

出版说明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是西班牙共产党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中国人民尊敬的朋友，人们亲切地称她为“热情之花”。她在1895年12月9日出生于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比斯开省的一个矿工家庭。1910年开始当缝纫工和女仆。正象她自己说的，她是“矿工的孙女、矿工的女儿、矿工的妻子、矿工的姐妹”。早在1917年她就在索莫罗斯特罗市加入社会主义组织，从1918年开始在当地工人报纸上以“热情之花”的笔名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工人斗争，走上了谋求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革命道路。

1920年4月西班牙共产党成立，伊巴露丽参加了创建工作，同年当选为比斯开省第一届党委会委员。1930年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并参加党报《工人世界报》编辑部的工作。1931—1935年间曾多次被捕入狱。1932年当选为党的政治局委员。1936年大选中当选为众议员。1936—1939年参加领导抗击佛朗哥法西斯武装叛乱和抗击德、意法西斯入侵的革命战争。她的口号“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成了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庄严誓言。

1939年反法西斯战争失败后，伊巴露丽和西班牙共产党其他一些领导人被迫流亡国外。1942年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逝世后，伊巴露丽接任总书记，1945年当选为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1960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至今，一直任西班牙共产党的主席。1977年西班牙共产党在国内取得合

法地位，伊巴露丽才得以回国并再次当选为众议员。

伊巴露丽的主要著作有1960年出版的回忆录《唯一的道路》和1984年她八十九岁高龄时撰写的《热情之花回忆录》(下称《回忆录》)。两部著作实际上是内容衔接的姊妹篇。第一部从她的童年写到1939年，第二部从1939年写到1977年。

两部著作通过记叙作者自身的经历，给我们描绘了西班牙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半个多世纪以来反压迫、反剥削、反抗佛朗哥独裁统治，争取独立、民主与社会主义斗争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反法西斯斗争的一幅幅壮丽画卷。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伊巴露丽和西班牙共产党人在这些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作出了重大牺牲，并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现在翻译出版的这部《回忆录》生动地记述了作者流亡国外近四十年的工作和斗争，字里行间渗透着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炽热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感情，坚定的革命信念，对祖国和人民无比热爱。中国和西班牙远隔万里，然而读者从《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一条无形的纽带把相隔万里的中西两国人民的斗争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无疑，这条纽带凝聚着伊巴露丽的心血。1956年和1959年，她两度亲自率西共代表团访问我国，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等同志亲切会见，为促进中西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我们感谢近九十岁高龄的伊巴露丽同志专门为《回忆录》中译本写了热情洋溢的《致中国读者》和题词。我们在伊巴露丽同志九十寿辰前夕翻译出版她的这部著作，作为献给这位热情之花的一束鲜花。我们深信本书将帮助我国人民进一步加深她对为西班牙人民事业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战斗一生的了解。

1985年4月

致中国读者

得知我的近作《热情之花回忆录》将译成你们的文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问世，在那遥远的、令人心驰神往的国家，将有许多朋友可以读到书中讲到的事情，听到这一好消息，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十分欣喜。

岁月在流逝，许多事情也随之从记忆中消失，然而在我几十年前几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短暂访问中，有机会观赏到你们国家那无与伦比的美丽景色，却终生难忘。

一想起我在你们国家认识的男男女女，他们那一副副闪烁着智慧、生气勃勃、笑容可掬的面孔，还有惹人喜爱的孩子们，就从我的记忆中跃然而出。我还记得他们问我西班牙的情况，我国人民的情况以及我们长期的反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斗争历程。他们对我们的斗争十分理解。

在我们内战战事犹酣的时期，我们收到了毛泽东和朱德同志代表中国人民给我们发来的亲切的声援电报，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来自战斗的中国的问候，给了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以巨大的鼓舞。他们当时正象你们一样，为了独立与自由，每时每刻都在艰苦地战斗。

在本书，我提到这样一个故事：1949年我因身患重病，在苏联一家疗养院养病，当时上海解放的消息传到了我的病榻前。决心砸烂帝国主义压迫枷锁的共产党和人民长达三十年的英勇

斗争达到了最高潮。我立即感到这一历史性胜利驱使一切革命者要活下去，要做乐观主义者，要对我们事业的胜利充满信心。

我相信，我在本书叙述的这些故事会打动中国读者的心，因为它们是我在四十年流亡生活期间，颠沛流离，漂泊于五湖四海，持续不断地工作与斗争的见证。当然，我也自知，我们在和你们相距万里的那些国家里所经历的事件，在某些方面可能还解释得不够清楚。

在我们被迫离开祖国的那个悲剧性的时期，我有幸耳闻目睹认识了本世纪伟大的革命人物，同他们交谈，向他们学习。

我亲身体验了各国人民对西班牙共产党人和西班牙人民斗争的积极而慷慨的支援。西班牙人民是第一个拿起武器抗击三十年代法西斯侵略的人民。朋友们的支持和援助给了我们难以想象的艰难条件下继续抵抗的力量。

今天，我已再度生活在西班牙的国土上，生活在我的同志们、劳动者和我国人民的怀抱里。现在，我年事已高，但我还是坚持每天为我的党工作。我想象不出还有别的生活方式。我从这里，从马德里，向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志们和朋友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如果我能知道，我的《回忆录》会引起你们的兴趣，使你们得到消遣，我就感到莫大的欣慰。

西班牙共产党主席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

(签字)

A MIS LECTORES CHINOS

Al llegarme la buena nueva de que mi último libro "Memorias de Pasiónaria" veía la luz en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y que los relatos que contiene, vertidos a vuestro idioma los podían leer muchos amigos de aquellas lejanas y apasionantes tierras, sentí sinceramente una gran ilusión.

Muchas cosas se borran de la memoria, con el correr de los años. Pero es imposible olvidar las bellezas incomparables de vuestro país que pude contemplar durante mis breves viajes a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hace ya algunos decenios.

En mi recuerdo resurgen los rostros sonrientes, vivos, inteligentes de las mujeres y de los hombres, el encanto de los niños que conocí en vuestro país. Recuerdo las preguntas que me hacían sobre España, sobre mi pueblo, sobre nuestra larga andadura de lucha contra la dictadura franquista que mis interlocutores comprendían muy bien.

Yo tenía presentes los mensajes de cordial solidaridad que en plena guerra civil recibimos de los camaradas Mao-Tse Tung y Chu-Te en nombre del pueblo chino. Aquellos saludos de la China combatiente fueron un poderoso estímulo para nuestros milicianos en las duras batallas que a diario librábamos, al igual que vosotros, por la independencia y la libertad.

En las páginas de este libro hago referencia al siguiente episodio: Hallándome gravemente enferma en un sanatorio de la Unión Soviética en el año 1949, llegó hasta mi lecho la noticia de la liberación de Shanghai. Y yo sentí que aquella histórica victoria que culminaba treinta largos años de épicos combates de un partido comunista y de un pueblo resueltos a romper el yugo de la opresión im-

... ..

perialista, obligaba a todos los revolucionarios a vivir, a ser optimistas, a tener fe en la victoria de nuestra causa.

Tengo confianza en que mis relatos, que son el testimonio de 40 años de trabajo y de lucha ininterrumpida en un exilio que se extendió por la dilatada geografía de nuestro planeta, lleguen al corazón de mis lectores chinos. Si bien soy consciente de que algunos aspectos de nuestro acontecer en países tan alejados del vuestro resulten insuficientemente explicados.

Dentro de la tragedia de la forzosa expatriación, he tenido la suerte de conocer personalmente a las grandes figuras revolucionarias de nuestro siglo, he podido hablar con ellas, aprender de ellas.

He sentido de cerca la solidaridad activa y generosa de los pueblos con la lucha de los comunistas españoles, del pueblo español, que fue el primero en hacer frente con las armas a la agresión fascista de los años 30. El apoyo, la ayuda de los amigos, nos dieron fuerza y energía para seguir la resistencia en condiciones increíblemente difíciles.

Hoy me encuentro de nuevo en mi España, rodeada de mis camaradas, de los trabajadores, de mi pueblo. Y aunque tengo muchos años, acudo todos los días al trabajo en mi Partido. No concibo otra forma de vida. Y desde aquí, desde Madrid, os saludo entrañablemente, camaradas y amigos de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Sería para mí una gran satisfacción saber que las páginas de "Mis Memorias" os ofrecen interés y os sirven de esparcimiento.



DOLORES IBARRURI
Presidenta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多·伊巴露丽《致中国读者》原文
(按原件缩小)

目 录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又一战绩 (巴斯克斯·蒙塔尔万)	1
致读者(伊雷内·法尔孔)	7
离开祖国	11
出卖的行动方案	13
从马赛到巴黎	16
开始新的阶段	17
议会常设委员会	17
莫斯科的约会	18
面貌完全改观的都市	20
同孩子们重逢	22
共产国际	24
革命的伟人们，我同格奥尔基· 季米特洛夫的谈话	25
联合的趋势	28
要是两个国际达成协议呢？	30
西班牙人民的伟大朋友马努依尔斯基	33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35

在意大利同陶里亚蒂在一起·····	40
同社会党和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会见·····	41
德国的第一任工人总统威廉·皮克·····	46
莫里斯·多列士·····	49
雅克同志·····	51
胡志明·····	54
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	56
黑山人维里科·弗拉霍维奇·····	57
来自远方的芬兰战士·····	59
安德烈·马尔梯·····	60
“革命的老一辈向年青人致敬”·····	61
瓦西里·科拉洛夫·····	62
我的朋友斯代拉·····	63
学习俄语·····	64
回忆克拉拉·蔡特金·····	66
纳粹分子进攻苏联·····	68
比利牛斯广播站的诞生·····	69
战争中的莫斯科·····	70
西班牙人·····	71
伪装成“蓝色师”的人·····	73
永远铭记在心的人们·····	74
全国大联合，全体西班牙人的和解·····	77
巴什基尔·····	79
我们迷航，来到鞑靼人村庄里·····	83
我的鲁文·····	84
我们失去了何塞·迪亚斯·····	90

他的最后一封信·····	91
何塞·迪亚斯的为人·····	93
年轻的领导人进入西班牙共产党·····	98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	102
我被任命为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	104
文明战胜野蛮·····	106
列宁格勒：九百个日日夜夜·····	108
共产国际自行解散·····	109
莫斯科圆柱大厅·····	114
在斯德哥尔摩·····	115
马拉加行动·····	116
圣地亚哥·卡里略·····	117
会见斯大林·····	121
漫长的旅程·····	123
原子时代的诞生·····	127
在解放后的法兰西·····	130
重大行动时期·····	131
和西班牙人民团结一致·····	137
毕加索的眼睛·····	141
“马基”·····	143
“沸腾生活的赞美者”·····	144
西班牙共产党的来历·····	147
和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在一起·····	150
一片废墟与旗帜招展的华沙·····	151
妇女们团结起来·····	155
斯堪的纳维亚的团结精神·····	157

国内外的西班牙妇女·····	160
女宇航员瓦丽娅·····	163
“十三朵玫瑰花”·····	164
我同社会党人弗朗西斯科·拉尔戈· 卡瓦列罗的最后一次会晤·····	168
我们将回到解放了的西班牙！·····	173
斯大林说我们是左倾分子，高傲·····	176
把合法斗争与地下斗争结合起来·····	178
嫩黄瓜的奇迹·····	180
斯大林来看望我·····	183
一段插曲：讲述历史·····	184
忆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国会议员们 到莫斯科去？·····	186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与我的悲伤·····	190
比利牛斯广播站沉默了·····	192
布加勒斯特使我着了迷·····	195
在人民中国·····	196
阿斯图利亚斯，站立起来的西班牙·····	202
西班牙宝贵的鲜血·····	205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211
全国和解·····	214
全国和解日的历史意义·····	216
当党的主席·····	218
向青年开绿灯·····	220
改正错误，同铁托再次会晤·····	228
胡利安·格里莫·····	231

罪行·····	233
我要求迁到马德里去·····	236
名誉博士·····	240
列宁勋章和国际和平奖金·····	244
打破礼仪·····	245
第一次分歧·····	246
同西班牙联系的桥梁·····	249
同拉斐尔·阿尔维蒂会见·····	251
难舍难分的告别·····	252
假发和眼镜·····	253
不适时宜的相遇·····	256
到千島群島去? ·····	258
一个坏脾气的丈夫·····	259
青年手臂和红旗·····	261
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一起·····	265
使馆代办害怕热情之花·····	270
活在心中的巴勃罗·聂鲁达·····	272
日内瓦集会·····	276
印度朋友·····	286
愿大地不要把他压得太重·····	287
在罗马度过八十岁生日·····	288
·····在莫斯科·····	294
公开露面·····	297
1001号案件·····	301
“返回”战斗·····	303
终于回国·····	309

我想念西班牙.....	310
“劈劈劈，啪啪啪，欢迎多洛雷斯回老家”.....	313
在阿斯图利亚斯.....	314
和赫拉尔多·伊格莱西亚斯在一起.....	317
我被选为阿斯图利亚斯的众议员.....	317
蒙特塞拉特修道院.....	318
在巴塞罗那同塔拉德利亚在一起.....	320
一位传教士给我写信.....	321
圣诞节前夜的故事.....	323
四十一年之后，再次进入议会.....	324
那是因为未来会成为过去.....	328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又一战绩

在巴黎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圣地亚哥·卡里略邀我参加祝贺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八十寿辰活动。祝寿活动是在1975年罗马人庆祝圣诞节的前夕举行的，它也是当时所谓“重返世间”的一个标志。对“重返世间”这个短短的“祷词”所包含的深刻内容不能等闲视之，尤其是因为“祷词”的学术定义是指“以虔诚之心向天乞灵的简短祈祷”。当时讲的“重返世间”意味着脱离昏暗的地下冥府，迎接光明的合法地位，说得干脆点，迈向光辉的现实生活。在西班牙的共产党，不管它用什么名称，叫西班牙共产党也好，叫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也好，在反对独裁统治而进行的漫长和无情的战斗中，都是主角，虽然不是唯一的主角，但确实是最始终如一的、受到佛朗哥独裁统治最残暴镇压的主角。从1939年开始，一直到1977年复活节，它在地下状态中度过了三十八个年头。在这三十八年里，它尽自己之所能和尽自己之所知去开辟民主变革希望的前景。从积极方面说，党的行动是人类最可贵的牺牲精神的榜样，对外，这种牺牲是声援他人的最高表现。从消极方面说，地下工作必然影响到党理解现实的机制，从而影响到它分析现实的能力。尽管共产党是一个有足够能力对付秘密工作挑战的政治力量，但它并不把秘密状态看成是最适宜于它活动的领域，更不把秘密状态看成是它立足的理想领域。

那时我们都在罗马。罗马城接待了从西班牙国内和欧洲各个角落来的几千名西班牙人。他们都是来向西班牙共产党的最高象征多洛雷斯·伊巴露丽致意的。与此同时，也利用这个机会，把八十大庆这支华尔兹舞编入题材更为广泛而且当时还问题成堆的一组舞蹈中去，那就是争取西班牙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意大利共产党费尽心机，安置了从西班牙国内出来的几百个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干部，以免在祝寿时辰到来之前就让冒冒失失的照相机暴露了这些人的身份，或遭到这样那样的不测或事故。至于普通党员、同情分子或只是出于好奇而来的有声望的人士，他们行动则自由得多，也因此我得以同阿方索·科明、霍尔迪·索莱·图拉、雷蒙·安娜利萨、安娜·萨莱斯结伴，愉快地重游罗马。有时连格雷戈里奥·洛佩斯·雷蒙多也同我们一起到特拉斯泰韦雷去散步。罗马街头张贴着意大利共产党署名的争取自由的标语，内容带有双重含义：赞助为多洛雷斯祝寿和怀念不久前被暗害的帕索利尼。因此，我们进行了两次感人的“朝圣”：一次是到地处僻野的一所罗马式大房子去，伊巴露丽向住在那里的干部“显灵”；一次是到帕索利尼受难和被害的奥斯蒂亚旷野去吊唁。

在那个时节，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具有三重性格：一个是胆怯地伸出手来告诉我她对作家和记者总感到十分害怕的多洛雷斯；一个是可以同几百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共产党干部进行平易而亲切交谈的多洛雷斯；一个是用由她一生的经历和我们党的历史所赋予她的权威控制着在罗马体育宫举行的群众性集会的多洛雷斯。我参加了卡里略和多洛雷斯的记者招待会，那次会上出现了第一个“奇迹”。奇迹两字应该打引号以表示对超自然的事物存在的可能性保持理性批判的距离。在记者招待会上，

有一位西班牙女记者提出了帕拉奎略斯监狱的问题，迫使卡里略站起身来作了强有力的回答。但他在口气上却仍是和蔼可亲的，这无疑是由于他的政治才能，同时了解卡里略的为人，就知道这也是因为那位女士有她讨人喜欢的地方。在记者招待会结束后，多洛雷斯同那个女士进行了内容充实的谈话，以致几个月后那位女记者竟成了《工人世界报》的经常的撰稿人。我不是用这个故事来证明多洛雷斯·伊巴露丽马列主义的天赋，而是作为下文的伏笔。

我必须提到的第二件事发生在上面讲到过的意大利共产党用以掩护从西班牙国内出来的干部的那所大房子里。伊格纳西奥·加列戈把我们带到那里。在热烈的气氛中，他请多洛雷斯进屋。这种热烈的气氛绝不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热情奔放的掌声和盈眶的热泪表露了三十八年来抑制在内心深处的那种共同的感情，表达了感情上的需要，需要承认多洛雷斯，因为承认多洛雷斯也就是承认了我们自己的身份，需要恢复多少时候以来在牢房里和警察局里度过的孤寂生活中掩藏在内心的或公开宣布过的一切。多洛雷斯立即同人们亲切地交谈起来，尽管伊格纳西奥竭力想缩短会见的时间。他一再说：“……因为多洛雷斯同志累了”，使那位所谓已经累了的多洛雷斯同志差一点发火。最后她决定不理睬伊格纳西奥的建议，她留了下来，同她的同乡唱起巴斯克的歌来，她问道：“这里有我的同乡吗？……”多洛雷斯就这样接过别人的话头，开始作了概括性很强的演说，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佛朗哥之死。

最后是在体育宫举行的大会。会场里坐满了流亡国外的党组织代表团和国内出来的党组织代表团。在掌声中大家互相问候，欢庆重逢。多少年来这是第一次冒着风险公开宣布自己是

一个党员或一个同情党的分子。这种兴奋的心情与其说出于政治原因，不如说是出于感情因素。不管同党的关系是深是浅，只要坐在那里，就说明是靠拢党的人。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团的一个姑娘讲了话。贝林格、阿尔维蒂和卡里略也讲了话，最后是多洛雷斯，自然是多洛雷斯讲话。这次她没有作即兴演说，而是念稿子。但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甚至荡涤了那种对神话和对过分夸大的偶像可能产生的嘲弄和距离。这是我第一次在群众性集会上听到伊巴露丽的声音，使我懂得了她力量所在的一个关键因素。不管她说的是什麼，她的声音本身就是至诚之音。会后我写了一篇短文寄给《胜利》杂志。这是西班牙报纸上第一次载文直接赞颂共产党的领导人，而这个人又恰恰是多洛雷斯·伊巴露丽。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发表这篇文章是带冒险性的，因为《胜利》杂志已遇到停刊的严重威胁。并且我们当时还将受到佛朗哥死后过渡时期的打击。但我当时受到社长何塞·安赫尔·埃斯库拉和副社长阿罗·特克格伦的支持，那篇对罗马集会的简短描写，使缓慢的“重返世间”的活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我记得在读完豪尔赫·森普隆所著的《费德里科·桑切斯自传》时，我得到这样一个印象：森普隆拿着棍子四下里乱打一气，唯独对一尊塑像手下留情，那就是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塑像。森普隆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也不是出于自觉，而是出于文学考虑。因为留下这位受人尊敬的年长妇女的形象，对森普隆是有利的，她不卷入政治纷争，而且站在超脱当时时机的高度，足以使森普隆几年之后可以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向她热情致意。也因为森普隆崇敬这个人物，尽管他的书从头到尾都贯穿着破除迷信的思想。有一次我曾具

体地同他谈过这个问题。他用颇为风趣的口吻对我说，在女人和男人之间，他总是偏爱女人的。也许森普隆也象我自己以及其他许多被多洛雷斯称之为“漫不经心的知识分子”一样，在这么一个历史人物面前，不由自主地怀着敬意，而这种例外是没有什麼准则可循的。

因为，多洛雷斯·伊巴露丽为工人运动、为共产主义向世界各方发展提供的共处和批评性和解的观点，首先使用的就是语言。初期战斗中的多洛雷斯是一位来自人民的妇女，她把自己女工处境的现实上升为阶级觉悟，并且有天赋的才能，用人民群众懂得的语言和行动表达出来。事情就这么简单，但又是这么难以做到。多洛雷斯有着特别使作家和电影工作者关注和迷恋的东西，那就是真实性，总是表达真实情况的语言。多洛雷斯纯朴的为人使你信任她，正因为这样，她首先受人民大众的信任。凡目睹她战前无所畏惧地投身社会斗争的人们，凡看到她在内战期间所起的精神上的象征作用，后来又在西班牙共产党激动人心的历史中起着重心作用的人们都信任她。甚至现在党处于分裂和危机时期，多洛雷斯·伊巴露丽仍然是精神支柱。西班牙共产党（过去这个党敢于对抗独裁统治，为西班牙的民主觉醒、为重建理性作出贡献）内任何一部分人都不敢攻击她。多洛雷斯仍有可能成为西班牙共产党人日益需要重新团结统一的黏合剂。

有时我使用了“神话”或“象征”这一类字眼来形容象多洛雷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看到在共产党的队伍中，有人对此有所抵触，不愿意接受，认为这些词有非现实的含义。这种看法并不对。神话是超自然的，但它总是建立在某种现实的基础之上的。而象征这个词则概括的幅度很宽，包含着多层含义。如果

不知道她出身于一个生前注定要沉默的社会阶级，那么就无法理解多洛雷斯。人民接受那些对周围发生的事物以及对应该如何改变现实有全面看法的天然形成的领袖。这就是那位矿工的女儿、矿工的妻子的情况。她出身于天主教徒和卡洛斯派家庭。忽然有一天她发现自己可以成为那个受剥削的沉默阶级的天然发言人。她受尽了现实之苦，从而善于了解现实，并能够解释现实，以堪称楷模的方式表现了阶级觉悟的提高。这就是产生多洛雷斯这个象征的真正奥秘。与此同时，还要加上她那魔法似的声音，她在那个时代的高大的人民妇女形象，以及可以在某些时候超脱不可避免的政治交易又与他人同甘共苦的伟大秉性。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回忆，具有生动的历史价值，这种价值使这本书在现时和将来都有科学意义。也许历史学家们会指责她对处理党内危机情况故意采取审慎态度。谁要希望看到那一类的书，那是看错了作者，当然那一类的书也是需要的。多洛雷斯把这本书当作一面镜子。每一个共产党人，不论他在党的历史上是不是曾经掉过队，都能够照一照这面镜子。党的历史源远流长。在这本书里含蓄地呼吁共产党恢复自己的面貌，更确切点说，呼吁共产党在民主制度下能使我们在这样一个接近真正的现实从而接近理性的有利时期，恢复自己的面貌。尽管从黑暗走向光明也许还需要有一段令人痛心的重新适应的过程。

巴斯克斯·蒙塔尔万^①

^① 西班牙当代的名作家。——译者

致 读 者

一年多以前，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同我谈到她打算写一写从1939年到我们返回西班牙的这段令人难以置信地复杂的四十年里某些亲身经历的回忆。她说她经常听到人们问起，“那么1939年之后又是怎么回事呢？”她想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这就是用某种方式继续她在1960年出版的《唯一的道路》中的叙述。

多洛雷斯坚持说，她并不想写自传，也不想作历史的或理论的深入分析。她愿让读者从她的新书中看到她在内战之后各个阶段生活的主要情况；用简单明了和有趣的语言来叙述她的经历和轶事。

她建议我同她合作。也许这是因为我们相识五十年来，同甘共苦，一起工作，一起旅行，一起渡过那艰难复杂的处境。在某种程度上，我亲眼目睹热情之花的经历，是她那如此丰富、如此辉煌，同时又是如此艰巨和如此痛苦的生涯的见证人。她是“本世纪最优秀的西班牙妇女”。我这么说绝不是夸张。我曾经在最遥远的国度里，听到各种不同思想的人们用各种不同的语言说出了同样的或类似的话。

她所讲的“他们绝不会得逞”这句话，已经传遍世界各个角落，迄今仍是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战斗口号。

有些老同志会回忆起，当年年轻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在西班牙共和国的议会里作第一次发言时，引起了政界多大的轰动。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写道：“妇女进入议会了。”

人们给热情之花冠以“传奇”、“神话”的字样。她高大的形象是从从来没有屈膝过的西班牙、劳动人民的西班牙的真正代表。她的性格是穿着丧服的母亲同杰出的演说家融为一体，是具有出众的政治智慧的领袖和作为矿工的女儿和妻子的女革命家融为一体。她的口才和勇气使她成为传奇式的妇女，就象拉斐尔·阿尔维蒂所说的，“为了拯救生灵，她把儿子献给死神”。这位妇女鼓舞着世界上最优秀的进步诗人，鼓舞着杰出的文豪、雕塑家和知识分子。

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肩负很高的政治责任。她担任过西班牙共和国议会的副议长，共产国际的书记处书记，西班牙共产党的总书记，后来任主席。在1977年新民主议会中任名誉副议长。她还是数不胜数的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她经常作为西班牙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国际上最重要的代表大会。

我们看到她同一些领导人进行交谈或一起工作，其中有些已成为传奇人物，如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毛泽东、陶里亚蒂；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如胡志明、铁托、菲德尔·卡斯特罗；国务活动家如尼赫鲁、亨利·华莱士、勃兰汀或西班牙的领袖人物如阿萨尼亚、康巴尼斯、拉尔戈·卡瓦列罗·普列托、阿吉雷、加西亚·克希多、拉莫内达、何塞·迪亚斯、塔拉德利亚斯。

在一些国家里多洛雷斯·伊巴露丽象国家首脑、西班牙的代表一样受到各种礼仪的接待，安排她住在十分豪华的住宅里，而她反而总是感到不舒服。她到波兰时，贝鲁特总统邀请她住在华沙的贝尔维莱德宫中，使她感到十分困惑。当她回到亲爱

的莫斯科她那经常住的小房子里同她家人在一起时，她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应该说明一点，宫殿和奢华的住宅在热情之花永不疲倦的旅行中，只是凤毛麟角，她更经常地住在好朋友和好同志的简朴的家中，或象秘密生活所要求的那样伪装起来躲在一个偏僻的不舒服的角落里过夜。

读者们可以从这本书中看到，多洛雷斯在为西班牙重新获得民主而进行的永不间断的斗争中，不得不飞行几千公里（并不总是坐喷气机），奔驰在永无止境的公路上，飘洋过海，发表数不清的讲话。她的声音，她那无人能模仿的银铃般的声音，使人激动，惊讶和动情，甚至使那些经过斗争磨练和经历过千辛万苦的生活的男男女女也会流泪。我认识不少人，有男的也有女的，他们感到必须亲自告诉多洛雷斯他们是怎么成为共产党员的，有些人是由于在比利牛斯广播站的广播中听到了她的声音，也有的人想让她知道他们在狱中受折磨的岁月，向她表示他们对社会主义和自由的信念。

我们这些在热情之花身边生活的人都知道，尽管她有名誉、“传奇故事”，受到欢呼和礼仪接待，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到她的为人，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她从来没有丢掉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同劳动人民一起斗争和受难的妇女的纯朴品质，她一直感到自己同西班牙，同她所怀念的西班牙和她所热爱的巴斯克紧密相联。

同时，突出这位杰出的妇女在政治上的主角地位是责无旁贷的。由于她对新事物的敏感性，懂得不能死抱住陈旧过时的东西不放，善于掌握我们时代的现实，因此她对维护西班牙共产党的团结，对发展和革新西班牙共产党，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一些有权威的领导人曾断言，如果没有她，在漫长的秘密工作和流亡生活中，党就不可能经受住强烈的冲突和逆境。

我想许多人还会惊讶地看到在多洛雷斯·伊巴露丽这些个人的叙述中，没有一处有怨恨的语言。她前后一致地、宽厚地叙述着发生的事件。她以自己的资历和丰富的经验和宽阔的胸怀，对人们作出判断。她受到过法西斯和反动派的辱骂、污蔑和攻击。但她谈论别人时却没有敌意。她知道不可能期待敌人和对手给她献上鲜花。她并不在乎对立面的攻击。她一再地说，她认为，“再说，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

她知道她得到朋友、许多朋友的爱戴，得到劳动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爱戴，因为她天天都能感觉到这一点。更主要的是她感受到共产党的同志们的温暖的友情，而她在六十四年前就是这个党的创始人。

伊雷内·法尔孔^①

^① 多·伊巴露丽的秘书。——译片

离开祖国

在《唯一的道路》最后几页结尾，我提到一群游击战士如何在莫诺瓦尔机场同我告别：

“向你致敬，热情之花同志，我们会再见的。”

我同他们一个个拥抱。他们都是我的亲人，都是我的同志、朋友、孩子。我只得同他们分手了。同其中的许多人这将是永别，同另一些人，又谁知何时才能重逢？

我又加上这么一句：

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历史上光辉而悲惨的一页。斗争的新阶段开始了。倒下去的人是不可战胜的。

我们乘“龙”型飞机在离开西班牙的东部海面飞向奥兰时，不得不冒佛朗哥海军炮击的危险，他们想阻止我们飞离。

在这次伤心的旅行中，陪伴我的有法国共产党议员让·卡泰拉。他带着人道主义的使命来到西班牙声援反法西斯战士，帮助他们撤退。后来这位令人不能忘怀的同志战斗在法国抵抗运动的最前线，在希特勒入侵者的枪弹中阵亡。陪伴我的还有保加利亚的斯托扬·莫涅夫·伊凡诺夫，又名斯捷潘诺夫。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共产国际的代表。我们亲昵地叫他“黑炭”。随着我们一起走的还有巴斯克的一位年轻领导人赫苏斯·蒙松。

我抵达奥兰的消息引起了一次同情西班牙共和国的盛大示威。人们把我们包围起来，甚至士兵们也悄悄地给我递过来他

们的母亲或女朋友的照片要我在上面签名留念。

惊慌的法国当局赶紧把我们转移到停泊在奥兰港口的另一艘船上，准备把我们送往马赛。

第二天中午(刚巧是1939年3月8日)伊雷内·法尔孔来同我们相聚。她是当天清晨到奥兰的，也是乘的一架“龙”型旧飞机，同行的还有弗朗西斯科·罗梅罗·马林、拉蒙·索利瓦和安赫林·阿尔瓦雷斯。前两位由于是人民军的军官曾被扣在军事要塞中。

我问伊雷内是怎么打听到我的下落的。因为我离开莫诺瓦尔时，她在阿尔瓦塞特完成一项紧急的使命。待她回到埃尔达时，接到任务要她转移到奥兰和尽一切可能找到我以便陪伴我一起旅行。她第二天早晨才开始动身，因为她和其他三个同志要乘的那架“龙”型飞机晚上不能飞行。他们同游击战士们围着篝火，等着黎明的到来，同这些勇敢的人进行了交谈。一张我在上飞机前给游击战士的米什兰地图成了他们的护身符。

在抵达奥兰之后，法国警察把伊雷内转移到一艘大海轮上。海轮上的情景令人十分吃惊。船上满载着几百个男人和妇孺。她同他们进行了交谈，知道他们都是卡塔赫纳人，是当地法西斯分子发动政变时，惊慌地从那里逃出来的。他们坐上各式各样的船，只有老天爷才知道他们是怎么到的阿尔及利亚海岸的。这时他们坐在木凳上，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命运。

港口的工人通过带着铁栅的窗口递给他们枣子和大西洋沙丁鱼，表示友好的支持。

一个阿尔及利亚人悄悄地同伊雷内打招呼，对她说，“我认识你。”伊雷内赶紧问她，“多洛雷斯在那里？”

“热情之花？难道你不知道吗？昨天她到奥兰的时候，这里

可热闹了。所有的人都出来向她致意。还举行了一次大示威。她现在在一条法国船上，再隔几个小时就要开船。她都把有的人吓破胆罗！”

从这时起，伊雷内就要求把她带到港口，希望能碰到我。她终于在这条法国船离开奥兰前找到了我。

出卖的行动方案

我们住的是一间三等舱（因为我们的钱不够住更好的房间）。我们就这么不断地航行……向未知世界驶去。最后几天的紧张经历，多少个不眠之夜，同最亲近的人、同故土心碎的别离，以及为那些留在西班牙的同志的担心，阵阵忧思向心头袭来。还有今后怎么办的问题，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呢？如何将斗争继续下去呢？此外，还有一种令人忧伤的哀愁：从此刻起我们都成了被迫要在别国的土地上乞求栖身的流亡者、异乡人……

但是我们的事业终将胜利的信念使我们仍然坚定不移，相信我们的人民是会胜利的。

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流亡者里瓦斯公爵^①写的诗句。他在一百多年前乘着一艘英国邮船离开直布罗陀的海湾。这首诗是这样的：

我不断地战斗，
为反对一群狂热、野蛮、暴虐的匪
徒而战斗。

^① 里瓦斯(1791—1865)是西班牙诗人和剧作家。——译者

尽管我的语言平凡，
但也许还能为保卫可贵的自由奋斗，
使可怖的专制统治颤抖……

当有人敲舱门时，这样的思虑正笼罩着我们的的心灵。几名法国水手走了进来。他们都是壮汉子。海洋上风吹日晒以及艰苦的生活使他们变得黝黑。他们冲着我们微笑。

“我们是船上共产党支部派来的代表团”，他们自我介绍说。我们互相拥抱，一缕光芒划破了黑暗。

“我们代表全体船员向你们表示支持，你们若需要什么，可以随时吩咐……”

很快我们就了解到朋友的帮助是多么必要。

他们给我们通报了情况，“这条船的船长是个反动派，对热情之花不怀好意……”

他们担心在船驶近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首府时，船长会把我出卖给法西斯分子。

他们又补充说，“幸亏无线电报员是个党员，我们已经提醒他，如果知道有值得怀疑的信息，就及时通知我们。”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的客人用坚定的口吻向我们保证说，“船员们就会起来接管这条船。”

可想而知我们对这些具有崇高品质的同志是多么感激。法国人民积极声援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的活动还在继续进行着。

这些水手们一再地来探望我们，给我们带来消息和食物，并问我们需要什么。

最后他们满面春风地进来告诉我们，我们脱离了危险。看来那个船长不敢贸然执行“出卖的行动方案”。

两个月前，1939年1月，我也碰到过类似的“行动方案”，也没有得逞。

那次我们乘一架小飞机离开巴塞罗那的飞机场飞往马德里。伊雷内同我一起旅行。我当时的使命是在首都着手筹备一次党的会议。

飞机起飞前不久，驾驶员不知为什么走开了。有一个同志过来惊慌地对我们说：“这个驾驶员可靠不住！”

不久，驾驶员回到他的座位上，飞机开始起飞。

我同伊雷内对视了一下，想猜测当时彼此的心情。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把别人送的小手枪，我们在口袋里摸到了它，心就稍定一些。我们有了可以自卫的武器。

我们低声地交换了一下看法。

“如果把我们弄到佛朗哥占领的地区……那怎么办？”

我们都明白，不管怎么样，到那里就得送命。

旅程简直没有尽头……

最终……到了阿尔瓦塞特。

中南区空军司令在迎接我，我记得他叫卡马乔。

他敬过礼之后，脸上一片惊讶的神色。

“你怎么坐这架飞机来？这个驾驶员是个靠不住的人。”

我们当时的疑心得到了证实。

但这个“靠不住”的家伙，无疑不敢执行“行动方案”。

我还记起在卡萨多叛乱之后发生的另一件事。他下达命令扣留共产党领导人。理所当然我也有份。我由曼努埃尔·德利卡多陪伴着坐汽车离开洛斯多洛雷斯，这是同卡塔赫纳交界的一个地方。我们直奔埃尔达去同我们的同志会合。

一支巡逻队要我们停车：

“证件!”

一个卫兵探头到车内来。他看到了我，他严厉的脸色马上变成微笑，惊呼起来：

“啊，是热情之花！对您就用不着来这一套。让他们通过！祝您一路平安！”

那些卫兵只当不知道要找的正是我。真可以说每走一步我们都获得了新生。

从马赛到巴黎

在马赛港一大群人等着接我们。广播电台和报刊已经报道了我们离开西班牙的消息。同志们和朋友们热情地欢迎我们，争着要款待和帮助我们。

马赛的共产党议员弗朗索亚·比尤把我们带到他家里，他一家都象自己人这么接待我们。

当天我们又接着坐火车到巴黎。车站上又有许多同志和朋友在等着我们。不一会儿，就看见我们的好朋友，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向我走来。他满脸笑容，蓝眼睛里流露出那和善的目光。拥在他周围的还有其他许多我熟悉的同志，其中有我们的胡安·莫德斯托将军，他不久前抵达法国首都。

当时还围着许多好奇的人，自然还有警察。他们自告奋勇地来“保护我”，询问我的计划和住处。

我们不引人注目地离开了车站。法国同志把我们安顿在巴黎市议员列昂·莫维的家里，他同他的夫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我们离开西班牙时一件行李都没有。由于最后几个星期不断转移地方，我们的两个箱子都丢失了。

开始新的阶段

我首先考虑的是同正在法国的党领导机构的同志们相会，并同当时由于病重而在莫斯科疗养的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取得联系。

我们必须努力重建所有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行动，首先是工人阶级所有组织之间的联合行动，以便在新的阶段继续在西班牙进行斗争，尽管开展抵抗运动的条件是十分艰巨的。

议会常设委员会

3月31日，我作为副议长，同安东尼奥·米赫一起参加了已流亡在外的议会常设委员会会议。会上内格林博士作了长篇报告，详尽地谈了从加泰罗尼亚失陷到内战结束的历次悲惨事件的结局。

内格林说，“卡萨多将军抵达马德里时，曾企图要我相信有人在策划阴谋，说他决心要粉碎这样的阴谋活动，他已经把一些发表过查禁的宣言的人关了起来……”

“……当我知道卡萨多先生查禁的两个宣言之一也包括我

2月23日在非格拉斯的发言稿时，我大吃一惊……就是说，政府的官方文件也给查禁了。另一方面，从我抵达马德里前几天出版的报刊上，可以看出卡萨多很少关心马德里前线的情况。在他的领导下，到处弥漫着同法西斯势力和某些一贯不满的分子勾结在一起的新叛乱分子准备阴谋暴乱的气氛……”

“……说明卡萨多这个人正在作准备。他同参谋部的另一个准备叛乱的领导人有直接的联系……通过这些代理人对卡萨多‘做工作’，说服他可以通过各派军人彼此之间的直接联系来取得和平……”

那次会议开得很激烈，尽是互相责备、埋怨和指控。

显然在失败之后，人们不可能冷静地判断已经造成的局面和重新协调一致。

这次会上议长马丁内斯·巴里奥斯提出辞呈，由费尔南德斯·克莱里戈接替他的职务。

在我们需要完成的紧急任务中，最主要的是要尽量把仍然留在国内和在法国难民营中过着非人生活的战士搭救出来。我们急需让他们离开难民营，帮助他们转移到愿意提供避难的国家中去，尤其是到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和其他一些拉丁美洲的共和国中去。不言而喻，还有苏联，尽管多数人宁愿留在法国。当然……不是留在集中营里。

莫斯科的约会

那时我们准备在莫斯科同党的总书记何塞·迪亚斯一起开

一次会。

我原打算只作简短的旅行，会议一结束就回法国。

为此目的，我悄悄化装一下到了勒阿弗尔港口。我戴了一顶当时法国所有妇女都喜欢戴的帽子和一副黑眼镜，由一位很体面的男同志陪我同行。港口停着一艘苏联船只。船上已有不少以前西班牙的战士，他们选择移居苏联，待有可能时再回西班牙。

我们当时一点都没有想到这么快就会爆发使我们吃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严重的事件。但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我不得不留在莫斯科，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何塞·迪亚斯和我基本上都致力于西班牙的问题。

有一些西班牙共产党的军人和领导人已经到达莫斯科，其中有恩里克·利斯特尔、胡安·莫德斯托、德尔·巴里奥、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维森特·乌里维等等，有的人我现在已记不清了。他们来的目的是要同何塞·迪亚斯，同我以及同共产国际的代表一起讨论共和国失败的原因。这次会开得很别扭，时间拖得很长，气氛很紧张。每个人谈了自己的经历和批评性意见，这些意见必然是主观的，往往同其他同志的意见发生冲突。当然最后也没有得出明确和具体的结论。大家都知道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进行思考，此外还需要对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事态的结局有全面的了解，才能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并得出客观的判断。

柯多维利亚同志和保加利亚的斯捷潘诺夫同志也在那次会上谈了他们的经验和看法，我在后面还要提到他们。

会上选出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一致同意起草一个讨论纪

要。但由于意见分歧太大，纪要没有得到与会者的通过，因而也就没有公开发表。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后来看了纪要草稿，有好几处他也不赞成。

总而言之，大家认为失败的决定性因素，从外部来说是意、德入侵和各民主国家采取不干涉政策；从内部来说是工人阶级和左翼力量团结不够，最终导致人民阵线的破裂。

面貌完全改观的都市

在俄国人民反对拿破仑入侵的战争中被大火夷为平地的莫斯科，今天又得到新生，在古老的建筑物旁矗立着各种式样和风格的现代建筑。

我们每次经过红场时，都赞赏圣巴西里奥教堂的令人神往的彩色屋顶。红场是一个对我们颇有吸引力的地方，一方面是由于它的革命传统，另一方面是由于它的美丽（俄文 *Krásnaia Ploshad* 的准确译法应为“美丽广场”）。

在红场上，用红色花岗石和朴素的线条建筑起来的列宁陵墓，每天都受到从这个幅员无限辽阔的国家各个角落来的几千个苏联人的瞻仰。

在克里姆林宫金色屋顶上，那用红玻璃制成的光芒四射的五角星向我们致意，它们点缀在克里姆林宫四座最高的塔尖，代替了作为沙皇专制象征的双头鹰。

在克里姆林宫围墙前面的驯马场（*manège*）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人们讲解说，它是在上个世纪根据我们的同胞，一位西

班牙建筑师贝当古的设计建筑的。现在它成了展览厅。

那举世闻名的大剧院以及在那里上演的优美的芭蕾舞和歌剧，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世界。我们兴奋地看到在金碧辉煌的池座里坐着包着头巾的农村妇女，坐着工人、知识分子、衣着随便的苏联人，而在他们旁边，则坐着从世界各国来的盛装的旅游者和音乐迷。

我的工作和斗争不允许我经常去剧院，更不用说去听歌剧。我到过巴黎歌剧院，那是在战争期间某次去做政治宣传时我的同志们带我去的。

在故乡加利亚达，我喜欢去看一个名叫“联谊社”的业余剧团表演说唱。

对我来说，而且我相信对大多数的西班牙流亡者来说，大剧院的演出给我们一种新的奇妙的感受，使我们很快就迷上了。在那里，我们可以欣赏举世闻名的艺术家，如芭蕾舞明星卡琳娜·乌兰诺娃、玛雅·普里谢茨卡娅、列佩申斯卡娅、谢苗诺娃、A·梅赛列尔；歌唱家米哈依洛夫、科兹洛夫斯基、列梅舍夫、利西齐安。我们可以在《伊戈尔王子》《泪泉》《伊凡·苏萨宁》《蝴蝶夫人》《卡门》等等的演出中欣赏他们的艺术。

当然，吸引我们西班牙人的不只是大剧院。

在通向高尔基大街的一条狭窄的小街上，有一座吉卜赛人的剧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座剧院的名字叫“罗曼”，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所吉卜赛剧院，演员又有精湛的演技。

西班牙人安赫尔·古铁雷斯，1937年被苏联搭救出来的儿童之一，有一段时间曾任罗曼剧院的艺术指导，当然那时他已不是个孩子，而是在莫斯科受过专业训练的青年了。这些吉卜赛人十分深刻地领会了洛尔卡在他的作品《血婚》中表达的忧伤情

感，出于他们尚不清楚的血缘关系，他们同这位遭卑鄙谋杀的格拉纳达诗人心心相印。舞台的幕布和道具给人以深刻印象，这些都出自阿尔维托·桑切斯之手。罗曼剧院特别受西班牙人和苏联人喜爱的一出戏是塞万提斯的《吉卜赛姑娘》，由塞萨尔-马利亚·阿科纳达改编成舞台剧，他属于流亡在莫斯科的1927年这光辉的一代。

有名的斯坦尼斯拉夫剧院用俄语演出了弗德里科的剧本《贝尔纳达·阿尔巴之家》，舞台设计也是出于阿尔维托的才华，那已经是七十年代的事了。

巴勃罗·聂鲁达十分欣赏吉卜赛剧院和阿尔维托，他曾为后者写过一首诗说：

……心扉敞开了，
从西班牙人民中诞生了
他们的儿子——托莱多的阿尔维托·桑切斯。

洛佩·德维加、卡尔德隆、蒂尔索过去和现在都是莫斯科以及苏联多民族的领土上其他舞台的广告上经常出现的名字。举世闻名的艺术剧场首次演出了译成俄文的安东尼奥·布埃罗·巴列霍的《理性之梦》。

同孩子们重逢

到莫斯科能重新把我的孩子鲁文和阿玛娅拥抱在怀中，对我是莫大的欣慰。

鲁文作为志愿人员参加过战斗，他在莫德斯托将军指挥的

埃布罗军的一个山区连里当士官。在越过比利牛斯山后，同其他许多西班牙战士一样，被收容在法国阿尔日莱的难民营中，在那个不适宜人居住的海滨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没有，气候恶劣，食品短缺。他后来同其他的战士一起逃了出来，到苏联同他的妹妹会合。

在长时期的分离之后，我又同孩子们在一起过起了家庭生活。我们住在市中心基斯洛沃茨基街的一套公寓里。何塞·迪亚斯同他一家也住在这个大楼里。

阿玛娅上大学，鲁文在一所军事学校学习。

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西班牙流亡者都是我的亲人，我得帮助他们过正常化的生活，把他们安顿下来，找到同他们专业对口的工作，进行技术训练或学习。由于流亡出来有各行各业的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专业人员、青年、妇女、退伍士兵等等，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因此要解决涌现出来的各式各样的问题是不容易的。

西班牙的流亡者在苏联得到慷慨和人道的接待。在欧洲其他国家却不然，在那里我的同胞们受到各种磨难。

苏联的工会组织西班牙人到乌克兰的一个休养所休养几个月，由医务人员进行护理。他们在那里可以得到治疗，恢复精力，并开始熟悉那丰富的却是难学的俄语以及东道国的习俗。

我经常要到我们的儿童和青年所居住的公寓去探访，想用我的关怀和规劝来代替他们所需要的母爱和亲人的关切。我努力使他们什么也不缺，并关心他们能健康地成长和好好学习。可想而知，我们每走一步都遇到各种问题，如感情上的关怀，性格上的培养，人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气质上的问题。我们同苏联同志在一起试图对每一个问题都找出妥善的解决办法。

战时疏散到苏联去的西班牙儿童都安排在公寓里，有西班牙和苏联的教育员和老师帮助他们。因此他们在苏联的大专院校上课外，还能保持祖国的语言，这真是一个“奇迹”，当时专门为他们编了西班牙文的教科书和文学读物。

我们的孩子们不断地受到周围苏联人的关怀，苏联人以他们各族人民举世闻名的好客精神照顾他们。当孩子们走在街上时，由于带着苏联人所不熟悉的巴斯克小帽子，马上就被人们围起来，给他们糖吃，抚摸他们。后来不得不把巴斯克小帽换成苏联儿童带的帽子，以免这些小西班牙人变成特殊儿童。

我们在所有这些工作中，不断地得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志和苏联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马努依尔斯基同志的可贵帮助。

共产国际

生活的变化迫使我完全改变了活动和工作的节奏。从前线的战斗、议会的激烈论战和在西班牙同群众的天天接触过渡到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我同何塞·迪亚斯一起，被吸收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我们过渡到有条不紊的工作，进行学习和理论上的探讨，了解和深入研究这个紧张而复杂的时期里出现的国际问题。

所有这些对我说来都是新鲜的，但说心里话，要做到可并不容易。每天早晨我都到我在共产国际大楼（现在的马列主义研究院）里一间宽敞而舒服的办公室去上班。然后是开会、讨论、

看书、思考问题和密切地(从如此遥远的地方)注视着祖国每日的动态。

那个时期印象最深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代伟大领袖人物的身边工作。过去我只是从他们的讲话或著作中熟悉他们,或者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见过他们,而现在我天天同他们在一起工作,直接聆听他们的教诲,从他们长期而丰富的经验中吸取教益。

革命的伟人们,我同格奥尔基· 季米特洛夫的谈话

我是1934年2月在莫斯科结识季米特洛夫的。这是一次短暂的会面,当时这位保加利亚传奇式的人物受到苏联兄弟般的接待。

一年之后,我十分高兴地作为以何塞·迪亚斯为首的西班牙代表团的团员出席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聆听了季米特洛夫亲自作的报告,这个报告成了各国共产党在战略上和策略上的大胆转折,是对宗派主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批评。报章杂志迅速传播了那篇讲话,在全世界引起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对希特勒在德国建立统治及其侵略性深感忧虑的一切舆论的震动。

那位非凡的领导人享有极高的威望,他把纳粹政府“毁灭共产主义”而一手制造的莱比锡审讯变成了全世界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审判。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单枪匹马,在被幽禁和受

虐待的情况下，用无情的逻辑，出色地捍卫了共产主义思想。他怀着坚定的革命意志，就在法西斯法庭上义正辞严地击败了纳粹头目戈林和戈倍尔，使曾经下令要将这次著名的审讯向全世界转播的法西斯宣传部门的头头惊惶失措，大失所望。

在法西斯的法庭上，季米特洛夫宣告“历史的车轮将滚滚向前，直到共产主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我们记得当时西班牙也开展了群众运动，声援被纳粹分子指控为在国会纵火的季米特洛夫、台尔曼和其他被捕的同志。西班牙城市的墙上涂满了要求释放这些战士的标语。他们的名字是难写的，但他们的斗争对所有爱好民主的人来说都是易于理解的和一目了然的。一位西班牙共产党的青年律师作为观察员出席了莱比锡审讯。

通过同这位共产国际总书记日常的直接接触，我更清楚地看到了季米特洛夫智慧和人道的价值，他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对革命运动发展的贡献以及他对具有时代意义的问题宽广的思路。

我在同季米特洛夫的交谈中，进一步深入了解到他在德国的切身经历和在纳粹监狱中的幽禁，利用这段时间对新的国际局势的严重性的思考，使他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拥有两个大的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德国，工人阶级会遭到失败？为什么群众不支持共产党的方针？社会民主党搞改良主义，反对共产党人，认为纳粹主义不可能取得胜利，这些在当时都是人所共知的。

当时共产党建议宣布总罢工，同时在1933年1月组织柏林工人举行群众性的大示威，示威队伍一直走到卡尔·李卜克内西故居，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却禁止它的下属组织同共产党

采取联合行动。

但是不应忘记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所犯的错误。经过思考之后，季米特洛夫得出结论，认为工人阶级为保卫受到法西斯主义威胁的民主权利而同其他一切进步力量建立联盟已刻不容缓。

这些思考帮助季米特洛夫对错误的宗派主义的评价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如把社会民主党人称为“社会法西斯分子”，或认为只需要同社会党基层建立统一战线而不需要去争取和团结社会党的领导人进行共同行动。他清晰地看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采取同各个国家解决历史任务相适应的不同道路和不同方式。他已经觉察到从莫斯科来指导各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困难的，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各国共产党应完全在其本国领导机构领导下根据对本国具体情况的分析来行事。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书记处的讨论中检验和发展了他的主张和想法，当然在讨论中大家的意见并不总是一致的。他就这样制定了向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实行伟大转折的政策，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的新的战略和策略。他同我们运动中的狭隘的教条主义决裂，为各国共产党开辟了进行革命的联合活动的前景，这将有利于共产党成为在国内有深厚根基的政治力量。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的最后阶段刻下了他自己的印迹。

我那时才回忆起在西班牙正处在内战的时候季米特洛夫给我们打去电报，强调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我们，而共产国际的代表只是顾问。

联合的趋势

显然三十年代西班牙和法国反法西斯斗争的发展和联合趋势的出现就已经引起季米特洛夫的注意。那种活动在许多方面证实了他的预言。

1933年冬西班牙已经出现了联合起来的新情况，虽然只是发生在市镇一级：大选中（全国性的大选由右翼取胜），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共和党人在马拉加建立了一个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或称为竞选集团，使马拉加的左翼有好几个当选为西班牙议会的议员，其中有我们的同志卡耶塔诺·博利瓦尔医生。

这次经验标志着日益发展的联合趋势。之后不久，这一联合趋势得以实现。劳动者统一总联合会集体加入劳动者总联盟，人民阵线公约签订了，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同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并成立了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以及成立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所有这些联合对三十年代西班牙民主的发展具有带历史意义的重要性。

季米特洛夫以极大的兴趣密切注视着西班牙工人和民主力量的演变。他很愿意听听我们的意见，邀请我们参加共产国际书记处的讨论。他在文章中举了西班牙的经验为例。这些经验在实践中证明了他关于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的主张和理论的正确。围绕由于法西斯主义上台而出现的重大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充实和检验。

季米特洛夫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领导人保持很有意思的

通信，并同由圣地亚哥·卡里略领导的西班牙社会党青年联盟保持联系。

在我们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不断地开展活动，支持拿起武器的西班牙人民。他经常告诫我们要扩大反法西斯联盟，把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把西班牙一切民主阶层统统包括进来。而这个意见有时同共产国际领导层内某些仍然持有宗派主义倾向的人发生争执，这些人把西班牙的局面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前夜。季米特洛夫划清了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的界线，有充分理由认为西班牙孕育着一次反法西斯的民主革命，一旦西班牙人民赢得胜利，我们国家将成为人民群众真正拥护的特殊的国家。换句话说，这将是战略性组织工作方面的转折，将出现不能用旧的模式来把它框住的崭新事物。

我认为很有意思的是要强调指出，在共产国际讨论西班牙问题的一次主席团会议上（那是在我国内战期间，理所当然有西班牙代表团参加），大家建议西班牙共产党人“不要强制同工人社会党合并，最主要的是两党进行共同行动以巩固和扩大人民阵线”。但又补充说，一旦实现合并，那么共产国际赞成新的统一党既应同社会党国际，也应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以支持两个国际的联合，就象两个工人政党在共同纲领中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的党在一次中央全会上研究了这个问题。会上我作了报告。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也开了全国委员会会议。最后没有合并成，因为当时不可能这样做，但双方同意增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联络委员会代表的人数，之后不久，共产党和社会党通过了共同行动纲领。

季米特洛夫已经觉察到国际力量对比不利于西班牙人民维护的民主事业。法西斯势力在明显上升，有入侵整个欧洲的迹象。与此同时，那些民主政府如果按逻辑行事，必须支持我们，但是他们不但不帮助我们，反而建立了臭名昭著的“不干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是袒护侵略者的。

要是两个国际达成协议呢？

社会党国际本可以对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作出贡献。领导共产国际的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想在这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说服第二国际的领导人。

在季米特洛夫同阿德勒和德·勃鲁克尔的通信中，体现了他对广泛开辟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渠道的热烈愿望。当时在西班牙战士英勇抵抗的鼓舞下，世界反法西斯运动正在扩展。但这些通信的结果只是使昂马斯会议达成了一些显然是不起作用的协议。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那次会议的有马塞尔·加香、莫里斯·多列士、路易吉·隆哥、弗朗兹·达伦以及佩德罗·切卡，后者代表当时正在生病的何塞·迪亚斯去开会。德·勃鲁克尔和阿德勒代表社会党国际出席会议。社会党的领导人只答应开展平行活动，据他们自己说，他们没有授权再往前走一步。

但季米特洛夫并不就此气馁，他尽可能地用各种方法推动国际上对我们斗争的声援。他是传奇式的国际纵队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来自各大洲五十三个国家的见义勇为的朋友们，二十

世纪的浪漫派同我们并肩战斗，为制止法西斯侵略、保卫自由和民主而献出生命。

季米特洛夫谈到他们时说，“这是他们在西班牙的战壕里保卫本国人民的自由和祖国的独立。”

季米特洛夫在193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西班牙人民的英勇斗争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由于这一斗争，制止了并正在制止着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如果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在西班牙赢得了他们自以为必然赢得的快速胜利，那么必然会大大加剧战争纵火者对其他国家人民的蛮横行为和侵略。

他接下去又写道：

应该毫不含糊地说，在这两年中，西班牙人民为保卫和平和世界进步事业所作的贡献要远远大于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对西班牙人民的支持。

多少年过去了，情况千变万化……但这个在我一生中如此重要的时期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形象是不可磨灭的。

我现在一闭上眼就能看到季米特洛夫的样子，他那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脑袋，宽阔的前额，令人难以忘怀的、含着仁慈和智慧眼神的双目，看到他在同我们聊天，或同何塞·迪亚斯和我讨论问题，那时他也同当时的青年圣地亚哥·卡里略讨论问题。卡里略在1939年末曾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国际书记处参加了几个月的工作。

有时季米特洛夫和他的夫人罗莎邀请我们到他们的别墅去吃饭，在那里海阔天空地热烈交谈，谈论西班牙和保加利亚、文学艺术、保加利亚的人民及其历史和文化。也谈论西班牙人民，季米特洛夫对西班牙人民怀有很大的敬意和同情。大家还谈论

苏联，季米特洛夫对苏联怀着深挚的感情。

回忆起季米特洛夫对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的慈爱态度不由人不动感情。他以真正的革命者的感情热爱他的同志们。他是官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坚决反对照现成的模式乱套或照搬教条。他支持工作人员的倡议，即使是地位最低的同志的倡议，在工作中鼓励他们和培养他们的个性。我不止一次地亲眼看到他关心和注意那些被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反动派赶出来离乡背井的男男女女，竭力帮助他们解决家庭遇到的问题。在当时艰苦的岁月里，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

如果有同志显得忧郁和消沉，季米特洛夫就去鼓励他：“只要相信你所维护的政策是正义的，就应该有信心。”他也喜欢提醒我们：“真理是最革命的武器。”

我对季米特洛夫的怀念是永不消逝的。当他因心爱的儿子小米夏逝世而最痛心的时刻，我正在他身旁。

后来到1949年，当我因长期患病在莫斯科附近的巴维哈疗养时，我知道季米特洛夫也在那所疗养院住。我很想再看到他，同他谈谈话。但他的病不容许我这样做。

有一天早晨我同女儿阿玛娅和伊雷内·法尔孔在园内散步，唱着故乡的民歌。季米特洛夫从一个阳台上探出身来。他对我们鼓掌说，“好极了，好极了。很快我也能下去同你们一起唱歌。”

但他的愿望没有能实现。几天之后，我们这位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人类的尊严和革命的英雄主义提到如此高度的伟大朋友和导师离开了我们。

西班牙人民的伟大朋友

马努依尔斯基

我是1933年底在我首次应邀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十三次中央全会时认识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代表马努依尔斯基的。在那次全会上我第一次听到斯大林讲话。当我代表西班牙共产党发完言后，斯大林友好地向我致意。

应苏联同志的邀请，我同一些外国代表到那个幅员广阔的国家的几个共和国去参观访问。我离开故乡加利亚达不过两年，苏联国土的辽阔就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赞赏那得到解放的妇女，她们都是各个生产岗位上的劳动者。当时情况是艰苦的，物资十分缺乏。但是她们怀着奔放的热情、意志和愿望去学习，去掌握知识，成为崭新国家的名符其实的公民。

让我们再回到马努依尔斯基同志身上来。当我结束访问准备回西班牙时，他问我有没有问题要向共产国际提出来。

若讲真话，我确实为我们国内的工会问题感到担心。但是国内党领导机构的同志们并没有委托我到这里来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我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提。在我稍微点了一下之后，马努依尔斯基以他活跃的性格鼓励我把我的疑虑讲出来，谈谈我对保持劳动者统一总联合会这个工会组织是否合适的意见，这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组织，但同其他两大工会组织——劳动者总联盟和全国劳动者联合会比起来，实际上成不了气候。

我没想到这是多此一举，因为实际上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

中对我谈的意见早就有了成熟的想法，只是没有公开说出来而已。

马努依尔斯基在听完我的意见后，就对我说，第二天我不能动身。我吓了一跳，但后来想了一想，说了一句我家乡的谚语，“随老天爷的便吧。”随后举行一次有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共产国际的代表以及几个外国工会的代表和我参加的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其中有共产国际的总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库恩·贝拉、拉狄克、红色工会国际的书记罗索夫斯基、马努依尔斯基和两个我过去不认识的同志即法国的蒙米索、巴尔内托和我。

主持会议的皮亚特尼茨基第一个发言，他同我的意见不一致。与会的多数同志在发言中同意我的意见。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由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根据各国支部的意见对这一问题作出决定。

我轻轻松松地离开了莫斯科，虽然想到党领导机构内同志的反映也不无担心，因为他们并没有委托我这么做。

抵达马德里后，我第一件关心的事就是报告我们的总书记何塞·迪亚斯。他以惯有的朴实态度对我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这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1939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时，我把马努依尔斯基当作我的老朋友。一遇到一些对我说是新的问题，我就找他商量。他总是以伟大的同志情谊来接待我。因为他是专门研究罗马语系和拉丁语系的国家的专家，他很了解西班牙的问题。

我前面已经讲过，马努依尔斯基除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外，也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他积极帮助我们安置那些流亡到苏联的西班牙人，安排他们的学习和工作。

他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是1906年喀琅施塔得起义的组织者之一，十月革命时战斗在第一线。

这位乌克兰的革命家具有南方人的身材，性格开朗、十分灵敏、知识渊博、阅历很深，他十分懂得我们的难处。由于他曾经在法国流亡过，因此他法语说得很好，这有利于我们互相了解。他喜欢同我们谈天，竭力想使我们的流亡生活变得轻松些。他是讲故事逗乐的能手，他会唱许多乌克兰民歌，也唱给我们听。

他的妻子瓦里娅是一个聪明的女革命家。她常常一有空就来给我们作伴。有些时候邀请我们到他们简朴的小别墅去吃清水煮荷包蛋。

马努依尔斯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各种军政重要职务。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他转而担任乌克兰政府的副主席兼外交部长，并以这样的资格代表本国出使联合国。

我们私下里亲切地叫他马努。不论岁月的流逝和事物的变迁，我们这些同他一起工作过的西班牙人一直对他怀着深情，这是对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朋友，具有革命敏感性的真诚的共产党人的感情。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当时我常常见到一些革命的伟人，一些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留下不可抹杀的印记的人们。但是却没有见到其中最杰出的一位，我们在西班牙称呼他为阿尔弗雷多(埃尔科利)同志，而在历

史上大家都叫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季米特洛夫要我放心，说陶里亚蒂不久就会回来同我们生活在一起。这样过了好几个月。

当我在1939年3月6日离开莫诺瓦尔机场时，陶里亚蒂坚持要同佩德罗·切卡和费尔南多·克劳汀一起留在西班牙。也许他当时怀着有可能用某种方式收拾局面的希望，不管怎样，他这样做是要坚持声援我们到底，同我们的同志一起战斗到最后一刻。

在加泰罗尼亚时，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就已经以这种刚毅的性格作出了革命的表率。当时佛朗哥的坦克已经开进了巴塞罗那，陶里亚蒂才沉着地只身一人离开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总部，同其他同志会合，一起继续战斗。

当他被迫越过比利牛斯山后，他又在法国设法在一架老掉牙的军用飞机上找到一个座位转移到我们的中央区，以便在战争的最后关头继续同我们共患难。

在那些日子里，陶里亚蒂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西班牙的战士。我想技术上的原因是由于他暂时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更多的是作为我们党的领导人从事活动，参加了最后的几次战斗，和贯彻在莫诺瓦尔狭小的飞机场上举行的短促的会议上所通过的各项决定。

我说这是一次短促的会议。但共和国的空军司令，我们亲爱的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同志却并不这么看。他在那本很有意思的回忆录中说，那次会议是在十分平静的气氛中进行的，虽然当时情况十分紧急，伊达尔戈说，满载卡萨多军队的头几辆卡车已开始靠近，这些军队是奉命来抓我们的，“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都得抓到”。

不管怎么说，在那次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让一些风险最大的同志，不管是政界的还是军界的，都撤到法国去。其余的人留在西班牙，同在巴伦西亚、马德里等地方领导工作的领导人会合。他们的使命是公开表明共产党人的立场，组织精干的新领导班子和指导党的秘密工作。

就象我在上面讲到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留在切卡和克劳汀的那个小组里。当时维森特·乌里维和其他同志都表示担心共产国际的代表有可能被佛朗哥分子抓去，但陶里亚蒂坚持说在西班牙几乎没有人认识他，他的决心是很坚定的。

陶里亚蒂、切卡和克劳汀半夜里坐汽车离开莫诺瓦尔，目的在于同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赫苏斯·拉腊尼亚加和何塞·帕劳会合，他们事前约好在埃尔达会合。但他们没能走多远，一出机场就被为卡萨多效劳的军事情报局的警察扣了起来。幸运的是这个行动小组的组长是克劳汀认识的一个青年，他并不认识陶里亚蒂，因此在扣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把他们三个人都释放了，否则就会被送往马德里交给卡萨多的军事委员会。

他们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才到达巴伦西亚，同那里党组织的领导人会合，在那里成立了由赫苏斯·拉腊尼亚加为首的西班牙共产党新的秘密领导班子。成员有卡斯托·加西亚·罗萨、曼努埃尔·纳瓦罗·巴列斯特罗斯（这些可敬的战士后来被佛朗哥分子枪决）、费尔南多·蒙托利乌、弗洛伦西奥·索萨、费尔南多·罗德里格斯、平托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一个青年。

后来，巴斯克人民的儿子拉腊尼亚加在判处他死刑的法西斯法庭上自豪地宣布：

对共产党人来说，我们的祖国就是西班牙。我们在过

去和现在都为她献出自己的生命。为西班牙发扬光大，我们在7月18日^①以前进行了斗争。从那时起到现在，为了把西班牙从外国的侵略下解放出来，几千名共产党人同其他西班牙人一起，为了西班牙，为了祖国，为了西班牙人民作出了牺牲。如果需要我们共产党人去死，我们就会象我们共产党的先驱者那样地去死，而后面的人还会沿着我们的步伐继续前进。

在马德里成立了一个由华金·罗德里格斯、维多利亚·莫雷诺和马蒂尔德·兰达为首的共产党领导小组。马蒂尔德·兰达是一位杰出的妇女，她坚定不移地要留在西班牙，后来在帕尔马-德马略尔卡岛上的监狱中逝世。

陶里亚蒂、切卡、克劳汀、埃尔南德斯和其他几个同志们在起草了一些文件，并在当时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加以印刷和散发后，最终得以从卡塔赫纳撤离西班牙。他们在阿特米奥·普雷西奥索的指挥下，靠他们的镇定和共产主义战士的勇气，在托塔纳搞到一条船，把他们运到非洲的海岸。

陶里亚蒂从西班牙的某一个地方给我和党领导机构写了一封信，信上的日期是1939年3月12日。他在信中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以及在共和军的抵抗行将崩溃的动荡时刻各军事和政治指挥机关的表现。这封信后来变得人所共知，在西班牙的杂志和书籍上多次发表过。

陶里亚蒂所经历的千辛万苦并不到此结束，在他离开西班牙后，某种程度上遇到更大的困难。

在抵达法国后，他决定为真正是他自己的党，意大利共产党

^① 1936年7月18日西班牙各大城市爆发反革命叛乱。——译者

献身。但他的活动受到法国警察的粗暴干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把他和其他几个意大利同志抓了起来。他在弗雷纳和圣特度过了几个月的难以忍受的铁窗生活，受尽磨难。但他总是很幸运地没有被人认出来，所以他才能于1940年2月重新获得自由。那年5月我们得以在莫斯科同他拥抱。

看到这位“阿尔弗雷多”同志，看到他那众所周知的从容不迫的性格，欢快的情绪和隐隐约约的微笑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人刚刚冒过极大的风险，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困难。“阿尔弗雷多”为他能在西班牙留到最后一刻帮助西班牙共产党而感到高兴。我们则对他个人怀有无比亲切的感情。

在“阿尔弗雷多”同我们一起在西班牙工作的那短短的却是十分紧张的两年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我们政治局的会议上，总是注意让我们自己，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去深入地分析那些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先例的问题），并根据我们自己的推理作出决定。他按照他同季米特洛夫完全一致的看法，总是谨慎地起一个顾问的作用。

我说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因为这种作风同共产国际派来的前一任代表“路易斯”，即阿根廷的比托里奥·柯多维利亚同志的作风完全不一样。柯多维利亚是在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十分有效地来帮助我们打掉宗派主义的，我们对他怀有很深的感情。由于所处的时期不同，也由于他是一个拉丁美洲人，因此，事实上他就象我们的政治局委员一样活动。

“埃尔科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知名的领导人之一。在共产国际中，他表现了出众的智慧和政治上的洞察力，他有远见卓识，放眼世界，能摒弃一切宗派和陈腐的见解，感受并敢于维

护新事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考验人的岁月里，我们一起在苏联的一个边远城市乌法生活和工作。感谢无线电台的奇妙，把我们的声音送往住在远方城市中的千家万户，我们每天晚上都要一起去电台向我们各国人民广播。每天在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的时候，都表现出了他出众的工作能力，明快的思想和渊博的学问。根据那些国际问题人们编排广播节目，用不知多少语言广播出去。这一切都是由他协调的。

还有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他那简朴的生活也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记得他手里拿着茶壶在我们居住的巴什基尔旅馆过道里的开水桶前面排队打开水。若有人走过去要替他打水时，他总是笑着回答：“不，谢谢，在这里听听人们的议论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还记得陶里亚蒂在那些日子里穿一件很旧的西装上衣，袖口已经发毛，他还乐滋滋用剪刀把袖口剪平……有个工作人员建议他去做套新衣服穿，他很干脆地用一个“不”字拒绝了。他说，“我们是在战争时期。等将来我们再去穿好的吧……”

“埃尔科利”在乌法工作期间得到同他最亲近的意大利同志的帮助，其中我记得的有埃多（德奥诺弗里奥）、泽雷蒂、格列科、贝尔托尼……

在意大利同陶里亚蒂在一起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1944年回到意大利。

我再次看到他是在他那美丽的国家，他在那里领导着伟大的意大利共产党。我在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和伊雷内·法尔孔的陪同下，出席了1962年意大利共产党举行的第十次代表大会。

在那次大会上，我以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用西班牙文发了言。我的发言没有翻译出来人们就听懂了，受到所有的代表、特邀代表和记者们的鼓掌欢迎，其中包括天主教民主党的代表、这当然使我感到高兴。意大利的同志们笑着对我说，“多洛雷斯，你在意大利实现了民族团结。”

显然这是意大利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对西班牙人民及其维护民主和自由的英雄业绩表示敬意。

同社会党和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会见

除参加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外，我有机会在马里萨·罗达诺的有效帮助下，同意大利各种知名的政治人物会见。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彼得罗·南尼在议会里接见了，他是我十分敬重的战友，他参加国际纵队意大利加里波第队的行列进行过战斗。我们进行了十分开诚布公和友好的谈话。南尼对西班牙的近况十分了解。我强烈地提出意大利社会党人和所有的民主派有必要帮助我们拯救胡利安·格里莫的生命，南尼真诚地准备这么做。我们还议论了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南尼表示他也同意在西班牙有此必要。但是意大利么，……又是另一回事了。他对我们同国内的社会党人建立联系很感兴

趣。他要我详细谈一谈西班牙出现的天主教左翼思潮。他向我们提供了援助，表示了友谊。

陪同我们参加会见的有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亲爱的路易吉·隆哥同志。他曾是国际纵队政委。这次我见到他时，他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副总书记。

我们在一起回忆了三十年代和国际纵队第五团的往事，并议论了西班牙人民在反对法西斯斗争中的团结问题。

我要在这里特别提到，我同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人士以及同与梵蒂冈有联系的神甫进行的谈话，因为这件事很新鲜，也很重要。

我还记得天主教民主党的领导人佛朗哥·马丽亚·马尔法蒂先生。他对西班牙的政治问题很感兴趣。我也记得天主教民主党左翼的吉桑蒂先生和《信使报》记者保罗·格洛廖索。我特别记得罗马波赛亚堡教区神甫里切斯，他是个聪明和直爽的神甫。

这些先生们想直接从“第一手”了解西班牙共产党人的想法。他们想知道我们提出的全国和解政策是否真诚以及我们同西班牙新出现的天主教运动的关系。并想知道我们反对反教权主义者的态度是不是真的。

我向他们详细地通报了我党的开放政策，并坦率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在谈话的过程中，我对他们说，我们“既不象他们想的那么坏，也不象我们可能自己认为的那么好”，所有的人都赞成这个看法。

里切斯神甫笑着说，这句话也同样可以用到他们身上。

他谈到了上帝事业派，谈到它缺乏同群众联系。他还谈到教会内有些情况在起变化，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当时是约翰二十三世这位善良的教皇掌权时期，里切斯暗示说，梵蒂冈正忙于配备新的各级领导班子。有人说一些年轻的进步神甫明天有可能成为主教。

在我的要求下，这些先生答应在反对佛朗哥恐怖活动的运动中同我合作，并帮助我们援救胡里安·格里莫的生命。他们将向教皇汇报并将为此成立委员会。

在告别时，马尔法蒂先生要求我在我赠给他的《唯一的道路》一书上题词。这本书刚刚在意大利用《一个女革命家的回忆录》的书名出版。

据我的朋友们后来告诉我，同我交谈过的那些天主教民主党人对谈话很满意，因为他们一直把我看成是莫斯科来的“布尔什维克”。他们认为意大利共产党则是另一回事。也因此，我们开诚布公的、反教条主义的、愿意同进步天主教徒和一切反佛朗哥力量合作以在西班牙重新争取民主的态度给他们以深刻的印象。

萨拉加特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玛格里特·贝尔纳维邀请我到她家里吃午饭，表示她对反法西斯的西班牙十分赞赏和支持。

在我们的好朋友，参加过西班牙战斗的维多里奥·比达里，也即“卡洛斯司令”的陪伴下，我们很高兴地同著名的艺术家卡洛·莱维同志和雷纳托·古图索同志一起吃晚饭。我一直珍藏着当时我的主人们送给我的画。古图索送了我一幅他在阿斯图里亚斯战斗中受到启发而作的画。

有一个星期天早晨，“新抵抗”组织的一些男女青年邀请我

去座谈，参加这个组织活动的都是十六至二十三岁的青年。在座谈会开始时，有一个青年向我们说明意大利青年如何怀着兴趣和激情密切注视着西班牙事态的发展，说欧洲还存在象佛朗哥或萨拉查尔这样的法西斯政权对青年人说来是不可容忍的。

我向青年和感兴趣的听众讲述了我国人民的斗争情况，佛朗哥的野蛮恐怖统治和我们的前景。他们向我们提了许多问题。学生们向我们献了花束和一个精致可爱的圣诞节蛋糕。

当时正在罗马出售我写的《一个女革命家的回忆录》，从而引起一大群记者到处找我和无情地跟踪追逐。我记得其中有一位记者，一个成年人，简直成了我的影子，在我访问那些罗马令人惊叹的古迹（古罗马广场、大剧院、大教堂、西光斯汀纳小教堂等地）时，一刻不离我左右。他向我提的都是些什么神呀，人性呀等问题，也不知他要从我的私生活中捞到什么东西来写。我很少回答他，对他不感兴趣。有一次，他坐在我旁边，突然说：

“说真心话，热情之花，要当你的丈夫可真不容易。”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吃饭。他的夫人尼尔德·约蒂特意准备了十分精彩的西班牙炒饭。“阿尔弗雷多”同他家人一起接待我们显然十分高兴，兴致勃勃地谈论“他”的西班牙以及我们共同的战斗和无数往事。对我们来说，我们对能再次这么近地同我们的朋友和同志、我们的导师和无数次并肩战斗的战友在一起，感到由衷的高兴。

陶里亚蒂建议我回意大利来，在这里靠近西班牙的地方工作。

我确实回到了意大利。但并不象我原来所希望的那样回

来，而是满怀悲痛地代表所有继续他那如此热忱地献身的战斗的共产党人和反法西斯战士去向帕尔米罗作最后的告别的。

在罗马圣乔瓦尼广场上举行的那次难忘的送葬仪式上，我发了言：

我是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见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当时他是共产国际的主要支柱之一。在大会上，我看到他引用从生活和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有教益的论据，以它们所固有的辩证力量和说服力支持季米特洛夫同志，结束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狭隘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观点。

在我们反对西班牙法西斯叛乱、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一直同我们，同我国人民，同我们的战士在一起，向我们提出忠告，制止我们有时出现的冲动，他永远将他的一生同我们的事业、同西班牙争取自由的事业联系在一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考验人的岁月里，我作为他的同事，同陶里亚蒂在苏联一起生活。那时的苏联，由于希特勒的背信弃义和野蛮侵略而血流成河，但它坚信自己会胜利，因而始终没有屈服。

最后我是这么讲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同你告别，我们永别了。请允许我在你的遗体前，代表西班牙所有怀念你和忘不了你的人们，谦卑地对你说：

安息吧，埃尔科利同志！

感谢你的一切教诲，感谢你的一切帮助。

“阿尔弗雷多”的名字以及对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回忆，

始终深深地埋在我国人民的心底。

我可以讲两件动人的事例：

1948年在陶里亚蒂遭暗害后的复元时期，他收到了西班牙送给他的一件礼物。一个马拉加水手乘一艘西班牙船到热那亚找到意大利共产党的总部，说他受马拉加码头工人的委托把一瓶好酒送给“阿尔弗雷多”同志。

1964年，正当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葬在维拉诺的罗马墓地的那一刻，被关在布尔戈斯中央监狱里的西班牙共产党员（其中有的被判处二十到三十年徒刑），衣领上挂着黑布，在监狱的院子里，三人一排地列队，脱帽默哀一分钟。

就象他们自己给意大利共产党写的悼词中所说的，“为我们的导师、我们的同志帕尔米罗·陶里亚蒂默哀一分钟。”

德国的第一任工人总统威廉·皮克

怎么可能忘记威廉·皮克的一头白发和他那又大又蓝的眼睛呢？

当我1939年到莫斯科时，他热情地拥抱我。对他来说，我代表西班牙。而皮克一直把西班牙放在他的心上。他的最优秀的同志和朋友都到我们的国土上，同我们肩并肩地为反对野蛮地侵略各国人民的纳粹分子而斗争。

台尔曼纵队志愿军唱的歌词说：

祖国远在他方，
但我们来到这块土地上，

是为了你，自由之神，
去斗争和争取胜利的希望。

我们西班牙人都怀着感激的情谊怀念着在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中牺牲的汉斯·拜姆勒。

皮克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纯朴的人。他同台尔曼一起创建了德国共产党，他原来是社会党左翼积极分子，参加过1918年的革命，他是共产国际领导机构成员。

当我在莫斯科见到他时，他正在为国内出现纳粹统治而感到气愤。

我记得希特勒侵略苏联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在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一次扩大会议上，一个德国同志介绍野蛮的纳粹分子在苏联土地上犯下的种种残暴的罪行。

这位同志在做报告时，表情是冷漠的，公事公办式的，好象这些事情同他本人没有什么关系。

皮克对他同胞的这种语调感到忍无可忍。他站了起来，两条腿颤抖着，十分激动。他表示他为苏联人民遭受纳粹侵略者之害而感到痛苦。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也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但他也是一个德国人，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自己周围发生的不幸就没有责任。

在我们面前，他是德国劳动人民的真正的代表。

1945年当苏联军队和同盟军击败纳粹之后，威廉·皮克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他对我们党总是保持兄弟般的友谊，同情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他总是热情地接待我们，让我们在新的德国召开许多会议，一直到他逝世都没有改变这种友好的态度。1960年我到柏林参加了他的葬礼。

瓦尔特·乌布里希继任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政领导人，我也是在莫斯科认识他的。他一直毫不动摇地支持我们的党和我国人民。

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中，我还记得德国工会领袖弗洛林。他同他的同伴们一样也住在莫斯科。他的儿子彼得·弗洛林是我孩子的朋友，后来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一个负责人。

还有一件事给我们所有的人印象十分深刻。另一位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弗里德里希·黑克尔特在得悉纳粹侵略苏联时心脏病发作，全身瘫痪，最后死亡。人们在继续斗争着，继续生活着……

我也满怀深情地记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弗兰茨·达伦，他同台尔曼一起创建德国共产党。他志愿参加我们的民族革命战争，是国际纵队的领导人之一。同其他许多争取自由的战士一样，后来受到法国贝当政府的迫害，之后又在柏林落在带乐的人手里，并在茅特豪森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受到野蛮的摧残。

我记得1951年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曾向德国的劳动者、德国的人民讲话。我回忆说：

大约十五年前，西班牙反动派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支持下反叛了西班牙共和国。

西班牙是不设防城市遭到可怕轰炸的第一个国家。

希特勒派来的纳粹飞机摧毁了格尔尼卡和努莱斯，轰炸了杜兰戈和赫罗纳，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巴伦西亚和毕尔巴鄂。但是我们，西班牙的民主派、西班牙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从来没有把德国人民同摧毁我们城市、杀害我们妇孺的在逃的希特勒匪徒混为一谈……我们不可能把德国人民同

希特勒的罪犯们混为一谈，因为德国人民给世界献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海涅和歌德，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克拉拉·蔡特金、恩斯特·台尔曼和威廉·皮克这样的人；因为台尔曼纵队和埃德加·安德烈纵队的英勇战士同我们在一起斗争过，在哈拉玛河沿岸的战壕里为维护民主、维护西班牙的自由，他们英勇牺牲，一步都不后退，因为保卫西班牙的自由也就是保卫德国的自由，保卫德国工人阶级的自由。

莫里斯·多列士

一想起莫里斯·多列士，在我眼前就浮现出他那深蓝色的坦率的目光和他咧着嘴的微笑。

他的回忆录的书名是《人民的儿子》。因为作为矿工的多列士是出身于帕索·德加莱的一个无产阶级家庭，他确实是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儿子，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领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惨岁月里，我正在莫斯科，当时我对多列士的命运十分担心，因为他的生命正处在危险中。当时他应征在军队里服役，在那个时代人所共知的极端反共的情况下，他作为法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后来我很高兴地听说他的同志们把他搭救了出来。过了不久，他就同我们一起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

莫里斯总是率领法国共产党声援我们的党和人民的斗争，因此我们象对兄长似的敬爱他，他从1930年起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1919年他就是社会党的工人党员。在图尔代表大会上，

多列士主张参加共产国际。

他坐过监牢，受过迫害，1932年工人阶级选他为众议院议员。

他领导了强大的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运动，团结天主教人士，从而提高了他在法国和国际上劳动人民和进步力量中的威望。

在我们抵抗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中，他对我们斗争的支持是很突出的。他是一个反对不干涉政策和在各个方面帮助处于内战中的西班牙人民的坚强战士。他访问过我们的前线，给我们战士带来了法国工人阶级的支持。我至今还记得多列士在马德里的帕尔迪尼亚兹影院发表的精彩演说。

巴黎成了国际纵队的组织中心，接待和组织从波兰、德国、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来的反法西斯志愿人士，并帮助他们转到西班牙去。法国的志愿军，包括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天主教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国际纵队的主力，以他们中间的英雄命名组成军团。

巴黎也是世界各地知名人士聚会的友好城市，在那里举行维护西班牙反法西斯事业的各种会议、代表大会和讨论会。这些人士用他们的生命和英勇气概筑起了一座伟大的街垒，上面飘扬着争取民主、自由和世界和平的旗帜。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巴黎冬季赛车场举行的无数次集会。莫里斯用清晰和有力的声音讲话，号召捐献武器帮助西班牙人民，得到四面八方千百个声音的响应。

就是在这样一次集会上，我讲了一句后来成为名言的话：“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

多列士代表共产国际参加了昂马斯会议，努力想同社会党

国际的代表达成某种协议，以支持西班牙的战士。他在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遥远的乌法，常常同多列士交谈，多年的共同斗争使我们的交谈自然是坦率和友好的。

莫里斯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这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自行解散工作。

不久之后，多列士在1944年回到本国领导党的工作。他在戴高乐政府里担任国务部部长的职务。

在戴高乐将军辞职，古安政府建立之后，多列士成为政府副总理，在政府中有五个共产党员任部长，两个任副国务秘书。在这之前，他曾任不管部部长。

这是一个新的政治阶段，莫里斯在这个阶段里表现出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的天才。

在我们流亡法国的岁月里，西班牙共产党人一直感受到莫里斯·多列士和伟大的法国共产党的热情声援和帮助。从以瓦尔德克·罗歇和乔治·马歇相继为首的领导机构开始，一直到最基层的党员都是如此，这一点我们是永远不能忘怀的。

雅 克 同 志

在法国，有一位非凡地勇敢的领导人，率领着法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他就是雅克·杜克洛。他是一位杰出的议员，由于他言词锋利和论据理由充足而为他的对手所畏惧。

我入党初期就认识了杜克洛同志。

他到西班牙来帮助我们，向我们提出他的忠告，纠正我们在那些犯“革命幼稚病”的年代里所犯的极端宗派主义的情绪，当时我们以为革命已经在望。他以他的经验和修养给我们提供了帮助。

由于他是法国南方人，因此熟悉我们的语言和习俗。

他参加了我们头几次代表大会和无数次小型会议，带来了法国共产党对我们的声援和支持。他感到自己是不可分割地同我们的战斗联系在一起。

在法国共产党人和爱国者艰苦和英勇地进行抵抗希特勒侵略的时代里，雅克·杜克洛是这一漫长和艰苦的斗争的智囊和灵魂。

在比利牛斯山脉的另一边，同法国人民一道继续进行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的西班牙人对这点是很清楚的。法国同志们在西班牙的战场上提供了慷慨和可贵的援助。

法国解放后，杜克洛当选为共和国的第一副总统。在1947年在奥里奥尔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时，杜克洛当了国民议会议长。

法国政治上另一位伟大人物、伟大的共产党人马塞尔·加香是这样来描写杜克洛的：

雅克·杜克洛总是时刻作好准备，以令人难以相信的活力随时准备斗争、讨论、理解别人、倾听意见和回答问题。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新的法国竟是一位真正的工人阶级代表在议会中唤起了对米拉波、甘必大和饶勒斯等人在议会里为民主进行雄辩的光辉回忆。

这位演说家友好的声音在我们流亡的漫长岁月里举行的许多次集会上伴随着我们，呼吁人们声援西班牙人民。

在1975年4月的一个悲痛的日子里，我们心碎地在巴黎向我们亲爱的雅克同志作最后的告别。在那天下午举行的仪式上，我用那由于悲伤而嘶哑的声音讲道：

雅克同志，你现在已不可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了。但你的名字，你的音容，你的榜样永远活在我们的革命生涯和我们的斗争中。

我在致乔治·马歇和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悼词中说：

……雅克，杜克洛的逝世不仅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袖，失去了一位用他的辩证法击溃敌人的政治人物，而且失去了一位亲爱的同志。他是法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在我们的心底里和在我们的感情上，他无论在昨天还是在今天都不可分割地同我们的斗争联结在一起，他一直把我们的斗争当作是他的斗争，当作是法国共产党的斗争，当作是一切有革命良心的人、一切共产党人的斗争。

他热情地维护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1936年至1939年西班牙人民的斗争，他在法国动员一切民主力量支持西班牙共和国。他作为一个坚持原则和不断战斗的人，在希特勒占领时期，他一直留在法国，同法国共产党一起，成了法国抵抗运动的灵魂。

在和平时期，他同莫里斯·多列士和法国共产党全体同志在一起，是为民主的法国、社会主义的法国而斗争的旗手。雅克·杜克洛同志的逝世，使法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亲密和最孚众望的同志，使法国人民失去了一位最有天才的革命领袖。他在任何时候，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总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战士，作为国际工人运动和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活跃的革命领导人之一站在斗争的第一线……

胡 志 明

在为共产主义的胜利作斗争而贡献出自己生命的男男女女中，有没有传奇式的人物呢？

他好象就站在我面前，带着那仅有他才有的微笑，那斜视着的富有表情眼神，那尖尖稀疏的胡子。这位越南革命家，他本国人民称之为胡伯伯的胡志明，确实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我是在共产国际的某次会议上认识他的。

但是我同越南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及其越南走狗的民族抵抗运动的这位领导人的一次最激动人心的会见，是于1946年在巴黎。当时，他率领越南的一个代表团到法国首都同法国政府进行谈判。当时法国政府承认胡志明的身份。谈判的目的是为结束侵略战争达成一项暂时解决办法。尽管还有种种阴谋，这一解决办法，实质上就是承认越南人民民族独立的权利。

然而，法国殖民主义者并不尊重暂时解决办法，迫使越南人民在胡志明及其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漫长和英勇的抵抗，直到取得奠边府的胜利，之后又具有历史意义地击败了美国侵略者，获得越南的完全独立。

我一直记得胡志明在革命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样子。但是从外表上看去，他却是那么弱不禁风，那么温文尔雅，和蔼可亲。

在我们见面时，他以极大的兴趣询问西班牙的局势和我国人民斗争的情况。西班牙人民抵抗法西斯侵略的斗争给他很深的印象。他对我说，象西班牙这样的人民必将击败法西斯，取得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他同我谈话很有趣，总是用法语和意大利语混合在一起讲，而我用西班牙语回答他。由于我们的友谊和同志情谊，我们完全能互相理解。

我从来没有到过越南，但总感到那个勇敢的人民同我们非常亲近。他们战胜强大和野蛮的美帝国主义的新闻使我感到无比兴奋，也是对正在进行斗争的我国人民的鼓舞。西班牙的民主派声援越南的战士，公开地勇敢地对那在遥远地方进行同自己近似的斗争的人民表示兄弟般的情意。

是的，胡志明是今天传奇式的人物，是一切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男男女女们的共同财富。各国人民都怀着兴趣读他的遗训。

出于越南人民的意愿，原来越南南方的首都西贡市今已命名为胡志明市。胡志明，是智慧、勇敢和革命精神的象征。

1974年由我党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越南。在河内，人们邀请我们去参观胡志明的故居，所有的陈设仍象他当年逝世时一样。参加了那个代表团的洛佩斯·雷蒙多对我说，在胡志明办公室里陈列的书中他看到了我寄去的我们出版的著作《西班牙的战争和革命》的头两集，这证实他对西班牙人民斗争的关注。

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

每当我见到哥特瓦尔德,我就不禁想起慕尼黑,想起那个手不离雨伞的张伯伦和达拉第向希特勒独裁者可耻投降的事,慕尼黑协定对西班牙的民主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也给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带来了灾难。

哥特瓦尔德不得不同党的一部分领导人于1938年流亡苏联,并在那里建立起党的领导中心。

我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是一个了不起的党,在议会里有相当多的席位(哥特瓦尔德从1929年起就是议员),在工会中也有重大影响。哥特瓦尔德先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总书记,继而任党的主席和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

哥特瓦尔德身材魁梧,具有斯拉夫人的相貌。他喜欢独自一人心事重重地信步漫游,或是同他最亲密的同志柯别茨基、斯兰斯基、圭明德尔一起散步。

由于语言不通,我无法同他交谈,但是我们相遇时总是互相友好地打招呼。他的夫人玛尔塔和在大学学习的女儿小玛尔塔都是很直爽,惹人喜爱的人。

战后,哥特瓦尔德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府首脑,后来任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和国总统。

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人多次受到他的接待,我们常常在他美丽的国家举行党的会议和代表大会,得到他们的声援和帮助。

哥特瓦尔德由于心肌梗死于1953年逝世。实际上他的身体

早就垮了。

对于这样一个慈爱善良的人来说，布拉格的审讯以及他最亲密的同事和朋友的惨死可能是绝对无法容忍的。

黑山人维里科·弗拉霍维奇

在共产国际协助季米特洛夫工作的有一名南斯拉夫青年叫弗拉霍维奇。他在西班牙曾与我们并肩战斗，在西班牙土地上淌过他的鲜血，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年青人。他身材高大，体格强壮。从他英俊的面容上，可以看到他心地非常善良，智慧非凡。几年后，在铁托身边，他成了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

记得有一次我们访问南斯拉夫，他陪同我参观了他的家乡黑山。他自豪地给我指点陡峭的山中一个个隐现的处所。1937年黑山这块坚强土地的儿女们就是从这里秘密地前去西班牙同西班牙人民并肩为自由而斗争。

一块钉在岩石上的牌子告诉我们，在那一带，劳动群众曾举行过大会，声援我国人民。警察竟野蛮地向与会者开枪冲散会场。为了表示对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士的情谊，有两百来名黑山人就这样被枪杀了。

维里科还带我去拜访他的老妈妈。这位令人尊敬的老妈妈十分疼爱自己的儿子，她住在海边一幢简朴的房子里。我摘下自己的头巾和耳环给她戴上，作为友谊的纪念。她也送我一块她亲手织的精致的小台布。

“黑山人一般是不让外人进家门的。”弗拉霍维奇对我说“但是你可以相信，对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家的大门都是敞开的。”

黑山入口处屹立着一座十字军东征时西班牙人建造的碉堡，叫西班牙堡。

南斯拉夫朋友告诉我们，那个时代来的西班牙人就在黑山定居下来了，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都已斯拉夫化了，但从姓氏上还可以看出他们的本源。

对于我们，维里科·弗拉霍维奇不仅是一位由于他的英勇、才干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而受尊敬的同志，而且也是我们情同手足的兄弟，他代表了南斯拉夫人民和西班牙人民之间，我们两党之间的兄弟般的团结。

有一次我们散步时，他给我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使我刚才讲到的这种友谊又加深了一层。

那是他在西班牙的阿利坎特省一个乡村养伤的时候。他腿上中了一颗子弹，不得不截去这条腿。养伤时，全村居民对他体贴入微。渔民常常带他乘船到海上去散心，他们总是认为海上的空气无比新鲜可以治百病。在大家的关怀下，他很快康复了，又回到了火热的生活斗争中去。他养伤时，一位妇女就象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服侍这位南斯拉夫青年，慈母般地照料他。几年后，当这位好心肠的老人去世时，就把这位国际纵队的战士，她的“养子”立为她那座小屋的继承人。

弗拉霍维奇满怀激情叙述了这段故事。

他说，“打倒佛朗哥独裁统治后，我要去访问西班牙，还要去看看我在阿利坎特的那份‘产业’呢！”

来自远方的芬兰战士

奥托·库西宁是芬兰的一名革命家，具有丰富而有意义的斗争经历。他参加过1918年的芬兰革命，从1904年开始他是芬兰社会民主党左翼的领袖，之后他就成为芬兰共产党的奠基人。在1918年的革命政府中，他当过部长。这个政府只存在了几个月，就被反革命残暴镇压了。

他的个子不高，沉默寡言。多年来的地下斗争生活使他养成了特殊的性格。他总是含着不易察觉的微笑细心地观察事物，同时又博览群书。

在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会议上，他不喜欢滔滔不绝地发表讲话。可是一旦他开口，我们就知道他要对所讨论的问题进行严肃的分析了。

他的著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1962年出版时曾轰动一时。

他的女儿赫尔塔·库西宁高高的身材，很有魅力。我是在国际妇女运动中与她结识的。1947年，她作为党的代表出席了我们党中央的扩大会议。

晚些时候，她被选为芬兰共产党副主席，在芬兰人民民主同盟和皮可拉政府中都担任过重要职务。

安德烈·马尔梯

安德烈·马尔梯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他性情暴躁，性格刚强，人们对他毁誉参半。

他年青时期当过“黑海的水手”，在法国入侵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时，他转向了布尔什维克。后来他为此受审判，被判处死刑。是国际声援运动搭救了他，使他一下子名震四海。

他同情西班牙，对我国的问题感兴趣，正是因为这样，我认识了这位法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

他是来到我国前线的首批志愿人员之一，很快他就被提拔为国际纵队的政委。他自称是加泰罗尼亚人，而且还会说一口西班牙语，当然法语的口音很重。

由于他的性格，也由于他爱好军事，他把西班牙战争看作是自己的事业，满腔热情地投身进去。他又是在前线参加战斗，又是帮助组织国际纵队，因为他认为必须这样做。他的看法往往同来自各国的搞军事和政治的其他同志的看法产生矛盾。

我们流亡法国期间，马尔梯开展了大量活动，声援我国人民。

关于马尔梯在阿尔瓦塞特的活动，人们写过许多充满否定与诽谤言词的文章。后来，他在党内碰到许多严重的问题并被开除出党。他经历了战斗的一生，诚然，也犯过一些严重的错误，到暮年，孤苦伶仃，死在病榻上。

但是留在我记忆中的却是另一个安德烈·马尔梯，革命的、

热情奔放的，甚至带点稚气的马尔梯。不论是在法国，在西班牙，在莫斯科，还是在乌法，对一切事物，一切人他都要批评一番……然而，他总是善意的。

“革命的老一辈向年青人致敬”

匈牙利解放不久，我们访问布达佩斯时，拉科西·马加什就是这样欢迎我们的。

早在三十年代西班牙共产党人就熟悉他的名字了。那时因为没有钱印刷标语，我用勤劳的双手把拉科西、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安娜·波克尔、季米特洛夫、台尔曼等被反动派囚禁的英勇的革命者的名字刷在墙壁上，要求释放他们。

关于拉科西本人，他在1918年至1919年间和库恩·贝拉一起参加过祖国的革命。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在这个革命政府里当过部长。可是这个政府遭到反革命野蛮镇压，只是昙花一现。后来……就是监狱、刑罚、驱逐、地下斗争。1925年霍尔蒂政府判处他无期徒刑……在第七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我是1940年认识他的，当时他是由苏联政府用战犯交换过来，安置在苏联的。

他个子不高，但身体很结实。看到他的脸形，我们总要想起几百年前鞑靼一蒙古游牧部落到过匈牙利的事情来。拉科西·马加什参加过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而且同许多其他革命者一起当过俄国的俘虏。1917年爆发革命时，他加入了布尔什维

克的行列。他和其他战士一起共同创建了匈牙利共产党。一直战斗到1945年才合法回到祖国，被选为匈牙利共产党（后来改名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当我们出席在景色迷人的布达佩斯举行的一次国际妇女大会时，我们在多瑙河边拜访了他。

几年后，在拉科西的革命史上出现了黑色的斑点。他坚持教条主义的观点，顽固执行不符合他们国家的、极不合理的政策。他草木皆兵，甚至把自己最亲密的同事都视为仇敌，而且毫不犹豫地把他们清洗掉，给他本人和本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拉科西被赶出祖国，不过这次不是被霍尔蒂反动派赶走的，而是被他祖国的人民，他自己的党驱逐出国的。

对于一个革命者，这是多么可悲的结局，多么可怜的归宿呀！

最后，他成为孤家寡人，被人们遗忘，死在苏联的一个边远的城市。

瓦西里·科拉洛夫

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中还有一位来自保加利亚的领导人，瓦西里·科拉洛夫。他从上一世纪起就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这是一位热情、开朗、谈吐风趣的同志。他曾经给我们讲述过他出席社会党国际在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和齐美尔瓦尔

得举行的代表大会的情况。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大会上，他直接认识了列宁。他在社会党国际的革命小组里曾同列宁积极合作。

在这之后，科拉洛夫成了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季米特洛夫一起参加了保加利亚1923年“九月起义”。科拉洛夫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对西班牙文化、音乐和乡土人情有浓厚的兴趣。我们常常一起交流关于他们国家和我们国家政治形势的看法。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所以我们很容易交流。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瓦西里·科拉洛夫被选为保加利亚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后来又担任过政府高级职务。

我的朋友斯代拉

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保加利亚人当中有一位妇女，身材矮小，抽起烟来一支接一支没个完。她很活跃，但有时又很严肃。

她叫斯代拉·布拉戈耶娃，是保加利亚第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创始人和领袖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的女儿。

青年时期，斯代拉曾经是个演说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者，后来她过着艰苦的流亡生活，从一个国家移居另一个国家。

我是在莫斯科认识她的。她很关怀西班牙同志，总是设法帮助我们解决流亡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复杂问题。对我来说，斯代拉永远是位好朋友。

保加利亚解放后，政府任命布拉戈耶娃为驻莫斯科的全权大使。

她常来看望我。我们还作过几年邻居。她曾对我很坦率地说，搞外交不是她的爱好。她向往的是充满同志情谊的岁月、斗争岁月、革命岁月。

我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年月里，还有机会在各种会议上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表示敬意。在后面叙述我访问人民中国时，我还要谈到他们。

我还认识了朝鲜共产党总书记金日成，印度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

认识他们，同他们交谈，丰富了我们离我们如此遥远、如此不同的大陆的认识。

学 习 俄 语

不会讲几句俄语，怎么能在莫斯科生活和工作呢？有一位女教师，弗莉克同志自告奋勇要教我学会普希金的语言。她说要学会普希金的语言，意思是说，要掌握这门美丽的语言，就要努力阅读古典作品，而不是浏览莫斯科报纸上的文章。她对报纸上文风的评价不是很高的。但是，我却没有严格地当好她的学生，我总喜欢读《真理报》，了解国际时事，尽管在空余时间也看点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作家的书，但读的都是西班牙文或法文译本。

看我那么固执，我的女教师给我布置作业时，就让我看报纸上摘出来的不长的一段文章。但是第二天，我竟能把整篇文章

流利地念给她听。她带着惊讶的目光看着我说：“这些词我们还没有学，您怎么就都懂了？”我告诉她，政治术语在所有语言中都是差不多的，即便是在最难的俄语中也是这样。学会了基里尔字母后，加上一点感性知识和经验，就把文章弄懂了。然而，说真的，有时我竟把报上说的事完全理解拧了。但是，耐心和坚持使我逐步学会了用俄语阅读、书写。确实，我有自己的一套学习方法。

弗莉克同志伤心地对我说，在我身上，她作为专业人员失败了。不过，在我的心目中，她是一位优秀的、亲切的教育家，这是确切无疑的。

相反，她给埃尔科利^①同志上的课使她很满意。埃尔科利同志很好地掌握了俄语，而且还能进行深入的语言研究。

拉法格曾说过：“马克思五十岁开始学俄语，而且，尽管这门语言同他掌握的其他语言没有任何词源上的联系，经过六个月的学习，他的水平竟达到了能够阅读普希金、果戈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他最喜爱的诗人和作家的原著。促使他想到要学习俄语的原因是他想阅读俄国官方调查委员会编写的文件。这些文件透露了大量材料，沙皇政府禁止传播。一些热心的朋友把这些文件寄给了马克思，因为他是他们认识的唯一的西欧经济学家。”

每逢星期日，我们都要到旧书店去寻找法国和西班牙的文学作品。发现几本优秀作家的著作，就带回家去放在家庭图书室里，心里真是高兴。我原来珍藏的那么多宝贵的书籍，很遗憾都在各地散失了，现在只得逐步重新把我的图书室充实起来。

^① 即陶里亚蒂。——译者

回忆克拉拉·蔡特金

在莫斯科给我开车的司机叫阿纳托里·尼科拉耶维奇。他是一个瘦高个子的俄罗斯人，一个北方的唐·吉珂德。他非常高兴同我们一起工作，因为，他不只是司机，而且还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亲密同志，他对我们的关怀无微不至。他自豪地告诉我，他给德国老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开过车。那时蔡特金经常去共产国际的大楼。他强调指出，不过，那时开的不是小汽车，而是带侧斗的摩托车。在革命的最初年代，这是最通常的交通工具。

我没有机会亲自结识这位可敬的德国战士，她是最早的革命女政治领导人物之一。在青年时代，她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成员，是第二国际的创始人之一，经常出席它的代表大会。她认识了恩格斯、拉法格和盖得。她富有政治才干和活动能力。下列事实就证明了这点：她作为第二国际的代表出席过1907年在斯图加特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妇女代表会议。会上，决定设立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书记处，大家推选她担任了领导职务。三年后，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妇女代表大会上，她提出了一项将每年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的建议，并得到了通过。1912年在巴塞尔召开的社会主义国际代表大会上，克拉拉·蔡特金发表讲话说：“只有绝大多数妇女坚定信念，在‘以战争反对战争’的口号下团结起来，各国人民的和平才能有保证。”

她回忆说：“这两位巨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妇女在现

代社会生活中具有巨大的革命作用。”

她站在列宁、罗·卢森堡、卡·李卜克内西和弗·梅林一边，非常积极地投入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行列。

社会党国际第一次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妇女代表会议就是于1915年在克拉拉·蔡特金的领导下在伯尔尼召开的。

她参加了1919年德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被选入该党的中央委员会。1920年，她在德国国会(Reichstag)里获得了一个席位。翌年，她任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她也曾经和列宁一起出席过共产国际成立大会。

1932年，年老体弱，病魔缠身的克拉拉·蔡特金由两位妇女搀扶着出席国会开幕式时，她竟成了古希腊悲剧中的人物。那时国会里身穿棕褐色衬衫、头顶乐的人占据多数议席。由于她是年龄最高的议员，在高龄议员组成的主席团中，只有她有资格宣布新的一届国会开幕。希特勒分子早就向她发出了死亡的威胁，阻止她出席国会会议。蔡特金当时正在莫斯科附近住院治病，但是她毫不犹豫地，冒着一切风险到了柏林。

这位身材矮小、貌不惊人的女人，坚贞不屈地进入了国会大厦，致了开幕词。

翌年，1933年，她逝世了，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红墙内。

在革命政治斗争中，在捍卫妇女权利的斗争中，涌现出了许多先进妇女，她们中有1918年同卡尔·李卜克内西一起在德国被诺斯克的走狗们谋害的波兰革命的杰出领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罗莎·卢森堡，有曾经是西班牙劳动者总联盟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领导人，后来又成为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的、我们的比希尼娅·冈萨雷斯，还有法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伊内·阿尔芒，列宁的战友和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

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女部长和蜚声国内外的外交家亚历山德拉·柯仑泰。

纳粹分子进攻苏联

那是1941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空中突然响起了希特勒的狂叫，宣布德国各路大军越过了苏联的边界，从而撕毁了一切协定。

当时我们全家人正在莫斯科郊外的普希金诺。何塞·迪亚斯和他的妻子特雷莎、女儿小特雷莎也在那里。

这个消息是伊雷内带来的。这个星期天，她也在莫斯科郊外休息。她从德语广播中收听到了Führer^①的这战争的叫器，急急忙忙跑来告诉了我们。稍晚一点，莫斯科电台广播了有名的莫洛托夫演说。侵略苏联已是事实。我们又要经历一场战争了，可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呀！

我的儿子鲁文是军事学校的学生，此时正请假在家。听了这一消息，他急忙去登记当了志愿兵。我们拥抱着，他说：“妈妈，作为您的儿子我决不会给您丢脸……”

翌日，季米特洛夫召集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和政治工作者开会。大家讨论了形势的严重性和它提出的新任务。

① 意为“元首”，指希特勒。——译者

比利牛斯广播站的诞生

不久，独立西班牙电台比利牛斯广播站在其他广播电台的波段之间出现了。我担任领导工作，一批西班牙同志协助工作。我记得他们当中有拉斐尔·比迭利亚、弗朗西斯科·安东、伊雷内·法尔孔、安东尼奥·普雷特尔、塞希斯·阿尔瓦雷斯、佩德罗·费利佩、埃斯佩兰萨·冈萨雷斯、包迪略·桑切斯、胡利奥·马特奥、胡莉塔·佩利卡乔。

工作并不容易。有时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要从设在地下室里的广播室中播音。因为苏联首都经常受到轰炸。敌人空袭时，就自动断电，我们只得点起蜡烛，甚至点起油灯写广播稿。而那时空袭又很频繁。

最大的困难还是战争初期缺少直接来自国内的报道。

但是，我们大家都带着坚定信念，信心百倍地工作着，我们相信，在我们祖国一定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不久，我们确实了解到，在西班牙，人们收听到了比利牛斯广播站的广播。我们还收到了活跃在西班牙各个地区的游击队员用手抄写的报纸，上面居然全文刊登了我们的广播稿件。人们不但收听我们的广播，而且还在同志和朋友们中间散发我们的广播稿。

我说的只是我们早期的工作。它后来的发展和扩大是众所周知的了。几年之后，比利牛斯广播站成了西班牙人获得反法西斯斗争消息的最可靠的来源。

五十年代初，独立西班牙电台迁至罗马尼亚，拉蒙·门多萨任台长。大家知道，他在我们党的这项宣传和指导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我开办了针对天主教徒的广播节目。节目的标题是“洗礼圣母”。这个节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梵蒂冈电台不得不宣布它对此电台不承担责任。

战争中的莫斯科

战争爆发后，苏联首都变了样。

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都在街头或广场上进行军事训练，学习使用步枪、冲锋枪，练习投掷手榴弹和对付坦克的办法。每个莫斯科人都有自己的任务。

在红场上，红军部队高唱着爱国歌曲，阔步前进，走在检阅队伍的前列。这些歌曲，这些雄赳赳气昂昂的歌声，伴随着誓死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青年的坚定有力的步伐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使我激动。我永远也忘不了这种场面。

妇女在工厂里积极劳动，她们知道，每一颗子弹都是用来保卫自己亲人和祖国独立的。

有些穿着军装的姑娘们手系着气球，使它在城市上空漂浮，保护我们不受敌机的袭击。

所有的橱窗和门窗上的玻璃都交叉贴着宽纸条。房屋墙根下堆满了装着沙土的麻袋，保护墙壁不受炮弹的损害。探照灯不时划破天空，搜索着可能进犯的敌机。

每天晚上，莫斯科的居民，不分男女老少都爬上屋顶，在那里值班。看到有敌机投下的燃烧弹，就用钳子夹着取出来，用水和沙土把它扑灭。

在莫斯科周围可以听到海英克尔飞机隆隆作响，企图冲破苏联空军的防线。

我不禁想起了保卫我们不可战胜的马德里的那些轰轰烈烈的日子，想起了我国人民在战斗中写下的令人赞叹的篇章。

所有流亡在苏联的西班牙人都与我有同感。

战事爆发的最初几天，我们许多西班牙妇女都报名参加了护士训练班，学习护理知识，以便应急。

西班牙人

从6月22日开始，所有西班牙人都动员起来了，他们要求把自己派到战斗岗位上，抗击希特勒侵略者，保卫苏维埃领土。我们的同志们要求把不得不抛弃在西法边境的步枪重新捡回来，继续战斗。

何塞·迪亚斯和我一同向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依尔斯基讲了此事。西班牙的同志们坚持要这样做，而且急不可待。这件事报告到了斯大林那里。斯大林考虑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里不缺人，况且西班牙的斗争更需要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士。”

很有道理。但是不能参加战争去打击曾经侵略过他们祖国的同一敌人，西班牙的同志们是不会罢休的。看到官方拒绝接

收他们，他们就自寻门路去参加红军。

列宁格勒寄宿学校的一些西班牙少年冒充俄罗斯人，但由于年龄太小，还是没有被吸收进红军部队，无奈，他们就到芬兰前线冻土带加入了在那里活动的游击队。还有一些报名参加了飞行员训练班。有的在空战中表现很出色。

由于我们同志们的再三请战，终于使苏联军事指挥部改变了决定。由西班牙人组成了一支部队，保卫莫斯科，更具体地说，保卫克里姆林宫。

由佩雷格林·佩雷斯指挥，驻扎在莫斯科郊外的第四特别连使我想起马德里的第五团。我专程去看望过他们，同他们谈过话，正巧（或许这是一种象征），也是在7月18日，不过已是五年之后的7月18日，是1941年的7月18日。

现在是斗争时期，我们知道，你们是不怕斗争的。而且同苏联人民肩并肩为保卫苏联人民的自由与独立而战斗，为反对希特勒分子而战斗，也就是为我们国家的人民，为西班牙的独立而战斗。

在红军队伍里，有几个西班牙人还一直打到柏林。他们中有玛格丽塔·内尔肯的儿子，圣地亚哥·德保尔·内尔肯，我的侄子阿尔维托·雷哈斯·伊巴露丽，马诺洛·阿尔维迪。马诺洛·阿尔维迪还在柏林斯特凡大街的路牌上贴了写着何塞·迪亚斯名字的纸条。

还有一些西班牙人在游击队里参加了战斗。他们活动在陌生国家的敌后，既不懂语言，有时还要忍受北极的寒冷。讲起他们每人的英雄事迹来，我们真为同胞们的英勇机智而感到惊讶和赞叹。让我们讲段故事吧。

伪装成“蓝色师”的人

西班牙人常常被苏联高级指挥部挑选出来派到纳粹侵略者占领和蹂躏的苏联领土上去执行责任最大、最机密，因而也是最危险的特殊任务。

要在蓝色师参谋部的军官名单中找到路易斯·门多萨·培尼亚的名字，那是白费功夫。但有一位西班牙小伙子穿着一套德军军服，佩带蓝色师红黄色徽章，往返于侵略者占领下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他随身带着的军官身份证上写着：二十四岁，昆卡人，未婚，在非洲学过军事等具体情况。其实，他并不是出生于昆卡，也从未到过非洲，倒是1936年在马德里郊区的战壕里同摩尔人^①拚搏过。当然，他也不叫路易斯·门多萨·培尼亚，而是叫何塞·帕拉·莫亚。他的战友，不管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员，都亲切地叫他“小帕拉”。这个中尉门多萨属于德国的一支部队，他很多次不得不拿出自己的假证件给德军巡逻队，甚至盖世太保的某个指挥官检查。

这个伪装成蓝色师成员的红色中尉在德军后方有什么任务呢？原来他是被挑选出来同高级指挥部精心组织的别动队的队员们一起执行一项行动。行动的目的是把斯大林的儿子从集中营里营救出来。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小帕拉也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一行动一直没有付诸实施。但执行了一些别的行动，

^① 指原驻非洲的佛朗哥部队。——译者

这些行动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对侦察和破坏敌人的阴谋诡计却是很有成效的。一直到最后完成了他的冒险活动，何塞·帕拉终于“原形毕露”，回到他同敌人斗争的原来的战斗岗位。

我们有二千名同志在苏联各个战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当中有我们内战时期的老战士，也有他们的子女，年轻人。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二千万苏联人的鲜血汇成的海洋相比，他们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是对流亡在苏联的为数不多的西班牙人来说，这个比例是很大的。

何塞·格罗斯在他很有意思的《开辟道路》一书中就反映了这种同近在咫尺的死神进行斗争的生活：从西班牙的7月18日开始直到苏联战胜希特勒，然后又是在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进行游击战争。

永远铭记在心的人们

几年后，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过这样的话：“抗击希特勒侵略者的斗争席卷苏联大地，那里满目疮痍，血流成河，处处残垣断壁，城市和村庄都被纳粹匪徒夷为平地。”

流亡在苏联的西班牙同志们就象我特别指出的那样，不甘心站在一边袖手旁观，仅仅做见证人。因为这场战斗将决定各国人民是得到自由还是受奴役，决定各个国家是通过民主得到发展，还是在希特勒的奴役下停滞不前（这比死亡还要坏一千倍）。

过去，1936年7月他们曾在西班牙拿起武器保卫共和国，抗

击法西斯的侵略。今天，看到自己不能参加正规军，他们就以同样高的热情毅然参加了游击战争。不过，那里的游击战对他们这些来自南方，对俄罗斯的寒冷毫无准备，不熟悉当地风土人情，不懂当地语言的人来说的确是既困难，又危险。

他们走了……有的游击小队，如何塞·桑多瓦尔小队、胡斯托·洛佩斯小队，经过艰难的行军，历尽艰险，打到了离苏联边境很远的地方，在游击队里战斗到战争结束。

有的人打到匈牙利，看到了传奇般的多瑙河。另外一些人还在柏林施普雷河游过泳，或者到了从希特勒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的美丽的布拉格。

但是有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弗朗西斯科·古利翁、莱昂纳多·加西亚·卡马拉、有名的运动健将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领导人胡斯托·洛德里格斯、华金·费霍、维森特·德布拉斯，安布罗西奥·阿尔科塔、阿莱霍·贝拉、阿曼多·桑多瓦尔、玛丽亚·帕尔迪纳、何塞·佩拉雷斯、米格尔·博伊霍、何塞·富西马尼亚、何塞·路易斯·巴拉、佩德罗·潘查梅、胡安·阿门特罗斯、胡安·庞斯，他们都没有回来。还有弗朗西斯科·比利亚隆、何塞·克雷斯皮略也没有回来。多少人倒下了！

有一批青年，军事学校训练毕业后，加入了苏联的军队，他们也没有回来。他们当中有乌里维·加德阿诺、圣地亚哥·保尔·内尔肯、埃克托尔和阿曼多·比亚迪乌兄弟俩和我的鲁文……

他们都是在英勇的保卫战中或是在迅猛的进军中倒下的。有些人的坟墓我们知道在哪里，而另一些人，连他们葬身何处我们都不知。

我们常常自问：他们是在布良斯克森林里牺牲的吗？或是在

地处次喀尔巴阡山脉的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在进军波兰的路上，还是在斯洛伐克山区？

还有博伊霍小组又在哪里消失？博伊霍是出生在加泰罗尼亚的同志，我国内战时期的战士，活动在可爱的苏联土地上的光荣的游击队员。

今天黑暗开始消失了。永远也不能忘却的同志们和朋友们的伟大的英勇形象，如同在屏幕上一样又展现在眼前，光线那么清晰，形象那么逼真。

1943年3月，一支大部分由加泰罗尼亚人和西班牙人组成的游击队，被围困在克里米亚的舒宾诺村。敌众我寡，力量相差悬殊。

这个村庄的农民讲述了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在希特勒警察局档案中发现的文件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战士中，许多人讲的话舒宾诺村的农民都听不懂。他们是谁呢？

他们是加泰罗尼亚人，西班牙人，也有苏联人。这就是米格尔·博伊霍领导的游击小队。队员有何塞·富西马尼亚、佩德罗·潘查梅、胡安·庞斯、胡安·阿门特罗斯、何塞·佩拉雷斯和何塞·路易斯·巴拉·罗德里格斯。和他们并肩战斗的还有两名苏联战士库纳金和库拉晓夫。

共同的意志使他们情同手足，发扬了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决心象保卫西班牙、保卫加泰罗尼亚一样保卫苏联的国土。现在他们又在同一个墓穴中安息。舒宾诺村的农民一贯艰苦勤劳，那里的妇女对人犹如慈母般和蔼可亲。这些慈善的人们用双手为这些无名战士树起了朴实无华的纪念碑。

每年，人们都要在这些苏联抗战英雄和西班牙英雄墓前放

上一个个花圈和一束束鲜花，以表对他们的崇敬与思念。

全国大联合，全体西班牙人的和解

在我远离祖国几千里、流亡飘零的日子里，我的一项经常活动就是每天写文章和报道，有时用真名，有时用笔名安东尼奥·德格瓦拉或者胡安·德格尔尼卡。这些文章和报道都是通过比利牛斯广播站和莫斯科电台的频道传播到西班牙的。有些文章还刊登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党报上。

就在那时，我和何塞·迪亚斯一起制定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广泛的、公开性文件，号召西班牙工人阶级和西班牙全国人民建立全国大联合，首要目的就是阻止西班牙被卷入世界大战。

这一文件说：

西班牙共产党不放弃自己的任何原则，但考虑到国内外形势，提出一个广泛的纲领，作为纽带把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和派、社会党人、天主教徒、巴斯克与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全国劳动者联合会成员、共济会成员以及中间派和右派人士都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只要他们同意以在西班牙建立正常生活和共和国法制作为基础。这个纲领甚至包括国内政权机构内部形成反对佛朗哥政策运动的各种因素。

全国大联合应当为争取国家独立与主权，争取大赦、反对恐怖，争取使从西班牙人民手中夺取的粮食一颗也不要落到德国法西斯手中去而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这一号召在西班牙国内外反法西斯运动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全国大联合的思想逐步深入西班牙各民主领域，甚至形成了一些有名的组织机构。

几个月后，我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阐述这个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已经提出了向着全体西班牙人和解的方向前进的思想。几年后，这一思想终于成熟了。

这里，我摘录这篇文章中的几段：

去年9月，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关于全国大联合的文件，在国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加强了反对长枪党及其战争政策的运动。

西班牙共产党当前关于全国大联合的立场既不是新花样，也不是陌生的东西。因此绝不会使人感到突然。它是我党一贯立场的延续。

早在我国解放战争中，面对种种不理解的态度和宗派主义的倾向，甚至面对某些人企图改变我国战争性质的倾向，共产党就捍卫了全国大联合的政策，不曾有丝毫的动摇，也从不担心某些不负责任的政客对这一爱国主义的一贯立场品头论足。

当时，我们并不是为共产主义而斗争，而是为保卫民主共和国，为争取我国实施共和国宪法和民主法律而斗争。我们忠于我们的诺言和我们的同盟者。我们坚信，这样才能保护我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坚决反对实行不适宜的社会化的试验。我们在各条战线都坚定热情地进行了斗争，捍卫了人民的和共和的西班牙的旗帜。这在当时就是革命的真正含意。

长期以来，共产党为保持和扩大团结作出了各种牺牲。

当由于战争的需要必须进一步扩大团结民主力量的纲领，制定中央政府的“十三”条纲领时，共产党维护和宣传了这个纲领，其忠诚的程度谁也无法与之相比拟。

今天，我们又向全体西班牙人提出了全国大联合的问题，因为我们国家正面临巨大的危险。这种危险同1936年7月18日军事叛乱出于同一根源。

我在那篇文章中强调指出西班牙如果被希特勒的走狗，佛朗哥分子拖进战争，那西班牙就会面临被毁灭的危险。我号召全体真正的西班牙人，不论是“右”的，还是“左”的，都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鉴于这种爱国主义的考虑，我们首先提醒左翼力量，不要把西班牙现存的一切政治和社会核心同长枪党一样看待，那是极其错误的。西班牙的最高利益要求的正是制止长枪党在其战争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以便使“从长枪党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西班牙坚定不移地向着全体西班牙人和解的方向前进。”

巴什基尔

在希特勒军队步步紧逼的危急情况下（他们当时离莫斯科只有几公里了），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决定转移到巴什基尔共和国首都乌法去。撤离工作是困难的，也是令人难过的。

我关心的是使所有西班牙孩子和青年都能撤离出去。实际上，西班牙人的家庭和住宅都已撤出受威胁的首都。只有居住在一个公寓里的一些西班牙青年，由于某种原因尚未撤离。考

考虑到莫斯科当时情况的严重性，我向有关同志坚决表示，撤离工作不完成，我就不离开。那次谈话的气氛是紧张的，但是我还是宣布，只要还有一个西班牙青年留在莫斯科，我就不离开首都。

这种紧急的转移工作带来了一大堆问题，其中有些是人员撤离的问题。

我女儿，阿玛娅还在学校里。鲁文在前线受了伤，当时正在鲍里索夫疗养。那天早晨，他正在我普希金诺村的家里。

我把阿玛娅从学校里叫了回来。两人收拾了一下旅途中的生活必需品。我们还保持着西班牙的习惯，在那种时刻也没有忘记带上土豆鸡蛋饼，但后来并没有吃上，因为在一个车站丢失了。那是1941年10月16日。

我们乘车到喀山火车站。车站上没有一点光亮。这是为了预防敌人不断空袭而采取的最起码的安全措施。密密麻麻的人群在黑暗中拥挤着，不分是哪一趟列车，也不管它是开到哪里去的，只要能远离纳粹的侵略。

在黑暗中，人群你推我拥，一会儿，我和我的孩子们就被冲散了。我被挤进一节车厢。火车没有发什么信号，就开动了。鲁文和阿玛娅他们俩也失散了，混杂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留在车站上。

几小时后，在一个车站上（我不记得站名了）我突然喜出望外得知鲁文、阿玛娅和其他许多同志一起坐上了我们后面的那一趟车。我们大家将在乌法见面。

在车厢里，我完全意外地见到了伊雷内。这样，在这次去远东的长途跋涉中，她就一直陪着我。和我一起的还有一位保加利亚专家斯捷潘诺夫（斯托扬·米涅夫）同志，他的境遇和我们差不多。他象变魔术似的掏出了咖啡、搅拌棒、开水。还邀请我们

喝一杯。那滋味真象是一杯美酒。

在我们同一列车上还有各国的外交官。有几位工党的领导人，如沃尔特·西特林。他们是在德军进犯时，羁留在莫斯科的。后来，伊利娅·爱伦堡、鲍里斯·波诺马廖夫和其他朋友也都来陪伴我们旅行。

我们的车没完没了地开了九天。中间，不时还要停下来，给从对面开来直奔前线的军车让路，或者给从我们后面赶上来的，装满军工厂机械设备开往较安全地方去的平板货车让路。在这些货车上的机器旁边还有一些工人守卫着那些对战事至关重要的设备。在1941年的那个值得纪念的秋天，气温很低，但他们好象谁都没有感觉到冷。苏联的工人，这些生产战线上的战士们懂得，他们必须在大后方不失时机地把机器安装起来，继续生产前线所需要的一切。

关于乌法，我们知道些什么呢？据说，那是个远方的城市，始建于十六世纪，是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巴什基尔的首都。这个共和国地处乌拉尔山麓。在乌拉尔山脉两侧，欧亚两大洲遥相呼应。

离我的故乡加利亚达，离我们的马德里真远！

战争打乱了一切，打散了一切。不仅屠戮了数以万计的生命，而且也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家破人亡，背井离乡，被抛向远方，抛向陌生的地方。

假如我们不是在撤离，而是在和平时期进行旅行，我们就会兴致勃勃地游览一下巴什基尔。它与鞑靼自治共和国接壤，别拉雅河（白河）穿越其间，山区景色十分优美。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的鞑靼—蒙古“金帐部落”就是越过这些高山过来的。

我们将要同巴什基尔人、鞑靼人、俄罗斯人，还有楚瓦什人

和乌德穆尔德人等许许多多民族的人民共同生活、工作几年了。

巴什基尔劳动人民把他们的革命传统引为自豪。他们参加过1917年的十月革命，参加过同白匪的战斗。在乌法，在本世纪初就出现过以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齐亚鲁巴为首的工农革命委员会。列宁曾和巴什基尔地方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开过会。象夏伯阳和伏龙芝这些传奇式的人物都参加过解放这些远方民族的斗争。

1919年诞生了巴什基尔社会主义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当然它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的第一个自治共和国。

革命给巴什基尔人的生活、文化带来了变化。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接着本民族的文学也诞生了。

我们到达乌法时，那里的人民，同苏联全国人民一样，都已经动员起来参加反侵略战争了。乌法人对我们热情友好。他们把少年宫腾出来给我们做共产国际的办公室，又把巴什基尔旅馆空出来给我们这些来自陌生国家，操着稀奇古怪语言的革命者居住。

说实在话，在我们撤离后，生活和工作情况都不允许我们去参观访问，去研究本来非常有意思的，信仰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我们的活动只是日以继夜孜孜不倦地工作。气温有时达到零下40--50度。而天空却是难以置信地一片晴朗，还有迷人的夕阳。每天清晨我们才下班，沿着在厚厚的雪地上用镢头敲开的小路回家。地上的积雪有一层楼高。

至今，每当我们回想起那种气温，还对人们献身于重大事业时所表现出来的抵御能力赞叹不已。因为那时好象无论什么困难我们都能克服。尽管敌人步步进逼，我们总是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和必胜的信心工作着。苏联人民坚韧不拔的精神，英雄的

气概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决心使我们在那种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依然士气高昂。

我们在乌法保持了严明的纪律，这是在那种严酷战争环境下的需要。

我在前面提到过，我的儿子鲁文在鲍里索夫战斗中受了伤。他在古比雪夫城的一家医院住院治疗了两个月后，又从那里到了莫斯科，要求重新派他上前线。

我的女儿阿玛娅上了一所中学。

一些亲近的朋友也带着家眷来到乌法。他们当中有著名建筑师曼努埃尔·桑切斯·阿尔卡斯和路易斯·拉卡萨、科尔东将军、雕塑家阿尔贝托和他的妻子克拉拉·桑查和其他一些同志。根据各自的职业，每人都担负一定的工作。胡安·普拉内列斯博士在恩格斯大学工作，离我们很近。

一群西班牙少年也到了乌法。在战争动乱中，他们与我们失去了联系，无依无靠，到处寻找自己的同胞。我们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接待他们，照料他们，安排他们上学或做工。

我们迷航，来到鞑靼人村庄里

巴什基尔的同志们常常邀请我们出席他们的群众大会、军事仪式，发表讲话。

有一次，我从乌法到古比雪夫城参加那里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发表演说。陪我去的有鲍里斯·波诺马廖夫。他那时是季米特洛夫的政治助理，现在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国际

部负责人。我乘坐的是一架敞门的双引擎飞机。飞机里面真象个大风洞，不过那次旅行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飞行员迷了航。飞机在天上转了半天，后来把我们搁在鞑靼人的一个小村庄里。我们的出现使村民们感到惊慌和惊奇。在那种战火纷飞的年月，这是可以理解的。

经过一番解释，他们把我们请进一个家庭的一间房子里。房子四周放置着长椅子，椅子是宽宽的，上面还铺着兽皮。壁炉里冒着火星，把房子烧得暖烘烘的。这家好心肠的主人为了我们不着凉，使劲烧炉子，结果烧过了头，第二天清晨，我一醒来，感到头晕，炭炉里冒出的气体使我中毒了。他们只好请来一位医生。他很快就把我治好了，使我又能重新上路。我送给好客的家庭主妇一条西班牙头巾作为纪念。我们在古比雪夫下了飞机才知道，同志们为我们的失踪坐立不安，派了几架飞机四处寻找。

我的鲁文

1942年是可歌可泣的战斗的一年。苏联的战士们筑起了人墙，抵挡着纳粹侵略者，他们浴血奋战，震撼了全世界。

在敌人围困中的列宁格勒，饥寒交迫，冰封大地，但人们还是在顽强不屈地抵抗着。男女老少，每天都有人被敌人的炮弹打中而倒在大街的冰地上或葬身在被炸塌的房屋里。

在斯大林格勒这座沿着伏尔加河伸展开的带形城市里，人们在血战。这场极为残酷的殊死战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三十五近卫师开上了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前线，我的儿子鲁文尉官就在这个师里服役。他没等伤口痊愈就到莫斯科要求派他到前方战斗岗位上去。8月13日，我收到了他的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在还没有了解到我将会被派到哪一条战线去之前，我一直没有给你写信。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了，我现在正在一个我熟悉的，非常亲切的地方，是我学习驾驶飞机的城市里……我真想尽早投入战斗。你可以放心，我一定会尽到一名年轻共产党员和战士的职责。

我连忙给阿玛娅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孩子：鲁文已在前线了。他先是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第三十五近卫师，从那里上了前方。

拥抱你

多洛雷斯

鲁文在斯大林格勒战斗的时间很短，但异常艰苦。

当时斯大林格勒战线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尼基塔·赫鲁晓夫通知我，我的鲁文于9月3日牺牲了……他自己也刚刚在这一战线失去了一个儿子。

赫鲁晓夫告诉我说：

鲁文·伊巴露丽指挥的机关枪连粉碎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在这一战斗中，近卫师尉官鲁文·伊巴露丽受了重伤，被战友们送进医院……医生们尽力抢救这位西班牙青年的生命，但无效。1942年9月3日清晨，鲁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个师的战士们在鲁文墓前宣誓要为他们的战友报仇。他们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三十五师高举着旗帜，走过了光荣的战斗路程，从斯大林格勒直打到柏林。我的鲁文就是在那面旗帜

下牺牲的。

那面旗帜连同我的鲁文的证件、照片和个人生活用品至今还珍藏在苏军中央博物馆里。

1942年9月23日，我收到了季米特洛夫从莫斯科寄来的一封信：

亲爱的多洛雷斯：

您优秀的儿子的牺牲无疑是命运对您个人最不幸的打击。您抚养和教育出来的，令人钦佩的西班牙革命青年鲁文的牺牲是我们大家，西班牙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重大损失。

请您相信，我们的心与您在一起，分担您的痛苦。

不过，值得您和我们欣慰和自豪的是鲁文是在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英勇奋战中，在保卫光荣的斯大林格勒城市的英勇战斗中倒下的。

您的儿子——英雄战士，用自己的鲜血，巩固了苏联人民和西班牙人民之间在以您，鲁文的英雄母亲为最好代表的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中结成的战斗关系。

鲁文的牺牲和成千上万个保卫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英雄们的牺牲一样，向我们大家发出了号召，号召我们更加紧张地、毫不留情地同法西斯强盗进行斗争，直到他们彻底失败。

我们坚信，您，亲爱的多洛雷斯，一定会把您巨大的悲痛化为新的力量，化为对万恶的法西斯刻骨的仇恨，让敌人恐惧，为西班牙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造福。

紧紧地，紧紧地握您的手

格·季米特洛夫

怎么叙说我的痛苦呢？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一个母亲由于失去自己的儿子所受的痛苦了。他是我唯一的儿子。我生了六个孩子，现在只剩下阿玛娅。

他是在斯大林格勒这场决定希特勒匪徒失败的战役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滑铁卢牺牲的。

巴勃罗·聂鲁达在他歌颂斯大林格勒的诗歌中，以过人的精湛艺术把西班牙同斯大林格勒融合在一起：

西班牙人想起马德里，
他高呼着，
要顶住，姐妹般的城市，
要顶住，光荣的城市。
他在洒遍西班牙的血泊中站起来，
为了西班牙，他又抬起了头。
在刑场墙根，西班牙人寻思着，
斯大林格勒还存在吗？
在牢房里，一双双黑色的眼睛
把写满你的名字的墙壁看穿。
为你流的鲜血，为你的烈士，
西班牙痛心疾首。
是你，斯大林格勒，给了她安慰，
使她造就了无数英雄，
与你的英雄儿女相比美。

几年后，我给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水电站青年作业班写了一封信：

鲁文·路易斯·伊巴露丽作业班的劳动者们，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水电站的全体劳动者，

亲爱的朋友们和同志们：

得知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大型水电站的建设中，有一个班是以我的儿子鲁文的名字命名的，作为他的母亲和共产党员，我感到心情激动。

我很难向你们表达，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的鲁文活在你们的理想中，活在你们的希望中，活在你们英雄般的劳动中，活在苏联最大的水电站艰苦的建设事业中！……

他在西班牙，很小就开始习惯于劳动和斗争。在我们工人家庭艰难的生活中，他一直都积极帮助我们。他散发党秘密出版的文件和报刊。参加失业工人的斗争和游行示威。我被捕入狱后，我们党的领导机构把我的两个孩子都送到苏联来，让我在西班牙艰难的生活与斗争条件下能够从事我们党的革命活动，而不必为孩子们流落街头无家可归而担忧。

在苏联，鲁文在利哈乔夫工厂工作过，在西班牙战争年代里，他回到祖国，在人民军队里与祖国人民一道进行了斗争。

西班牙共和国失败后，他又同其他数以千计的共和国战士一道被法国政府关进难民营。从那里，他回到了他热爱的第二祖国苏联。他上了军事学校，加入了苏联军队。从抗击希特勒侵略者斗争的第一天起，他就在苏联队伍中进行斗争，在保卫白俄罗斯的鲍里索夫战斗中受了重伤。由于他英勇奋战，他被授于红旗勋章。尚未等痊愈，他又重返部队。在保卫斯大林格勒战斗中英勇牺牲。死后，被追认为苏联英雄。

请你们原谅，我把我的鲁文的生平写得这么简短，就象

他的生命那样简短：他只活了二十二岁。但是，我愿意把它写出来，好让你们，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作业班的同志们和朋友们知道，鲁文并不是娇子，而是象你们一样的工人，一名在西班牙斗争过并在保卫苏维埃国家的战斗中献出自己青春和生命的年轻共产党员。

谢谢，鲁文·路易斯·伊巴露丽班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谢谢，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劳动者们，谢谢你们在艰难困苦的劳动中表现出忘我的精神。

祝你们在新的日常工作中取得新的成绩，生活幸福。

你们的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

在苏联，以鲁文·路易斯·伊巴露丽命名的还有学校、国际友谊俱乐部、劳动班。常常有人给我写信。我也满腔热情地给他们回信。看到他们象亲儿子一般亲切的话语，使我感到我的鲁文还活着。

斯大林格勒烈士大街耸立着一座朴素而雅致的纪念碑。那里安息着我的鲁文和其他两位被希特勒侵略者夺去生命的青年，他们是飞行员卡缅希科夫少校和法齐雅胡齐诺夫大尉。

在克里米亚天文台工作的苏联女天文学家塔玛拉·斯米尔诺娃在写给我的女儿阿玛娅的一封很有意义的信中说，1983年初，她发现了几颗小天体，说她把其中的一颗命名为伊巴露丽，以纪念鲁文。

献给鲁文·路易斯·伊巴露丽

夜幕降临俄罗斯的大地
降临在白雪皑皑的大草原，

一声叫唤，使战马收住了脚步：
“那位西班牙年轻尉官在安息……”
他满身血迹斑斑，
他手持钢枪，渴望复仇与胜利，
从埃布罗河岸边来到这里，
全身闪烁着西班牙自傲的光芒。
他日以继夜战斗不息，
把自己那颗年轻的心
留在这遥远的西班牙。
他的战友说：
“这就是西班牙之子
欢乐的哈拉马河水浇灌的西班牙之子。”
同法西斯禽兽的战斗中
枪弹深深打中他的胸膛，
他牺牲了，
他高呼着“同志们好！”倒下了。
这呼唤成了向全世界青年发出的号召。

阿图罗·塞拉诺·普拉哈

我们失去了何塞·迪亚斯

1942年3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最艰难的战斗使反法西斯民主大联盟的主要缔造者——苏联人民处于最紧张的时刻，我们

失去了我们的总书记，何塞·迪亚斯。

早在西班牙的监狱里和苦役中，他就得了一种肠道病。几年来，这种有可能是不治之症的病痛一直在折磨着他。他和他全家就转移到远离战场的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以前叫第弗利斯）去了。这是一座气候温和怡人的城市。给他治疗的都是苏联著名的大夫。他的妻子，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聪颖的特雷莎·马克斯想出各种点子奇迹般地减轻他的病痛。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很不好。他远离党，远离政治生活，远离战争，远离自己的人民。这对我们的佩贝·迪亚斯这样一位四十七岁的革命领导人不能不产生消极的影响。

何塞·迪亚斯离开了我们，结束了自己短暂然而英勇的生命。在那乌云密布的日子里他的去世是我们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当时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分散在各大洲。在西班牙，我们的党员受到严刑拷打，被枪杀。

我们当然知道，何塞·迪亚斯身染疾病无法工作。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还是感到他就在我们之中，都记得他堪称楷模的革命经历，他天生的才能，他的洞察力和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他的最后一封信

他给我留下了一封信，是他亲手写在一页纸上的几行字。

亲爱的多洛雷斯同志：我生命的末日就要来临了。我

想一定要在这之前给你留下几句话。

多洛雷斯,请以我的名义向西班牙人民,向党,向党的全体领导表示敬意。

我们的党是在战争中成长、发展起来的。我们在战争中失败了,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党还是保持了自己的团结。

我们党的团结对于我们就象生命的雨露。

何塞·迪亚斯还讲到共产党员要学习、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必要性。最后他写道:

拥抱大家,紧紧地拥抱你,多洛雷斯。

佩贝

这就是他的嘱托,一个令人钦佩的革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何塞·迪亚斯的嘱托。

在他的墓前,我这样说:

你缔造和培育的党保持着抵抗运动旺盛火焰,正在国内进行不倦的斗争,它定将实现你的遗训,保持自己的团结,实现全国大团结,为争取我们的西班牙奠定基础。你把整个生命都贡献给了这个西班牙。

我乘一架军用飞机(在那种条件下,这是唯一可能的交通工具),从乌法赶到第比利斯参加何塞·迪亚斯的葬礼,慰问他的妻子和女儿。

由于天气不好,我们——伊雷内同我一起前行——只好在寒风刺骨的斯大林格勒作短暂的停留。苏联这个国家幅员是这么广阔,当我们第二天在格鲁吉亚首都走下飞机时,看到的是阳光灿烂,风景美丽极了,连战争的影子都没有,好象是来到了另

一个世界。但是，我们这次旅行却是悲伤痛苦的。

塞维利亚人民没有机会护送佩贝·迪亚斯到他最后安息的墓地，可是成千上万象安达卢西亚人一样褐肤色的、热情的格鲁吉亚人把他护送到了墓地，以示哀悼。

在我们怀念的佩贝墓上立着一尊格鲁吉亚艺术家创作的精致的塑像。这是第比利斯人民的礼品。

何塞·迪亚斯的为人

何塞·迪亚斯的革命生涯和革命活动同现代西班牙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政治和社会演变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西班牙工人阶级和西班牙人民反对反动的、妄图使我国成为法西斯堡垒的西班牙寡头和法西斯势力的叛乱的斗争最紧张的各个时期，他都是最杰出的人物。

何塞·迪亚斯是二十年代末参加党组织的。象我们多数人一样，他不是来自社会党。他在年轻的时候，参加过无政府主义工会运动。他不是只身一人参加到党组织中来的，而是带来了一批战士。他们当中有曼努埃尔·德利卡多、安东尼奥·米赫和萨图尼诺·巴尔内托。在那个年代，塞维利亚对全国革命都有影响。

佩贝·迪亚斯本人和他的父亲都是面包工人出身，母亲是一家烟草厂的工人。

还在劳工联盟中，他就以斗争精神和办事果断而著称。他

经常被捕,受过严刑拷打。甚至经历过以越狱法^①假处决(我指的是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统治年代)。

他爱看书,努力补上了基础教育方面的欠缺。他还需要援助被囚禁的同志。这迫使这位年轻的劳工联盟成员向共产党人领导的国际红色救援协会靠拢。那里他开始懂得了团结斗争和政治道理。这位塞维利亚青年通情达理,富有革命才干,进步很快,成了塞维利亚党组织的书记。1932年,西班牙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我们党的总书记。就是在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上,打破了(不是没有抵制的)宗派主义和“幼稚病”,并通过学习列宁的著作开始把西班牙共产党改造成为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扎根于群众中并受群众支持的、完全实行国际主义的党。

在何塞·迪亚斯和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有能力的领导人(维森特·乌里维、安东尼奥·米赫、曼努埃尔·德利卡多、佩德罗·切卡、特里丰·梅德拉诺、赫苏斯·拉腊尼亚加和我)组成的班子领导下,西班牙共产党成了战前动乱时期争取工人和民主团结斗争的核心,同时成为以后的工农联盟和人民阵线的核心。

共产党打破了教条主义的狭隘性后,一批又一批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加入了它的行列。

那时,以众议员何塞·安东尼奥·巴尔冯廷为首的一批社会革命党人参加进了西班牙共产党。这样,在我们的同志卡耶

① 早在十八世纪,在西班牙独裁统治时期形成的一种残暴做法。每当监狱里关满囚犯时,就宣布释放一批犯人,让他们出狱。当他们走出监狱后,就开枪一一处决,声称他们是越狱犯。后来的独裁统治者也都跟着这样做,人们称之为“越狱法”。——译者

塔诺·博利瓦尔大夫在马拉加地区选入议会之前，他就成了第一名议会里共产党的代表。以塞萨尔和伊雷内·法尔孔为首的革命与反法西斯左翼的主要成员也加入了党组织。

佩贝同志总是热情洋溢，既不墨守成规，也不好卖弄学识。现在，每当我想起他的这种作风，我的心情就激动。他教导我们要谦虚，对自己的人和别人都要诚心相见，平易近人；教导我们要善于听取和表达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呼声和愿望，并且不遗余力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去维护；教导我们要成为在最广泛、最高尚词意上的我们西班牙的爱国者。

他作为领袖，作为共产党的议员所表现出的政治风格博得了三十年代的西班牙政治家的尊敬。我们不只一次地听到在思想意识上同我们保持距离的重要人物谈到何塞·迪亚斯，说他是“我们国家最有头脑的人物之一”。渗透了他的思想的《三年斗争》一书就反映了他的政治才能。

在创建人民阵线时，何塞·迪亚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在前线 and 后方不知疲倦地维护共和国的团结。

他一贯支持联盟的政策，纠正狭隘的、宗派主义的观点并对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作了解释。何塞·迪亚斯于1938年3月30日在给《工人世界报》编辑部发出的一封信中写道：

要尽一切可能把问题说得明白无误

亲爱的同志们：

《工人世界报》3月23日出版的那一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有必要大声疾呼提请你们和全党注意这篇文章。文章一开始就说，“对一切能使群众迷失方向的事情都应极认真地加以说明”。谁也不能怀疑这句话的正确性，而且，正

因为如此，我认为有必要给你们写这封信，因为在你们的那篇文章中接着有这样一句话：

“……不能象一家报纸那样说我们解决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使西班牙既不成为法西斯国家，也不要成为共产党的国家，因为法国希望的就是这样。”

我不知你们与之辩论的是那一家报纸。可能这家报纸是不喜欢我们党，也不大懂得我们战争问题的人写的。不过，说“我们解决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西班牙既不要成为法西斯的国家，也不要成为共产党的国家”，这是正确的，而且恰恰符合我们党的立场。

为了使人们对此没有丝毫怀疑，需要再次重复说一遍，在这场战争中，西班牙人民是为自己的民族独立，为捍卫民主共和国而战斗，是为了把德国和意大利野蛮的侵略者赶出我们祖国的国土而战斗。西班牙人民进行战斗，是因为不希望西班牙沦为法西斯的殖民地，是为了自由，为了捍卫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这个制度在我国是合法的，能促进最广泛的社会进步。

共产党，此外还有社会党，是西班牙工人阶级的党，它没有，也不可能不同于全体人民的利益和目标。我们党从来也没有想过这场战争的结局会是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工人群众，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之所以和我们站在一起，喜欢我们，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民族独立、自由和共和国宪法最坚定的捍卫者。捍卫这一事业是我们一切团结政策和人民阵线政策的基础和根本内容。尤其是在当前这个时刻，如果我们党内对这个问题不要说是产生动摇，那怕是缺乏明确的认识，那都将是很严重的，是不许可的。当前这

个时刻需要的是人民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反对垂死的外国侵略者的进攻。我国今天的客观情况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需要有一个民主制度，并使之得到加强，而不存在可以考虑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条件。提出建立共产主义制度问题，就等于分裂人民，因为共产主义制度将不会，也根本不可能为全体西班牙人所接受。我们党从来不会做可能分裂人民的事，相反，从战争一开始，就竭尽全力团结全体西班牙人为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而战斗。甚至要尽一切努力去扩大这个团结，把它扩大到所有受奴役，受佛朗哥主义宣传影响的各个阶层去，扩大到“所有不愿沦为残暴的外国独裁统治的奴隶的西班牙人”那里去。

谈到战争的国际性质时，何塞·迪亚斯在信中着重指出：

只有一个能使一切民主国家都可以团结起来，共同行动的范围。这就是捍卫自己的生存，反对侵略各国人民的法西斯，就是反对威胁着我们大家的战争。

在我们说“一切民主国家”时，我们想到的不只是存在社会主义民主的苏联，我们想到的还有法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美国等国家。后面这些国家都是民主的，但是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我们希望这些国家支援我们。我们认为，他们支援我们也是在保卫他们自己的利益。我们正努力使它们懂得这点，请它们支援我们。你们在文章中所采取的立场则是很不同的，是不正确的。错就错在忘记了我们斗争的国际性质，我们的斗争是一场反法西斯的斗争，也就是反对最反动的那部分资本主义，反对可怕的新世界大战的挑唆者，反对和平的敌人，反对各国人民自由的敌人的斗争。我们非常清楚，法西斯侵略者在每个国家都有象英国

保守派和法国右派分子那样的资产阶级集团支持他们。但是法西斯侵略者发展到这一地步，在象法国这样的国家中，民族利益本身会使所有希望自由、希望他们国家独立的人都懂得必须反对这一侵略，而今天要反对侵略，除了具体地帮助西班牙人民外，就没有别的更有效的办法了。

……你们提问题的方法不可避免地再一次使我们限制了我们的阵线，而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正是扩大这一阵线。在西班牙历史上这个不幸的时刻，组织对西班牙的国际援助的任务主要要由国际上的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去完成，但是如果现在可能采取措施使其他力量，非工人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和民主的、自由的资产阶级的力量相信有必要进行这种援助，那么这些措施就肯定会得到我们的赞许。

我们要求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和战争的利益。一切反法西斯主义分子能够而且应该同意我们这一点。还有，所有希望这场战争以我们祖国的胜利和法西斯侵略者的失败而结束的西班牙人也能够而且应该同意我们这一点。党的任务就是在这一条件的基础上，加强一切反法西斯阶层的团结与联系。今天比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任何反对团结的东西，一切都是为了争取人民的团结，尽可能争取最广泛、最牢固的团结。

年轻的领导人进入西班牙共产党

何塞·迪亚斯一直关心着党的延续性，因此，他费尽了心

血，让圣地亚哥·卡里略、特里丰·梅德拉诺、何塞·卡索拉、费德里科·梅尔乔、伊格纳西奥·加列戈、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何塞·拉英、费尔南多·克劳丁、塞希斯·阿尔瓦雷斯等一些在斗争中表现最突出的青年领导人参加到党内来，使党得到更新和年轻化，把老一代的经验同年轻一代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在新的斗争与工作条件下结合起来。

费德里科·梅尔乔有一次对我说：

那是1936年11月，在马德里。我们大家都记得，那几天人民抵抗运动正准备要“豁出去干一场”。我们几位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领导人都住在奥拉阿将军街。有圣地亚哥·卡里略，何塞·拉英，卡索拉和我。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

有一天夜里，圣地亚哥回到公寓，脸上流露出一种坚定的神情。

他说，“你们想干什么，各随己便，反正我已经决定参加西班牙共产党。”

谁也没有提出异议，但是都各自上床，暗自思索去了。

到第二天上午，我们大家都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干脆都参加西班牙共产党。

我们会见了佩贝·迪亚斯，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和佩德罗·切卡。你们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就象对待经过斗争锤炼的同志那样，没有一点家长作风。

记得很清楚，使我们作出这种决定的关键是11月7日。那天拉尔戈·卡瓦列罗把我们召集到国防部，向我们通报说，需要撤离，说民兵抵挡不了佛朗哥军队的进犯。

我们怒气冲冲，离开了国防部。共产党人一个都没有

撤离。他们在保卫着马德里，那怕是象人们所说的那样用“建筑工地的手推车”。

西班牙共产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同人民在一起，他们相信，能够守住马德里。

年轻人向共产党靠拢，这是带有一致性的现象，而且不仅仅是在马德里，在安达卢西亚、瓦伦西亚，全国各地都有这种情况发生。

在待人接物中，佩贝·迪亚斯可真是—一个地道的塞维利亚人，谈吐诙谐，娱乐时快活。他这种讨人喜欢的性格，使同志们和朋友们都愿意接近他。

岁月流逝，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我们面临的情况同何塞·迪亚斯当时所遇到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走过了洒满鲜血，也充满希望的坎坷不平的道路，但何塞·迪亚斯的名字将永远是我们党，我们人民走向社会主义这条崎岖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我们伟大的诗人佩德罗·加菲亚斯在墨西哥写了一首诗：

悼念何塞·迪亚斯之死

——致多洛雷斯·伊巴露丽

从那鲜血染红白雪，
庄稼化为灰烬的地方；
从那工厂只留下暗淡的屋架，
房屋变成瓦砾的地方，
传来噩耗
何塞·迪亚斯逝世了。
那里，顽敌、死神炸开岩石

埋葬了微笑，
使大自然愁眉苦脸，
似白雪，冰冷苍白，
就在那里
何塞·迪亚斯逝世了。
在真诚、毫无表情的人们中间，
在他们惊慌的呼叫声中，
在一双双友好、激动、坚硬的双手中间，
何塞·迪亚斯逝世了。
凡人、巨人、圣人
看到他的生命在奔逝，
在挣脱束缚，在陨落。
从他停止转动的眼珠里
看到他的身躯在死亡，
他的骨灰在燃烧。
死神在奔忙，
这里，不幸的村庄遍体鳞伤，
那里，牺牲者的尸体挂在半空。
整个历史，即将来临的黎明
又被抛在后面，抛进黑夜。
何塞·迪亚斯逝世了。
他虽死犹生，
因为战争还在继续。
在长着油橄榄
麦浪起伏的土地上，
他的名字将在街头传诵，

它将踩着轻轻脚步，
拐过弯，走进家庭，
拜访在贫贱中昏睡的人们。
静默与哭泣，
将笼罩着他忠诚的塞维利亚。
悲伤的目光，嘶哑的声音，
将传遍西班牙，
象风吹田野
轻轻卷起早熟的麦穗，
工厂里，晴天一声霹雳
充满悲痛的目光
会无声地转告：
何塞·迪亚斯逝世了，
同志们，何塞·迪亚斯逝世了。
在我们的俄罗斯，
在初升的阳光下，
何塞·迪亚斯
在生活的怀抱中
逝世了。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

1942年的同一天，我们亲爱的诗人，米格尔·埃尔南德斯

屈死于囹圄，当时才三十一岁。

我对这个来自奥利韦尔拉的年轻农民怀有深厚感情。他一脸稚气，眼睛闪烁着慈善和智慧的光芒。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是西班牙农村成长起来的最优秀的诗人之一。

人们叫我泥土，
尽管我的名字叫米格尔，
泥土是我的职业，
我的归宿……

我是在前线，在战士们中间认识他的。他是文化民兵，他一边战斗，一边给战士们朗诵他那些带有泥土气息、麦穗和鲜花芳香的诗歌。战士们大多数也都是农民，同他是息息相通的，他们喜欢他这个普通兄弟。他以非凡的才干与你谈论更美好的未来，充满公正和爱的未来。

他歌颂青年：

青年永远一往无前，
青年永远所向披靡。
拯救西班牙
要靠它的青年人。

胡安·雷哈诺献给他这样一首诗：

只身一人，
慷慨激昂的牧羊人，
在这激动的时刻，
你还活着，
呼吸着，
幻想着，

歌唱着。
你没有死，
仇杀者未能得逞，
大地不会死，
你是大地，
西班牙壮丽的大地，
多少破灭的梦想
今天都在你的胸怀中深藏，
你呀，火一样热情的孩子，
你就是希望。

我被任命为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

党的领导机构决定，并经共产国际同意，任命我为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

我知道，落在我双肩的责任有多大分量，我知道，我将会遇到巨大的困难。我宁愿同意选别的同志来挑这付重担。

我非常真诚地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季米特洛夫。我对他说，我怀疑我有足够的能力来完成这项任务。

而季米特洛夫回答道：

“多洛雷斯，领导人都是在工作中磨练出来的。”

我埋头工作，尽可能好地完成党交给我的这一项任务。我对困难已经习惯了。我习惯于以坚定的意志，努力奋斗去克服困难。

党的领导机构的同志们，正象我前面指出的那样，都同意对我的任命。

自然，以赫苏斯·埃尔南德斯为首的一帮人少不了耍一些花招，要抵制。很明显，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妄图接替何塞·迪亚斯的位置。过去他对我个人确实是非常友好和支持的。然而，他迁到墨西哥后，企图发动一场小政变，争取流亡在拉丁美洲的同志们支持他宣布自己为总书记。他的阴谋遭到同志们一致的唾弃，失败了。从此，他一直死都对党怀恨在心。

圣地亚哥·卡里略说，1942年春，在哈瓦那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会上，他站在布拉斯·罗加和胡安·马里内罗一边，讲了话。他说，“何塞·迪亚斯逝世了。有人问，谁接替他呢？唯一能够接替他的人是多洛雷斯·伊巴露丽。”他还说：“在墨西哥的同志们都有同样的看法。这是无可争议的一致。”

西班牙共产党1954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又以民主选举的方式选我为党的总书记。

战争期间，党员分散，佛朗哥独裁统治对民主人士，主要是对共产党人实行白色恐怖，在那种特殊情况下，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保持党的团结。

同分散在欧洲和美洲各处的同志们取得联系决非易事。不过最为困难的还是同我们在西班牙的组织保持接触。

我们最好的联系手段还是比利牛斯广播站，即独立西班牙电台。通过它的电波，我们能够经常向我们的人民讲话，向他们通报情况，给他们指明方向，解释时局。

莫斯科电台也将它的波段交给我们使用过。我常常以安东尼奥·德格瓦拉的化名向反佛朗哥的战斗和民主人士发表讲话，使他们在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充满信心，坚定不移。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1942年9月，我们党发表了呼吁全国团结的号召书，提醒西班牙人注意有被拖进世界大战的危险。佛朗哥已向柏林作过这样的保证。我们对西班牙人说，要避免这种灾难，只有全体西班牙人下定决心，团结起来，以爱国主义的精神拯救西班牙，使我们的人民免遭全面战争这一可怕的浩劫。

正象我们在本书说的那样，在国内战争后期，我们就阐述和维护了全国大联合的思想。

何塞·迪亚斯1938年在伊比利亚—美洲联盟发表著名的演说时，就阐明过这一思想：

全国大联合不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政治形式或议会形式。它是在国家独立、领土完整、西班牙作为国家的存在等这些共同的财富受到威胁时，全体西班牙人民的团结。因此，在我们讲到全国大联合时，我们的目光不仅投向在我们领土上应该团结起来反对入侵者的人，而且特别投向战壕的另一边。

文明战胜野蛮

1944年2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了。

苏联军队象铜墙铁壁渐渐把希特勒的各个师围在一个包围圈里。这个包围圈日益收缩，直到使纳粹全部覆灭。

斯大林格勒是战争的伟大转折，是苏联和所有不愿受侮辱、受奴役的各国人民走向胜利的出发点。

陆军元帅冯·保卢斯带着九万一千名士兵投降了。苏联军队直到战争结束都保持着战略上的主动。

有一天早晨，几百名德军俘虏在苏联士兵的押送下走过莫斯科的街道。几天前，他们还以为自己是战无不胜的呢！他们都是从斯大林格勒战线败下阵来的。一个个拖着失败者沉重的步伐，凄惨万状地行走着。

电台宣布了消息后，全莫斯科人都涌向街头，看他们的丑样。我们也混在人群中间，沉默不语地观看这些败兵、败将，即那些“弗里茨们”^①从大街上走过。

是的，莫斯科人都沉默不语地看着他们，没有发泄他们的仇恨，因为此时此刻他们是败兵……

然而，在苏联没有一个家庭不为自己正在抗击纳粹侵略的战斗中倒下的亲人哭泣。几百万烈士、孤儿、寡妇和因失去子女悲痛欲绝的母亲……

在我们身边，有一位司机，眼睛盯着那些“血统优秀”的军官，他们衣衫褴褛，全身上下肮脏不堪，有的缺胳膊，有的瘸着腿，个个垂头丧气，谁也顾不得保持德军耀武扬威传统的步伐了。

“朋友，您在想什么呢？”我们问身边的这位司机。

“嗯，我想，他们是人，对，他们是人。”他举止彬彬有礼，说话宽厚，这就是俄罗斯人的特点。

斯大林格勒已作为永久的里程碑进入历史，为世界上从事

^① 即德国佬的意思。——译者

最伟大事业的人们所想念并从中受到鼓舞。

这是文明战胜了野蛮。

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已经是10月了——莫斯科召开了盟国会议。

一个月后，举行了闻名于世的德黑兰会议。

德黑兰协定宣布：“任何人的力量都无法阻止我们摧毁德国陆军和海上的潜艇、炸毁德国的工厂……”

申张正义的日子临近了。

列宁格勒：九百个日日夜夜

1943年1月，苏联新闻处宣布，对列宁格勒的封锁线已从拉多加湖南岸开始打破了。经过红军两个月的进攻战和列宁格勒人的英勇抵抗，希特勒的防线被冲破了。一年之后，列宁的城市彻底解放了。

列宁格勒这个名字和它的居民所受的苦难深深刻在苏联人民的心中。列宁格勒有多少人死于饥寒交迫。侵略者又向它扔下了多少吨炸弹。但是，列宁格勒没有投降。

肖斯塔科维奇就是在那些史诗般的日子，在这个被围困的城市里，写出了他著名的《第七交响乐》。

列宁格勒人，1941年11月在封冻的拉多加湖上冒着敌机轮番的轰炸，开辟了一条通道，他们给它起名为“生命之路”。通过这条路运进了粮食、药品、武器，把病残老幼撤了出来。

第一批撤离的人员中就有西班牙的学生，不过不是全部西

班牙学生。有一些人——我已经提到过他们了——在列宁格勒保卫战的芬兰防线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

玛丽娅·帕迪娜，一位来自马德里的姑娘，当了护士，她自愿参加了斗争，护理收留了她自己的城市的伤员。她和忍受了三年封锁的男男女女一起，受尽了也许在现代史上都是空前的苦难，最后，她倒下了。

令人痛心的是参加封锁列宁格勒的德军中，竟然有蓝色师的西班牙部队。

皮斯卡廖夫公墓中安息着六十万列宁格勒人。奥莉加·贝戈尔茨写了一首诗，刻在墓碑上：

这里安息着列宁格勒人
男人、妇女和孩子，
他们身边还有红军战士。
为了保卫你，
革命的摇篮，
列宁格勒，
他们献出了生命。

共产国际自行解散

1943年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莫斯科开会，决定解散第三国际。

这一历史性的事件会不会动摇共产主义运动呢？

所有重大的变动都会影响到有关的组织机构，但是也赋予

它们新的动力。在世界大战的情况下，是比较容易达成一致意见的。基本思想是认为由于当时的情况，共产国际的影响范围已经收缩到极限了，认为它的解散同各国共产党的发展前景是一致的。

各国共产党已经成了具有民族特点，影响日益扩大的政治力量。它们在短期内，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地区肯定将进入打败希特勒以后出现的政府。

如果说在各国共产党刚诞生的时候以及在它们最初的活动，共产国际的存在和它对这些党的指导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话，那么，二十五年之后，实际上它就可能阻碍它们的发展。

我和陶里亚蒂、弗拉霍维奇、马努依尔斯基以及其他领导人一起参加了负责起草决议草案的研究委员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的这个文件全文如下：

“1919年，由于绝大多数战前旧工人政党政治破产的结果，组织了共产国际，它的历史任务在于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使其不为工人运动中之机会主义分子所庸俗化及曲解，在许多国度里，它曾帮助先进工人的先锋队团结成为真正的工人政党，帮助他们动员劳动群众来保卫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来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及其所已准备的战争之斗争，来保卫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堡垒的苏联。共产国际曾及时地揭露了‘反对共产国际公约’作为希特勒匪帮准备战争的武器的真正意义。在战前，共产国际早已不倦地暴露了希特勒匪帮在外国的卑污破坏活动，他们是以所谓共产国际干涉这些国家内政的叫嚣，来掩饰这些活动的。

但是在战前，早就可以日益清楚地看到：既然各个国度的内

部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加复杂,那么,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一个别国度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

世界各国发展之历史道路的深刻差别,它们社会制度的殊异,它们社会和政治发展水平与速率的不同,以及最后,工人们觉悟与组织程度的各异,也决定了每一个别国度工人阶级面前问题的不同。

过去二十五年事件的整个进程,以及共产国际所积累的经验,已经明确地证明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符合于工人运动复兴初期需要的团结工人的组织形式,日益不能适应这个运动的增长和每个国度内日益复杂的问题了,而且还证明了这个形式甚至成了进一步加强各民族工人政党的障碍。

希特勒匪帮所掀起的世界战争,使各国间情况的差异更加尖锐,它在成为希特勒匪帮暴政承受者的国度与团结在强大的反希特勒联盟中的各爱好自由人民之间,划下了深刻的界线。在希特勒匪帮集团的国度里,工人、劳动者及一切忠诚人民的基本任务,是用一切想得出的办法,从内部颠覆希特勒匪帮战争机构,帮助推翻应负战争责任的各政府,这样来协力击败这个集团。在反希特勒的国度里,为求最迅速地摧毁希特勒匪帮集团和建立各民族在权利平等基础上的友谊合作,最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先进工人们的神圣责任,是用一切方法来支持这些国度政府的作战措施。同时,不能忽略参加反希特勒联盟的各个国度,也有它们自己的特殊任务。例如,在希特勒匪帮占领了的、和丧失了它们国家独立的国度里,进步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任务,是开展正在成长为反希特勒德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

武装斗争。

同时，各爱好自由人民反对希特勒暴政的解放战争，已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行动起来。他们不分党派、不分宗教，团结在强大的反希特勒联盟的队伍中。这个解放战争更加明显地说明了，为最迅速战胜敌人所需要的民族高潮和群众动员，是能够由各个国度工人运动的先锋队，在自己国家的体制内最好和最有成效地实现的。

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估计到国际形势及工人运动中所已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各支部在解决它们面前的问题时，有更大的伸缩性和独立性——，那时就已强调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决定工人运动的一切问题时，需要从各个国度的具体情况及特殊条件出发，同时一般地避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的内部组织事宜。

在考虑和批准1940年11月美国共产党退出共产国际队伍的决定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是遵循了这种原则的。

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者的学说指导下，从不主张保存已经变为陈旧的组织形式，他们永远是使工人运动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服从整个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利益，服从特定的历史条件的特点，及由这些条件所直接产生的各种问题。他们记得伟大的马克思的榜样：马克思曾将进步的工人团结到国际工人联合会的队伍中来。而在第一国际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奠定了欧美各国工人政党发展的基础以后，马克思鉴于创造民族的、工人的、群众性的政党之日益增长的需要，就实行解散第一国际，因为这个组织形式不再符合这一需要了。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从上述各项考虑出发，并估计到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与政治上的成熟，且因在目前战争

过程中曾有若干支部提出解散国际工人运动指导中心——共产国际——的事实，但由于在世界战争情况下无法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乃由执委主席团自身提出下列提议，再经共产国际各支部加以批准：‘解散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中心——共产国际，解除共产国际各支部因共产国际章程及历届代表大会决议所负的义务。’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号召共产国际的一切同道者集中他们的力量于多方面地支持与积极参加反希特勒联盟各民族及国家的解放战争，以便加速摧毁劳动人民的死敌——法西斯主义及其同盟者与附庸。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哥特瓦尔德、季米特洛夫、日丹诺夫、
科拉洛夫、柯泼米尼格、库西宁、马
努依尔斯基、马尔梯、皮克、多列士、
弗洛林、埃尔柯利

此决议为下列各国共产党代表所同意：

比安柯（意大利）、多洛雷斯·伊巴
露丽（西班牙）、勒蒂宁（芬兰）、波克
尔（罗马尼亚）、拉科西（匈牙利）

1943年5月15日拟定”

我们党毫无保留地通过了这一决议，认为一般说来，各国共产党确实已经有能力自己来领导，而无需监护人。我们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经历的经验证明这一措施是正确及时的。

实际上，由于世界大战造成的条件，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极为困难。共产国际从1941年7月以来作为这样的国际组织已经停止活动了。具体地说，在四十年代共产国际的基本活动只

成了流亡在苏联的共产党领导人通过电波发表意见，在战争的困难条件下，指导着各国党和人民的媒介。

后来建立了所谓的共产党情报局，或称情报局，拥有执行权。西班牙共产党理所当然没有加入。它的寿命短暂，但却留下了令人伤心的回忆，因为正是这个组织不公正地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驱逐出了共产主义大家庭，并对这个为反对希特勒占领而如此英勇战斗过的国家进行了经济和政治隔离。

莫斯科圆柱大厅

那是1944年。我应邀到圆柱大厅去做报告。我报告的题目是：“佛朗哥的西班牙，希特勒的卫星国”。

在列宁、季米特洛夫和许多历史著名人物作过演说的那个富丽堂皇的大厅的讲台上作报告，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使我感到胆怯，况且还恰恰要用俄语讲。

我作过多次演说，但这是我第一次处于如此困难的境地。

我把报告用西班牙文写好，然后由别人把它译成俄语。基里尔字母同我们拉丁语系的文字差别很大。纸上，一个个字都象是用一种挑衅性的目光盯着我。我看台下，在光辉夺目的大型吊灯照得通亮的大厅里挤满了听众。我看了一看这一建筑物因此而得名的闪闪发光的圆柱子，感到人们的目光都凝聚在我的身上。我用我这个结结巴巴的俄语怎么能同他们这些友好的听众沟通思想呢？

我鼓足勇气，上了讲台。用他们的语言向与会者表示敬意，

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然后我开始讲话。我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怪，不象是我自己的声音，语调、风格也不是我自己的。

怎么办呢？

我必须当机立断。我推开讲稿，开始用西班牙文讲。尽管他们听不懂，但这毕竟是我自己的语言。

结果，啊，真出乎意料！厅里掌声雷动。一张张笑脸向我致意，对我说：“这就对了，我们要听的就是这个！”

我讲话后自然是由一位可爱的女译员翻译成俄语。但我再一次确信，只有用母亲身边学会的语言作演说，才能成为一个演说家。

在斯德哥尔摩

的确，不久之后在斯德哥尔摩我又遇到了类似的事情。

一些瑞典朋友利用我到瑞典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机会，邀请我去讲讲西班牙的情况，讲讲我们的人民。大厅里挤满了金黄色头发的人们，他们神态安宁、和蔼可亲。陪我在台上就座的有社会党议员勃兰亭，他是民主西班牙的真挚朋友，是支持我们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最积极的组织者之一。

我在讲话中努力把我们的英勇壮丽的斗争告诉我的听众，告诉他们我们的人民是永远不会屈服的。

我的讲话——当然是用西班牙语——受到长时间掌声的欢迎。

勃兰亭议员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当他说让他来翻译

一下我的讲话时，大厅里的人们喊成一片，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勃兰亭微笑着对我解释道：“他们说没有必要翻译了，大家全都听懂了。”

马拉加行动

1944年是个多事之秋，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一天下午，我收到一封信，看后不禁大吃一惊。是圣地亚哥·卡里略从奥兰寄来的，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我已训练好六十名同志，准备在马拉加登陆。”

我很能理解卡里略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抱负，他们热切希望潜入西班牙，直接参加反独裁的斗争。他的意图是在马拉加建立一个游击根据地，同内地的斗争建立新的联系。两个月前他们开始训练，那时到处都已经在谈论希特勒的垮台。必须加快步伐，争取使西班牙共和派的问题同胜利问题一起解决。

圣地亚哥的计划反映了我们青年同志的那种胆量和勇气。

尽管如此，这个计划还是欠斟酌的。在内地并没有能为迎接这样人数众多的部队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即使登陆能够成功，也还是有些冒失，不能拿我们党如此需要的领导干部的生命以及几十名勇敢的同志们的生命去冒险。

我断然用“不同意”回答了卡里略。

圣地亚哥在第二封信中仍坚持他的观点，并说都是一些可靠的人。

我给他回了一封信，授与他另一项任务：“你到法国去，到党

的领导机构里去工作。”

卡里略服从了——我想不是十分情愿的，他加入了到图卢兹去的小组，秘密地从北非开始了他的旅程，战胜了极其艰苦的条件——在一条军舰上整整藏了五天。

很快他就明白了我为什么坚持要让他那浪漫的登陆计划落空，他自己承认了这一点，他说：“如果真是那么干了的话，我今天大概也不会在这里了。”

到图卢兹去的小组中有：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卡门·德佩德罗、希梅诺和托雷斯（桑切斯·别德马）。

由于卡里略参加到流亡在法国的党的领导机构，党的领导得到了加强，并一直到党中央和政治局的其他一些成员从拉丁美洲和苏联回来都继续运转。

圣地亚哥·卡里略

我早就认识了这位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年轻的总书记，他当时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信徒，从青少年时起就在他父亲的身旁开始在《社会主义者》杂志的编辑部和印刷厂做事情，他父亲文塞斯劳·卡里略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领导人。

在圣地亚哥加入西班牙共产党之前我本人没有直接和他打过交道。

我一直十分尊敬年轻的圣地亚哥，因为由于他的主张统一的精神和革命态度，才使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并，组成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这个新的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是由

一个聪明的小伙子特里丰·梅特拉诺所领导的。这个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在我们的战争中以及在战争之后的那些极其艰苦的岁月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政治作用。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扩大了左翼的队伍，推动了团结，为党输送了很多有作为的年轻干部、战士和政治领导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战争和抵抗运动中英勇献身，另外的一些，如今已经是老资格了，则可以骄傲地宣扬他们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身世以及他们清白的革命经历。

在国际上，西班牙这两个在争取自由的战壕中斗争在第一线的革命的青年团的合并也有力地推动了其他国家青年的团结。

在圣地亚哥·卡里略主持下，社会党青年国际和共产主义青年国际领导小组在马德里开会，参加的人有社会党工人国际的书记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和主席德·布鲁凯尔，以及共产主义青年国际的书记迈克尔·沃尔夫。

世界各大洲的青年、志愿人员源源不断地涌向西班牙争取自由的各条战线的战斗岗位上，在现实活动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安东尼奥·马查多以他那特殊的敏感曾在1937年写下这样的话：“我向你们致敬，团结的社会主义青年们，我以一种崇敬的心情向你们致敬，但我对我那个时代的老人们并不总是感到有这种崇敬的心情，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曾企图肢解西班牙，而你们却努力使它统一起来。”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将作为一项最伟大的业绩载入西班牙革命青年运动的史册。

会有那么一天（应该这么希望）人们会将统一社会主义青年

联盟甚至三十年代西班牙所有进步青年们书写的令人激动的历史编写出来。

人家告诉我说，1939年费德里科·梅尔乔来到巴黎时，当时的共和国驻伦敦大使董·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陪他一起到巴黎警察厅，一个警察头目问梅尔乔说：“你在战争期间作什么工作？”

“最后一段时间，我是外交部副部长下属的宣传总局的局长。”

那位法国警察不无嘲讽地端详着费德里科，看着他那年轻的脸庞和瘦小的体格，然后朝董·巴勃罗大声说道：

“我现在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输掉这场战争了。”

1939年3月弗朗西斯科·罗梅罗·马林和拉蒙·索利瓦到达奥兰时，法国警察对他们也作了类似的评价。

那时他们两人都是只有二十四岁的陆军中校。他们的罪过，看来就因为他们是年青人和英雄。

马林曾回忆道：

他们向索利亚和我要证件，我们只带了军人身分证，上面标明我们的军阶和职位，当时我们两人都已经是师长，却刚满二十四、五岁。盘问我们的情报局的军人看看我们证件开始挖苦我们。正在这个时候，从我们面前飞过几架波塞兹飞机，我们看到这些飞机便对他们说，如果法国军队的装备就是这种水平的话，只要和德国军队战一个回合就会一败涂地。我们的话刺痛了他们，于是二话不说把我们送到米尔斯克比尔要塞，而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把我们送到去法国的港口。

那些法国警察企图无视西班牙人民对国际法西斯的侵略进

行了将近三年的抵抗这样一个事实。看来他们不知道在1936年正是这些许许多多部队的二十来岁的指挥员和政委尽了最大可能抑制了摩尔人和“本国人”的大举进攻，其中许多狙击战连不少军事专家们都认为是不可能取胜的。

在那些年轻的军事指挥员中表现尤其突出的有：卡索拉、埃特尔维诺·维加、弗朗西斯科·罗梅罗·马林、拉蒙·索利瓦、佩德罗·马特奥·梅里诺、阿特米奥·普雷西奥索、弗朗西斯科·梅松、塔古埃尼亚、尼拉蒙·托拉尔、多米西亚诺·莱亚尔、弗尔南多·德拉罗莎、卡里翁、爱德华多·加西亚、佩德罗·巴尔维德、安德烈斯·马丁。政委当中有：何塞·莱恩·恩特拉戈、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托马斯·韦特、路易斯·苏亚雷斯以及其他许多年轻的指挥员和政委，他们的才能和英雄主义精神是我们人民军队的骄傲。

1946年，我在一次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大会致辞时曾经说过：

钢铁连队战歌的歌词并非一句空话，那是一位人民诗人为了向我们的英雄表示敬意而写的：

钢铁的连队

高唱战歌迎着死神冲上……

他们高歌奋进，为捍卫生的权利和自由的权利去迎接死亡！高唱战歌迎着死神冲上，为人民和祖国的自由献身那不是死，而是永远活在人民和祖国对他们英雄儿女的感激的记忆中！……利纳·奥德纳、梅特腊诺、我的鲁文、胡斯托、维蒂尼以及许许多多我们青年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们并没有死，他们永远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将永远活在新一代的爱慕和敬仰中！……

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也不能够忘记我们战士们的英名：政委贝尔蒙特，他没有辜负政治委员的口号“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指挥员莱亚尔、海员出身的反坦克手科尔、纯朴的庄稼汉塞莱斯蒂诺·加西亚、莫拉塔·德塔胡尼亚等人的光辉名字。我们不会忘记第一位民兵指挥员胡安尼托·加西亚，不会忘记安德烈斯·马丁、古隆、安东尼亚·桑切斯和许许多多年轻的英烈们。

1939年我在莫斯科见到了圣地亚哥·卡里略。我在前边提到过，当时他在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

1940年中期，他到了美国、古巴、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其他一些国家，在那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

直到1945年，当我结束卡夫卡^①式荒诞不经的旅程到达法国时，才在巴黎又一次见到了他。

会见斯大林

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做离开苏联的准备。我是想到法国去和在那里的，或将从拉美一些国家聚集到那里去的党的领导机构的同志们会面。

在离开苏联之前我想与斯大林告别一下。

他接见了，在场的还有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同我一起去参加会见的还有伊格纳西奥·加列戈。

^① 卡夫卡(1883—1924)是生于布拉格的德语作家。他的创作手法有表现主义色彩，常把现实生活的细节和幻想情境交织在一起。——译者

会见的气氛极其热烈，我对斯大林表示，感谢苏联党和人民对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支持，感谢苏联给予流亡在苏联的我国同胞的热情款待。

谈话中我们涉及到各种问题。战争接近于最终战胜纳粹侵略者的尾声，人民面前展开了新的、还不十分明确的前景。

斯大林很想知道西班牙劳动者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是如何发展的，想知道我们党的政策。

我们详细地向他作了介绍，他听得十分认真。当我们谈到游击队，谈到有些西班牙人正在西班牙和法国战斗，谈到我们人民的抵抗运动等情况时，他问我们是否考虑过在战争后期通过某种方式利用我们的长期英勇的斗争获得一点好处。

我们肯定地说，“是的。”我们认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由于他们的斗争和抵抗，应该在胜利的桌上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认为，希特勒的倒台必定导致佛朗哥的垮台。但他绝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我们需要国际政治等各方面的支援。

我们考虑应该为我们在法国和国内的游击队装备轻武器。

斯大林十分专注地听着我们的讲话，他缓缓地起身，握着他那从不离手的烟斗慢慢踱步，之后又重新坐到我们对面。

“多洛雷斯同志，”他说，“你应该知道，我们将一如既往，随时准备向你们提供你们所需要的帮助，这一点你们就交给我们办吧，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士们是我们的盟军。”

我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告诉我们的领导同志们，当然还要告诉内格林博士。我打急电通知他，请他在巴黎等我。

内格林给了我肯定的答复，他一定等我。

我请求戴高乐将军签发有关的签证，他毫不迟误地把这些

签证交给了我。

但是这里产生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战争期间我怎么从莫斯科到巴黎去呢？民航客机已经不通航了，军用飞机是从属于英国当局的，而英国当局显然宁愿让我呆在离我们国家的边境远远的地方，在地球的另外地区，而且是越远越好。

我伫立在我莫斯科住所的窗前，隔着双重玻璃凝视着飘落的雪花，反复地思考着这些问题。

苏联同志们建议我走一条较远但却比较可行的路线：伊朗、埃及然后有可能的话在开罗找到去法国的办法。

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现在最要紧的是尽可能早地离开这里。

和我一起上路的有我的女儿阿玛娅，还有年轻的哈恩·伊格纳西奥·加列戈同志，他的陪伴确实给我帮了很大忙。

漫长的旅程

1945年2月23日，我们乘一架苏联军用飞机离开莫斯科。天气寒冷异常，但因为我们要向南方飞，所以只穿着轻便鞋和薄裙子，当然，我们的脚都冻僵了。有一个飞行员慷慨地脱下他自己的高统皮靴让给我穿。他们把我们大家都用毛毯裹了起来。

在斯大林格勒和巴库作了短暂停留后，我们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着陆了，在那里我们开始四处奔走活动，想办法找寻去埃及的交通工具，经过一个星期的奔忙，我们达到了目的，终于飞到

了巴格达，又从巴格达飞到埃及。

由于战争的原因，埃及当局让我们在飞机上呆了很久，以进行检疫。

出海关后，我们找到一家简易的旅馆，我想我还记得它叫月亮公园(Lunapark)。天气热得令人窒息。

我们又重新开始为寻找交通工具奔忙了。

我们向法、英、美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政治代表机构讲了我们的情况，我们只要求三张去法国的票，乘坐什么都可以。

他们对我们说：“好，当然。”

但一时并没有这种交通工具，既没有民航班机也没有客轮，战争还没有结束，德国人的潜艇仍在海中出没……

我们每天都要去库克旅行社，但都是徒劳。等待，只能等待……

几天过去了，几个星期也过去了，我们无能为力，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

开罗是一个美丽、宽阔的城市。

然而当我们作为非出于自愿的旅游者来访问这里时，它却给人一种极强烈的对比：一方面是破烂不堪的贫民窟，另一方是经常有英国、美国、法国的军人在穿着华丽的女人陪同下出入的豪华奢侈的咖啡馆和餐厅。

我有幸参观了著名的开罗博物馆，这还应感谢那位和蔼可亲的馆长，因为在战争期间博物馆是不对公众开放的。

我们还去游览了世界奇迹金字塔、图坦卡蒙陵，这是不能不去的。加列戈奋力爬上了一座金字塔，他在塔顶惊喜地发现有人在这里画上了大幅的镰刀斧头的图案。不知法老会作何感想？

那些天遇到的情景现在在我的记忆里已经变得很混乱了，千年古国人民宝贵的历史财富（尽管那些最有价值的文物却是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卢佛尔博物馆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里）以及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成了盟国活动基地的埃及，两年前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聚集在这里商讨了对日作战问题……

一天，风和日丽，当我们例行公事般地又来到库克旅行社时，他们给了我们船票，这是一艘法国运棉花的货轮，叫“希望号”，由英国军舰护航。他们破例满足了我们的要求，自愿接受我们。

我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人家恩赐的机会，尽管这显然要冒风险，这是获准从埃及开往法国的第一班海上货船。

“希望号”！单是这船的名字就鼓舞着我们进行新的冒险。首先是我們最迫切需要结束旷日持久的行程。

我们4月初从亚历山大港起碇，希望很快会到达马赛，这是他们最初向我们保证过的。

海上航行了几天，当我们打听什么时候可以到达目的地时，他们的回答大出我们意料，他们说“希望号”并不开往马赛，而是开往布伦。

旅程并不是十分惬意的。

地中海里已经布满了水雷，船只能靠防磁索或是用一门小炮把水雷引爆避免触雷。

当我们的船通过直布罗陀海峡时，我们不禁感到内心的激动，感到靠近了我们的土地，尽管距离还是那么远。几个走私分子来到我们船上兜售货物，这算是我们与乡土的唯一一次接触了。

在远海上，我们每天早上必须不间断地练习使用救生衣，我

们每一个人都被告知在船只遇险的时候该上哪一只救生艇，这被后来发生的情况证明并不是无的放矢。

一天夜晚，雾色浓重，我们的船在威地岛附近与一艘挂波兰旗的船猛烈相撞了，灯全灭了，有人在喊：“快逃命呀，快逃命呀，船要沉啦！”

我们飞速穿好衣服跑上甲板，在一片漆黑之中有人把救生衣发到我们手里并在慌乱嘈杂中开始准备救生艇……

我们居然还能讲出这些细节是因为一阵忙乱之后船长出现了，他对我们说“希望号”不会沉没，因为被撞破的部分是在吃水线以上。

船员中有几人受伤，撞坏的部分也需要修理。整整用了八天时间修理防磁索……终于，我们又重新起航了……

在离布伦只差将近一海里的地方，我们得知港口已经被毁坏了，船不能靠岸。

我们这五、六个冒险搭乘“希望号”旅行的乘客被用摩托艇送到了曾经是港口的地方，那里现在剩下的只有二十米高的墙壁了。几个英国海员帮助我们顺绳梯向上爬。

就这样，我们到达了法国。几号了？5月1日。整整三个月漫长的旅程。

当我们象乌龟一样在这拖拉得很久而又使人烦恼的旅途中行进的时候，世界上已经发生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

4月，红军开始了对柏林的进攻，一个星期后，红旗就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希特勒在他的防空洞里自杀身亡。

波兰和匈牙利在年初已经从法西斯的占领下得到解放。

2月，当我们从莫斯科出发的时候，已经举行了雅尔塔会议。

战争结束了。

内格林等待不了这么久的时间，此时他已经在墨西哥了。

我们在会见斯大林后幻想过的种种计划已经无法实现了。

我们在巴黎和同志们朋友们一起欢庆了胜利的日子，他们是：圣地亚哥·卡里略、拉蒙·奥马萨巴尔、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以及一大批纵情歌舞的人群。

原子时代的诞生

我看着巴黎人民欢乐地起舞，到处都是欢乐的气氛，赶走了昔日的苦难。

但我不能逃避活生生的、让人无法忘却的现实。我不能忘记，人民也不会忘记两千万苏联青年倒在战场上；不会忘记成千的男人和妇女在法国抗击希特勒入侵的战斗中献出了生命，他们之中也有西班牙的男人和妇女。

我忘不掉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伦敦、利迪采和奥拉杜尔的大轰炸，以及在这之前的我们格尔尼卡的惨案。我也忘不掉阵亡的年轻的英国、美国的战士们。

此时，在我眼前总是浮现出西班牙，我那依然处于佛朗哥统治下的祖国，第一个站出来反抗，第一个拿起武器抵抗法西斯分子的入侵，然而至今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我国人民……我的西班牙还没有取得胜利……

在1945年的那个夏天，以及在那之后的许多年里，发生过许多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我们当时都注意到了这些事件，也都议论

过,但是我们没有以极其严谨的态度对它们进行深入研究(或许当时也不可能)。

我指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胜利带来的历史性影响。

虽然经过四年异常残酷的战争,苏联耗尽资财,许多城市和乡村成为一片废墟,但它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却提高到一个令人不容置疑的高度,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得到发展和扩大。

不但帝国主义政客们“消灭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企图没有实现,相反,苏联在国际上的作用甚至超过了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西方列强。

苏联人在无法想象的不利和困难的条件下所取得的成千次战役的胜利,红军攻克柏林并在国会大厦顶上插上镰刀斧头的红旗,使全世界都产生了对苏维埃国家的好感和敬佩之情,创造了一种左的、革命的气氛。

在法国,在意大利,共产党人进入新的民主政府,担任重要的部长职务。

在英国,工党在1945年7月的大选中战胜了保守党,建立了以社会党人艾德礼为首的政府,尽管后一件事几乎并不意味着国际政治向左转。

在战胜法西斯的影响下,殖民地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也以前所未有的声势不断发展。

面对这些现实,眼看自己的统治以及在世界政治方面的领导地位受到削弱的英国右翼统治者怎能不感到失望、担心呢?

大家还记得温斯顿·丘吉尔在富尔顿发出惊叫“危险的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的威胁!”

世界战争刚刚结束就开始进入冷战阶段,西方的反动派展

开大规模宣传攻势，企图混淆人民的视听，不惜一切代价扼制革命进程以及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所产生的影响。

生活和现实告诉人们，这一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在战后的几年之内，大英帝国解体了，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缅甸等国取得了它们各自的独立……民族解放运动越过高山大洋蔓延开来。

英国统治者在全世界掀起的不仅是宣传浪潮，甚至首先不是宣传浪潮。他们的活动产生了重要性无法估量的事件，开辟了一个新的极其严峻的历史时代……

1945年7月，美国当时的总统杜鲁门向温斯顿·丘吉尔透露了原子弹的产生：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尔多已经试验成功了新的武器。

这位英国保守党领袖当时就抑制不住满心的欢喜，有了原子武器就有可能重建世界，摧毁共产主义……

一个新的时代，原子时代开始了，它几乎改变了所有的传统观念，不仅仅是战争的观念，而是生命的观念。

在几天之后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把这个惊人的事件告诉了斯大林。

安东尼·艾登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当时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到约瑟夫·斯大林的脸上，看他如何反应。

斯大林丝毫不动声色，他没有任何评论，只是感谢人家告诉他这个消息。

一个月之后，在8月，美国人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给日本带来了死亡，给人类播下了恐怖的种子。

但西方世界的原子优势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几年后，1949年，苏联人也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

人民在1945年7月的日子里如此强烈地期望和为之欢歌的

和平跑到哪里去了？

在那种政治背景下，西方右翼的统治者决定支持佛朗哥，维持他在西班牙的政权，使这个处于战略要地的国家成为镇压人民争取社会主义和解放的斗争的堡垒，这难道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但是按照我回忆的思路讲，我还是想说，在战争结束后的头几个月里，我依然和我们党和左翼力量一起全力以赴为西班牙人民摆脱佛朗哥主义者的奴役而斗争。

在解放后的法兰西

谁能忍受，在今天，
西班牙的时钟仍要
停留在过去的时刻？
——拉斐尔·阿尔维蒂

我在巴黎逗留的时间不长，鉴于内格林博士，我前面说过，没有能等我，已经到墨西哥去了，我就去了图卢兹，党的领导机构曾经设在那里。我们党的总部设在西班牙之路(Route d'Espagne)，在直通我国的公路上。这样我们在地理位置上就离我的巴斯克地区更近了，尽管依然象乌纳穆诺讲的那样“和我们灾难深重的西班牙咫尺天涯”。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在我们十分简朴的总部里没有暖气，只是在过厅的尽头处安了一只烧煤的炉子。我们经常围坐在火炉旁取暖，烤一烤冻僵的手指。

图卢兹是一个好客的城市，那时在街上能听到不少人讲西班牙语。那里有我们勇敢的游击队员们，他们中很多人是军事指挥员，法国政府给他们授过勋，表彰他们参加抗击希特勒的入侵。他们使我们感到骄傲和充满希望。

一天下午，我同阿玛娅、伊雷内乘坐一位这类西班牙军官的车子外出，警察把我们拦住并把我们带到一间小营房。里面有一些卫兵躺在床上，接着给我们搬来几把椅子。

一段时间过后，来了一位下级军官，我们向他抗议这种无理行动，他打官腔说：“太太们，我只不过是跑腿的。”

后来，我们的同志们来接我们，我们才明白，原来那种车不能带妇女。又是反对妇女！我们参加斗争，在监狱里受苦，在行刑队面前死去，这可以。但乘军用飞机或军用汽车……“女士，不行！”

重大行动时期

当我们大多数党的领导人聚集在法国之后，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有了新的强有力的动力，特别是有可能一同分析西班牙的形势以及我们的政策。

1945年7月，我们已经处在解放了的欧洲之中，而佛朗哥控制的西班牙却仍然象一个阴暗的法西斯的堡垒，提醒全世界斗争还没有结束，仅仅消灭希特勒的军事力量是不够的，提醒人们（或者说应该这样做），只有在所有国家都消灭反动的黑暗势力，人民才不会感到受威胁。

在同年的12月(1945年),我们在图卢兹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

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很自然,我们在会上通过了适应具体形势的新纲领和新章程。

全会的中心议题是:建立一个广泛的民族联合政府的必要性,参加这个政府的人有社会党人、共产党人,甚至君主主义者,其任务是组织征求人民意见的民主协商。

我在会议的发言中讲道:

我们在经过长期的被迫的分离之后,第一次重新聚会在一起。我们不要象疲劳不堪的经过长途跋涉的人那样向后看,以证实他的疲惫,并且面对依然没有走完的崎岖坎坷的旅程感到缺乏信心。我们要象一支军队,在遭到意外打击溃散之后,又重新聚集他们的力量去迎接新的、决定性的战斗。

漫长的六个年头过去了。当然,由于慕尼黑的那些人的卑鄙的投降,共和国的抵抗被冲破了,使我们被迫离开祖国,在其他国家人民的帮助下寻求光复被法西斯分子强占的家园和祖国。

我们是带着由于不应遭受的失败而造成的痛苦离开祖国的,但怀着继续斗争的坚定信念,我们并不认为这场斗争已经结束。

今天当我们聚集到了一起,清点一下我们的力量并把这支力量部署到争取解放我们祖国的战线上去时,我们非常激动和骄傲地看到共产党人不愧是人民的子弟,他们坚定不移地保持了热爱祖国独立的一片赤心。哪里有共产党员,哪里就有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就有法西斯主义的死

敌，就有为自由而战的士兵。

我们十分骄傲地向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共产党员们致敬，他们在西班牙本土坚持了战斗或流亡归来，他们不怕危险和牺牲，高举着我们党的旗帜和反佛朗哥的抵抗运动的旗帜。

不论是在卖国者们在法国建立的集中营，还是在希特勒德国的死囚营里，不论是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的监牢和劳动营里，还是在酷热的非洲沙漠里，他们表现了同样的献身精神和坚贞不屈的精神。

他们不论是苏联“游击队员”，还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战士”都表现了同样的英雄气概。

不论在西方的部队中或是在红军的光荣行列里西班牙共产党的党员们做出的贡献都远远超过他们应尽的义务，以他们的英雄气概，以他们的刚毅果敢，他们为他们遥远的祖国至高无上的名誉增添了荣耀，为我们党，为何塞·迪亚斯的党，为抵抗运动的党，为反法西斯的团结统一的党的光辉历史增添了光彩。

我们很多最优秀的同志今天没有到会，一些曾经组建并教育了我们党的同志没能来，那些曾用他们的榜样和牺牲精神奠定了我们党坚如磐石般基础的同志，今天没有能到会。

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一些空缺是无法弥补的，何塞·迪亚斯不在了，他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领导人，是我们党的缔造者。

还有佩德罗·切卡、赫苏斯·拉腊尼亚加、伊西多罗·迭格斯、曼努埃尔·阿萨尔塔、多明戈·希龙、欧亨尼奥·

梅松、阿斯卡尼奥、卡耶塔诺·博利瓦尔、何塞·苏亚雷斯、克里斯托瓦尔·巴伦苏埃拉、路易斯·冈萨雷斯、萨图尼诺·巴尔内托、路易斯·阿拉拉斯、哈辛托·阿莱马尼……

一些同志过早地去世了，长期斗争的遭遇毁坏了他们的身体；另一些同志在行刑队面前或是在争取自由的前线英勇地倒下去了。

应该同我们这些领导人的英名一起写进西班牙共产党光荣册的还有成千忘我献身的、亲密无间的、为西班牙自由而捐躯的同志们的英名。

曼努埃尔·雷卡特罗、马蒂尔德·兰达、塔伦斯、何塞·奥乔亚·阿尔卡萨、阿基利诺·费尔南德斯、维蒂尼、卡雷拉斯、埃拉迪奥·罗德里格斯、巴雷罗、海梅·希拉鲍、何塞·罗斯、阿尔坎塔拉、胡斯托·罗德里格斯、何塞·福西马尼亚、弗朗西斯科·吉隆、费霍、阿方索、安东尼奥·加西亚，以及成百上千其他同志。

没有人能够算清我们党在这三十二个月的战争中，在长枪党统治下的凄风苦雨的六年地下斗争中失去了多少同志，这太困难了！

我在前面提到过，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推动人民群众科学、艺术、文化、福利进步的伟大的西班牙；建立一个能使工人受到社会立法保护的西班牙，这种社会立法应当是切实可行的、有生命力的、落实在行动上的而不仅仅是一纸空文，应该尊重劳动者并为他们提供一种文明的生活。

我们渴望建立这样一个西班牙，在那里，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感到土地是他们自己的，场上的麦子和他们种植的橄榄园生产的橄榄油是他们自己的，能安居乐业。

他们感受到作坊、矿山、工厂的人们的支持，同他们一道成为共和国的柱石。

我们渴望建立这样一个西班牙，在那里知识分子受到保护和鼓励，能够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服务于人民，不必向权贵们摧眉折腰，不必听从雇佣者和统治者指手划脚。

我们渴望建立这样一个西班牙，在那里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小业主能放心地展望未来，带着感到生活在令人尊敬的、自由的、进步的祖国而产生的喜悦心情看待现实。

我们渴望建立这样一个西班牙，在那里妇女受到尊重，在那里长枪党侮辱性的口号，“效劳”应为“正直的劳动”所代替。

我们渴望建立一个受到赞美的西班牙，那里没有赤脚的饥肠辘辘的儿童，没有贫困，没有仇恨，没有长枪党人西班牙的可怕争斗，而只有温暖家庭，热情接待孩子的学校。

我们渴望一个有高水平工业和农业的西班牙，以充分满足全体西班牙人民的需要，以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平等的贸易交往，这种交往不应是象现在这样受到我们落后的工业的不利条件的限制。

我还补充了一句话，说我们共产党人并不反对合理的解决方法，不反对爱国主义的解决方法。

要是反佛朗哥的力量，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我们达成一致意见，在消灭佛朗哥主义之后，在一个真正的民族联合政府的领导下，举行真正民主的协商，征求人民的意见，使其在如何领导国家的政治生活

的问题上能完全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愿望，那我们共产党人是不会反对的。

只要具有征求民意的协商的前景，我们随时准备参加这一协商，保证尊重人民自由表达出来的愿望，也要求其他人做出同样的许诺。

但这一征求民意的协商不能在佛朗哥主义继续当政的时候举行，也不能在外国人的刺刀压力下，在别人的控制下举行。

负责组织征求民意的协商的民族联合政府应该包括共和派的代表、工人力量及其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的代表，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和加利西亚的代表，天主教、君主主义者和反佛朗哥的军人的代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由表达民族意愿的设想不至落空。

领导这一协商的反佛朗哥的民族联合政府将是一个过渡政府，一个临时性政府，它应事先重建民主自由，应无条件地宣布释放一切被佛朗哥主义者监禁和迫害的人，把所有佛朗哥主义代理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出去，以保证人民意愿的自由表达不受到暴力以及佛朗哥主义代理人的官僚管理机构的阴谋和舞弊的阻碍。

我以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的名义写信给反法西斯的政党和组织的领导人，以及西班牙共和派人士。在这封信里，我们向他们建议在巴黎召开一次会议，以达成一项协议以及制定共同行动纲领。在这个协议的基础上，我们建议以后共同和为推翻佛朗哥统治和举行征求民意的协商而准备合作行动的反佛朗哥的君主主义力量和军事力量对话。

和西班牙人民团结一致

巴黎在战后最初的几年成了举行各种反法西斯的民主大会和会议的中心。我认为这些会议中，最重要的一次是1945年在冬季自行车赛场举行的作为世界工会代表大会的后续会议的群众大会，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最重要的一些国家的劳动者建立了统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

这次群众大会由法国—西班牙协会召集，一些非常著名的工会领袖和政治家出席了会议，其中有世界工会联合会总书记路易·赛扬，拉丁美洲劳动者大会主席隆巴尔多·托莱达诺，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总书记加里，古巴工会领袖拉萨罗·培尼亚，以及苏联、巴西、乌拉圭、阿根廷、厄瓜多尔等国的代表。

坐在我周围的有波特拉·巴利亚达雷斯、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圣地亚哥·卡里略，还有莫德斯托和里克尔梅两位将军，还接触到了很多人士，如：赫·格·威尔斯、奥·赫克斯利、雅各布·爱泼斯坦、霍尔丹教授、胡安·内格林博士、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和尼科拉·德奥尔弗。

面对两万五千名与会者，波特拉·巴利亚达雷斯和我以西班牙民主人士的名义讲了话，我在发言中向所有劳动者、民主人士发出呼吁，希望他们积极支持我们争取自由的斗争：

巴黎的人民！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代表们！同志们，朋友们！

此次大会确立民主并与西班牙人民团结一致的壮举十

分令人感动地表明，热爱自由并对兄弟国家、对英雄的西班牙、对于在佛朗哥暴政下受迫害的西班牙、对于在各国人民中第一个起来进行反法西斯侵略斗争的西班牙所给予的关怀在法国人民心中已经深深地扎了根。

我内心极为激动，这种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控制的，因为它不是产生于一瞬间的、过眼烟云般的印象，而是产生于对不久前的可怕的斗争以及流血牺牲的深刻回忆。以这种激动的心情，我今晚要向你们表达西班牙的要求，这是从不屈服的西班牙、斗争的西班牙、抱着使自由与民主在法西斯铁蹄践踏下的祖国重新发扬的希望而生活着的西班牙。

我回忆说：

西班牙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插曲，是罪恶的希特勒集团制造的可怕灾难的第一个阶段，这场灾难给成千上万家带来饥饿与毁灭，痛苦与死亡。

以法西斯军事叛乱为先导，希特勒发起了对共和国西班牙的侵略，从而开始了对欧洲自由人民侵略的血腥阶段。

在无法比拟的高尚精神的作用下，法国、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英国、南北美洲、意大利和德国人民都来和我们并肩作战。

但这些人不象希特勒、墨索里尼派来的军队那样有大炮、飞机、机关枪和坦克。

这些英雄们和我们同甘共苦，他们不是政府派来的，他们的政府已经向希特勒妥协投降了。

他们是那些不愿意作奴隶的人民的代表，他们为了保卫西班牙的自由，他们以自己的勇气和决心，鲜血和生命为

我们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在当时，保卫西班牙的自由也就是保卫他们自己祖国免遭法西斯的侵略。

在西班牙人民斗争这个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的熔炉里锻炼出了有钢铁意志的人，对于这些人，我们骄傲地感到可以真诚地把他们看作自己人。巴黎起义的指挥者法比恩和罗尔·唐居伊上校就是我们解放战争的英雄。

领导过抗击德寇入侵的人民斗争的波兰爱国志士中有些人组成多姆布罗夫斯基纵队。

在积极参加过反希特勒的民族斗争的保加利亚游击队员中，很多人曾经在西班牙战斗过。

安娜·波克管的罗马尼亚同志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罗马尼亚民主运动的中坚。

捷克斯洛伐克的游击队员中有很多人参加了西班牙战争。

林肯纵队中的英国、美国战士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以同样的决心和大无畏的精神在西班牙的田野和战壕里和我们并肩作战。

在解放意大利北部的英勇的游击队员中打先锋的是反法西斯战士路易吉·隆哥(政治委员加略)所领导的加里波第纵队的老战士。

多民族的南斯拉夫的光荣领导者铁托的人，南斯拉夫解放运动的青年领导者大多数都在西班牙共和军争取解放的队伍中战斗过。……

……说不关心西班牙现行制度的问题，也就是继续执行“不干涉”的政策，这一政策曾经给所有国家都带来了不幸的后果……

……帮助西班牙人民摆脱佛朗哥暴政，同时也是历史正义的事业，是国际上的需要。

虽说最后消灭佛朗哥主义的任务要由西班牙人来完成，我们也正是按照这一思想指导我们的斗争的，但确切地讲，民主国家也欠着西班牙人民一笔债。我们请求还上这笔债，帮助我们吧，把西班牙建成一个自由的国家、民主的国家。

亲法西斯的反动派集团把西班牙看作是他们的的主要基地之一。为了保卫世界的安宁就必须使这些罪恶分子的阴谋破产，这些人并不满足于已经使欧洲繁荣的国家血流成河、满目疮痍。

只要不消灭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就不能说战争已经结束，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已经巩固。

同志们，朋友们！法国的民主人士们！

九年前我就曾在这个讲台向你们呼吁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的战士们。

我的声音并不是回荡在旷野的声音，它在法国人民灵魂中得到回声和共鸣。

是你们，同志们，朋友们，社会各阶级的、持各种观点的人们，抱着对法国的爱，对它受到威胁的自由的自由的爱，以你们那颗充满兄弟情谊的温暖的心和慷慨的双手来帮助了我们。

我们不要别国干涉我们国家，因为我们渴望一个自由的、自主的西班牙。西班牙的自由将是西班牙人自己的事业，我们英雄的游击队员，我们的工人、农民、社会各阶层的爱国者正在争取实现这一目标。垂死、疯狂的佛朗哥对他

们穷凶极恶，

国内外的西班牙人！

我们有理由因第一个对法西斯侵略进行抵抗而感到自豪，而且不可能忘记我们战争的惨痛教训。

我们之所以能够进行抵抗，是因为我们是团结战斗，团结使我们有了足够的力量去对付敌人。

而在我们面前摆着争取自由与民主的西班牙的历史任务的时候，团结就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因为不团结我们必然被打败，不团结就不可能取得对佛朗哥的胜利。

毕加索的眼睛

1945年12月，在图卢兹，党召集同志们和朋友们开了一个小型的联欢会，祝贺我五十岁生日……这是战胜希特勒之后我第一次在法国过生日。然而就在几公里以外的那一边，佛朗哥和他的法西斯政权仍在继续，我们的人民仍在受折磨，不能得到自由。这个现实给我们这小小的联欢会罩上一层阴影。

有人告诉我：“多洛雷斯，毕加索也来了。”

毕加索！太好了！我看见他坐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象任何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一样，穿着皮袄，戴着帽子。但他的眼睛很独特，那是毕加索的眼睛。

我立即走了过去，第一次在握到他那双神奇的手时感到激动。我早就认识他了，一直把他当作亲密的朋友和同志，作为出类拔萃的艺术家，作为人，大写的人。

我作为巴斯克人，我从他的“格尔尼卡”中感到一种震慑的力量，作品深刻地抨击了佛朗哥、希特勒，它传遍了世界，唤醒和动员了人民和所有具备人类良知的男人、妇女。毕加索在他多产的一生即便只画了“格尔尼卡”这一幅画，这一幅画也足以使他成为我们整个这个斗争与恐怖时代的最杰出的画家。

我们拥抱了，我永远忘不了他那友好的目光，他的微笑……

我知道毕加索不喜欢集会、联欢之类的场合，他甚至从没有出席过专门为他举行的活动。这就是毕加索的为人。他只愿意工作、工作，夜以继日地在他的画室里工作。也正因为如此，我更从心底里感激他出席我们简朴的晚宴。

不久之后，在巴黎，我在他秘书的陪同下参观了他的画室。我仿佛置身于圣殿之中：他的画卷，他画笔表现出的排山倒海的气势，是他激情的流露，是他对平庸的官方、对不公正、对倒行逆施、对专制独裁、对邪恶的反叛。毕加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西班牙人，这不单是由于他的祖籍，而且也由于他的性格，他的习惯，他画中的光线与色调。

很多年之后，那已经是在马德里了，我看到了为西班牙人民展出的“格尔尼卡”这幅画，而当时在西班牙只能看到复制品。全世界数百万的毕加索的崇拜者都已经在纽约欣赏过这幅画了。巴勃罗·毕加索不希望他的“格尔尼卡”回到佛朗哥的西班牙。今天，它已经按照它的作者和西班牙人的意愿成为西班牙各族人民的财富。

我激动地端详着玻璃罩下的“格尔尼卡”，我仿佛觉得巴勃罗·毕加索就站在我身旁，看到他那双敏锐的大眼睛（拉斐尔·阿尔维蒂曾经说，那是我们世纪最了不起的一双眼睛），看到他的微笑和翩翩的风度。

毕加索依然活在我们中间，活在我们人民身边，活在大家身边。因为他是西班牙人，但却生活和工作在法国，他是属于全世界的，他活在所有受苦的，为最美好、最崇高、最公正的事业而工作、斗争的人们身边。因为他懂得经受历史变迁得以生存的是人民。他自己永远是一个年轻人。

他画的和平鸽带着他的问候飞遍了整个世界。今天，不愿毁于核浩劫的儿童们、青年们、老人们，所有的男人和妇女们又注视着这只和平鸽。

“马 基”^①

法国内地军^②的一位西班牙游击队长在知道我将要到巴黎去时，送给我一条优种的狼狗，他们给它取个名字叫“马基”。

当他把狗交给我时，这位西班牙游击队长象对他的战友一样对那条狗说：“从现在起你就是多洛雷斯的卫士了，你永远也不要离开她。”

这条狗真的来到了我身旁，而且无论我走到哪里，它都寸步不离。

我们说服了图卢兹—巴黎列车的车长，请他让“马基”和我们在车厢里同行。

到了巴黎，在家里，只要我一回到我的住所，这条狗就躺到门口，在那里过夜，直到我离开，每夜都是如此。

① 法国对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参加者的称呼。——译者

② 法国反法西斯游击队的名称。——译者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马基那股聪明劲儿，我在法国的那些年里，它一直跟随着我。当我离开法国不得不把它留下时，我真是十分恋恋不舍，因为它的确是一个忠实朋友，一个模范的卫士。

“沸腾生活的赞美者”

党的领导组织决定搬到巴黎去工作，这样更便于同其他政治力量联系。

我和女儿阿玛娅住到尚比尼街，法国同志们在那里给我让出一间小屋子。

我们的办公地点在中心区的克莱贝尔大街，这儿比图卢兹的办公地方要舒适宽敞得多。战后的法国允许我们相当自由地开展政治活动。

阿玛娅一边在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及其中央刊物工作，一边学习。

1946年4月我们召开了第二次中央全会。1947年3月，召开了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第三次会议。

这次会议有一点小型代表大会的味道，被邀请参加大会的有法国共产党的雅克·杜克洛、安德烈·马尔梯和马德莱娜·布朗、哈利·波立特（当时是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和前国际纵队的战士彼得·卡里甘、意大利共产党的韦利奥·斯帕诺、比利时共产党的瓦利格兰特、匈牙利的共产党员诺格拉迪、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黑尔塔·库西宁、澳大利亚共产党的杰克·亨利、

挪威共产党的罗德内·达兰德、瑞典的共产党员特龙科和一名中国共产党的代表。

我们伟大的朋友杜克洛在致贺词的时候，把社会主义和民主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他说，在二十世纪，这两种思想不能分离。

他强调说：

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我不祝你们英勇顽强，因为你们已经显示了这一点，我只祝你们在你们的工作中，在你们争取解放你们祖国的斗争中取得成绩。

我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会议作了报告。在报告中，我对许多人提出的为什么在打垮希特勒之后，佛朗哥仍然还会留在台上这样的问题谈了一些想法。

我说：“西班牙的问题不仅仅是西班牙自身的事，而是一个国际范围的问题。只要看看各国反动集团都拚命阻止西班牙问题的民主解决就足以使我们理解这一点了。”

西班牙当时和 1936 年一样是世界政治的焦点。国际帝国主义需要一个准备为他们的侵略、反人民、反民主的目的效劳的反动的西班牙。

我们党的这一估计是正确的。然而，我们依然抱有一些希望，认为希特勒的灭亡不管怎样，可能会加速佛朗哥的垮台。已经有一些事情在促进这一点得以实现：法国政府关闭了与西班牙的边境，另外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中断了与佛朗哥的外交关系或者不建立这种关系。在联合国的大会上确定，西班牙的制度的性质是与希特勒一脉相承的法西斯制度。各国劳动者对我们的声援不断传来。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解放运动

和反对殖民主义的运动。

某种乐观主义情绪，尤其是我们游击队员们在西班牙英勇斗争给它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推动着这些运动。我断言：

在斯大林格勒战胜德军的胜利者那强有力的手已经在马德里的帕尔多宫刻下了最后的谶语：《圣经》中的弥尼、提客勒、毗勒斯，向独裁者宣布了他们恐怖政权的覆灭。

这句话，以及当时我们说过的其他话反映了我们的唯意志论：想改变敌对力量与西班牙反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力量对比。

现实对西班牙的民主改革却是极为不利的。

在某种程度上，象我回顾的一样，我们继续坚持我们的想法，认为有可能举行全国起义。游击战争在我们国家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在我现在介绍的那次全体会议上，我就讲了这个问题。

一些钢铁般坚强的同志要求党同意让他们回西班牙，以推动群众斗争，使其团结、壮大。如：拉拉尼亚加、迭格斯、阿萨尔塔、希拉鲍、卡斯特罗·加西亚·罗萨、爱德华多·桑切斯·别德马（托雷斯）、克里斯蒂诺·加西亚、拉蒙·比亚、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萨皮拉因、伊萨萨、列朗迪和数百名其他同志。

西班牙共产党的斗争漫延在卡斯蒂利亚、厄斯特列马都拉的平坦的草原和安达卢西亚、阿拉贡、莱万特、阿斯图利亚斯、加利西亚、莱昂、格雷多斯的崇山峻岭之中。

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巴伦西亚、巴斯克、阿利坎特、莱昂、萨克拉、雷阿尔城、瓜达拉哈拉、萨拉戈萨、巴利阿里群岛、加那利群岛出现了象克里斯蒂诺·加西亚、拉蒙·比

亚、阿拉桑斯、伊萨萨、列朗迪、赫苏斯·巴扬、曼努埃尔·塔维尔内罗等人一样的英雄的指挥官，对于他们，可以用罗曼·罗兰的话说，“是有火一样灵魂的人，是沸腾生活的赞美者，是气贯长虹的英雄，他们的业绩超越时间和空间永存……”

我还说：

共产党员在拷打和死亡面前坚贞不屈，他们向西班牙的剑子手表明共产党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两千年前，科尔多瓦的哲学家塞内卡曾经写过这样的话：

一个看见过自己鲜血流淌的人，一个在敌人的拳打脚踢下听到过自己的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的人，一个被打倒在地，但能忍受敌手重压，并且尽管倒翻在地仍坚定不屈多次站起来过的人，这种人走上沙场总是稳操胜券。

西班牙共产党的来历

在那次共产党员的会议上，老党员们的经验同为捍卫祖国自由而斗争过的新一代的热情融为一体，我也向老同志和青年同志讲了西班牙共产党是什么样的组织和怎么产生的。

我们共产党是1920年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在西班牙政治舞台的。

党并不是由那些同西班牙工人运动无关的人组成的。

它是从西班牙社会主义这棵老树上萌发出来的，它是这棵树上的新枝，它吮吸了社会党在英雄阶段培育起来的

最优秀传统这一生命的汁液。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沙皇俄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砸断了资本主义统治的链条，使它再也无法连结起来了。就在这一时期，西班牙共产党诞生了，这完全符合西班牙无产阶级对建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需要。

对西班牙工人阶级来讲需要有这样性质的党，因为由于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不得不在矛盾更加激化的条件下开展斗争。

对西班牙的无产阶级来讲需要一个坚决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理武装起来的政党，因为在老的社会党中这些原理被扭曲了。

一开始，一些西班牙社会党的台柱参加到了共产党的队伍中，把社会党旧的革命的阶级传统同共产党的精髓青年人交织在一起。

同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一起既创建了社会党又创建了劳动者总联盟的、西班牙工人阶级当时所了解的最好的组织者安东尼奥·加西亚·克希多作为创始人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他从1888年建立劳动者总联盟的代表大会起到1899年一直是劳动者总联盟的第一任主席，1899年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被选为主席，加西亚·克希多为书记。加西亚·克希多也是西班牙共产党的缔造者，直到他去世一直是共产党员。

但并不是单单他一个人创立了西班牙共产党，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比希尼娅·冈萨雷斯，她是社会党热心的宣传家，只是过早地去世了。

共产党的缔造者还有法昆多·佩雷萨瓜，他是上世纪

最后十年巴斯克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鼓动者和组织者，矿山工人，伟大斗争的灵魂和向导，这些斗争曾多少次使巴斯克反动资产阶级吓得发抖。

我们的老前辈伊西多罗·阿塞维多从建党初期就加入了共产党，他是阿斯图利亚斯最老的社会主义斗争者，当过毕尔巴鄂社会党报纸《阶级斗争》和奥维多的《社会曙光》报社的社长，他现在已经八十岁高龄了，堪称献身精神和革命始终如一的典范。他现在在苏联正等待时机回到西班牙重新工作和斗争。

来到我们队伍中的还有丹尼尔·安吉亚诺，原社会党的总书记，他有四十年的极其丰富的工会和社会党的工作经验。

还有阿利坎特的拉斐尔·米利亚，加利西亚的何塞·席尔瓦、加罗特和加西亚·菲格拉斯，毕尔巴鄂的莱安德罗·卡罗、伊波利托·德尔加多和路易斯·阿拉拉斯，阿斯图利亚斯的菲耶罗兄弟，还有托拉尔瓦·贝希、埃瓦里斯托·希尔、维森特·阿罗约，以及成百上千忘我的劳动者，他们都有长期的、光明磊落的斗争历史，对革命始终如一的不可比拟的优点。

同志们，这就是西班牙的共产党的根底，这是我们党的基础，它并不是起源于1921年3月西班牙共产党与工人共产党合并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而是起源于西班牙工人运动本身。

和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在一起

1947年4月，我被邀请参加欢迎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的招待会，是由“和平之友”在巴黎吕特蒂亚饭店举行的。

出于对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士真挚的情感，亨利·华莱士大步走过来热情地和我握手。我向他表示，希望美国人民支援西班牙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华莱士先生用西班牙语回答我说，从他这方面讲，将会不断呼吁他的同胞们去支持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高尚和正义的事业。他拿起别人递过去的一杯酒转向我们碰杯，同样用西班牙语说：“为西班牙的民主干杯！”

在同一年的三月，我在回答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向我提出的关于西班牙各派民主力量的联合问题时，曾经说过：

西班牙共产党从1942年起一贯致力于捍卫共和派与保守派联合的政策，因为这些力量出于不同的目的，都准备消灭佛朗哥主义。因而西班牙共产党将不会反对共和派政府与保守派力量之间为消灭佛朗哥统治而达成谅解。

我的意见是，如果共和派与君主派在最低民主纲领基础上实现了联合，如果外部对佛朗哥政权施加压力而使这些力量得到支援，这样佛朗哥的垮台便会指日可待，而不会引起内战激化，这场战争从1935年就没有停息过……

共产党将不折不扣地遵循从“全国大联合”的民主政治引申出来的诺言，为民族经济的振兴，为西班牙成为自主、独立、民主的国家贡献力量。

一片废墟与旗帜招展的华沙

1947年5月1日，我应波兰议会主席的邀请访问了华沙。

当我快要到达这个劫难后的城市时，想起希特勒犯下的罪行，不禁又感到一阵恐惧。当我们的飞机徐徐下降时，看到机场上聚集的黑压压的人群，我吃了一惊。我寻思着，大概在飞机上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什么重要人物。我用目光扫视了一下，想猜猜哪一位人物这么重要。

“大概是那位黑胡子。”我对坐在我身旁的伊雷内说。

飞机着陆后我更吃惊了，我看到迎接我们的西班牙与波兰国旗和一幅大标语，上面写着：“热情之花，欢迎你访问华沙。”

走上前来向我问候的有共和国总统的代表、议会副主席、军队的代表、外交使团的代表、令人难忘的多姆布罗夫斯基纵队的朋友、以及波兰妇女协会的朋友……

讲实话，最使我感到不安的是人们告诉我，我要在斯彼哈尔斯基将军和议会副主席扎姆布罗福斯克的陪同下检阅武装力量。

这种仪式对我来说是新鲜的。

“你别紧张，我跟在你旁边走。”我们的曼努埃尔·桑切斯·阿尔卡斯同志走过来对我说。他当时在波兰担任类似流亡的西班牙共和国官方大使的职务。

结果是一切都很顺利。

在这儿我想插两句话，谈谈曼努埃尔·桑切斯·阿尔卡斯。他和路易斯·拉卡萨两人都是战后那些年里西班牙出类拔萃的建筑师。他的成就颇多，其中有他设计的洛克菲勒学院（今天的罗卡索拉诺学院）和马德里大学城的建筑群。

在内战期间，他同阿尔维蒂、玛丽亚·特雷莎·莱昂和其他一些人士参加了抢救我们国家的艺术珍宝的工作，并担任负责宣传工作的副书记。

1939年他在巴黎时接到了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政府的邀请去发挥他的专长。

在一次同我们见面时，桑切斯·阿尔卡斯断然说：“我再不愿意为资本主义建任何东西了。”

他请求调到苏联去。

路易斯·拉卡萨的情况同他很相似。

两个西班牙建筑师都在莫斯科建筑科学院工作。

战争——最野蛮的破坏者——成了我们这两位同志创作中无情的障碍。之后，桑切斯·阿尔卡斯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定居、工作，最后死在那里。路易斯·拉卡萨曾是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后来在人民中国工作，他曾经在西班牙住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又被迫回到莫斯科。他在那儿去世后，他的坟墓就安置在阿尔维托·桑切斯、塞萨尔·阿科纳达、胡安·帕内列斯、贝尼格诺·罗德里格斯、阿塞维多、莫拉托以及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西班牙人的墓地附近。

1947年我们再次来到华沙，5月1日在罗马电影院举行群众大会，会上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同志、政府首脑西伦凯维兹和我讲了话。

在他们的讲话中，波兰的领导人赞扬了西班牙人民的英雄

主义，强调了各国人民为消灭佛朗哥主义加强斗争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以我们人民的名义向波兰劳动者致以战斗的敬礼：

波兰人曾经到过我们国家，那是多姆布罗夫斯基纵队英雄的战士们，他们在马德里保卫了波兰的自由和独立。他们同西班牙的战士们并肩战斗，在一起还击了国际法西斯的联合力量对西班牙共和国的侵略……

我还参加了同一天在胜利广场举行的“五一”游行。

我们眼前的情景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

华沙，这个曾经被变为废墟、瓦砾、满目疮痍的城市（有七百万波兰人被希特勒杀害）那一天却是旗帜的海洋，红的、白的、蓝的、绿的。数千名男人和妇女唱着歌行进。当我从观礼台上激动地向人们致意时，向反法西斯的西班牙致敬的欢呼声响彻了整个广场和附近的街道。那真是个难忘的时刻。

华沙街道上的情景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在废墟上燃亮着一支支小蜡烛，纪念为抗击纳粹侵略而捐躯的人。在遗留下来的犹太区中，据陪同我们的朋友说，被“雅利安”野蛮军队杀死的数千名犹太人的尸首至今还没有完全收殓好。

一个法国神父在那可怕的场面前不住地用颤抖的声音叨念着：“天理不容！天理不容！”

在一条宽阔的大道上，我们看到一个已经成为废墟的教堂，只有祭坛还残存着，立在露天，仿佛是从瓦砾和烂铁中复活了。那里正在作弥撒，上千名男女跪在街上，虔诚地在祈祷。

波兰的同志对我们讲，那时正在实行土地改革，把庄园主的地分给穷苦农民和农业工人，但遇到的困难很大，因为很多应该分到土地的人不敢要，“因为那是罪过”。战士们只好用木桩标

出分给每人的土地，然后把土地证交到他们手里。

我要求他们带我到我们的伟大朋友和同志瓦尔特的墓地去，我们在西班牙就是这样称呼他的。

他是国际纵队中最杰出的指挥员之一。他的真实姓名叫卡洛尔·斯维耶谢夫斯基，1945年起在他的祖国波兰任将军和国防部副部长。

在我来访的几个月之前，他被一小撮法西斯匪帮杀害了。我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在西班牙人民高尚忠实的朋友、社会主义波兰的保卫者的墓上献上一束鲜花。

卡托维策的矿工们给予我的欢迎是十分热烈的，我很快便同他们产生了共同语言。

在离开波兰之前，我同西伦凯维兹以及哥穆尔卡同志进行了会谈。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是一个很朴实谦逊的人，是波兰工人党的总书记、波兰临时政府部长会议副主席。我在波兰访问期间他曾经很坦率地讲了新波兰由于人民历史和宗教的特点所产生的复杂和困难的情况。

哥穆尔卡的政治生涯和个人生活也是复杂和困难的。我同他会谈后的第二年，他被撤销了职务，不久又被关进监狱，被毫无道理地指控为民族主义右倾分子。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之后，他又重新当选为党的第一书记。1970年他辞去了所有的职务，直到去世，他一直象他祖国任何一个普通公民一样，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妇女们团结起来

经历战争磨难的人民渴望建设一个新世界，一个更公正的，实行人权、平等、自由、相互谅解的世界，而最主要的，是一个和平的世界。

妇女们以高度的热情和理想投入这一新的战斗领域。

她们在战争年代里已经充分显示出在各个方面的工作能力和斗争能力。我作为见证人（我在本书已经讲过了），可以证明工厂、农村、前线、后勤、管理等项工作是如何压在妇女们肩头的，而她们又是怎样以自己的才干光荣地经受了这些最严峻的考验的。

妇女们默默地承受了工作的重压、困苦，特别是那种看到自己的子女、丈夫、孙子们在生命的黄金时代死去时的无法形容的痛苦。

她们决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可怕的灾难重演，同时避免她们用工作和斗争获得的权力又被束之高阁，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出现过。我相信还没有任何人认真写过我们生活中的这个如此重要的问题。

1945年在巴黎召开了成立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代表大会。

西班牙的妇女们，具有丰富的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尽管为争取自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那次代表大会上积极地进行了工作。会议期间，各大洲、各种族、不同职业和信仰的妇

女们携手并肩，紧密团结在一起。

在墨西哥，我们已经事先建立了一个筹备这次世界妇女大会的西班牙委员会，在那里工作的有女医生阿罗约、贝内兰达·曼萨诺、玛蒂尔德·坎托斯、埃米莉亚·埃利亚斯以及其他一些人。

这个大会为在很多国家建立进步的妇女运动开辟了前景并为此给予了帮助。它通过一个广泛的、易于被所有民主妇女接受的纲领，选举法国科学家欧仁妮·戈登为主席，玛丽·克洛德·瓦扬·古久里为总书记，她是法国抵抗运动的英雄。我被选为副主席中的一位。其他两位西班牙妇女特雷莎·安德列斯和埃莉萨·乌里斯参加了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领导机构。

在那些年中发生的众多事件中，我还记得一件给我印象极深的事。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这已经是1947年了），目的之一是讨论可否接纳德国妇女加入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意见十分不统一。我们中的许多人还正在为她们的死在德国人枪口下的孩子、丈夫、父母或兄弟姊妹穿孝。我还记得那个宽敞肃穆的大厅，为世界民主妇女联合会领导机构的成员准备的座位。有意大利、波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等等一些国家的妇女……战争的伤口还在淌着血。在我们面前一张小桌子旁坐着几位面色苍白憔悴的妇女，她们同样穿着丧服，她们是德国人。她们用由于激动而变得含混不清的声音向我们讲话，为纳粹分子的罪行向我们道歉。她们告诉我们，她们同样也是黑色瘟疫的受害者，她们是从尸堆中爬出来的，她们的家人也都没有了……她们的话使会场上出现死一般的沉默，人们的表情十分严峻，手在颤抖……我受不了这种气氛，起身走到德国妇女跟前，向她们伸出手，其他一些人也这样做了。我记得有玛丽·克

洛德·瓦扬·古久里，我还记得有苏联的尼娜·波波娃和娜德什达·巴菲奥诺娃，她们说：“应该接受她们的要求，她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妇女。”她是以一个刚刚在反希特勒侵略的战争中失去两千万人生命的人民的名义讲这话的。

合乎人之常情的感情占了上风。当务之急是团结战斗，团结所有的人，彻底消灭灭绝人性的战争……

斯德哥尔摩市政府向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提供了著名的“金殿”作为它的会场，这是斯德哥尔摩市内最漂亮的一座建筑，这就使这次会议具有一种特有的庄重感。

斯堪的纳维亚的团结精神

瑞典有一个半世纪不曾经历过战争，这个国家在声援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我访问斯德哥尔摩时，这个国家的报纸把我作为西班牙人民的代表向我致以热烈的敬意。

国际和平合作协会的主席在为我们举行的招待会上说，应当向已经和正在为自由而斗争的妇女们致敬，“她们象胡安娜·德阿尔科或热情之花一样，是光明战胜黑暗的斗争的化身”。

我在前几页提到过的我们伟大的朋友，社会民主党著名议员乔治·勃兰亭带领一个由原国际纵队战士组成的代表团，在被称作“斯德哥尔摩冬季自行车小型竞赛场”的厄里克斯达莱宫举行的集会上向我致以极热烈的敬意，着重强调了同西班牙人民的团结。

当我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友好的口号声：

“让我们同佛朗哥断绝一切关系！”

“热情之花万岁！”

“西班牙人民万岁！”

我在讲话中对瑞典政府和斯德哥尔摩市政府给予各国民民主妇女的真诚欢迎表示感谢。

我强调说：

塞尔玛·拉格洛夫、克雷斯登·海瑟尔格林、伊丽莎白·塔姆和尼尔森大夫曾顽强地、坚韧不拔地努力唤醒成千上万名妇女去参加社会和政治活动。今天，这些妇女已成为瑞典民主的中坚。

我还说：

在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共事过的有各阶层妇女，从世界科学界的骄傲伊伦·约里奥·居里，到欧洲、亚洲、拉丁美洲、非洲许许多多国家的农村妇女。

我还向瑞典的劳动者、瑞典的民主人士、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同志们表示，请他们继续支持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统治、争取民主的斗争：

在战争中，你们中的很多人同我们并肩战斗过，为我们贡献了你们的鲜血和表现了你们的英雄主义，勃兰亭议员也同你们一起来为我们鼓气。西班牙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这些兄弟般的、英雄主义的行为……

我们还接到来自芬兰、挪威、丹麦的电报，邀请我们去访问他们的国家。

我真的去访问了峡湾湖泊之国。我们的挪威朋友们带我看了当年同德国侵略者战斗的地方。

我参加了在奥斯陆栎树公园举行的有五千人参加的一次群众集会。

我在会上说：

我知道在争取挪威解放的战斗中有多少英雄倒下了，知道挪威人民、挪威的母亲们为从侵略者手中夺回祖国流了多少血，淌了多少泪。

因此我相信你们不会充耳不闻我们请你们声援在法西斯铁蹄下的西班牙的请求的。

我想到了西班牙：

它虽然不大但却无比英勇，它在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中流过的鲜血和牺牲的生命比英国、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人数的总和还要多。

我补充说：

……我希望我作为一个没有在法西斯淫威下屈膝过的人民的使者所说的这席话能打动你们的心，能够为西班牙的解放事业获得新的同情……

那次群众集会后，给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挪威的特里格韦·赖伊发了份电报：

我们，奥斯陆的男女公民，代表着几千人，在听了热情之花作的关于西班牙人民斗争的报告之后我们认为有必要向您发出紧急呼吁。

我们呼吁您，我们真心实意地请求您施加影响，使联合国大会向西班牙人民提供他们有权得到和应该得到的一切支持。

以世界民主妇女联合会的数千名会员的名义从斯德哥尔摩向特里格韦·赖伊先生发出了类似内容的信。

我们路过丹麦，但却没有时间在那里停留了。在哥本哈根的车站上，朋友们举着鲜花和旗帜正等着我们，他们高声为西班牙人民欢呼，并且高呼反佛朗哥的口号：“他们绝不会得逞！”

我对北欧的访问虽然时间短暂，但却是紧张的，是充满情谊的。

在那些年里，我们在很多国家的首都，如，布拉格、莫斯科、柏林、布达佩斯、索非亚、华沙、布加勒斯特、赫尔辛基、巴黎等出席过妇女组织的代表大会和会议。在这些场合，我们总是呼吁支持西班牙妇女的斗争、妇女和儿童的安宁的生活和权利。我们都代表民主的西班牙、西班牙人民和它英雄的妇女们讲了话。

国内外的西班牙妇女

偷越比利牛斯山脉，在难民营里受苦受难，忍受那种令人心碎的骨肉分离的痛苦，远渡重洋，寻找不知下落的孩子、丈夫，在举目无亲的城市里生活、打工，经历多少次苦难的折磨，尽管如此，这一切都没有能够削弱数千名流亡在外的西班牙妇女反法西斯斗争的锐气。

在欧洲，在北非，在美洲，她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成立她们的反法西斯妇女的组织，继续她们的工作，保持她们高昂的战斗精神，特别是支援她们在西班牙国内坚持战斗的同志们。

西班牙反法西斯妇女在反法西斯军事侵略战争爆发前和战争期间开展的出色的活动由于1939年独裁统治的恐怖被迫

中断。

但地下斗争仍在继续。这一斗争在我们妇女界也引起了反响，反法西斯妇女的小组仍在秘密活动，散发传单和印刷品。在巴伦西亚出版了《妇女团结报》；精心书写的传单发到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监狱中和我们苦难祖国的其他许多地方。

我还记得马拉加的反法西斯妇女组织、加里西亚的反法西斯妇女委员会、托莱多的组织、加泰罗尼亚妇女联盟组织以及许多其他妇女爱国行动小组。

在法国五十个省，在古巴、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首都，在奥兰、卡萨布兰卡、阿尔及尔、英国、纽约等地相继出现流亡的妇女反法西斯组织。

勇敢的西班牙妇女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了抵抗纳粹侵略者和维希政府叛国分子的斗争。

她们的英雄气概，她们在完成艰巨任务时表现出的无畏精神堪称典范。

许多时候，她们冒着被捕甚至失去性命的危险，参加需要有决心和勇敢的行动，运送武器、炸药，传递秘密口号和命令，她们在自己家里掩藏被追捕的人，护理伤员，掩护男人们执行困难的任务。

无论在什么时候她们都是抵抗战士们的榜样和鼓舞力量。

描写这些令人敬佩的自由女战士的书很少，不过读者可以在涅维斯·卡斯特罗写的题为《为理想而生活》一书中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

在战后的头几年里，在法国重建了久经考验的妇女组织，叫做西班牙妇女联盟，其工作对象并不是海外移民，而是准备回西班牙妇女合作并支援她们，那里才是我们生根的地方。

在法国、奥兰、阿尔及尔、摩洛哥、英国、美国、墨西哥和阿根廷的这些组织最后实现了统一。

在这些活动中突出的妇女是维多丽亚·肯特、阿罗约大夫、贝内兰达·曼萨诺、玛蒂尔德·坎托斯、埃米莉亚·埃利亚斯、卢斯·佩雷拉、奥罗拉·皮霍安、伊雷内·法尔孔、罗莎·比拉斯、雷耶斯·贝尔特兰、玛格丽塔·阿夫里尔、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埃内斯蒂娜·冈萨雷斯、皮拉尔·索莱尔……还涌现出一些新的女领导者，其中有安尼塔·马丁内斯、卡门·德卡斯特罗、卡门·德佩德罗、阿尼塔·希梅诺、多洛雷斯·巴尔武埃纳、佩雷拉·加西亚、里塔·佩雷斯、纳蒂·乌里瓦雷纳。

在巴黎还连续几年出版了《西班牙妇女》杂志，是由罗莎·比拉斯·科尔东主编的。

几年前，我在一封写给拉丁美洲妇女的信中，回忆了历史上西班牙妇女保卫自由的斗争。

萨贡托、努曼西亚的妇女们，卡斯提亚公社的妇女们，瓦伦西亚和马略尔卡日尔曼化的妇女们，加泰罗尼亚的农村妇女们，加里西亚反对封建农奴制的妇女，1808年同拿破仑军队浴血奋战的妇女们，阿古斯蒂娜·德阿拉贡式的、马利亚·皮塔式的、曼努埃尔·桑切斯式的、马丽亚娜·皮内达式的、阿伊达·拉弗恩特式的、利纳·奥德纳式的妇女，阿斯图利亚斯的妇女们，巴斯克的妇女们，马德里的妇女们，整个西班牙的妇女们，是我们祖国的英雄军团，她们指出了我们应该走的道路。

女宇航员瓦丽娅

我记忆中印象很深的是几年后在莫斯科召开的妇女代表大会。

来自伊拉克、越南南方、南朝鲜、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的妇女们，代表着母亲、孀妇、被严刑拷打的女性、被奴役的人民，及其为争取民主和自由而被关进监牢的子女们，把她们痛苦和抗议的声音带上了讲坛。

我们西班牙妇女代表团控诉了佛朗哥政权的残暴和恐怖，控诉它处死了我们永远怀念的胡利安·格里莫——这一暴行震动了各族人民的思想，使不同政治主张、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宗教信仰的男人和妇女们都联合起来提出抗议；我们讲到了被判处长期徒刑的妇女们。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认识了世界上第一位女宇航员瓦伦蒂娜·特雷斯科娃，她给我们西班牙妇女写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西班牙姐妹们：

我乘坐的东方六号太空飞船刚从西班牙上空飞过。我看到了你们绿色的城市和村庄，蓝色的海浪拍打着你们国家美丽的海滩，我痛苦地想到西班牙人民最优秀的儿女们仍在佛朗哥的监狱里受折磨。

但是我要象世界上所有进步的人们一样对你们说“西班牙人民必将获得自由”。

看着这位苏联女宇航员那微笑的面容，我想起克维多写的

一首诗：

关于天上星斗的故事
全是弥天大谎，
因为谁也没有本事
上去问个明白。

瓦丽娅、加加林和其他宇航员们，他们同星星对话了吗？

那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出现了不愉快的事情，反映了当时中国代表团与其他国家代表团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

中国代表发完言后，还把住话筒没完没了地讲，不让其他人发言。^① 摄影师和记者们都围了上去。过了一段时间，尽管大会主席喊破了嗓子要大家维持秩序，但冲突还是得不到解决。大家的脸上都流露出一种忧伤的情绪。怎么办呢？大会开不下去了。

有人喊我的名字，我不知道是谁。我站起身来，尽量保持平静，走向主席台。所有的人都把紧张的目光集中在我的身上。当我走到麦克风跟前时，中国的发言者温和地退了几步，给我让了位子。我很激动，在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中，向全体的妇女呼吁团结、友谊，代表大会又继续工作了。摄影师又忙碌了一阵。

“十三朵玫瑰花”

我在写关于妇女斗争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手上还抚弄着一个小小的珍品：一件很小的工艺品，它的来历使它具有无法估

^① 据了解，当时会上发生意见分歧，会议主持者不让中国代表团进行解释，中国代表不得不维护发言的权利。——译者

量的动人的价值。

这是女青年迪奥尼西亚·曼萨纳雷斯·萨拉斯在死牢中的作品，她是1939年8月15日佛朗哥分子在本塔斯监狱枪决的十三名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女战士中的一名。人民把她们称作“十三朵玫瑰花”。

工艺品上绣着D.M.^①的署名，紧接着是：1939年5月11日，于本塔斯监狱。迪奥尼西亚把这个绣品交给也关在本塔斯的我的忠实伙伴和朋友胡安尼塔·科尔索，嘱咐她如果能活着出去的话，一定要把这件东西交给我。三十八年后，当我回到西班牙，胡安尼塔同志把她珍藏的这个包含真挚感情的纪念品交给了我。

我回到西班牙后接到许多信，从中我特意把一封内容使人震惊的信挑了出来，这封信写的就是1939年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中这一队年轻战士被枪杀的悲惨情景。

阿格里皮娜·莫雷诺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心中为你保留着这一音信，一个很悲惨的音信。

很多次我都以为自己可能完不成这项使命了，这是十四名姑娘委托给我的。她们就是“十三朵玫瑰花”和另一个叫阿尼塔的同志……

1939年7月的一个不幸的日子里，一群姑娘被带进本塔斯监狱，她们那时几乎还是孩子。

她们中的一个，皮拉尔·布埃诺告诉我，她们来时已经受过严刑拷打……

① 这是这位女青年名字迪奥尼西亚·曼萨纳雷斯(Dionisia Manzanares)开头的两个字母。——译者

……7月4日这痛苦难忘的一天，传来消息说她们将被处死。果真如此。人们都沉默了。姑娘们穿上她们身边最好的衣裳。看到她们如此镇定自若，如此坚毅、高尚，她们的形象在我们面前变得更加高大。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我们越来越渴望陪同她们度过生命的最后一刻。

8月5日，她们终于被带走了，很快就要见不到她们了，我们都非常紧张。但这一天叫到了奥罗拉·罗德里格斯和我的名字，允许我们同她们告别。

当我们进入行刑预备室时，她们排着队站在那里等着我们。我走到第一个人，皮拉尔·布埃诺跟前，无言地亲吻。然后她拉住我的手对我说：“阿格里皮娜同志，如果你有幸活着出去，你要多保重，要活下去为我们伸张正义。我们是清白无辜的。如果哪一天你见到我们的多洛雷斯，你告诉她，我们死了也不愧是她的学生……”

卡门·布埃诺对我说：“他们要把我同我的兄弟一起枪毙，我为我亲爱的母亲感到遗憾。我们是无罪的。他们要杀我们，就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

胡安尼塔·拉斐特仅有十八岁，她是一位高级军官的遗孤，她嘱咐我们对党、对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说，她们是高举着红旗死去的。

一位姓科内萨的青年喊道：“我们将作为共产党员死去，我们不让他们蒙住我们的眼睛，我们要面对我们的刽子手死去。我们是无罪的。”

马丽是一个治安警察的女儿。行刑队刚一来到监狱，他们的队长就发现要被枪决的这些人中有行刑队一个治安警察的女儿，于是马上把这个警察换了下去。

“你们告诉青年团和党，要紧密团结，继续斗争下去。告诉他们不要忘了我们”。小马丽是这样叮嘱我们的。

迪奥尼西亚是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领导人，我们难以同她告别。

阿尼塔和她丈夫一样是教师，他们都很年轻。在被枪决之前他们写下了这样的话：“他们能杀死我们，但却不可能消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信念将改变世界。”

……当我们要结束这次肝肠痛断的诀别时，我们的两个好朋友玛蒂尔德·巴拉克和普拉·德拉阿尔德亚围拢过来，后者在共和国时期你被关在本塔斯监狱的那些日子里认识了你。她对我说，她就是学了你的榜样、你在监狱的为人，才成为共产党员的……

监狱中的一名女看守目睹了我们的青年女同志被处死，她曾经是圣特雷萨的修女。当她目睹那场罪行回来时，竟成了另一个人。她走到走廊上，开始向所有牢里的人讲述她看到的情景：“姑娘们没有让人蒙住眼睛，她们是瞪着刽子手死去的。皮拉尔·布埃诺死时振臂高呼：‘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万岁！’阿尼塔中了头几枪后没有死，她高喊着：‘杀死我吧，刽子手！别把我活埋了。’”

修女交给当时也关在监狱的华金尼塔的姐姐玛丽亚·拉斐特一条死者的发带。

这一血腥暴行很快就在监狱引起了反应，对于所有被监禁的妇女们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第二天一大早，我的牢里来了一个自由青年联盟的成员，她是个诗人，手里拿着一张四开纸，她泣不成声地给我读了她为我们永生难忘的“十三朵玫瑰花”写的诗，是她这

样称呼她们的……

亲爱的多洛雷斯同志，做完了这件事我心里才感到非常平静，我可以向我们的共产党和团组织说：

任务完成了。

致以诚挚的敬意

阿格里皮娜·莫雷诺(七十四岁)

1977年7月1日

一个朋友还记得“十三朵玫瑰花”的名字是：华金娜·洛佩斯、维尔图德斯·冈萨雷斯、卡门·巴雷罗、迪奥尼西亚·曼萨纳雷斯、皮拉尔·布埃诺、胡利娅·科内萨、布兰基塔、维多利亚、阿德拉、马丁纳、帕尔米拉、阿尼塔、阿尼塔·罗佩斯。

有些人的姓记不起来了，……时间，年月抹去了很多东西。但在我们人民的斗争史上，在本塔斯监狱被枪杀的十三位姑娘将万古流芳。

我同社会党人弗朗西斯科·拉尔戈· 卡瓦列罗的最后一次会晤

前面我曾提到过在法西协会组织的一次声援西班牙人民的集会上我与老资格的社会党领导人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一次会面。

这次我得知他在生病后，随即就去看望他。在此之前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曾去看望他。1945年12月，卡瓦列罗对伦敦《新闻纪事报》记者说：“我同‘热情之花’多洛雷斯·伊巴露丽进行

了一次长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消除障碍以利共同行动。我们应该‘解除武装’、停止争吵，把分歧和不和放在一边。”

这位社会党领袖曾落入维希政府走狗的魔爪中，遭受了种种非人待遇。对此我深受震动。他受到贝当和赖伐尔的迫害，面临着被交给佛朗哥的危險。佛朗哥一直要求引渡这位犯有“煽动偷窃、煽动犯罪”罪行的共和国政府前领导人。他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关进德国的奥拉宁堡集中营。

这事发生在1943年7月，当时拉尔戈·卡瓦列罗已有七十一岁的高龄，而且重病缠身。奥拉宁堡就是死亡之地，卡瓦列罗讲述说：“五千名西班牙人被关进这个集中营，幸存者只有五百人。”他补充说：“那里是用机关枪的扫射接待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

希特勒的警察在法国逮捕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路易斯·康巴尼斯以及共和国的两位前部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和胡安·佩伊罗，还有记者克鲁斯·萨利多，把他们交给了佛朗哥分子。结果他们都被枪杀了。

1945年5月波兰和苏联军队解放了奥拉宁堡集中营，病入膏肓的卡瓦列罗才得以死里逃生。

我们的同志，代表瓦伦西亚的前议员，何塞·安东尼奥·乌里维斯当时住在苏联，他赶到柏林去看望拉尔戈·卡瓦列罗，那时卡瓦列罗正在红军司令部的保护下，得到红军的帮助和支持。

“和一个西班牙人在一起，我感到莫大高兴。”卡瓦列罗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们滔滔不绝地谈论西班牙。”

苏联人在苏联给了他热情的款待，但他更愿意回法国去，他热切盼望与女儿团聚。

他在柏林办理旅行手续期间，卡瓦列罗写了一部分《回忆

录》。晚些时候，1954年在墨西哥出版了这本《回忆录》。他写道：

波兰和苏联的军队当时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我看他们在公路上列队开往前线。他们的容貌好得不能再好了。所有士兵都很年轻、强壮。从他们的脸色中可以看出，他们营养充足，身体健康。他们穿着很好。他们纪律严明。他们对待德国人，无论是男、是女，都不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态度，而是同志式的态度。他们给德国人食品、烟，对孩子们都亲热。我看到俄国人和波兰人如何对待曾杀害了他们千百万同胞的德国人的家属时，我感到羞愧，我们对那些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人总是满腔仇恨，我们不懂得宽恕啊……

看到这些后，报纸上开展的攻击俄国人和波兰人的运动，在我看来都属无稽之谈。

……如果我没有流亡过，没有被贝当、希特勒迫害过，我就不可能学到这些我认为对指导我今后的生活有重要意义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说，体验这种经历，实现从中得到的教益都太晚了。

卡瓦列罗从柏林乘专机来到巴黎。一到法国，他就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劳动者总联盟开会。那时这两个组织正处于分裂和对立状态。

他出席了法西协会组织的集会。我记得波特拉·巴利亚达雷斯和我在会上都发了言。由于出席那次集会，他受到了党内一些共事的人的猛烈攻击。

实际上，卡瓦列罗仍对我们党持敌视态度。他强调指出：“没有人比我更有理由生共产党的气了。”

但是这位社会党领导人十分关心使西班牙避免再次发生内

战。他强调西班牙的头号敌人是法西斯主义。

他认为同共产党人交往是正确的。

他回答那些对他的批评时，表示：

我是说，同与我们相似的人保持对立的关系，在政策上是一种错误，也就是说需要同他们保持尽可能正确的关系，但同时又必须一贯保持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以为，因为同反佛朗哥的政党合作，就意味着拿社会党未来的活动去冒险，因而任何时候也不同任何这样的党合作，这种说法是违反政治常识的。

卡瓦列罗认为，流亡政府那种闭关自守、宗派主义的态度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认为有必要“由一切在内战前或内战中保卫共和国的政党和工人组织选出的代表在欧洲组成一个委员会。”

他提出了一个纲领，这个纲领的宗旨是在西班牙举行公民投票以了解人民是喜欢共和政体还是君主政体。不论投票结果如何都将举行立宪议会选举。

在他给希门内斯·德阿苏亚的信上卡瓦列罗谈到了我在图卢兹所做的一个演说：

流亡法国的西班牙共产党高举保障公民投票的旗帜。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劳动者总联盟在法国还没有宣布同意这样做。我们总是被人家拖着走。我们把时间和智慧都耗费在我们的争论上，而与此同时，又在时局变化中不知所措，焦头烂额。

在同一封信里，在回答希门内斯·德阿苏亚请他“确定社会主义的真正原则并等待人们向这些原则靠拢”的要求时，卡瓦列罗写道：

但是，请别忘记，你要我确定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原则中有一条就是马克思的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他还说：

至于共产党，我要做如下的区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我不能，也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不能也不应该反对值得所有希望把资本主义制度改造成另一种制度，即对社会财富实现社会化的制度的人尊重的哲学理论。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经过一次艰难的手术后于1946年3月在巴黎逝世。他的流亡生活是短暂的，但却是痛苦的。

我同圣地亚哥·卡里略深感悲痛，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两年后，他的遗体迁往马德里时，我们又曾为他送行。

我们同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政治分歧是深刻的，尽人皆知的，但由于他历史清白，由于他把自己的生命，一个粉刷工人的生命真诚地、完全地献给了组织和捍卫工人阶级这一事业，我对他深为尊敬。

他侨居墨西哥的儿子，弗朗西斯科·拉尔戈是我们的同志，我们大家赞赏他真诚直率、政治上正派的态度。

1975年西班牙共产党在法国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我向弗朗西斯科·拉尔戈表示敬意时说：

在这里，在一次有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领导人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儿子在场的会议上，我想以最真挚、最感激的心情悼念这位社会主义领导人。尽管有许多观点把我们与他分开了，但是我们尊敬他，象尊敬其他社会主义领导人一样，他们那种革命者的真挚态度值得我们怀念，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忘记了他们的政治错误，即使最英明的人物往往也不免要犯这种政治错误。

我们将回到解放了的西班牙！

1947年7月我们在图卢兹举行了战后第一次群众大会。这是一次由群众组织和“建造”的群众性集会。我之所以用“建造”两个字，是因为劳动者自己动手把面积很大的图卢兹体育场变成了平整的会场并安置了木凳，四万名西班牙人挤在这里，亲耳聆听了西班牙共产党的声音。

在主席台上，以醒目的大字写着我们牺牲的同志的名字，他们是克利斯蒂诺、拉蒙·比亚、托雷斯、伊萨萨、罗萨、贝朗迪、卡斯特罗、梅迪纳、拉腊尼亚加、迪戈斯、阿萨尔塔、希龙、希拉帕乌、梅宋、卡索尔拉、卡瓦列罗……

我在讲话中提出“西班牙应属于西班牙人，人民应享有自由并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我们共产党人认为，没有西班牙的合作，没有西班牙的贡献，就不能严肃地谈什么重建欧洲。

我们共产党人同样认为，西班牙的生存也不能离开其他国家的人民，不能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与合作。但是，我们为重建西班牙所需要的这种帮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意味着干涉、吞并，也不能意味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依附。这一切都是我们共产党人永远不能接受的。

人们说西班牙是个贫穷的国家，可能是这样。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西班牙的贫穷在不小的程度上为英国钢铁工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比斯开的铁矿、韦尔瓦的铜矿、桑坦德的钴和锌矿、加利西亚的钨矿以及西班牙扼国际贸易通道中心这一更关键性的地理位置都没有给它带来美好的生活。

无需外国保护人，我们西班牙人明白我们为什么贫穷，我们明白我们的财富在哪里。我们知道西班牙的价值何在，知道它英勇的人民的价值何在。

因此，我们希望的是西班牙的西班牙，西班牙人的西班牙，它的人民应享有自由并决定自己命运。

共和国派阵营里的一些人士无视历史上的惨重教训，好心好意地忘记了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就是美国佬为争夺西班牙的最后两块殖民地——古巴、菲律宾而发动的。流亡国外的某些组织做着幻想与期望的梦，把马车挂在马前头，本末倒置，以为佛朗哥还掌握着政权，马歇尔先生尚未表示要帮助西班牙人民争取解放时，我们就应该拥护所谓的马歇尔计划。当时我们共产党人就声明，只要不危害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并能帮助西班牙恢复民主，我们不反对签订条约、协定或达成某种协议。

但是我们也声明，我们强烈反对一切损害西班牙独立与主权的企图，反对把西班牙拉入公开的或秘密的反对民主国家的独立与自由的任何集团。

由于西班牙作为战略基地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它所拥有的必不可少的、丰富的原料资源引起了不少国家的觊觎，在这一时刻作这些声明是必要的。我想谈一谈国内的情况。

佛朗哥向外国帝国主义集团让了步。佛朗哥加剧恐怖统治，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野蛮程度。佛朗哥又演出了人民

协商的闹剧，但尽管如此，佛朗哥政权还是在日趋衰落……

如果离心离德，四分五裂，如果各自为政，

斗争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

民主国家的某些统治者拿西班牙共和派力量不团结的状况进行投机，以说明他们抛弃和拒绝援助为反对佛朗哥独裁统治而斗争的西班牙人民的政策正确。

尽管不团结的理由对那些宽宏大量的民主派是种虚伪的借口，但现实表明现有的分裂阻碍着斗争的发展，不管我们的愿望如何，这都会使佛朗哥主义统治得以苟延残喘。

如果离心离德，四分五裂，如果各自为政，斗争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

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在我国劳动群众中根基很深，为劳动群众和人民利益服务的党。它把我国人民和民主的最高利益置于一切考虑之上。从这一讲台上，它对社会主义者、所有共和派，对一切反佛朗哥主义者说几句话：

“我们人民在受难，我们国家在崩溃。佛朗哥独裁政府要把西班牙出卖给出大价钱的老板。我们要团结我们的力量，阻止它，我们要拯救西班牙，要砸碎佛朗哥的专制独裁，解放我们的人民。”

我相信，我们会相互理解的，因为他们是被对待共产党人的那种宗派主义仇恨和国际反动派用来耍花招和进行投机的反共活动，等等……弄昏了头脑，他们不可能一直抵制下去。

……的确，流亡生活使人伤心，在瓦解人民的精神。

但是，同志们，朋友们，我们定将回到西班牙，回到解放了的西班牙去！

我们一定要回去的！……因为各国的革命者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上一世纪所有自由派和共和派政治家都回到了西班牙。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统治时期流亡国外的人，即1934年流亡国外的人，都回到了西班牙。

我们一定会回去的！我们将贡献出我们在斗争中，在痛苦的生活中获得的经验，在废墟上建设西班牙。

我们将重建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祖国民主化，通过我们的努力和工作，建设一个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子女在解放战争日子里朝思暮想，甚至为之牺牲的西班牙。

斯大林说我们是左倾分子，高傲

1948年中，我们收到了莫斯科的邀请，邀请我们与苏联共产党会晤。

圣地亚哥·卡里略、弗朗西斯科·安东与我一起前往。

当时我们急切想知道苏联共产党要与我们讨论什么问题。

在莫斯科我们得知斯大林要亲自接见我们，这就更加引起我们的注意。卡里略与安东是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谈。

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苏斯洛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们，我们相互非常亲切地致意后，他们便询问我们关于西班牙共产党的情况。

听了我们的介绍后，斯大林要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西班牙共产党人不参加佛朗哥主义的群众组织，主要指工会方面的组织。

我们向他讲了劳动人民对这些垂直工会^①的仇恨，也讲述了英勇的游击斗争。

显而易见，斯大林比我们更全面掌握西方各国政府使佛朗哥政权“民主化”并把佛朗哥政权作为它们在西班牙的据点保持下去的意图。他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在沙皇统治下长期斗争的经验，以此来启发我们。就是在“斯托雷平式”最残酷的镇压时期，他们也没有放弃在反动派操纵的群众组织中工作。他用这些例子想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要对此作好准备。

我们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我们又讲了一遍游击战的情况。我们表示，西班牙的情况不一样，如果党到垂直工会去工作，工人会不理解我们。

斯大林镇定自若，在他面前有一个白本，他一边在本子上涂画着，一边听我们介绍。他说，我们的观点是左倾的。他建议我们利用游击战作为政治领导的后盾，保障同志们安全。

斯大林看到我们还没有完全信服，就向我们问起了维森特·乌里维、安东尼奥·米赫及其他领导人的情况。我们的谈话也就转到一般性的问题上去了。他们请我们用茶点、吃糖果。告别时，斯大林与我们一一握手，并告诫我们说“*terpenie*”，俄语的意思是说“要耐心”。

斯大林补充说：“噢！如果你们需要我们向游击队提供援助，我们一定照办。这一切都得说到，因为你们西班牙人是很高傲的。”

回住所后，我们三人继续讨论，我们分析和发挥了斯大林提

^① 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的御用工会。人们叫它“垂直工会”是因为其各级领导是由独裁者自上而下任命的，该工会内没有民主可言。——译者

出的思想——因为他自己并没有坚持。我们反复考虑到深夜，最后，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斯大林说得有道理。

哪里有劳动者、有群众，共产党人就应在哪里活动，尽管那些组织的头目是法西斯分子、反动派。这是为人所知的常识，早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就同意了这一观点。我们也很熟悉列宁关于“左倾”的著作。我们自己确信必须改变策略。

这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我们一回到巴黎就证实了这点。我们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同志们听了我们的报告，纷纷对此表示怀疑，引起了长时间的、激烈的争论。改变策略真是不容易啊。游击队呢？如果斗争将是长期的，如果需要“耐心”地进行，就必须提出减少游击队和把受威胁最大的同志们从山上撤下来的问题。

最后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决定在党内讨论这一问题。

把合法斗争与地下斗争结合起来

要讨论一个这么重要的问题本应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但当时我们没有条件召开这类会议，主要是由于同志们从西班牙来这里困难重重。

因此，政治局决定召开由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和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尽管条件恶劣，我记得游击队的代表，巴斯克和加利西亚的同志们参加了会议。因此是一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会议。

会议于1948年10月在夏托贝召开，法国同志向我们提供了这个隐秘的场所。

维森特·乌里维在会议上宣读了政治局起草的报告。的确，最初乌里维也并不同意这一新策略，但在讨论中，他终于接受了，认为这是最正确的。这个报告极为重要的主题是：在法西斯独裁统治下，共产党应怎么办，它应该执行什么样的群众政策。

乌里维在报告中谈了美国佬在西班牙的渗透，它在经济、军事以及政治上对佛朗哥主义国家活动的影响。美帝国主义力图把我们国家变成为其扩张政策服务的练兵场。

党在这之前没有充分意识到我们在内战失败以后以及由于这一原因西班牙所发生的变化。好象并没有发生过内战，也没有由于我们的失败而带来的一切后果。

虽然，关于党在长枪党的组织中开展活动的问题几个月前中央就讨论过了，但并未深入研究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在的工人阶级就其构成来看，已不是1936年的工人阶级了。有觉悟的、有战斗性的工人干部有的在战争中牺牲了，有的惨遭镇压，有的正流亡国外。新一代不了解共和国的政治生活，没有象他们的前辈那样受过思想上的锻炼，没有搞阶级工会的经验，并对前景不明确。在地下状态中又不可能建立群众的、独立的工会运动的组织。如果我们硬是要坚持那样做，那就会脱离广大工人群众，而只是发动一部分先锋分子。最好的办法是：哪里有群众，就在哪里开展工作，把地下斗争同在佛朗哥的合法组织中的活动结合起来。为此，迫切需要恢复和巩固我们的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理论讨论。

经过激烈的讨论，大家同意在垂直工会中开展工作。由于

参加这种工会是强制性的，大多数工人是迫不得已参加的。对这点我们是充分意识到的。我们共产党人加入这些工会，就能使这些工会更有效地开展活动，保护自己的利益。我们就能在长枪党自己的组织里向他们开战。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劳动人民的真正的精神状态。

我们大家决定派一些坚定的，但其党员身份尚不公开的同志去从事这项工作。

我们大家还决定在另外一些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如在农民兄弟会中，在体育、学生等青年组织中，在妇女组织及天主教会组织中进行工作。

嫩黄瓜的奇迹

几年来一直折磨着我的肝病，1948年底又犯了。

我们的一位朋友，法国优秀医生洛盖劝我做胆囊摘除手术，他向我保证，手术并不复杂。我自己寻思着：没有胆囊我怎么活呀？象鸽子那样活着？

人们告诉我，有胆囊还是没有胆囊，我将还是那个我，我的性格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在阿玛妮、伊雷内陪同下，我住进了莫斯科的一家医院，在那儿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但在手术后的阶段，我却遇上了麻烦，使我近六个月卧床不起。无疑我是染上了严重的肺病，只好靠氧气袋呼吸——在密封的房间里我受不了。

照顾我的许多医生都非常担心我会发生意外。当时抗菌素

刚刚诞生。美国有一种药，据说很神，能保治百病，我想这药就叫金霉素。侨居美国的一些好心的朋友们，其中有亲爱的马诺洛·科利诺同志给我寄来了这种所谓对生命有魔力的药品。苏联卫生部长也向我提供了这种药。多么慷慨的帮助啊！

后来人们告诉我，在美国是很难搞到这种只供应军队和外交使团的抗菌素。

多亏一位友好的大使，科利诺才弄到两瓶金霉素，据他说，本来是给他生病的妈妈用的。

但我这个巴斯克矿工的机体却顽固拒绝吸收美国科学的新成就。我只能吸收青霉素。

我还是昼夜靠氧气袋呼吸，一点东西也不能吃，人也瘦得皮包骨。

我得到了维诺格拉多夫教授、我的主治医生罗曼·伊萨科维奇大夫、勤奋的护士、卫生员、慈母般的“阿姨”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女儿阿玛娅和伊雷内一直在我身边，同她们在一起，我更感到如同在家里一样。从苏联各地来到这里的医生也常来看望我，为医治我的病献计献策。

这样，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我的病也慢慢地好了起来，我已能不用氧气袋呼吸一会儿了。

一天下午，那个叫保利娜的卫生员坐在我身边，她是个典型的俄国农村妇女，胖胖的，总是笑眯眯的，她坐在我身边吃午饭：腌黄瓜、煮土豆。我从来没吃过这种俄国人很爱吃的嫩黄瓜。我不爱吃这东西。但那天下午我却特别想尝尝这种嫩黄瓜。

“保利娜，给我点儿嫩黄瓜。”

她若无其事地把一块黄瓜塞到了我嘴里。

“请再给我一块，还有土豆。”

就这样，多亏了保利娜的黄瓜，我开始吃东西了，身体开始好了起来。

往往是简单的办法胜过复杂的。大夫们想出了各种主意让我吃东西，有经验的厨师们精心为我准备了可口的饭菜，人们甚至还为我请来了一位巴伦西亚的同志给我做了非常好吃的菜饭。但这些都无济于事，我根本就吃不下东西……

“嫩黄瓜的奇迹”使大家感到困惑，唯独保利娜例外，她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你的康复应归功于你自己的机体。”大夫们都对我这样说。

“你体质胜利了……”

不管怎么说，事实是我要生活下去的愿望胜利了。

写到这里，要提一下下面一段故事：

已是1949年了，当时我很虚弱，躺在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一天早晨，阿玛娅和伊雷内走近我，凑近我的耳朵小声说：

“多洛雷斯，多洛雷斯，上海解放了！”

我听到了这个消息，感到一种非常重要，威力强大的东西闯进了历史，闯进了人类的生活。

“要活下去！要活下去！”我用微弱的声音喊着。

医生走了过来。

“您在说什么？”

“我说，要活下去！”

罗曼·伊萨科维奇脸上发出了光彩。

“您会活下去的，我相信您会活下去的。”

几年后，我第一次来到人民中国时，我还回忆起我在医院里

经历过的那件事，那个故事加上政治上的原因，以某种方式把我同挣脱了帝国主义枷锁的几亿中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

斯大林来看望我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一个星期天。当时我的身体已经相当好了，医生们允许我坐起来，稍微活动一下。

专程从法国来到这里给我治病的加泰罗尼亚优秀医生，我的伟大朋友何塞·博尼法西坐在我卧室的一个角落里看书。

一个护士进来告诉我说，有客人来访。可这是多么不平凡的客人呀！他是约瑟夫·斯大林，与他同来的还有莫洛托夫。

他们是想来问候我，看看我的身体状况如何，需要什么。他们用热情的话语鼓励我，他们告诉我，根据医生的报告，我很快就能站起来了。

这次会面是非常亲切的。

我还在感到意外，他们就已悄悄离去了。

博尼法西一直坐在那个角落里，没有挪动过，他对我说，他简直不敢想象刚才发生的一切是真的，就象幻觉一样。

但那不是幻觉。

后来，我的主治医生告诉我，斯大林给他们下了“命令”，一定要让我尽快恢复健康。

现在，在我八十八岁的时候，我认为，他们确实很好地执行了这个“命令”。

一段插曲：讲述历史

久病初愈，我就决定做一件多次想做，却因时间关系而一再推迟的事情。

我把以前利用零散时间和失眠的夜晚写的札记和回忆搜集、整理出来，用新的材料加以补充，开始把我经历过的，可能引起人们兴趣的事写出来。

1960年在莫斯科用西班牙文和俄文同时出版发行的《唯一的道路》就这样诞生了。

写这篇回忆录时，我总有一种时钟向后转的感觉，那些最遥远的往事，一件件都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地呈现出来，而后来的事情却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确切地回想起来。我能很容易地回想起我的根，能详细地叙述我幼年时代和少年时代，能把我在比斯开矿区成长的环境描绘出来。

实话讲，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让我的子孙们、青年们了解我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让他们了解共和国与内战时期西班牙劳动人民走过的充满斗争与流血牺牲的道路，想通过这本书帮助他们了解长辈们的生活和战斗；共享欢乐，共分忧愁。

无疑，由于适逢西班牙人民的英雄业绩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兴趣的时机，《唯一的道路》不知被翻译成了多少种文字，并在美国、法国、意大利、阿根廷、墨西哥、古巴、芬兰、挪威、日本、土耳其，在两个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出

版发行，但在西班牙二十年后才见天日。

那时候——我指的是六十年代，党的领导委托我及一批当时在国外的同志：安东尼奥·科尔东、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何塞·桑多瓦尔、伊雷内·法尔孔、路易斯·巴拉格尔负责编写一部西班牙共产党党史简编。任务是复杂的。档案材料都在离我们遥远的西班牙，我们只能利用珍藏在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所的西班牙文档案。

这部“著名”的西班牙共产党简史还有它自己轶事、趣闻式的“历史”呢。负责编写的同志还没有把我们掌握的文件搜集和整理出来，我们又接到了第二个任务：尽快编写一部西班牙共产党党史概要，让年轻的一代工人了解西班牙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近四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那时正是1960年头几个月。

我们是这样工作的：首先起草一个供党的领导机构的同志在即将在法国召开的会议上讨论的纲要。由于当时非常需要这类材料，因此党的领导机构匆忙决定全文发表。出乎我们的意料，这本作为我党四十年斗争史的一个简单提要写出来的，临时凑起来而带有不少缺陷的书，居然以某些读者可能熟悉的冠冕堂皇的书名《西班牙共产党简史》出版了。我真是羞愧得无地自容。

我们一心一意地投入了编纂历史的工作，当我们要结束流亡生活时，我们又以很大的勇气开始编写一部长篇著作，共有四卷，书名是《西班牙战争与革命 1936—1939 年》。

胡安·莫德斯托、曼努埃尔·马克思、佩德罗·马特奥·梅里诺、维森特·卡里翁、路易斯·加兰做为顾问也参加了我们这个编写小组。

历史学家埃洛伊娜·拉普、阿尔维托·冈萨雷斯也参加了

最后两卷的编写工作。

但是很快我们就明白了“写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同我们经常的政治活动是有矛盾的。我们经常扔下书本、档案，去准备讲演，去不同的国家参加会议。我们常常接到与“写历史”风马牛不相及的任务。安东尼奥·科尔东被派到意大利，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被派到法国工作。其他同志也有重要任务而时来时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何塞·桑多瓦尔换了工作，不再搞编写，而去西班牙本土搞党的地下斗争。后来不幸被捕，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十年。在狱中，他丢弃了写字的笔，却拿起了画笔，为自己的同志作画，为工人、农民作画。这帮助他减轻一些十年铁窗生活的艰辛。

这就是为什么《西班牙战争与革命》这本书迟迟不能问世的原因。里卡多·德拉谢尔瓦看了这本书的前几卷后写道：西班牙共产党已经停止编写、出版这本关于内战的历史了。但是他错了。1977年第四卷终于问世了。

这部在苏联用西班牙文和俄文同时出版、发行的书行销到了拉丁美洲，但在西班牙却几乎无人知道。

忆因达莱西奥·普列托。 国会议员们到莫斯科去？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五十年代曾以他所特有的尖刻的讽刺语言写过这样的话，说如果多洛雷斯·伊巴露丽愿意，她可以在

莫斯科召集共和国议会常设委员会的所有成员。

这种权力是普列托赋予我的，因为我作为共和国议会的副议长，在议长逝世或辞职的情况下，我可以担任西班牙流亡议会的主席职务。

我的这一种由于自然法则得到的继承权引起了共和派要人的恐慌，他们匆匆忙忙劝路易斯·希门尼斯·德阿苏亚收回他刚刚递交的辞呈。

很明显普列托对这种争论不休的流亡共和国议会的存在不感兴趣。

至于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对这种局面——相当奇特的局面——也缺乏兴趣。当时，我们已看到，前途并不在共和国前执政者的政治沉浮中，希望在西班牙国内，在朝气蓬勃、带着新的目光走上西班牙政治舞台的新一代的成长中。他们反对佛朗哥的独裁统治，为西班牙寻找别的出路。我们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完全结合进这个能引导西班牙人民走向民主的新方向。

至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这个人，除了我刚才回忆的这个轶事外，我还应说，我是在青年时代认识这个社会党领导人的。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因为普列托是在我出生与生活过的巴斯克大区开始和开展他的政治活动的。

后来，在议会里，由于当时作为议员我还是新手，普列托就常常给我提一些友好的建议。

他问我：“多洛雷斯，你把你的讲话稿交给《政府公报》以前，修改过吗？”

我回答说：“没有改过，没有想到要修改。”

他坚持对我说：“您在讲话的时候往往重复或者在组织一个句子时犯点儿毛病，您是可以改的。”

有时则作为政论老手和专家训诫我：

“如果当您讲话时，有人打断您的话，您要保持镇定，要沉着地继续您的讲话。”

流年似水，我们经历了多少转折时刻、战争的悲剧、政治斗争、失败、流亡。

在我们中央委员会于1956年召开的全会上，我提到了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反对“冷战”，反对原子武器，反对在西班牙的基地的讲话。这些讲话同我们所主张的意见是一致的。

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都是历史的需要。

我在那次全会上说：

同志们，请允许我作为你们的代表，在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讲台上，向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最杰出的领导人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讲几句话：如果您想批评我们，您想批评我们什么，您就批评吧。我们对手的批评也是对我们的帮助，不过，我们要交谈，我们要对话。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劳动者、共和派力量都如此希望我们对话。

巴斯克和纳瓦拉的劳动人民通过他们最近开展的斗争表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英勇斗争的年代里唤醒的，西班牙共产党后来加以提高的劳动人民的反叛精神和阶级觉悟并没有被佛朗哥主义镇压下去。

属于社会党、共产党、民族主义和王室正统主义的工人都参加了那次斗争。如果他们都在斗争中团结起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应该相互谅解呢？

您在“五一”前夕的那次讲话中，谈到要创建一个运动，可以称之为“西班牙团结”运动的基础是什么？纲领是

什么？

西班牙共产党一直主张实行“反对佛朗哥全国阵线”的政策，这一政策已开始在西班牙国内实行，而你们却顽固地反对。

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名称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其内容。如果你们理解的“西班牙团结”就是左翼和右翼一切力量之间的妥协，以推翻佛朗哥将军的独裁统治，重建民主自由，维护国家独立，让人民有机会民主地选择他们喜欢的政治制度，那么这正是我们所主张的，是全国阵线的基础和实质。如果为了接受各个反佛朗哥力量间的团结，你们要求用“西班牙团结”而不是用“全国阵线”，来命名这个政治力量集团的话，那么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没什么不好接受的，因为至关紧要的，我重复一遍，不是名称，而是内容。

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通过了这封信的内容，并把信寄给了普列托。

1960年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拜访他时，又带去了我个人的信件，邀请他到莫斯科会面、交谈。

1962年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在墨西哥逝世。

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一位仁慈的、杰出的人物，在我国政府中担任过高级负责工作。

尽管在内战艰难的年代，在流亡时期，我们两党之间有过政治对抗，但由于他有才能，有斗争能力，我个人对他是重视的、尊重的。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 与我的悲伤

休息……睡觉……我已许多年没有享受这种乐趣了。不幸的经历、前线、各种战斗、痛苦的分离、同志们在西班牙遭受的严刑拷打，多年来一直使我睡不安寝。

为了让我能睡着觉，医生们向我介绍了许多种方法，如睡觉之前先散散步，从一数到一百，然后从头再开始数，想些令人高兴的美事……无济于事，对我毫无用处。我那饱受震动的神经系统，对这些传统的办法无动于衷。

一位和蔼可亲的苏联神经精神病医生想用别的办法试一试。睡觉时，他坐在我的床边，用微弱而轻柔的声音讲着，讲着。我非常感激他的关怀，听着。他想干什么呢？要给我施催眠术？出于礼貌，我等待着，……那位医生继续讲着，说着……这时，我亲切地对他说：“对不起，大夫，……我一句话也听不懂。”

医生笑了一笑，握住我的手说：“当然，你是听不懂的，你是热情之花……”

我在这里顺便谈一点我看书的事。由于晚上几乎睡不着觉，我就读书，就象年轻时那样勤奋地读书。一本接一本地读，不管是什么专题和作者。看的什么书呀？政治书籍，我们的以及别人的理论书籍。但是我特别喜欢文学，喜欢读那些古代、当代历史学家的著作，喜欢读我的同乡乌纳穆诺、老玛丽亚纳、塞纳加、巴尔梅斯、希塞隆、塞万提斯的作品，喜欢读俄国、法国等

古典作家的作品。我阅读了我的朋友们、同志们从法国、美洲、西班牙给我寄来的所有书籍。

在充满希望的时候，在失望的时候，我就反复阅读这些古代作家写的有关西班牙的段落。

蒂托·利维奥这样写道：

西班牙是罗马人最先进攻，最后占领的国家。

希腊人埃斯特拉冯曾对我们作了这样的剖析：

他们对生活粗鲁地采取不在乎的态度，英勇顽强，艰苦朴素，仇恨外国人，与世隔绝，热爱自由、独立。

这些评论几乎已有两千多年了，今天，我们还是把它们记在我们的笔记本上。

我很喜欢歌谣、诗词，如埃斯普龙塞达、克维多、马查多、米格尔·埃尔南德斯、阿尔维蒂·雷哈诺、洛尔卡……的诗歌，其中有些已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后来，我和外孙们玩着玩着就把这些词教给了他们。

许多年前的一个下午，在马德里，我们几个议员同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及其他朋友一起喝咖啡。费德里科仔细地端详着我，好象在琢磨什么，当时我正在说话，讲着一件事。费德里科对我说：

“多洛雷斯，你是一个悲伤、痛苦的女人……我要为你写一首诗。”

几天后，费德里科就到他的格拉纳达去了，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再也不能写我悲伤的诗了……但他的死却给我带来了更大的悲痛。他是西班牙文坛上的天才之一，还值青春时期被杀害了。

能睡得着觉吗？

比利牛斯广播站沉默了

十年来，我们夜以继日一直是通过比利牛斯广播站发出的电波（可爱的电波），向西班牙传播我们的声音的。编写的稿件都是经优秀的笔杆子润色过的，他们是拉蒙·门德索纳、何塞·桑多瓦尔和其他几位同志。

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的政治形势的出现——让我们回想一下，如果说1941年建立了数以百计的秘密电台，向被法西斯占领的各国人民广播，那么，到了1955年只有比利牛斯一家地下电台还在工作。西班牙仍遭受着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而其他欧洲国家已获得了解放。我们同苏联同志商定把独立西班牙电台转移到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地说转移到罗马尼亚去。在这方面曾给予我们很大帮助的苏联人，答应继续帮助我们，并在技术方面和我们合作，使我们能继续进行广播工作。

1955年1月我们携带着比利牛斯广播站的全部设备，来到了那个国家，那里的人民同西班牙人民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我们一到那里就受到了罗马尼亚同志的热烈欢迎，他们以积极的支持给我们创造了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我不会忘记当时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同志及其他罗马尼亚领导人对我们的关怀，一出现问题——问题还不少——他们就热情地帮助我们解决。也不会忘记他们个人、家庭对我们的友好感情，他们使我们在这个国家里生活得愉快。

拉蒙·门德索纳担任了独立西班牙电台的领导工作，还增加了一些新的撰稿人。新领导机构的专业工作和比利牛斯广播站记者同西班牙内地逐步建立起来的联系站很快就见到了成效。比利牛斯广播站成了西班牙人最好的消息来源，在城市、乡村、家里、酒店、监狱、山上人们都在收听它，在政府各部和其他机关里也收听它。

在乔治乌-德治逝世后，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国家元首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继续热情帮助独立西班牙电台，及时帮助我们解决出现的许许多多技术和其他方面的困难，使这个如此重要的秘密电台继续工作下去。对比利牛斯广播站日常工作中取得的成绩，齐奥塞斯库同志同我们共享欢乐，这真叫与我们同心同德。多少次，我以我们党和西班牙人民的名义向罗马尼亚同志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卓有成效的帮助，使我们在西班牙共产党1977年取得合法地位前，能不仅是每天，而且是每时每刻都与西班牙人民联系，领导他们并向他们报道消息。独立西班牙电台在莫斯科、乌法、布加勒斯特工作了三十六个年头啊。

拉蒙·门德索纳写了一部很优秀的书《比利牛斯广播站》，详细地反映了独立西班牙电台的伟大工作。他让我为这本书作序，全文抄录如下：

为了传播真理，太空中出现了人民亲切地称为比利牛斯广播站的声音，从1941年7月22日的第一次播音到1977年7月14日的最后一次广播，真理始终伴随着它。

在那无休止地残酷镇压的年代里，独立西班牙电台是希望的使者。

它是不辞辛苦的引路人，它一直深入到祖国最偏僻的地方，号召全体西班牙人民超越分歧，团结起来争取自由。

它是西班牙共产党的代言人，但它通过它的电波传播了一切表达民主意愿的声音。独立西班牙电台是我们1956年宣布的全国和解政策的一贯捍卫者。今天在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里都可以高兴地看到这一政策取得的胜利。

比利牛斯广播站是佛朗哥无法检查的唯一的西班牙广播电台，这是散布在前所未有的最广泛的秘密网络中的数千名合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一贯得到我们电台国际主义的声援。我们曾先后祝贺过苏联和反法西斯联盟的胜利，中国革命，朝鲜人民的斗争，越南的英雄业绩，古巴革命，葡萄牙革命，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等国的解放。

但在这一革命进程中也不乏令人悲痛的事件，如智利皮诺切特的政变或乌拉圭的军人独裁专制，残酷镇压我们的兄弟人民。我们以最激烈的语言谴责了镇压活动。

让我们回到这本具有见证人价值的书上来吧，这本书反映了我们所经历的执行西班牙共产党政策的重要时刻，这本书提到的一些人为今天的民主进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拉蒙·门德索纳领导多年的独立西班牙电台完成了它的使命之后，停止了广播。但今天我们的人民却让人越来越多地听到它的声音。

布加勒斯特使我着了迷

我敬爱的“圣地”夫妇陪我住在布加勒斯特。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和我一起创建了共产党在巴斯克的组织，他的夫人，善良的马蒂德，是我亲密的伙伴。

我的外孙们也常来我这里过一段时间，当时他们都还很小。

在我身边工作的还有个叫玛丽亚·特雷莎·弗朗塞斯的姑娘，她是在苏联读的书。1956年伊雷内·法尔孔从中国回到这里，又和我们一起工作了。我们曾派伊雷内和她妹妹恩里克塔及一批西班牙人去中国工作，其中有哈辛托·巴里奥斯、路易斯·拉卡萨、索莱达·桑恰、玛丽亚·路易莎·冈萨雷斯、胡安·维森斯、马诺洛·阿尔维蒂、玛格丽塔、朗卡尼奥和德尔菲娜·阿斯卡拉特。他们的使命是帮助中国人民的同志建立北京电台对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广播的机构和进行日常广播工作，以及在出版社工作，在学校教西班牙语。

从布加勒斯特我经常到法国、意大利、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参加会议。

我很喜欢布加勒斯特，喜欢它的气候、它的草坪，特别是它的人民，渊源于拉丁系民族的活泼、好客的人民。还有它的语言，由于保留着大量的拉丁语的词汇，我们不用专门学习它就可以逐步听懂。

我亲眼领略了这个巴尔干国家的美丽景色，象我的家乡巴斯克地区一样翠绿的喀尔巴阡山，罗马尼亚劳动人民疗养和休

息的圣地，吸引国际游人的黑海沙滩。

我曾在罗马参观过著名的古迹图拉真圆柱，图拉真是出生在西班牙的罗马皇帝，在公元初年他战胜了那个英勇民族的抵抗，攻占了达契亚，即今天的罗马尼亚。

我在游览美丽的黑海海滩和历史名城康斯坦萨时，我有幸拜读了不幸的奥维德写的悲伤诗篇，他在公元九年被流放到遥远的，对他来说是寒冷的达契亚。

他在《悲歌》中发出的呼吁受到冷遇。这位才华出众的拉丁诗人，《变形记》的作者没有得到罗马权贵们的宽容，最后长眠在这里。

我每天依旧很早起床。早上我在布加勒斯特的大街上散步时，经常碰上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的总统佩德鲁·格罗查，他和蔼可亲，也喜欢每天早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在 人 民 中 国

象所有的小孩一样，我从小就幻想有朝一日能去那个以宝塔和庙宇闻名于世，盛产玉石、瓷器和柑桔的神秘国家——中国。我幻想着畅游黄河、长江，了解它古老的传说。

马可·波罗的游记使我们童年的幻想更加强烈……

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我充满热情和希望。这一胜利在各国人民的胜利斗争中有着崭新的、无法估量的意义……

1956年我同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应邀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

次代表大会，这是这个英勇的党在合法的状态下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带着真正的幻想开始了从莫斯科至北京的长途旅行。

代表团由圣地亚哥·卡里略、伊格纳西奥·加列戈、恩里克·利斯特尔以及胡安·帕拉内列斯和何塞·博尼法西大夫组成。帕拉内列斯与我开始了这漫长的旅行——乘九天的火车——，这是观赏辽阔的俄罗斯无比美丽的风光，它的草原、西伯利亚针叶林、贝加尔湖的唯一机会。贝加尔湖的深度和美丽的景色是举世无双的，还有那闻名于世的大河，受西伯利亚的勒拿河的启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取了列宁这个名字。

在旅途中，我们一边观赏风光，一边下棋，帕拉内列斯是个出色的西班牙医生。由于他在苏联加马列亚学院进行的科研工作，被选为莫斯科医学科学院的院士。除此之外，他还很精通棋艺，而我则只知道棋子的走法。不知怎么回事，我还居然赢了帕拉内列斯几盘，把他气得不能自制。

一进入中国领土，一切都变了：精心耕作的农田象艺术品一般，穿着蓝色的衣服蹲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向从另一个世界驶来的列车招手，那些我们还从未见过的，上面装饰着驱赶妖魔的动人图案的房子……

我们西班牙人受到了中国同志热忱的欢迎。它表达了为了共同的事业而战斗的战友之间的真挚的感情。当我们抗击法西斯军事侵略时，他们正同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进行斗争。

毛泽东、朱德在三十年代曾向我们致电，表示了兄弟般的支持。

我是在共产国际的一些会议上了解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刘少奇以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长期不屈不挠的战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我有机会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在这块赶走了侵略者和殖民主义者的国土上，在这块人民一寸土地、一寸土地夺回的国土上，向他们致意。

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很感人的。在会上有不少对我们来说是新的思想、新的语言，但是中国独有的思想和语言，确切地说是这个思维方法和生活习惯与我们所见到的都不同的国度所独有的。

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都派代表参加了这个大会，我们代表西班牙共产党，代表西班牙人民祝贺中国革命的胜利，祝贺新中国，同时，我们也把西班牙为争取自由、民主而进行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呼声带到了北京。

我们在华逗留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但我们有幸参观了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万里长城，它庄严地盘绕在群山之间，据说有一万三千公里长。这一数字使那些参观者大吃一惊。我们畅行无阻地走进了紫禁城，它已向人民开放，我们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人们含着微笑，好奇地看着我们。另一件使我们感到惊奇的事是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游行，那色彩的海洋、那蜿蜒的长龙，各民族的舞蹈，抛向天空的彩带、花束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我们有机会能同各行各业的许多中国人交谈、交流经验。

我没有忘记我与一个中国大资本家的会见，他没有逃离革命，而是留在了祖国，在一家公私合营的企业里工作。他对我们说他生在一个产业主家里，他热爱祖国，不想到国外去居住。他说，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最悲伤的莫过于作为低等公民，流落他乡。并不是他喜欢共产党政府，但他愿意参加工作，愿意分享他的企业的利润。

我们起程离开这个当时有六亿人口——现在据说已超过十亿人——如此动人的国家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接见了我们，这三个人各有特点：毛是一位在自己身上把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惊人地融为一体的人物，他善于思考，对我们非常亲切。周恩来很活跃、很诙谐，眼睛闪烁着机敏的目光，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朱德，这位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他很敬佩我们，把我们看作战友。

他们向我们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取得的巨大发展和存在的严重的困难。

他们想详细地了解西班牙反佛朗哥斗争的进展，了解我们党，我国人民的情况。

我们也向他们介绍了许多情况，我们向他们解释了我们政治工作的中心——我们的全国和解政策，但我们又突然感到这在时间和空间上距中国的现实太远。

毛听着我们的介绍，点头称赞，沉思了片刻之后大声说：“全国和解政策万岁！”

后来，中国同志向我解释，中国人说“万岁”（“diez mil años”），就是我们所说的“¡viva!”。

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受到的热情接待上又增加了一层兄弟般的情谊。

十年后^①，我们又接到中国同志的邀请，邀请我们参加他们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我们又开始了充满幻想的旅行。记得与我同行的有何塞·莫伊克斯、塞巴斯蒂安·萨皮拉因、安布罗西奥·圣·塞巴斯蒂安、马诺洛·阿斯卡拉特和诗

^① 原文如此。——译者

人胡安·雷哈诺同志。

我希望到北方陕西省的延安去参观。这个对中国革命及其领导人来说十分重要的地方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来到了延安，参观了毛泽东和他夫人一直居住到1947年的窑洞，窑洞里摆设简朴：办公桌、木板床（所有中国的床都是这样的）、非常一般的小窗户。通过窗户可以看到毛亲手种植的小菜园。

毛和他的将军们经过几千公里史诗般的长征，来到延安，毛自己曾这样描写过长征。

长 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人们告诉我们说，中国领导人在延安生活简朴，充满同志情谊、辛勤劳动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毛晚上工作、学习、思考问题、制定打击侵略者的作战计划。他的口号是：耐心、坚持，抓住时机打击敌人。

人们给我很大的荣幸，让我睡在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朱德当年曾用过的床上，这张木板床上只简单地铺着一床褥子。那天晚上我想，我一定要把这次经历告诉我的外孙们。

我们参观了武汉，那时它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基地，是个秀水环绕的大学城。中国人真是融合新旧的天才！

上海并没有使我们感到非常新奇：上海是个西方式的大城市，有点象伦敦、柏林或纽约。

相反中国的古都南京却使我们赞叹不已，中国伟大的政治

家孙中山就长眠在这里。

我们乘着中国漂亮的轮船渡过了长江。那些年轻、热情的中国翻译和导游让我们了解了不少新的东西，拥有学校、幼儿园、医疗所的人民公社，尊老爱幼的好风尚。我们参观了一个种植茶叶的公社的缝纫车间，我想试一试那同我在家乡看见过的缝纫机差不多的老式“辛格”缝纫机运转得怎么样。运转得相当不错。我还到矿区参观，同那里穿着浅蓝衣服的矿工进行了交谈，我向他们介绍了我的家乡加保亚达，比斯开矿区矿工的劳动情况。

我很担心我所讲述的对这些矿工来说很奇异，正如我们对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觉得奇异一样。

在中国参观访问期间，一位中国女翻译给我们提供了帮助。胡安·雷哈诺还写了一首诗赠给她：

赵

一些难认辨的音节
组成她的姓和名，
象一只蝴蝶
从东方飞起
飞进我的语言。
这姓名象玫瑰简短，
组成它的字符却密密麻麻。
这蝴蝶如此幼小，
清晨几乎看不清它。
飞舞起来
看不见它的翅膀，

只听得嗡嗡作响
好象翅膀上带着蜂房。
它优美潇洒，
酷似午后荷花。
笑吧！这就是我的翻译！
她的名字就是赵铭贤。

胡安·雷哈诺 1959年10月于重庆

阿斯图利亚斯，站立起来的西班牙

在全国和解日前不久，我在一篇比利牛斯广播站广播的文章中提到了席卷西班牙全国的罢工运动，我还具体地谈到了瓦列-纳龙矿区矿工的斗争。我的讲话概括如下：

……我们等待了如此之久的解冻终于开始了。阿斯图利亚斯人民的斗争宣告了西班牙春天的到来。这条消息使多少西班牙劳动者和民主人士感到欢欣鼓舞；唤起了对往事的回忆，这些往事是如此遥远，但又感到历历在目，就在眼前。

战斗者的阿斯图利亚斯……经历过1917年和1934年两次大革命的阿斯图利亚斯的矿工、冶金工人、农民和渔民在共和力量失败后又一次遭到了佛朗哥的血腥镇压，矿区每个家庭中都有亲人惨遭杀害，饱受牢狱、严刑、分离之苦。

操纵全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军阀^①派遣摩尔人、雇佣兵和军团士兵，在曾经历过光复战争^②的阿斯图利亚斯，在

佩拉约国王^③时期取得过科瓦东戈大捷的阿斯图利亚斯，在1808年建立过爱国执政委员会的阿斯图利亚斯，在坎波马内斯^④和霍维利亚诺斯^⑤的阿斯图利亚斯，用弯匕首和大刀——有那样的主子，就有那样的奴才——建立起他们的秩序与安宁、他们的文明与文化。

阿斯图利亚斯收缩了，但并没有背弃它自己英勇的、战斗的历史。在那些血腥镇压的日子里，在灰烬下面反抗与抵抗的火一直没有熄灭过。长枪党大小头目蛊惑人心的宣传象倾盆大雨浇向阿斯图利亚斯，但不过是象雨水冲石头，只能淋湿它的表面，渗透不了它。

新一代矿工，“头脑简单的人”，一进入矿里，就懂得了，他们的父辈，祖父辈进行斗争，为的是什么。那里一切都没有变化，一切都记载着历史。那就是激起矿工们斗争和不可战胜的反抗的活生生的原因。

“一切都来自矿井”，一首矿工歌曲这样唱道。“一切都来自矿井”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煤在那里边，在坑道里，在矿井里，在那地层的深处。如果我们不开采它们，不把它们装进矿车，不把它们运到地面，它们就会永远埋在地层深处。

① 指弗朗哥。——译者

② 光复战争，指西班牙中世纪驱逐伊斯兰教徒的战争。——译者

③ 佩拉约国王（？—737）阿斯图利亚斯第一个国王。718年战胜摩尔人，取得科瓦东戈大捷，从而开始了基督教徒的光复战争。——译者

④ 坎波马内斯（1723—1802），西班牙政治家，为西班牙的振兴作过重大的贡献。——译者

⑤ 霍维利亚诺斯（1744—1815）西班牙报刊撰稿人和政治家，写过诗歌、政治和经济小册子。——译者

为了让人们懂得矿工们为什么斗争，为什么罢工，为什么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有必要讲讲这个常常被人遗忘的道理。

佛朗哥政府把阿斯图利亚斯的罢工归结为外来的阴谋，那是欺骗，欺骗西班牙人，欺骗外国人，把它的镇压措施说成是反共斗争的一个方面，继续扮演着反共旗手的丑恶角色，以此证明乞讨更多的美元是无可非议的。

引起罢工和抗议的不是别人，正是政府自己，正是它执行的反国家的政策。

在政府的声明中只有一点是确实的：罢工带有政治色彩。之所以是这样，因为这不是由劳动人民的意愿所决定的，而是由工会体制、由政体的性质所决定的。工会是政府创办的，政府决定什么时候给工人增长工资，什么时候不给工人增长工资，政府决定工人应该怎样劳动，甚至劳动生产率应达到什么水平，劳动日应延长几小时。政府是工业、寡头利益的代表，是大股份公司利益的保护者。因此，每次劳资冲突都成了反对政府政策的斗争，因而也是反对推行这一政策的政府的斗争。工人阶级以及非无产阶级的阶层和阶级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必须改变这一状况，使西班牙具有另一种政治面貌。

矿工的斗争以及西班牙全体劳动者的斗争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得到了全世界的同情和支持，世界工会联合会、自由工会国际联合会、智利劳动者、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矿工、法国劳动者通过电台都向西班牙劳动者发去了信件表示支持。

目前的罢工提出了一个已经成熟了的，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工会的独立问题。把企业主同真正代表劳动者的愿望和利益的组织分离开来，不许有外来干涉或外来成分。

最近的工会选举越来越明显地表明了这个问题。工人们并没有选那些当局指定的人为工会代表，而选了工人们自己推举的人。

在当局和企业主面前，这些工会联络员是工人们的真正代表和保护者，他们光荣地完成了工人交给他们的使命和任务。

正因为如此，当局就重点镇压那些忠于自己的同志、忠于自己的阶级兄弟、在厂矿里维护劳动者要求的工会联络员。

目前的工人阶级的斗争由于其特点和广度，其重要性超过了以往的斗争和抗议。工人阶级正在提高觉悟和锤炼自己，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工人阶级懂得他们的态度对全国有着重大的意义，他们清醒地知道他们的斗争有利于一切反对派力量的重新组合和斗争。他们希望这些力量能消除无谓的分歧和互不相容的态度，团结起来同独裁统治背水作战。

西班牙宝贵的鲜血

每天，几乎每天都有消息传来，使我们流亡国外的同志震惊，又有同志被捕了。我们不得不在无尽头的被捕同志的名单

上,写上一个新的名字。

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庄严的目光总是浮现在我们眼前,西蒙·桑切斯·蒙特罗、奥拉西奥·费尔南德斯·因关萨、卢西奥·洛瓦托、米格尔·努涅斯、洛佩斯·雷蒙多、拉蒙·奥尔马萨瓦尔、马科斯·安娜、法夫里西亚诺·罗赫尔、赫拉尔多·伊格莱西亚斯、卡洛斯·埃尔维拉、梅尔格西德斯·罗德里格斯、何塞·桑多瓦尔、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塞瓦斯蒂安·萨皮拉因、弗朗西斯科·罗梅罗·马林、马蒂尔德·蓝达、曼努埃拉·桑切斯、佩德拉·奎瓦斯、胡安尼塔·科尔索、梅塞德斯·戈麦斯、恩里克塔·奥特罗、伊萨贝尔·桑斯·托莱达诺、康斯坦丁娜·佩雷斯、“十三朵玫瑰花”、还有许多,许多……

我们既感到悲痛又感到骄傲,为我们的同志们在监狱里不屈不挠的坚定立场我们感到无比骄傲。

西蒙·桑切斯·蒙特罗在社会政治纵队那帮家伙面前的声明表明了共产党人是那么英勇、那么有反抗精神,他阐述了共产党的政策,以中央的名义承担了马德里地方党组织的活动的责任,最后他说:

我叫西蒙·桑切斯·蒙特罗,是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执行委员会委员,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切,我不再说什么别的了,因为我党的党章不允许我那样做。

共产党人被捕后,除极个别的人外,说的话几乎都是差不多的,明确表示他们无意在佛朗哥的警察面前开口说话。

游击战士塞贡多·比利亚沃伊面对着刽子手庄严宣告:“你们可以剥夺我的生命,但剥夺不了我的尊严。”

多洛特奥·伊巴涅斯负责党的领导机构同东部沿海地区活动的游击队的联络。1951年游击队解散后,他来到法国,在西班牙

牙和法国同志的支持下，他开始使自己处境正常。有一天，正当他办理这种手续时，被法国警察逮捕了，他们把他带到西班牙边界一侧，并在二十四小时内把他交给了佛朗哥当局，他在公安局被拷打致死。这事就发生在社会党人于勒·莫克担任法国内务部长期间。

阿斯图利亚斯矿工克里斯蒂诺·加西亚十六岁就自愿参加了人民军队，在部队里还得到了少校军衔，内战失败后，他同共和国中成千上万战士一样被关进集中营，在法国的矿区服苦役。法国被希特勒占领后，克里斯蒂诺·加西亚在加尔地区组织了游击运动，他是游击队第三师的指挥员，他参加了好几个城市的解放战斗，为此，解放后法国政府向他授过勋。

他还想继续为解放阿斯图利亚斯、解放西班牙而战斗。克里斯蒂诺回到祖国，领导过一支游击队。后来他与一批同志一起被捕，都被判处死刑。

在被枪决之前，克里斯蒂诺给我写下了这几行感人的话语：

给多洛雷斯同志……只有两句话：一批共产党人马上就要被处决了，当你收到这封信时，我们肯定已经不存在了。但我们要对你说，谁也没能从我们嘴里掏出一句怨言，谁也没能不受制裁地给你领导的党抹黑。自从我们落入西班牙的盖世太保魔爪后，我们最关心的是保持党的声誉，敌人的任何诡计、手段都无济于事，因为如果有人胆敢污蔑党，你就会看到你的学生、共产党人象猛兽那样跳出来维护党。

我们不幸被捕了，倒下了，但我们相信还有数以千计的西班牙人、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将继承我们的事业。千万个共产党人所尊敬和热爱的你的英名就是我们的旗帜。

我们认为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为活得正直，为无愧于共产党人的称号而感到自豪胜过生命本身。

法西斯分子把我说成什么，对我来说无关紧要，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人民对我所说的一切，我和我们大家对人民都负有义务。为了人民，为了他们的自由，我战斗过，还将战斗下去。请同志们相信光荣的共产党的一名普通党员会象共产党人表现的那样视死如归。

克里斯蒂诺·加西亚

1946年2月15日于卡拉万切尔

何塞·戈麦斯·加约索曾是国立学校的教师，是他的家乡，加利西亚党组织的领导，他英勇地开展地下斗争。被捕后，受到严刑拷打，最后被枪决了。

他在写给妻子孔查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如果我的力量允许，我就给多洛雷斯同志留封信……亲爱的孔查，是她给了我力量和勇气使我忍受住了严刑拷打。多少次，当我感到我要发疯了，我就自己对自己说：“多洛雷斯说过，共产党人可杀不可辱。”他们没有使我屈服，正象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使其他同志屈服过一样。

加利西亚的游击战士曼努埃尔·庞特1947年5月被敌人杀害，临刑前的几个月，他给英国驻西班牙大使写了一封信，我从中摘出了以下这一段：

我们就象是加利西亚那些百年栎树，被雷电击断，失去树枝，但早晚它们又会发出茁壮繁茂的枝芽，因为它的根深深地扎在西班牙强壮的土地里。我们抵抗斗争这棵栎树就是这样。

拉斐尔·阿尔维蒂同我们一样感到悲痛，他这样写道：

戈麦斯·加约索流尽了鲜血！
纯洁，壮丽的鲜血！
安东尼奥·塞奥阿内，
迭格斯·拉腊尼亚加，
罗萨，克里斯蒂诺和比亚，
他们流尽了鲜血！
染红高山、峡谷！
阿古斯丁·索罗亚流尽了鲜血！
鲜血流成河！
曼努埃尔·桑切斯流尽了鲜血！
西班牙宝贵的鲜血！
戈麦斯·加约索是战士也是诗人，

贝拉马尔松树的歌声

沿海的松树，
甜蜜地歌唱：
和游击战士相爱，
是幸福的爱情。

他丰功伟绩，胜利辉煌，
他象歌中那样英武潇洒。
他的行装是武器，
他的休息就是战斗，
他的睡眠就是站岗放哨。
贝拉马尔的松树
用甜美的声音

每天迎着曙光歌唱。

平川和高山上的各路英雄们，
在鏖战中
庞特同志只身扑敌，
用自己的生命
为你们树立了榜样。

擦去你悲痛的眼泪吧，
英雄的妻子，不要哭，
你和游击战士相爱，
你是幸福的。

战士在战斗中牺牲
英勇、壮烈，
对他的悼念
应是胜利进军
不是哀歌。

平川和高山上的各路英雄们，
去继续自己高尚的事业，
而你，庞特同志，
仍是战斗的指挥。

霞光在你的坟墓上
同鲜花相辉映……

英雄的妈妈，不要哭，
不要吵醒他！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真理只可琢磨，
不可废弃。

——塞万提斯

发生了许多震动全球的事情。1953年斯大林逝世了。不知怎的，我们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在一定程度，我还觉得斯大林是永远也不会死的，当然这种想法是不理智的。

斯大林的逝世使许多国家的民主人士和社会主义者不知所措，他们尊敬、热爱苏联这样一个战胜了希特勒的国家的元首。

斯大林的逝世首先是给全世界共产党人留下了一个空白。

当时我怀着西班牙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的崇敬心情，在几次悼念这位苏联领袖的活动上讲了话。

三年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安东尼奥·米赫、维森特·乌里维、恩里克·利斯特尔、费尔南多·克劳丁和我参加了这次大会。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开幕式上做的报告中提出了新的理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可行的，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

这一理论为各国，特别是西方的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民主人士提供了新的启示，开辟了新的前景。

那次值得纪念的代表大会却是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结束的。

我们应邀参加大会的代表离开莫斯科代表大会会场后——有些人已经飞回国去了——，大会转为秘密会议，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尼基塔·赫鲁晓夫做了一个报告——至今人们还称为秘密报告，而且也没有发表过这个报告的正式文本。在这个报告中翻开了不为众人所知，令人震惊的关于斯大林时代的一页。

在分析斯大林晚年的为人时，苏联领导人揭示了一种痛苦的、令人伤心的实际情况与我们过去知道的不同。在对这一实际情况感到痛心之余，最好还是了解它，而不要在错误中虚度时光。

如果我们共产党人是为正义而战的，那么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犯了错误时，为什么不能改正呢？哪怕是象我们对斯大林的为人的看法所犯的那样错误也要改正。

从那时到现在，时间过去了不少，我们也经历了不少艰难的事情。关于斯大林，人们写了很多，但我认为真正有科学价值的调查很少或几乎没有。我们希望将来能有这种调查。随着时间的流逝，任何东西都是掩盖不住的，一切都将或早或晚地被公诸于世。约瑟夫·斯大林的为人，在它的一切方面，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方面，总有一天会被那些能够做到又善于做到的人向我们揭示出来。

但是，1956年，共产党人，一个奋斗了一生的战士又是怎样反应的呢？

共产党人继续在战斗，他检查和改正了错误（不管这些错误有多么严重），他掌握了新的情况，沿着他开辟出来的那条崎岖的路前进……

著名学者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说过，“只有为维护真理而进行顽强的斗争才能证明生命的意义，才能减轻痛苦与不公正的折磨。”

我们忠于那些我们已接受的思想，我们这个运动的活动家、人物、领袖都起着不同寻常的作用，推动着社会发展。但是活动家们、领袖们也会犯错误，这是合乎人之常情的。给我们信心，使我们坚定的是我们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有人说，弱者靠大人物激励，而强者则靠思想激励。

我们知道历史上起作用的是人民，关于这点我们重复过几千次了。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坚决反对在革命运动中搞个人崇拜，认为个人崇拜是旧时代最可恶的遗毒。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一切可能导致对权威任何形式的崇拜和迷信的东西。

列宁认为几千万创造者的智慧比最卓越、最天才的预见要高明得多。

尽管如此，所谓的个人崇拜从斯大林时代起就侵蚀着我们的队伍，并经常成为我们表达思想的工具。人们夸大领袖人物的作用，回避对他们的缺点和错误的批评，从而给基层党员积极参与制定党的政策带来了困难。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就我们党的工作方法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性的分析，努力纠正了同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基础的共产党格格不入的一切，纠正限制党员参与制定政治路线，从而使西班牙共产党内产生狭隘的、宗派主义的倾向，并使某些同志产生专断主义的恶习和工作方法的倾向。一些同志把各种工作包揽在自己身上，而实际上这些工作

只有在党的各级组织的积极参与下才能完成。

我们明确了这样一个问题：应当由我们自己，西班牙共产党人，通过学习别国共产党和革命运动的经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主要是在把它运用于我国国情的情况下，去制定和执行我们党的政策。换句话说，就是列宁教导我们的“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今后我们要做到这样一点，凡是我们自己犯的错误都应由我们自己承担，自己改正。

全 国 和 解

正象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全体西班牙人和解的思想早在我们四十年代的政治主张中就显露出来了。

这一想法随着西班牙政治变化的发生与发展，在党的领导机构的历次分析过程中逐步成熟起来，逐步勾画出它周密的轮廓和形式来。

圣地亚哥·卡里略和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为迫切革新西班牙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做出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

1956年5月19日经过激烈辩论通过的一项文件明确强调了全国和解的必要性。同年6月发表的西班牙共产党的声明《争取全国和解》中，提出了这一政策的基本内容。

1956年8月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我宣读了由党的领导机构起草的一个报告，报告的内容是改变党的策略以争取在我国的新形势下实现西班牙人和解并通过和平

方式加速佛朗哥将军独裁统治的垮台。我这个讲话的中心思想是我们发出全国和解的号召为西班牙政治确立新方向，以此开辟出一条道路使全国一切希望实现政治变革的力量重新组合起来。这些政治变革应保证西班牙和平的延续性。

我当时指出：

……一种新的公民意识在发展并向全国传播开来。随着这一新意识的蓬勃兴起，佛朗哥维护的帮派精神正在削弱。

因此，我们认为该是对我们昔日的对手说句话的时候了：结束内战吧！不要再把西班牙分成红色和蓝色的！

由于我们顽强不屈的抵抗，我们共产党人受到了佛朗哥最残酷的镇压和迫害，这一事实给了我们以权力，可以在我国人民面前，对一切站在对立营垒的军界、政界力量说：“我们愿意与你们达成一项政治协议，一项争取最起码的民主自由，争取结社、集会、出版和言论自由的协议，作为走向全国和解的第一步。

为了实现这种和解，为了在西班牙有生活、工作的可能条件，所有全国性的政治力量都应准备作出相应让步。

共产党提出的全国和解产生于西班牙的现实情况。

经过十七年的佛朗哥独裁统治，在全国人民的思想，围绕需要恢复西班牙的主权和保证它的进步与发展的问題，已逐步形成在各团体和各社会阶级之间实行集体团结的意识。

全国和解日的历史意义

实现全国和解的愿望已深入到西班牙各个社会阶层，有利于反对独裁的斗争。

教会领导层及反佛朗哥主义的人士的文件中也开始出现全国和解的想法。

1958年在西班牙举行了全国和解日的活动。传播了建立文明共存气氛的思想和意志，在这种气氛下，政治力量和政治舆论能自由发挥作用。

比利牛斯广播站广播了我用胡安·德格尔尼卡的笔名写的一篇题为《全国和解日的历史意义》的稿子……

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革命家赫尔岑说过：“保守派的怀疑主义比桑托·托马斯还厉害，他们用手摸到了伤疤，但仍不相信它的存在。”

过去只有我们共产党人坚定地认为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今天我们得到千百万人的赞同。

但是怎么才能促进和平过渡到新制度去，而不必等待灾难性的倒台或强烈的爆炸呢？

西班牙共产党通过它的全国和解政策，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开辟了西班牙政治、社会发展的新前景。只有傻瓜才不愿理解这一点。

西班牙共产党所维护的全国和解政策促进了对话的开始，消除了西班牙人之间的障碍。这些障碍是佛朗哥主义

人为设置的，它坚持内战思想，宣传存在失败者要复仇这一威胁性的幽灵。全国和解政策已经克服了最大的困难，就是使西班牙人高举和平的旗帜并实行符合大多数西班牙人感情的政策，大家互相接近。

佛朗哥主义搞的那一套是对受过创伤的西班牙再捅一刀，是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贫困，是政治上的停滞不前，是少数寄生虫靠牺牲国家和人民的活力来增长自己的大象般的躯体。

这样继续下去就是死路一条。反对这种局面，将是一种历史性的责任，这是任何一个正直的西班牙人都不能不承担的。

而反对目前这种局面并不意味着就是退回到不久前或更久以前的时期去。

今天没有象 1936 年或 1931 年那样的任何政治或社会问题。

西班牙的形势变了，人们的观念变了，因此政治形式也应随着这些变化而变化。

一种不停止的、不可避免的自然进程发展了——人们希望这样也是自然的——，在这一进程中起作用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不愿意看见它就是在显而易见的事实面前闭上眼睛。企图阻碍这种发展就是为强烈的爆炸创造条件，就是让激流越过堤坝或冲垮堤坝。

共产党维护全国和解政策时，什么也没有虚构。它注意到了这种进程并用一种政治表达形式把人们意识中早已成熟了的的东西体现出来。

当党的主席

推动未来政治变革的动力在国内不断加强、在西班牙响应反对佛朗哥独裁统治的倡议和行动的团体、人士和派别在成倍增加。

党同不同的阶层——有些是未来的反对党，有些已经是反对党——都保持着联系。

急需了解在政坛上出现的变化，各种态度和新看法及其多方面含意。急需具体了解我们国内同志和党设在巴黎的领导机构的意见。

住在莫斯科做得到这一切吗？

很早以来我就对我的这种不正常的处境感到担心了，我应转移到法国，到那里去工作。但是在法国我们也还得隐蔽地生活，这对所有的同志来说都是艰苦、困难的，从长远看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我曾多次试图这么做过，都不成功。为了不让人家认出来，我在法国只好把自己关在家里，几乎足不出户。只要我上街或在公共场合露面，人们就会走近我向我问候：“噢，热情之花！”这样不行。法国同志坚持认为在那种情况下，我的行动应是高度秘密的。

在那种情况下，要接待国内来的同志，同人们交谈，交换意见，参加会议，也就是说要尽到我作为总书记的义务是很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

我刚才说过，很早以来我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但由于上

述条件，变换一下流亡国家那也是无用的，而且在莫斯科我还与我女儿，外孙们生活在一起。

除了这些考虑外，还有一个年龄的问题。我马上就满六十五岁了。让一个比我更年轻，有更好条件来领导党的工作的同志担任总书记的职务，不是更正确、更有效吗？

政治职务又不是终身的。

在政治局里，我们有的是在日常斗争中锻炼出的机敏的、有能力的优秀干部。

那时，我们正筹备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局的一些同志：圣地亚哥·卡里略、豪尔赫·森普隆、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托马斯·加西亚、恩里克·利斯特尔来到莫斯科与我讨论各种问题。

在讨论中我向同志们讲了我的忧虑。问题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应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大家提出了各种意见。摆出几个方案，后来有人提出我们党从没有过的主席职务，这样就可以把总书记这一职务交给有更好条件来领导工作的同志。

我觉得很好，就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提出在代表大会上推荐圣地亚哥·卡里略担任总书记。在实际工作中圣地亚哥已经在协调党的活动了，他已经是一个以其才能、坚定的性格、丰富的经验和胆识而为人所熟悉的政治人物了，是一位足以能对付在今后几年内我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的人。

同志们同意了这一建议。这一方案提交到了中央委员会，后来又提交到了1960年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

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西班牙国内和国外的人员众多的代表团。

圣地亚哥·卡里略做了中心报告，在讨论中许多同志也发了言。我对我党四十年的历史的某些方面作了解释。代表大会修改了党章，设立了西班牙共产党主席这一职务，我当选了。选举结果，总书记职务真的落到了圣地亚哥·卡里略同志身上。

大会还把党的领导机构政治局改名为“执行委员会”，这在西班牙更常用。一些新的政治干部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大会强调有必要在反对派力量中间达成协议，以采取能把佛朗哥赶下台的共同行动。为此，大会向一切反对佛朗哥的政党、力量写了一封信。

大会重新制定了西班牙共产党的纲领，包括反对独裁统治的具体措施，以及民主时期和通过发展民主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目标。

大会还接受了把西班牙共产党变成一个群众性的党的方针。

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我感到更放心了，我庄严地完成了我为自己提出的任务。

不过，我的政治活动一点也没减少，依然全心全意致力于党的事业。我仍然参加我们党及其他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参加各种会议和集会。我总是受到朋友们和同志们的尊敬与爱戴。

向青年开绿灯

我们为青年专门举行了一次集会，作为对第六次党代表大

会的补充,或者说有点类似第六次党代表大会,这是使我难以忘怀的一次集会。

在主席台上,许多青年代表陪着我,我宣读了给青年一代的信,后来用《向青年开绿灯》的标题发表了。

我把这封信中的某些段落摘引如下:

……请允许我对你们谈一谈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和最基本的问题,如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志向,共产主义会给人们带来些什么,共产主义对青年来说意味着什么。

……昨天在青年中潜在的不满感情,只是在诗歌、小说、文学性刊物的散文中迸发出他们的抗议呼声,成为一种非正统的文学,今天已成为熊熊烈火,常常具有双重含义;不隐瞒自己的感情和爱好,去科利乌尔和塞哥维亚向马查多表示敬意;在由我国最负盛名的人物署名的文件下脚签下自己的名字,向世界宣告,要继承我国人民崇高而慷慨的精神和对自由的热爱。

学生青年配合工农青年的斗争,抵制“那些喋喋不休的人、爱占便宜的人和既得利益者鼓吹的单纯的节制”。这些人总站出来阻止青年,企图用说谎的办法使青年驯服,要他们谨慎些,向他们灌输顺从的思想,这是一种腐蚀剂,研究塞万提斯的伟大学者纳瓦罗·莱德斯马曾谴责这种顺从思想削弱了西班牙知识分子的特性……

……我国的青年正如向第六次代表大会提供的材料所表明的那样,正从沉默抗议所表现出来的潜在不满、从激烈愤慨发展到公开抗议,发展到争取经济和政治权利的斗争……

……青年非常急躁和不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青年

既不容忍模棱两可的态度，也不容忍陈规陋习、谎言和贫困。

青年需要明确的真理、具体的事实、容易证实的成就。他们在自己周围过去和现在所见到的却是平庸的、模糊不清的和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事实正在说明（而且是多么雄辩地说明！）那种被说成是新颖的、不可取代的东西已经失败了……

……有些人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敌人；可以憎恨马克思，出卖共产党人，但有一件事他们是做不到的，那就是他们否认不了马克思发现的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些规律无情地起着作用，决定着所有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政权的寿命。

面对那些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世界是永恒的、静止不变的人，资本主义陷入危机，社会主义得到发展的事实，象伽利略那样高呼：“然而（地球）总归是在运动！”（E pur si mouve）

反动思想家经常利用一些论点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比如他们说共产党人把所有的社会、政治和精神问题都归结为是经济方程式，把人变成一种没有个性的、机械的存在，我想对这一论点作简要的回答。

这不但是虚假的，而且企图把资本主义的弊病和罪过归咎到马克思主义身上来。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条件、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构成历史的基础。

同样，在多数人的生活中，首先关心的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社会存在，他们个人活动的经济方式及其在社会中

所占有的地位，这一切基本上决定着人们的习惯、思想和愿望，这样在每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着政治形式、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决定思想的发展方向。

但是如果只是认为思维的运动仅仅是由于经济形式发展引起的，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粗暴的解释，是机械地运用经济变化来解释人们意识的发展。问题要复杂得多。由于生产力本身的发展，经济变化是先于和超过思想和意识的变化的。

……十九世纪的发展表明，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政权刚得到巩固就出现了新的世界观：空想主义者、傅立叶派、卡贝派、圣西门派、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的社会主义思想。

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在里昂、加泰罗尼亚和西里西亚暴发了性质差不多的无产阶级起义。

在资本主义以胜利者面貌出现后和在充满生命力的资本主义全面高涨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科学地预见到资本主义要灭亡，将会建立无对抗阶级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从而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用来改造社会的战无不胜的武器交给了工人阶级。这一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的消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依靠这个理论，工人阶级不再进行盲目的斗争了，它有了目标和宗旨。

最近五十年社会发展的历史，令人信服地、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它的革命、改造的力量。

在1917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列宁和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根据当时客观存在的条件超越了他那

个时代的意识和存在方式，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人类开辟了共产主义的纪元。

在建立先进的理论方面，各个新阶级的代表不是没有任何根据，而是依据在先前的社会形态中创造的思想材料。

正是由于有这些历史背景才不能仅仅根据特定的经济关系来解释某个特定时期的思想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在批判地吸收了十九世纪在哲学、历史、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伟大研究成果并对它们加以彻底加工的基础上，作为哲学和社会思想发展的新的、更高级的阶段，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出现的。

由于存在过去时代给我们留下来的思想发展中的这些背景，共产党与反动阵营中的诽谤者所说的相反，尊重过去时代的思想遗产，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并努力吸收和发展我国旧文化中的有价值的成果，剔除一切无用的和倒退的东西。

所以，声称共产党人把社会历史发展的每个时期中使人们和人民震动和惶惑不安的一切社会、政治和精神问题都归结于经济方程式的说法是不对的，尽管象恩格斯说的那样，最终经济是决定性的。

……我们，作为西班牙共产党人，正面临刻不容缓的任务，即：领导和从思想上培养新一代，去进行将来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大规模的政治斗争，这一前景已在我国的地平线上显露出来。

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青年并不是一个“未知数”，而是一面洁净明亮的镜子，从中反映出他们生活、幻想、劳动，受苦的社会现实。如果在青年中出现恶习的苗头，那不是

他们的过错，而是他们所处的环境造成的。“入苍则苍，入黄则黄。”

有人指责青年采取怀疑主义，说青年不相信一切，不相信任何人。这种指责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在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和农民青年的活动中，在他们支持共产党的态度中，我们也证实了这种指责是错误的。除此之外，这样指责青年的人，作为了解生活的人，为解除青年的怀疑又究竟做了什么呢？

他们对青年进行欺骗、说谎。他们总是把自己打扮成青年的保护人，好为人师，表面说一套，实际做的又是另一套。

他们用其腐败堕落、厚颜无耻、野心、暴行和对受苦受难的人们漠不关心的态度，践踏青年所具有的高尚的思想感情；象一群蠢猪践踏青年的美丽心灵；使劳动青年过着受剥夺、一无所有、没有文化的生活，使他们由于贫困所迫失去家庭生活。

从本质上讲，青年是真诚、坦率的，他们慷慨、开放并且富于幻想，昨天是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

……为了使这些青年的活动更加有益，为了把他们的力量、精力和战斗力引向正确的道路和目标，要求我们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让他们不但获得西班牙的文化知识，而且还要了解我们的思想——共产主义思想，这是使人们生活具有意义，使人们认识自己的力量，对未来充满希望与信心的唯一的思想。

……如果一个共产党人，不断要求提高自己，不在努力工作和提高自己的政治修养的同时，过问文学、历史、机

械学、体育和其他一切使生活愉快、美好、庄严的东西的话，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完全的共产党人。

如果一个共产党人不关心人民和人们的各种问题，他就不是一个完全的共产党人……

工人青年、农民青年、知识青年之间在战斗中保持同志情谊和相互声援，是共产党人的一种品质，最突出的道德特点之一……

……既然在共产党人中间，用来判断政治成熟性的标准不是年龄，而是对斗争必要性的认识和准备参加斗争的决心、忠于原则和维护这些原则的坚定性，那么青年在党内占优势、感到党的吸引力，这就不奇怪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尽管那些二十年来一贯贬低青年人的思想和活动的人对此感到恼怒……

……列宁说，“在我们当中，在革命党中，青年占优势，难道不是自然的吗？我们是有前途的党，而前途是属于青年的；我们是革新者的党，青年人始终是紧跟革新者的。我们是为反对过时的腐败制度而进行忘我斗争的党，我们知道青年一贯走在忘我斗争的最前头……”

……在十九世纪西班牙政治文献中和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活动就已出现了革命道德的最初幼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初幼芽。

他们是费尔南多·加里多、西斯托·卡马拉、阿夫莱乌和比·马尔加尔，更不用说农业集体化宣传者弗洛雷斯·埃斯特拉达和其他人了，他们进行了忘我的宣传工作，为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准备了土壤，并着手筹备组织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第一国际的支部。

西班牙那些粗鲁的、没有教养的、无知的和落后的反动派，除了自私自利就没有别的知识，除了原封不动保持他们的特权地位，就没有其他准星，对一切新的思想，对任何进步的改革都采取抵制态度。他们闭眼不看历史和周围的现实，愚蠢顽固地认为，西班牙是世界上最不能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国家。

神话在继续，但生活在讥笑它们。

讥笑一切神话，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1871年，有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叫董·弗朗西斯科·西尔维拉，当时人们根本没有怀疑他同情马克思主义。但当西班牙议会里那些反动议员要求取缔参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的组织，说那个国际的理论不适合西班牙社会时，这位议员居然站起来，回答那些反动议员。他说：

“社会主义思想在我们当中是旧制度留下的遗产，旧制度已经给了它合法的地位。在西班牙的大部分村镇革命被认为是合法地恢复共产主义习惯的一种行动。这种共产主义习惯已经留在我们的血液里。这意味着自由获取市镇的财产，有时甚至获取个人财产，意味着拆除围墙，共同利用牧草场，甚至共同利用收获的庄稼。这种理解自由的方式不是来自报刊的任意宣传，也不是煽动者的宣传。而是来自根本不能磨灭的传统和回忆……”

……我们主要向青年发出呼吁。向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和学生青年以及热爱西班牙的青年发出呼吁。我们向青年提出作为前景和他们理想的目标，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建立一个自由、自主、独立和向一切进步开放的西班牙，这是我们大家梦寐以求的西班牙，使西班牙已经革新过的、更

加伟大的古老文化的光芒照遍各个大陆和各国人民。

改正错误，同铁托再次会晤

我又回到巴黎。

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梦想有朝一日能到巴黎去，在这个文化、艺术和公社的首都生活和学习。

我重新回到了巴黎。

但是，……情况怎么样呢？

参观博物馆、剧院，无忧无虑地欣赏它们建筑艺术的珍宝，连做梦也没有想过。

我的生活内容是……从会议到会议，奔波于欧洲各地。我看够了各种风景，全是一些模糊不清的风景，因为我始终是化装起来进行半秘密行动，用的证件也不是我自己的。

就这样年复一年……

奥尔特加·加塞特曾谈到生活这一实际困难，然而奥尔特加不熟悉革命者的经历。不熟悉革命者的不幸、痛苦、幻想和快乐。

这一次是1965年，我准备到南斯拉夫去。这是一次既使人愉快，又使人担心的旅程。

我们将同铁托交谈，同当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交谈；同游击队传奇式的领袖，同解放受意大利和纳粹军队侵略的南斯拉夫的领袖交谈。铁托的名声已经超越了一切国界。

我们将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南斯拉夫联邦

人民共和国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同志交谈。

人们说铁托去过西班牙，参加过国际纵队的斗争。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铁托同志曾经是来我国同我们并肩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南斯拉夫志愿军的组织者、鼓动者之一。

我是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认识铁托的。但是当时我们没有机会交谈……

现在……我怀着痛苦的心情来到南斯拉夫。

已经发生的许多事情，对我们的革命思想震动很大。

1948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把铁托的南斯拉夫开除出社会主义国际大家庭，指责它的领导人不忠实和大逆不道，后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揭露这些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是虚构出来的。

我们和我本人在文章和讲话中都以强硬的态度对南斯拉夫领导人进行过批评……

现在我们要向铁托和南斯拉夫同志解释。这是我们党的领导机构决定的。我们希望同任何人、任何事都没能征服的令人敬佩的南斯拉夫同志恢复友谊。

卡里略的妻子卡门·梅嫩德斯陪我旅行。这是我们两人乘巴黎—杜布罗夫尼克航线的飞机象母女一样进行的旅行。

我们有幸在亚得里亚海的明珠杜布罗夫尼克停留两天，也就是古罗马人时代的拉古萨，今天它已成为国际旅游中心。

接着同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南斯拉夫政府副主席兰科维奇同志一起——碰巧他与我们同机——继续乘飞机到普拉，再转乘轮船至布里俄尼岛。这个岛由于它美丽的景色和得天独厚的气候而闻名于世，岛上的居民整年都享受四季如春的气候。在布里俄尼铁托的住所里，我们同圣地亚哥·卡里略（他当时已

是我们党的总书记)，还有执行委员会委员，弗朗西斯科·罗梅罗·马林相会了，他们同我一起组成我们的代表团。

铁托来到我们住的旅馆，邀请我们乘坐他的游艇游湖，陪我们游览的还有几位其他南斯拉夫同志。

当我同南斯拉夫的领袖见面时，我急忙向他表示我对一切往事感到难过，告诉他我们在他们面前感到多么羞愧。

铁托打断我的话说：“多洛雷斯，不用伤心，不要往心里去，我非常了解当时这些事情是怎么搞的。完全了解……而且请相信我，如果当时我处于你的地位，我非常可能也会象你们一样行事……”

我们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在旅馆里，铁托同我们共进晚餐，对我们非常友好。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在餐桌上，我仍感不安（这是我的特性），又提起了原来的话题，我想向铁托再作些解释……

铁托又打断了我的话说：“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要解释。”他理解我们的情况，因为他是共产党人，知道苏联对共产党人来说代表着什么。还说，他再次同西班牙同志聚会感到非常愉快。

休息时，我们同南斯拉夫同志一起唱起了西班牙歌曲（有几个同志曾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进行过斗争），南斯拉夫歌曲和苏联歌曲。

我们两党之间的友谊恢复了。这是真诚的、兄弟般的友谊，它一直到今天还是那么深切。

此后，我对南斯拉夫又进行多次访问。

我的朋友比达·托米奇还在一次我过境的时候帮助过我。

我得到了机会同铁托、卡德尔、弗拉霍维奇和其他领导同志

就当前的一些国际问题交换看法。

铁托在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大家公认，他不仅是革命的解放者的领袖，而且还同纳赛尔、尼赫鲁、菲德尔·卡斯特罗、英迪拉·甘地一样是有重要意义的“不结盟国家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

在南斯拉夫，人们在接待我们西班牙人，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和党员时总是向我们表示兄弟般的友谊和坚定不移的支持。

我最近一次访问南斯拉夫时，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邀请我偕同我的女儿阿玛娅、我的外孙女洛利以及伊雷内·法尔孔到他在布里俄尼岛的官邸作客。我们同他一家共进午餐，这是一次不拘任何礼仪的便宴。他还陪我们游览了景色迷人的风景点，这是大自然对南斯拉夫人民的祖国的赏赐。

铁托已经作为传奇式的人物载入历史史册。

胡利安·格里莫

我们在离祖国千里迢迢的海外所经受的最痛苦的时刻是1963年4月20日的夜晚。我们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广播，抱着一线希望。

有可能营救我们亲爱的胡利安·格里莫吗？又怎么营救呢？日日夜夜我们全力以赴通过比利牛斯广播站、通过报刊动员国内外的舆论。我们向各国有影响的人士发出呼吁，要求制止对我们伟大的同志的处决。

西班牙和世界所有的共产党人、我们所有朋友和民主党人

都呼吁拯救西班牙爱国者的生命。

在马德里、巴塞罗那、阿斯图利亚斯矿区、加利西亚、塞维利亚和其他城市散发了无数的传单，介绍胡利安·格里莫的为人，呼吁采取行动保卫他。

圣地亚哥·卡里略在巴黎在法国同志的积极支持下，以及在西班牙民主派的配合下，同全党一起竭尽全力阻止西班牙当局这一罪行。在比利牛斯广播站安装了一种高级装置，一直深入到卡拉万切尔监狱，直至通到我们的胡利安的牢房。独立西班牙电台时刻广播有关格里莫生命的事件。从约翰二十三世到约翰·肯尼迪曾要求取消死刑。尼基塔·赫鲁晓夫直接给弗朗哥写信。参加营救格里莫的行动的有拉蒙·梅嫩德斯·比达尔、特奥菲洛·埃尔南德斯、哈维尔·苏维里、加西亚·莫雷诺、贝尔加明、莱恩·恩特拉戈和阿朗古伦。华金·鲁伊斯·希门尼斯走访了穆尼奥斯·格兰德斯、弗拉加、卡斯提利亚……

我从内心感到痛苦，通过广播我曾经向许多人士和朋友发表讲话，要求声援，营救格里莫的生命。

……也向您，何塞·安东尼奥^①的妹妹，皮拉尔·普里莫·德里维拉；也向你们，国民运动^②全国理事会的先生们，提出这种要求，你们曾公开表示对西班牙现状不满，难道你们要对正在策划的罪行沉默不语吗？

一个共产党人向一个长枪党人写信，不奇怪吗？是的，这不是平常的事……但是，一个人的生命正在危险之中，需

① 全名为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是西班牙1923年至1931年的独裁者。——译者

② 国民运动(1936—1961年)由弗朗哥的长枪党分子、卡洛斯派分子和右翼分子等组成。——译者

要营救。您，皮拉尔，请允许我作为您的对手说得这么随便，您会说共和党人枪杀了您的兄长。这是事实，一个痛苦的事实。但是那是战争，而且，到目前为止，反叛共和国的人又使多少人流了鲜血，使多少人遭受毁灭，使多少人披麻戴孝，给人们带来了多少灾难！

接着，我回忆了西班牙共产党坚持的一项全国和解政策，这是一项为公民和睦相处和民主开辟道路的政策，是制止发生新战争、新十字军东征的政策……

我在另一次讲话中向大家发出呼吁：

我呼吁老朋友，也呼吁在战争中曾反对过我们的人们。胡利安·格里莫的生命对我们来说是神圣的，这是因为他为人善良、情操高尚、朴实无华、富有牺牲精神。

营救胡利安·格里莫使其免于出于憎恨而判的死刑，就是使人们恢复对正义、对和睦相处的信念。

就是在建立或取消和睦相处的这些基本原则方面迈出了一步，也许是决定性的一步。

我还对我们的胡利安说了话，希望他能听见我的声音：

胡利安同志，我的兄弟！我希望我诚挚的、兄弟般的、亲切的声音能到达你在受苦、在等待的牢房，我们大家同你心连心……

胡利安好象是听到了我的话，他有一个小收音机……

罪 行

使人可怕的消息传来了，我们的胡利安·格里莫被枪杀了。

我通过独立西班牙电台说：

同志们，朋友们，暴行发生了。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同志，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的共产党人胡利安·格里莫被佛朗哥和他的部长们下令枪杀了。这一罪行完全由他们个人负责，西班牙人民决不会饶恕他们。

元首想向世界挑战，不理睬人们人道主义的呼声，人们已给他很大的面子，从世界各国给他写信，以制止这不可避免的事件的发生……

……佛朗哥政府的先生们：我们想对你们说句公道话。你们象我们原来估计的那样，都是一些十恶不赦的、背信弃义的、令人厌恶的人。我们以为，经过你们那段不幸的历史之后，在你们身上多少还会留下一点尊严和人道主义。然而，不。你们对自己是始终如一的。你们是福音书所提到的刷成白色的坟墓。而且你们只不过是发出臭气的坟墓。

牺牲了的胡利安·格里莫成了一面斗争的旗帜。他在我们中间，现在和将来都活在沿着共产主义道路，胜利的道路前进的新的一代人中间。生活无尽头，斗争亦无尽头。胡利安·格里莫是按照法西斯法律被杀害的。为了人民的事业，西班牙青年的优秀分子将跟我们走，现在和将来继续不断地加入西班牙共产党，象胡利安·格里莫和成千上万的英雄那样进行斗争。这些英雄是革命战士的典范，他们即使在斗争中倒下了，也是不可战胜的烈士。

……我们将报仇，在西班牙建立更加人道的、民主的制度。这个制度将结束挑起内战的思想，结束血腥镇压活动，在这个制度下所有的西班牙人不管其思想、信仰如何，他们的生活和自由都将得到保证。

我又说：

此时此刻，佛朗哥正在同美国人谈判为美国北极星导弹潜艇提供海军基地问题，在这次谈判中拿西班牙的安全和独立来讨价还价，在谈判桌上，佛朗哥需要向美国人表明他是一贯坚持法西斯反动立场的人，美国人以此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进行罪恶活动。

在这次营救胡利安的运动中，胡利安的妻子，我们亲爱的安赫莉塔·格里莫和她的女儿卡门和洛莉塔都表现得非常坚强。

安赫莉塔对国际宣传工具表示：

在我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之际，我想向全世界声明，我和我的两个女儿以及我的妈妈的最大的希望是胡利安·格里莫是最后一个流血的人。希望对人类来说，佛朗哥将军成为被流放的人！……

我不希望其他母亲、其他妻子和儿女再遭受我们此时此刻所遭受的痛苦。……

在西班牙驻巴黎、罗马和波恩以及其他国家首都的大使馆门前，发生了游行示威。在西班牙驻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机构门前也发生了抗议斗争。在美国，民主人士曾经组成纠察队要求尊重胡利安·格里莫的生命。

在世界一些城市里出现了以胡利安·格里莫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巴黎一个广场用这位西班牙英雄的名字命名。

在圣·安德烈斯区——西班牙城市中不知有多少区出现过这种现象——一条街上一夜之间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路标：“胡利安·格里莫街”。

我怀着自然的感情参加了一次石碑的揭幕式，在灰色的大理石底座上，镶金嵌玉，写着胡利安·格里莫的名字，安置在一

条新的白色的街道上。这是在苏联首都新建成的新野樱树区。

这个区的一名居民说：“我们一定不愧对胡利安·格里莫的名字。”

我要求迁到马德里去

胡利安·格里莫曾说过：“我将是死于弗朗哥主义的最后一个人。”

两年以后，1965年2月22日，另一名共产党人，我们的同志胡斯托·洛佩斯·德拉富恩特由于“进行地下活动”又面临被枪杀的危险。

胡斯托·洛佩斯曾在人民军里战斗过，在苏联又继续进行了反法西斯的斗争，后来又在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继续斗争。

当时我正在莫斯科。

怎么办呢？再向有影响的人士发电报，提出要求吗？对，这是要做的。但是这是不够的。

我决定我自己迁到马德里去，以见证人的身份为胡斯托·洛佩斯辩护。再也不能忍受枪杀了，在西班牙流的血太多了。

为此，我给弗朗哥政府陆军部长和外交部长分别打了电报，电文内容如下：

马德里

尊贵的陆军部长先生

梅嫩德斯·托洛萨中将：

作为1936年至1939年反对血洗西班牙的法西斯叛乱

的共和国人民抵抗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因而也是作为极为特殊的见证人，我要求允许我在目前对共产党人胡斯托·洛佩斯·德拉富恩特进行的审讯中作证，他是由于他作为保卫共和国的人民军的领袖之一所进行的军事活动而受到审讯的。

顺致敬意

西班牙共产党主席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

马德里

尊贵的外交部长马丽亚·卡斯铁利亚先生，

我已经要求陆军部长批准我在审讯共和国人民军领袖之一，共产党人胡斯托·洛佩斯·德拉富恩特的过程中作为见证人，现在我要求您批准我进入西班牙。

顺致敬意

西班牙共产党主席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

同时，我也打电话给胡斯托·洛佩斯的辩护律师董·马里亚诺·罗夫莱斯·罗梅罗·罗夫莱多，请求他提出要求让我在对他所辩护的人的审讯中作为见证人发言。

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许多外国记者和苏联记者参加，我向他们宣读了上述电报全文。

此外，我还补充了如下几句话：

我为什么这样做呢？你们知道，在12月初，在马德里审讯了几位共产党人，说他们进行了非法活动和地下宣传，他们分别被判八年到二十八年徒刑。其中之一就是胡斯

托·洛佩斯。他被判处了二十三年徒刑，现在又对他保卫共和国的活动提出新的起诉。

如果这次审讯违反法律，带有明显的复仇思想，而不是公正的思想，结果导致行刑队的行动（只要回忆一下胡利安·格里莫的痛苦遭遇就够了），那我就要作为见证人参加这次审讯，为胡斯托·洛佩斯·德拉富恩特和所有为共和国奋斗过的人开脱。

而且在这方面，我毫不动摇，准备为人民捍卫共和国的合法政权的抵抗运动承担一切责任，我是积极参加了这个政权并以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的身份进行过鼓动工作。我确信，面对今天仍把持着摇摇欲坠的政权，利用它的合法外衣来掩盖自己的屠戮生灵、侵犯人权和尊严最可憎的行动的人们，历史将会为我们申张正义。

我要求诸位向你们各自国家的公众报道正在准备对胡斯托·洛佩斯进行新的、骇人听闻的审讯，帮助我们营救他，结束这种屠戮生灵的时代，佛朗哥的司法机构想方设法要使这种时代永久化，以为这样就可以用恐怖来制止或阻止在西班牙已经开始的不可避免的变革。

佛朗哥政府的回答令人难以置信地迅速。看到热情之花可能要亲临马德里为遭死亡威胁的共产党人辩护时，第一军区司令马里亚诺·阿隆索·阿隆索，2月26日决定彻底停止审理胡斯托·洛佩斯同志的案件。

我经受这么多天的痛苦，简直都难以相信此事——我向报界发表声明说——，我们向各方打听。大家都向我们证实了这条消息。我们又是想哭又是想笑。我们已经被判为二十三年徒刑的同志将不交由军事法庭判决，不会被判处

死刑了。正义胜利了。在复仇思想面前人之常情战胜了憎恨。

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在我拯救了一位忠诚的同志、纯朴的同志、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战士的生命的时刻，我想向所有曾经为营救我们这位受死亡威胁的同志而出过力的人，表示我们深深的感谢。向曾经为保卫胡斯托·洛佩斯的生命而积极进行活动的律师们，向曾经每日揭露这次新的审讯是极端不公正的国际新闻界，向世界各国政界、宗教界人士，向工人组织、民主组织和各种政治机构表示深深的感谢。向第一军区司令致以特别的敬意，他作出了这个正确的、合乎人之常情的决定。这是合乎法律的、顺应西班牙人民希望我国不再流血的崇高愿望的，他使人们对公正、对西班牙人之间和睦相处的未来，重新燃起希望。

我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最深切的感谢。

我们甚至接到来自太空的声援。比利牛斯广播站对此作了报道说：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呼吁得到了巨大反响。当时四面八方的声援纷至沓来，其中最突出的（因为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人类第一个进入宇宙空间的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的声援。

加加林拜访了门德索纳，并为比利牛斯广播站录了下面一段讲话：

我们宇宙飞行员义愤填膺，同全世界成千上万人共同抗议。释放胡斯托·洛佩斯！给胡斯托·洛佩斯以自由！

我祝愿西班牙人民尽早获得自由和幸福。祝西班牙的进步力量和战士在争取西班牙人民的权利、自由和民主的

神圣斗争中取得丰硕的成果。

胡斯托·洛佩斯同志后来在狱中逝世，死于癌症。他和许多其他同志和朋友一样，是死于酷刑和折磨。

在西班牙争取自由的道路上，处处都有我们同志的坟墓，处处都保留着对烈士不可磨灭的记忆。

他们的名字永垂不朽。

名 誉 博 士

我是来自人民的一名普通妇女。我进过的大学是巴斯克和“革命”^①的阿斯图利亚斯的矿工斗争，是在抵抗法西斯的各条战线上的战斗，是共产党人几十年地下斗争的英雄行为。1961年11月10日，我进入莫斯科大学的礼堂，宣读了论文。我被授予这个著名的文化中心的名誉博士学位。

罗蒙诺索夫大学校长、科学院院士伊万·彼得罗夫斯基先在讲台上用热情洋溢的语言介绍了我的生平履历和我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校长说：

考虑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同志在发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发挥了杰出的作用，莫斯科大学校务委员会根据历史系的教授们的建议，一致选举多洛雷斯·伊巴露丽为莫斯科大学历史学名誉博士。

历史系主任伊万·费多索夫及其他教授和学生都向我表示

① 指1934年10月阿斯图利亚斯工人武装起义。起义者曾在许多城市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译者

祝贺。

那天下午，礼堂里在座的有各种各样的人。除了大学的领导、数百名学生（凡是这样隆重的集会，他们是一定要参加的）外，还有西班牙人民的苏联朋友和同情者，还有许多在苏联的西班牙侨民。我的讲话是这样开始的：

我深深感谢大家给我这样的荣誉，授予我以俄罗斯伟大学者罗蒙诺索夫这一光荣名字命名的、在其历史上出现过蜚声全球的人物的莫斯科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请允许我在接受这个荣誉时，把这件事看成你们对西班牙人民的兄弟般的支持的体现，西班牙人民是第一个拿起武器抵抗文明的敌人法西斯，为这场持续了将近三年的斗争献出了一百多万人的生命。

我接受这个名誉学位，把它视为对我国工人阶级的敬意，在他们的队伍中，我成长为一个共产党人。

我接受这个名誉学位，把它视为对我国的农民、妇女、劳动青年的敬意，他们如果只有初级文化，这不是他们的过错，但是他们在祖国多事的历史的各个阶段用自己的血和生命写下了光荣的、英雄的不朽篇章。

这些日子里，正在纪念马德里保卫战二十五周年，这是西班牙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最光荣的事件之一，它表明我国男男女女的高度政治觉悟和爱国主义的、历史的责任感，他们宁愿在争取生存和自由的斗争中壮烈死去，也不愿在法西斯侵略者面前可耻地屈膝求生。

西班牙人民以自己的英勇抵抗表明，在西班牙的当政者有预谋地、背信弃义地向准备侵略欧洲的希特勒投降的时刻，还是有可能制止和阻止法西斯进攻的。

那些容忍希特勒扩张主义，以及从进行宗教改革的时代以来就发号施令，把自己铁的法律强加于各国人民的强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世界上以歪曲方式和憎恨的态度介绍我国1936年以前的历史，把西班牙人民说成是落后的、狂热的人民，把西班牙说成是一个反动的堡垒，用法国历史学家基佐的说法来断定，在解释、编写和阐述文明史的时候，可以根本不提西班牙。

只有极不负责任的人才会如此蔑视历史真相，如此蔑视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它同罗马侵略者斗争了二百年，同阿拉伯统治斗争了近八个世纪，同时吸收了阿拉伯人的文化，又把它传给了西欧，再用新的因素恢复了拉丁文化。它是第一个编纂包含审判法的总法规汇编的国家，第一个通过代表会议和议会为现代议会制度奠定基础的国家；它发现了美洲，为世界贸易和资本主义发展打下了新的基础。

在文学方面，西班牙曾经历过一个黄金世纪，出现了杰出的作家，塞万提斯、洛佩·德维加、克维多、卡尔德隆，他们的名字永垂不朽。

在绘画方面，西班牙为世界提供了贝拉斯克斯、穆里略、格雷科、里维拉和戈雅他们创造的绝妙的现实主义艺术。

西班牙出现过象比维斯和瓦尔特、路易斯·德莱昂修道士和制定西印度群岛法律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这样一些杰出的人文学者，还出现了象发现血液循环的米格尔·塞尔维特这样著名的生理学家，以及其他一些在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放射着自己光芒的学者。

西班牙最进步的历史学家起来反对西班牙的对手虚构

出来的、有倾向性的、被歪曲了的历史，虽然由于他们拒绝用辩证的、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历史问题，而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本质。

所以，在西班牙历史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仍然是作为未知数提出来，不知其根源，或是把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原因都归结于人性，或归于国王、高级将领、宠臣或亲信的影响，轻视或不了解生产力发展具有革命的、改造社会的重要意义，拒绝承认每个国家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是该国家的历史的主要基础。

西班牙共产党经常性的一项工作就是依据我国真正的历史，依据对生产力的认识和对在各国人民政治和经济改造和变革中起作用的规律的认识，使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有许多理由使人钦佩的人民——认识自己的力量。各国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改造和变革将使人类走向共产主义。

我们在和平时期用笔杆子和语言，在战争时期用枪杆子进行的活动都是朝这一方向发展的。

我们不必假意谦虚，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在水上耕耘，我们的工作不是徒劳的。

有人常常指责我们把党派的、阶级的因素带到哲学和历史中去了。

这是事实，而且也不能有别的办法。世界上不存在中立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编写的历史，即使最好的历史也是渗进党派偏见。不但总是吹捧上层领导人，而且还自觉不自觉地歪曲历史真相，完全贬低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群

众。

我们写历史的党派观点与这相反，总是力求恢复客观真相，并认为人的劳动、群众的行动和阶级斗争在各国人民的社会发展中和人类的社会历史中是头等重要的因素。

我结束我的讲话时说：

我们要为帮助我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而活着，这一斗争将结束佛朗哥将军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把民主的西班牙、社会主义的西班牙建立在人民和民族意志这一钢铁般坚实的基础上。

同志们，朋友们，再次表示非常感谢。

列宁勋章和国际和平奖金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我列宁勋章，对我这个共产党人来说，这是最高的奖赏。

我在莫斯科获得的国际和平奖也是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那次授奖仪式是在克里姆林宫最华丽的一个大厅举行的，参加的有苏联著名人士和侨居苏联的西班牙同志，他们都是来向我表示祝贺的。

国际和平奖金质奖章是为使和平战胜法西斯侵略势力而作出了最大牺牲的这个国家颁发的，它授予那些在不同的国家，在政治、科学、创作方面对保卫和平事业贡献最突出的男男女女。比如据我现在回忆起来的有，我的伟大同胞巴勃罗·毕加索、拉斐尔·阿尔维蒂，还有学者、政治家、政治领袖、诗人、艺术家，如

费德里科·约里奥-居里、彼特罗·南尼、保罗·罗伯逊、巴勃罗·聂鲁达、贝尔托尔特、尼古拉斯·纪廉、路易斯·阿拉贡、菲德尔·卡斯特罗、拉萨罗·卡德纳斯和其他许多著名人士。能跻身于他们之中，真是无尚光荣。

打破礼仪

追怀往事，千头万绪一起涌上心头，难免有点不连贯。不过不能要求我们的脑子严格按时间顺序回忆。

我曾应邀参加一次纪念活动（日期回忆不起来了），是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圣·乔治大厅举行的。

来自世界各大洲如此众多的人士聚集在那里，以及这个著名大厅美丽的建筑给我们（当时伊雷内也应邀出席）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一直对参加这样的活动感到畏惧，虽然出于工作需要，我又不得不参加许多这样的活动，但是长期以来我对军服、礼服和一切华而不实的礼仪一直感到不习惯。

我的目光扫视着周围的人，盼望能见到熟人，终于我们向一位老朋友走去，我们曾同她在共产国际同事一段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物的变迁，她此时已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的夫人。

我们同她热烈地交谈了起来，回忆着往事，没有怎么注意纪念活动的进展情况。

我们突然看到苏联政府首脑，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尼基塔·

赫鲁晓夫在各种人物的簇拥下朝我们这边走来。我们互相以惊奇的眼光看了一下四周，发现我们是在外交使团区。我们只好尽量不引人注目地留在原地，我们那位德国大使馆的朋友一直陪着我们。

尼基塔·赫鲁晓夫一边往前走动，一边向各国外交代表致意。

他突然发现了我们，并以他所特有的那种来自民间的使人陶醉的自然风度，向我们这边走来，一边高声说：“西班牙真正的代表在这里呢。”这句话理所当然使在场的诸位大使感到惊讶，也使气氛大为活跃。

苏联还没有同西班牙建立外交关系。

他们没有告诉我一声，就打破了一切礼仪的惯例。

第一次分歧

我是在罗马第一次比较近地见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当时他率领苏联代表团参加帕米罗·陶里亚蒂的葬礼。

勃列日涅夫当时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因为我过去只在电视或报刊上看见过他的脸，我真没想到他那双湛蓝色的眼睛，同他那黝黑的脸庞形成如此鲜明的对照。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苏联不仅以国务活动家，而且也以苏联人民反对希特勒侵略的抵抗战士而闻名。后来，他以他为保卫和平所发表的历次谈话而出名。

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人们可以同他讨论任何政治问题或

人的问题。

我不禁想起，196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疗养地卡罗维发利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会议期间，卡里略和我同他进行的一次会谈。

西班牙代表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由门德索纳和阿斯卡拉特同志组成的。我们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经过热烈的讨论决定在政治决议中加了一段文字，谴责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法西斯反动独裁统治，声援和支持欧洲各国共产党以及西班牙工人力量和民主力量的斗争。

要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协议，那不是容易的。我认为这是自然的，因为执政的共产党和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或正在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共产党之间对某些不同性质问题的看法是不同的。

我们希望这个决议尽快公布，这显然是可以理解的。集中在卡罗维发利的新闻界都焦急地在等待着它发表。但是，还是按照老习惯，这类文件首先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报刊公开发表，这就意味着还要等好几个小时……

我们和其他代表团都发表意见说：打破那种有害无益的传统，向报界、电台和电视台通报我们国际会议的情况，将会对大家都有利。

由于我们的意见没有被接受，卡里略和我在中间休息时，走近勃列日涅夫并向他建议说，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立即通过电台广播该文件，以此来保全了当时仍在实行的出名的“优先地位”。

我记得当时勃列日涅夫注意地听取了我们的意见，点头表示同意，又同哥穆尔卡和另一个首脑商量的之后，答应当天下午把文件文本交给记者。

在这次会议上，我在发言中强调指出：

今天在我们的运动中谁也不会想象和允许别人可以采取干涉每个党在制订自己政策时的独立性的方法和做法……

……真正的独立性现在表现为每个党的内部反对狭隘的宗派主义，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限制在脱离实际，与实际毫无关系的一系列僵死的框框之内的斗争，表现为深入研究这一实际，以动员群众的形式建设性地实现我们的理论。

的确，在卡罗维发利会议上（与类似性质的另外几次会议上一样），后来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同志起了重要作用，他当时同鲍里斯·波诺马廖夫一起领导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的工作。

我曾有机会在几次会议上，或是在苏联的纪念性集会上，在国际会议或双边会晤中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会谈。

1968年8月，我们同苏联领导人的关系出现了痛苦时刻。其原因是华沙条约国的一些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事实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党领导机构的主张也是众所周知的。

圣地亚哥·卡里略、西蒙·桑切斯·蒙特罗、伊格纳西奥·加里戈、弗朗西斯科·罗梅罗·马林和我当时同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同志进行讨论，我们向他们表示深切忧虑和不同意这种做法。

这是我们第一次向苏联共产党的同志们表述我们的严重分歧。

我很尊敬苏斯洛夫同志，因为我同他共事多年，对鲍里斯·波诺马廖夫，也是这样。我们两党的兄弟般友谊是众所周知的，是有历史意义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最真诚的、最可信赖的做法是说真话，是我们怎么想就怎么说。

虽然这样做是令人痛苦的。

同西班牙联系的桥梁

我一直非常喜欢莫斯科的冬天。大雪覆盖着整个城市，象是洁白动人的地毯。我是巴斯克人，所以不怕寒冷，在苏联首都郊区林中洁白柔和的雪毯上散步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

正是这样一个冰天雪地的晴天，近三十个西班牙人在莫斯科降落。他们不是侨民，而是从西班牙专程赶来的。是以代表团的资格来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

我感到非常高兴。这么多的朋友！我们心心相印，非常亲切，因为他们从西班牙来到莫斯科为争取和平而斗争。

我们大家相互拥抱。我认识的人有卡洛斯国王的公主玛丽亚·特雷莎和塞西利亚·博尔冯·帕尔马、法学家托马斯·拉卡列和两位卡洛斯派的青年；画家赫诺维斯和阿雷尼利亚斯、作家阿拉瓦尔；律师海梅·萨托里乌斯和埃米莉亚·格拉尼亚、特奥杜尔福·拉古纳罗、米格尔·霍尔塔。我拥抱了我的同志胡安·安东尼奥·巴尔丹和阿曼多·洛佩斯·萨利纳斯……还有许多我现在记不起名字的人。

人数众多的西班牙代表团在那次重要会议上引起了与会者的注目。

当开始放萨尔瓦多·阿连德在莫内达宫录制的录音胶带

时，西班牙代表团成员全体肃立，齐声喊道：“心里感到，阿连德和我们在一起”，随即数百名代表齐声重复。

我几次到我的朋友们下榻的罗西亚旅馆去同他们共进午餐。我们还邀请他们到我家作客，进行友好的交谈。阿拉瓦尔把他写的作品《给佛朗西斯科·佛朗哥的信》送给我。玛丽亚·特雷莎和塞西利亚是和平、进步事业的热情保卫者，她们俩聪慧、朴实，博得了大家对她们的好感。不久之后，一天下午玛丽亚·特雷莎路过莫斯科时，还同巴尔丹一起来看过我，我们一起在厨房里做过西班牙土豆鸡蛋饼，共进晚餐。

每次从西班牙来的朋友来看我时，我都感到非常满意，我们感到在我的国家和我们流亡在国外的人之间已架起了一座桥梁，我热切希望很快就能走过这座桥梁。

我还记得安东尼奥·门查卡·卡雷亚加看望我的情况。他是我的同乡、海员和作家，是何塞·玛丽亚·德阿雷尔萨的侄子。我很高兴地接待过菲萨克建筑师和他可爱的妻子。他的妻子竟然有胆量在西班牙撰写和发表关于我个人和我外孙女小洛拉的文章。我还荣幸地在我家接待了孔普卢屯大学的前校长卡洛斯·布斯特洛和早就想见我的他的妻子，还有卡洛斯·卡斯提利亚·德尔皮诺和恩卡纳、维森特·罗霍、穆尼奥斯·苏亚伊……我会见了行星出版社社长何塞·曼奴埃尔·拉腊·埃尔南德斯，就是他建议我写这本书的……当时，佛朗哥还在帕尔多宫，我感到在西班牙出我的书是无法实现的事情。

到苏联演出的西班牙的艺术家也常来看我，他们是：著名舞蹈演员安东尼奥、舞蹈名星玛丽亚·罗莎、歌唱家米歇尔……安东尼奥·加德斯、萨拉·蒙铁尔、马西埃尔等人每次演出，我必去观看；旅居莫斯科的数百名西班牙人也是这样。我国的艺术

家们在苏联观众中所取得的成绩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同拉斐尔·阿尔维蒂会见

对我来说，拉斐尔·阿尔维蒂和巴勃罗·聂鲁达每次到我家来作客都是一次家庆。我出席过授予拉斐尔列宁和平奖的仪式，这是西班牙—苏联友好关系和评价我国伟大诗人的关键时刻。

党的领导机构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同志圣地亚哥·卡里略、伊格纳西奥·加列戈、海梅·巴列斯特罗斯、桑切斯·蒙特罗、因关索、毛里西奥、拉蒙·塔马梅斯，常来同我谈话，并向侨居国外的西班牙人通报情况。刚出狱的一位阿斯图里亚斯青年有一天突然来向我问候，他叫赫拉尔多·伊格莱西亚斯。他对我说他有一个小孩，说他给儿子取了一个和我儿子一样的名字——鲁文。

我们在西班牙活动中心就西班牙的政治、文化问题举行了报告会、讨论会和圆桌会议。

其中一次专题报告是专门纪念学者、组织学家董·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的。帕拉内列斯和翁布拉多斯两位大夫，还有卡哈尔生前秘书恩里克塔·列维·罗德里格斯，都就卡哈尔的科学著作发了言。

在我们的活动中心为西班牙侨民举办了一次巴勃罗·毕加索画展，取得了巨大成绩。我的同志们如毕加索的朋友和理发师阿里亚斯，都曾送过我天才画家的极好的复制品，我把它们都

陈列在活动中心的画展上。伊利娅·爱伦堡借给我们几张原画，其中有一张是毕加索给他画的肖像。

不知怎么的，我们举办画展的消息一下子就在莫斯科传开了。我们活动中心对面的日丹诺夫大街，排成了长队，在街区绕了一圈。不得不对进展览室的观众人数进行限制，这幢房子并不是为展览用的，人多了会有倒塌的危险。我们的画展的鼓动者是克拉拉·桑查，她是画家桑查的女儿，阿尔维托·桑切斯的妻子。

难舍难分的告别

我们的英雄和烈士中，有些人的名字是大家熟悉的，而另外一些人，这是绝大多数，则是无名氏。他们的名字组成了一幅珍贵的巨大画卷。在争取自由的漫长的斗争征途上我们留下了多少亲人的坟墓！

有共和国空军司令，著名的骑士，善于为劳动者的事业而斗争的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将军。有职业军人，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同志安东尼奥·科尔东将军……

当我乘飞机去同我最亲密的一位战友胡安·莫德斯托遗体告别时，痛苦的感情涌上心头。胡安·莫德斯托是工人又是将军，他是靠勇敢、靠学习、靠为争取祖国人民的自由而献身的精神获得这个称号的。

我在他的墓前说：

今天，我们沉痛地聚集在这里，最后一次向我们的同志和朋友胡安·莫德斯托·吉略托致敬，他是我们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英雄之一，是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西班牙共和国人民军第一位将军。

如果说作为英雄的、富于牺牲精神的、精明的和有才干的战士莫德斯托同志的功绩是巨大的话，那么作为共产党人他的功绩也不小。他的一生渗透着为党为人民尽义务的精神。共产党永远可以信赖他，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他都是共产党最可靠的中流砥柱之一。

莫德斯托的名字是与我国内战所有的最重要的战役联系在一起，如纳瓦塞拉塔、索莫西埃拉、阿尔多雷翁、培格里诺斯、塔拉韦拉等战役，马德里保卫战，以及哈拉马、瓜达拉哈拉、布鲁纳特、贝尔切特、特鲁埃尔、阿拉贡、帕索德埃布罗、加泰罗尼亚等战役。

作为共产党人、作为人民军的战士我们的同志胡安·莫德斯托的生活和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已成为我们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假发和眼镜

我们党准备在法国某一地方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那时我正在罗马尼亚，在比利牛斯广播站工作。我必须作些准备，以便穿越国境，又不被人认出来。我自己动手做了一件浅色衣服。

为了陪我进行秘密旅行，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精明、热情的莱昂诺尔·博尔娜奥专程从巴黎赶来。几年前，我就认识她了，当时她很年轻，同我女儿阿玛娅一起参加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在法国各个省组织的宣传运动。

莱昂诺尔来到布加勒斯特，给我带来一个假发和一顶帽子。人们帮助我尽可能装扮得好些。

我的一位罗马尼亚女友吉塞拉·巴斯早就委托了几位熟练的裁缝快速缝制了一套咖啡色的漂亮外衣和一件风雨衣。据他们对我说，裁缝师傅们一直忙到深夜才在次日清晨我出发前准时为我赶制出这些衣服。

我穿上衣服、高跟鞋，带上假发、眼镜、和帽子……

不行，这次秘密活动的规定不能要求我把形象改变得如此彻底……

不行，不行，……我连忙脱掉所有这些做得绝好的装饰，穿上我自己赶制足以能迷惑人一阵子的衣服。

外形奇特的假发、小礼帽和黑色眼镜把我打扮成令人敬重的美国旅游者。

我一再请好心的罗马尼亚同志原谅我。然后，同莱昂诺尔·博尔娜奥一起上了飞机，她是冒充我的女儿和我同行的。

我必须承认，我对我的装扮实在受不了。但是没有其他办法，只得这样。我们正处于冷战时期。法国当局早在1950年就把数百名西班牙人驱逐出境，其中许多人过去曾经是抵抗战士。还有一些人被迫又转入地下。在西班牙国外，流亡也须转入地下了。

旅途上，我们一路平安。谁也没有太注意我们。

当我接近法国，就脱掉小帽子。莱昂诺尔吓得脸色煞白，她

怕我的假发会掉下来。

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在头上扎了一条头巾。当我们通过护照检查后，一坐上汽车，我连忙拽掉我的假发，塞进口袋里，……我这才深深地喘了口气。

毫无疑问，我干戴假发这类事要比圣地亚哥·卡里略笨拙得多。

当我穿上我自己往常的深色服装，又感到自在了。我们动身到开会的地方去，走了好几公里之后，转入偏僻的道路，来到一座有玻璃门的别墅。

我对这次会议兴趣极大，因为我将会亲自认识许多来自西班牙的同志，他们都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他们的名字由于斗争和工作的关系，我早已很熟悉了。

我进入一个大厅，在场的人立即动了起来，其场面真令人难忘。我第一次见到的有年轻同志，有我多年未见过面的老同志，他们的面孔和眼光都使我回忆起往年的战斗。大家都向我致以亲切的问候。在那样的秘密会议上严禁鼓掌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大家无法抑制地动了起来，大家都顾不得那么谨慎，都激动得挥起双手相互鼓掌，但几乎未出声。大家都为这次我们亲密的会面而兴高采烈。

很快就平静下来，会议正常进行，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卡里略在那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已被收在他的重要著作《佛朗哥之后，会发生什么？》一书中。

关于我们党建立四十五周年，我作了一些解释。

不适时宜的相遇

我们在巴黎不得不过着地下生活，这对我这种性格的人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事。我习惯于在群众中进行公开工作。不上街的隐居生活，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在房间内开会，我感到非常难受，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在冷战方酣的时刻，当局不允许我在法国合法留住。

为了缓和一下我这种隐居式的生活，有一次法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乔治·戈斯纳，打破秘密活动的惯例，邀请我们到巴黎郊区一家相当阔气的饭馆去吃饭。不用说，我们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

我们几个人：乔治·戈斯纳同志和他的夫人、圣地亚哥·卡里略和他的夫人卡门·梅嫩德斯、伊雷内·法尔孔和我围着一张摆设得很好的桌子坐了下来，大家都很高兴，享受这小小聚会的快乐。可是正在这时，啊，意外的事发生了！我们看到一个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人走进了饭馆。他就是安德烈·马尔罗，当时法国政府的文化部长。他在靠我们旁边的一张桌子入座，对面坐着一位青年，无疑是在等他的。

我们大家都惊呆了。

要迅速作出决定。

是悄悄离开这里，放弃那次愉快的聚会，还是留下来，继续安心吃饭呢？

马尔罗确实是部长，但同时是我们的伟大朋友，在反对法西

斯叛乱的战争中他作为自愿军战士站在我们这一边。走过去向他问候和邀请他到我们桌上用餐，对我们来说本来是件快事。但是周围环境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我们决定相信安德烈·马尔罗的人道主义和友谊。

不知道是马尔罗看见了我们而假装没有看见，还是甚至没有发现我们，事实是他很快吃完饭，就走出饭馆。很幸运，部长们总是匆匆忙忙的。

我们松了一口气，那一天我们享受了双重“自由”。

我想提醒一下，那个饭馆叫红公鸡。

那天下午，我总是想着那些感到有必要同他们描写的人物并肩战斗，而不满足于仅仅描写他们的作家和艺术家。

英国诗人拜伦就是这样做了，两个世纪以前他就站在为自己的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希腊人那边同他们并肩斗争，并死在那里。

支持我国人民，并在我国土地上牺牲的匈牙利人佐尔考·马泰，英国人拉尔夫·福克斯和费利西亚·布朗，法国人路易·德拉普雷，古巴人巴勃罗·德拉托连特，我们的埃米利亚诺·巴拉尔都是这样做的。

同我们并肩战斗的还有马尔罗和海明威，路德维格·雷恩、古斯塔夫·雷格勒、埃里希·魏纳特、威利·布雷德尔、厄恩斯特·布什、米哈伊尔·科尔佐夫、卡门·奥·萨维奇、史蒂夫·纳尔逊、阿尔瓦·贝西；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还有路易·阿拉贡、伊利娅·爱伦堡、保罗·罗伯逊和全世界上百名知识分子，如巴尔斯基和诺尔曼·白求恩。有朝一日所有这些人的名字将在记载着为反对不公正，争取自由的斗争提供支持和友谊的历史上大放光芒。世界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站在我们这一边。

德国反法西斯作家恩斯特·特勒尔，《欣克曼悲剧》的作者在纽约为西班牙共和派人士组织募捐。得知佛朗哥获胜后，他就在旅馆房间里自缢而死。他的朋友埃尔温·皮斯卡托尔写道，特勒尔在欧洲沦陷后忍受不了不公正和“反对一切正义”的活动。

到千岛群岛去？

我们不得不继续过地下生活，住到巴黎郊区谢勒的一幢房子里，它和普普通通的小街两旁的其他房子没有什么两样。这座住宅有一个小花园。但是我只能在这个小花园的一个小小的三角地带散步，这里能避开邻居好奇的视线。上街只能坐小汽车，而且次数也很少。在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的法国，过这种隐居式的生活，渐渐地使我感到这倒更象是软禁。

情况并没有好转的倾向，而是相反。

一天下午——我想是1958年6月1日——陪我们的几位法共同志告诉我们戴高乐发动了政变，法西斯性质的政变！

我和伊雷内上了楼，回到我的房间里，我们熄灭了灯通过窗户观察着，看出了什么事。

发生了什么事呢？

又是一次法西斯政变吗？

难道出之类的东西要跟踪我们一辈子吗？

戴高乐是法西斯吗？这不会是言过其实吗？

我们这样低声谈论着我们的想法。从外面传来了《出征歌》^① (Le chant du départ) 的乐曲。原来是一个乐队带领着游行队伍向郊区的这个住宅区里的纪念广场走去。然后，他们在这个爱国主义广场四周停了下来。我们听到他们又是唤万岁，又是唱歌曲。

这是怎么回事呢？在黑暗里，我们感到好象种种不祥之兆向我们袭来。我们要在流亡中再来一次流亡吗？

我们的处境已经很困难，有时都无法容忍。但是如果在法国建立法西斯政权，我们的处境将会怎样呢？

我们回想起难以忘怀的佩德罗·切卡同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笑眯眯地说，说不定我们还得到千岛群岛去。

很快，熟知情况的同志来了。原来这不是法西斯政变，但确实是一次政变。戴高乐将军开辟了一个新的政治时期，实行他“个人专权”……

一个坏脾气的丈夫

蒙特勒伊是西班牙人难忘的巴黎市区之一。它的名字是与我们党的会议和群众集会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些活动中法国共产党人始终非常热情友好。

1971年6月，我们筹备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要在会上阐明我们的政策。

^①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歌曲。——译者

当时我在布加勒斯特，始终在比利牛斯广播站，它的电波使我每天同西班牙保持着联系。法国当局仍顽固拒绝我合法进入法国，这使我不得不采取各式各样的办法越过法国的边境。我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完全由于我们专家同志的聪明才智。在这方面，我要特别提到艺术大师和技术专家多明戈·马拉贡同志的艺术和技艺，由于他精心工作，我们许多西班牙共产党人才多少次得以顺利穿越国境线。首先是过西班牙的国境。

这次，多明戈本人负责使我能够进入巴黎。我同他在靠近意大利边界的南斯拉夫的卢布尔雅那会面。但是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不多也不少带了一个法国“丈夫”，他身材高，同我的身材相匹配。在文件上注明我是这位先生的“妻子”，以这个身份，我就容易进入法国。

这是我们的想法……

另外还有几个同志陪我们，分乘四辆车。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可怕的暴雨，使我们在的里雅斯特—米兰高速公路上受阻，有一辆车还发生了故障。

顶有意思的是大雨给我的“丈夫”扫了兴，要么可能是我不中他的意。这位“monsieur”（先生）的情绪确实是令人难以忍受。

到热那亚后，我们停下来吃点东西。我，象往常一样，留在车子里。我的“丈夫”上了大街，象变魔术一样，一会儿就无影无踪了。他不想见我们了。多明戈和他的同志们在那个结构复杂的城市里找遍了每个难以想象的角落，最后，终于找到了这个逃跑者。他说，“non, monsieur（不，先生），我不想干了。”多明戈以他那特有的态度制服了这个造反的“丈夫”，他们又把他拉上了我的车。我也只得继续忍受一直到越过法国国境。当我们同他分手时，我们大家才大大松了一口气！“Merci, monsieur”（谢

谢,先生。)”“Au revoir, madame” (再见,夫人。)”“丈夫”冒险行动,不管怎么说,算是顺利结束了。

我们于清晨四点钟到达尼斯,原来计划是头天夜里十点钟到。这是由于任性的monsieur(先生)的过错。但是我们西班牙同志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着我们,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

青年手臂和红旗

他们把我带到奥贝维利埃,这又是一个对西班牙人热情好客的巴黎市区。那天晚上—对夫妇——法国同志,也是我们的朋友把我们安置在他们家过夜。在独裁统治的年月,他们是我们的支柱,联络员,给了我们无私的援助,他们那种慷慨精神,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那是一个漫长的、不平静的夜晚。睡觉连想都没想过。次日上午,我还要在大规模群众集会上讲话呢。在发表讲话的前夕,我总是过得很不好。我拿着几天前就准备好的讲稿,又念了起来……这稿子,我一点也不喜欢,根本不喜欢。

因为睡不着,我就动手修改讲稿,把写好的东西,重新进行整理。就这样,不知不觉,从头到尾把它改得面目全非。

第二天早晨,同志们来找我时,麻烦事发生了。我把那个涂改很乱的稿子交给了他们,大家都惊讶地看着我,大会前怎么来得及抄清呢?

我不得不再次向同志们表示感谢和钦佩,他们设法正好在

轮到我讲话之前把一份抄清了的稿子交给了我。请不要忘记我们是处于非法状态。

圣地亚哥三年前就用假名,我记得叫吉斯卡,他不得不同他的家属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许多同志的情况都是这样。

我们受到五万名听众的保护,可以在蒙特勒伊公园自由讲话。

这是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表示兄弟般援助的大型集会。法国共产党开展支持西班牙人民斗争的声援周,开展募捐运动,带头的有乔治·马歇、艾蒂安·法戎、雅克·杜克洛、伯努瓦·弗拉商、马德莱娜·樊尚、路易·阿拉贡、罗朗·法瓦罗、罗尔-唐居伊、玛丽-克洛德·瓦扬-古久里、约埃·诺尔芒和夏尔·勒德尔芒。

大会收到了关在卡拉万切尔、卡的斯、塞哥维亚、托雷罗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和已经出狱的共产党人对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问候。

大会开幕时,艾蒂安·法戎宣读了从罗马发来的热情的贺电,在贺电中路易吉·隆哥重申意大利共产党无保留地支持西班牙共产党和西班牙人民的斗争。

杜克洛同志以他那种在讲话中表现出来的热情对我们说:

我们和你们在一起!千百万的法国男男女女向你们伸出友谊之手,与你们同甘共苦!

圣地亚哥·卡里略发表了很出色的讲话,结束时宣布了一项民主解决西班牙问题的纲领:

建立一个广泛联合的民主政府。

大赦政治犯和政治流亡者。毫无例外地恢复西班牙所有政党和一切倾向的政治自由。

举行立宪议会的选举，决定西班牙未来的制度。

我在讲话中感谢法国共产党和法国人民对我们的长期的兄弟般的声援：

在为声援正处在争取西班牙恢复民主的斗争中的我国人民而举行的这一感人的大会上，向你们表示衷心谢意时，我抑制不住激动的回忆。

三十五年了，整整一生哪！1936年夏天我来到这里，巴黎，这个大革命的巴黎、公社的巴黎，大规模工人斗争和民主的巴黎。当时，我是来要求帮助、声援西班牙共和国，当时共和国正受到法西斯罪恶叛乱的折磨。

法国人民、进步知识分子，特别是法国工人阶级对我们战士的紧急呼吁作出了使人难忘的积极响应，我们的战士决心誓死保卫共和国。

法国各地组织了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援助，同时又组织了大规模的人民示威要求当时的法国执政者给西班牙提供飞机和大炮。

就是在这里，在这个历来有支持各国人民争取自由斗争传统的法国，组织了最初的几支志愿军纵队，奔赴西班牙在共和国的战壕里参加了斗争。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1936年的这一场激动人心的声援西班牙人民的运动的发起者就是我们伟大的、难以忘怀的同志和朋友莫里斯·多列士领导下的法国共产党。

后来，希特勒侵略的黑暗日子降临法国时，刚搁下武器的西班牙人又英勇地参加了法国的抵抗运动，西班牙人已经知道法西斯对各国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法国的一些城镇，法国和西班牙战友情同手足，共入

土穴，它们是我们两国人民在争取自由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结成的生死与共的兄弟情谊感人的证明。

今天又是我们法国同志领导着对我国人民的声援运动，西班牙人民在反对昨天胜利者的长期而艰巨的斗争中必然不断瓦解佛朗哥将军的血腥的罪恶的独裁统治。

我们聚会在一起，不是象耶路撒冷的儿女那样由于我们长期流亡而哭泣，也不是要再去点燃杀兄之仇的灰烬，也不是要把我们死难同志的血衣当作斗争的旗帜高举起来。

我们象共产党人往常一样聚会在一起，谈生活、谈斗争、谈我们的希望和理想、谈我们对祖国光辉前景的信心……

青年富有战斗精神，是属于新一代，我们动员他们和我们一起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时，我们并不向他们提供清闲职务和肥缺。

我们的科尔多瓦哲学家塞内卡也遭受长期流亡生活，我们简单重复一下他的话：“你不要屈服于异己的思想。不管你经受什么事件，你都应采取坚定不移的、理直气壮的态度，人们至少可以说你是人……”

我们能够以共产党人的自豪说，在反对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日常斗争中、在监狱中、在严刑拷打中、在行刑队面前，西班牙共产党人就表现了他们是人——乌纳穆诺所说的这个词的最符合人之常情的含意中的“人”，这个乌纳穆诺在萨拉曼卡大学曾向佛朗哥叛乱者高喊：“你们会胜利，但不能使人信服！”他是传奇式的英雄。

我们遭受酷刑和杀害的同志不计其数，他们当中的最后一个是我们难以忘怀的胡利安·格里莫。

他们每个人都是人们学习的榜样，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如何在生活和死亡前面保持尊严。

雅克·杜克洛同志以下面的话结束他的演讲并宣布使人难忘的大会结束：

我们法国的共产党人同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的西班牙，同胡利安·格里莫的西班牙，同热情之花的西班牙，同人民的西班牙在一起，我们将帮助西班牙人民走出他们受奴役的黑夜，走向自由的太阳。

我们的同志同令人钦佩的西班牙在一起，它正在受苦，但是在斗争，不仅为自己斗争，而且也为我们斗争。

我们同你们，西班牙的劳动者和民主人士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比利牛斯山脉南边民主的胜利也将是法国劳动者和民主人士的胜利。

雅克·杜克洛想念正在斗争、受苦和充满希望的崇高、勇敢的西班牙，他回忆起保罗·艾吕雅的美丽诗句：

如果在西班牙有一棵鲜血染红的树，
它必然是自由之树。
如果在西班牙有讲话的人，
他必然是要求自由的人。

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一起

有一天，菲德尔·卡斯特罗邀请我访问古巴，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那还是1963年的冬天，旅途中我们在摩尔曼斯克，

作了短暂的停留，在那里苏联海员的热烈欢迎缓解了一下那个北方海港的低温。

我真想作为普通访问者去访问古巴，进行一次不声不响的、不拘礼节的、不举行记者招待会的访问。参观、学习在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

但是，不行。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何塞·马蒂机场等待着我，他把我当作一个战斗的西班牙、反法西斯的西班牙的代表来接待。在我们访问古巴期间，所到之处都强烈地感觉到古巴人民对我国人民的亲切感情和支持。那时古巴正准备庆祝在非德尔领导下古巴革命胜利五周年。在那些日子里同我们亲如手足的古巴人民在一起，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激动。

在古巴同志、伊雷内和阿斯卡拉特陪同下我访问了卡马圭平原、马埃斯特腊山脉，拜访了尼卡罗矿工、冶金工人、制糖厂的劳动者、哈瓦那圣地亚哥的学校。一个摆脱了长期奴役的人民焕发出来的人和知识的力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我们访问期间，古巴人把我当作他们非常亲近的人，象接待他们自己人一样接待我们。我还记得在圣地亚哥，我走出一座房子时，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向我走来，亲切地拥抱我并对我说：“多洛雷斯，我也是巴斯克人的后代。”

我认识许多创造古巴新社会的非凡的人。但是在那次旅行中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我们同菲德尔·卡斯特的私人接触。他在他的祖国遭受独裁残暴统治的情况下，了解到了历史时钟已经敲响了，古巴行动的时刻已经到了，他投入了艰难的战斗，为古巴开辟了自由和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在古巴期间，几次聆听了菲德尔的讲话。这些讲话是同他自己的良知和人民对话。谁也不知道在这些讲话中，哪部分

激情是他自己的，哪部分又是对自己的革命领导人无限信任的人民传给他的。

古巴为各国人民的革命宝库提供了独特的经验，它证明有必要打破旧的模式和冲破教条主义的概念。古巴革命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斗争，特别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斗争的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我在古巴日报《世界报》看到关于我的一段话：“我们相信，她一踏上古巴的国土就会感到象在她千里迢迢的祖国，因为她将发现每个古巴人的心中都怀着我们大家对她的人民的爱戴。”

古巴人民对西班牙人民的兄弟情谊和声援，是那些参加过我们解放战争的古巴人，如巴勃罗·德拉托连特·布劳、坎东、阿尔维托·桑切斯和其他人用自己的鲜血和牺牲凝结成的。他们的英名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古巴和世界诗人尼古拉斯·纪廉说得多么好：

啊，西班牙！

我看到你的血管流尽了鲜血，

又总是有新鲜血液充满它……

……我，美洲的儿子，

奔向你的身边，为你捐躯，

因为我生来爱自由……

我在首都附近的一个农场露天庆祝新年，有劳尔·卡斯特罗、拉米罗·巴尔德斯、比尔马·埃斯平、艾德·圣玛利亚、还有其他古巴和西班牙的同志，如赫雷斯、西乌达特、索利瓦、佩德罗·阿蒂恩萨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在古巴工作的几十位同胞，我们一起吃烤小猪和许多好吃的东西，在充满友谊和快乐的气氛中我们又说又唱，一直到很晚。

当菲德尔来到会场向西班牙朋友祝贺新年时，已经天亮了。

我应西班牙旅居古巴侨民当时的负责人何塞·玛丽娅·冈萨雷斯·赫雷斯的邀请，有机会在胡利安·格里莫西班牙活动中心看望我的同胞们，他们在自由之岛进行热情的合作和帮助。

西班牙内战期间，带头声援反法西斯的西班牙的古巴朋友送给我一个小小的青铜半身像，这是美国雕塑家乔·戴维森在马德里为我雕刻的半身像的复制品。我看见半身像被手枪打穿几个洞，这使我不悦，他们解释说，在巴蒂斯塔统治的年代里，残酷迫害西班牙共和国的同情者。有一天，几名警察进到我们几个朋友的家里，可是一个人也没有找到，就对我的青铜半身塑像开了几枪。古巴朋友把这受伤的半身像当作一件珍宝保存下来，我非常感谢他们。

经过五周的紧张活动之后，我们决定回苏联。菲德尔·卡斯特罗邀请我留在古巴。他对我说，“在这里你可以为西班牙而工作，会感到就象在你自己国家……”我记得在加勒比的这个岛上的旅途中经过一些农村都是用我的家乡巴斯克的名字命名的……我衷心感谢他对我的慷慨邀请。

“但是我的女儿和外孙在莫斯科。”

“这马上可以办理，”菲德尔回答说，“我们把他们都接到这里来，和你一起生活。”

他看到没有说服我，就以他特有的那种淘气的眼光看着我，说：

“我们可是从你飞机上拧下了一个小螺丝钉了，算了，你就别去了！”

在阿塞·马蒂机场，古巴领导人送别我们。菲德尔热情地拥抱了我，用典型的古巴的说法说：“我们会见面的。”当时苏联最

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尼与我们同机回苏联。飞机起飞了。

我们惊奇的是过了一会儿，菲德尔在两个穿橄榄绿衣服的同志陪同下出现了。菲德尔朝我走来，并笑着问我：“多洛雷斯，我穿的衣服能对付苏联的寒冷吗？”我用肯定的语气说，行。菲德尔坐到我们的座舱里，陪我们一大段旅程。我们谈了一整夜，谈到了古巴、西班牙、加利西亚，据他说，在加利西亚还有他的家属，谈到了古巴的农民及许多其他事情……

在我们座舱里，在一个黑口袋里，我们放着两个鸟笼子，一个里面是雌鸚鵡，另一个是金丝鸟，是几位古巴青年送的，我想，这一定是没有办理手续，就把它放到飞机上来了。

我们真担心雌鸚鵡会吱吱喳喳地叫，结果很幸运，没有发生，因为小鸟确实是“明白情况”的。

在莫斯科机场为菲德尔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其他领导人以及许多劳动者向古巴的人民领袖表示欢迎。

几天之后，在莫斯科我的家里，电话铃响了。当我听出肯定是菲德尔的声音时，我好不奇怪。他以古巴人特有的方式问我，“有素菜吗？”我明白了，他是想到我这里吃午饭，我喜出望外。全家出动开始准备午饭。过了一会儿，菲德尔在五六个古巴人陪同之下真的来了。他的第一个行动是下厨房，揭开砂锅盖子，说：“这才有西班牙菜肴味呢。”那一天我们整天都处在欢乐之中。

我外孙费奥多尔当时八岁左右，用一条彩带系在菲德尔座椅的一条腿上。

使馆代办害怕热情之花

几个月之后，何塞·玛丽娅·冈萨雷斯·赫鲁斯同志向我讲述和通报了关于我访问古巴在“外交”方面引起反映的一些轶事。

为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五周年，在总统府举行了招待会。按照惯例，参加的有驻古巴的外交使团、文化艺术界人士、古巴革命领导人和外宾。我也参加了。我是准时到会的。几分钟之后，西班牙代办也到了。当时，还没有大使。代办坐在车里，问迎接他的礼宾负责人：

“伊巴露丽夫人已经到了吗？”

他对这个意外的提问感到惊奇，但是带着礼节性的笑脸回答道：

“是，先生，她几分钟前就到了。”

西班牙外交官带着一副不愉快的表情说了声谢谢，关了车门，叫司机开车回使馆去了。几周以后的情况完全表明，这个代办从马德里接到密令，不能与我同时出席招待会。

后来，菲德尔从莫斯科回古巴时，西班牙代办要求会见菲德尔。古巴总理很忙，拖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又提出要求，并解释说，需要紧急会见，因为这位西班牙外交官应召要回马德里，几天后就要起程回国。

会见定于中午十二点。西班牙政府代表准时到达。当到达总统府门口时，意外地看到菲德尔急步外出。在街上，突然碰到

这位代办，菲德尔也感到意外，并连忙解释说，他忘记了这次约会，他有几个临时的紧急访问，必须去。“但是一切问题都有解决办法的，”菲德尔以他特有的不拘礼节的语气说，“如果您不太急，留下您的车，跟我来，我们一面走，一面可以谈。”

西班牙外交官接受了热情的邀请，他们约定了回来的时间。他同菲德尔一起去哈瓦那附近的家禽场和养牛场参观。在那里，他被介绍给劳动者和技术员。同他们共餐。在车上和在参观过程中都没有机会谈外交问题。菲德尔用热情的语言，谈了发展家禽饲养业和养牛业的规划，谈了目前情况和具体计划。少不了还直接谈到同西班牙的经济关系。

“这些装蛋的篮子，我们可以从贵国进口。那边这些产品质量很好……”“这台机器和这些孵化器肯定在西班牙也有。”“关于养猪，我们有兴趣引进西班牙的某些优良品种。”“关于蛋禽，我们也有兴趣引进西班牙的某些优良品种……”

访问结束后，在回来的路上，话题仍集中在所见所闻和古巴宏大的规划上。到达总统府，西班牙代办的汽车已在等着。在告别时，菲德尔说：“的确，您有急事要向我提出来，我们什么都谈了，就是忘记了您来访的目的……”

西班牙外交官感谢菲德尔的招待，接着表示他对这次参观中的所见所闻，均有兴趣，并解释马德里对我最近访问古巴感到很不高兴，认为我在古巴受到相当于国家首脑的接待。这次邀请冷落了西班牙政府，因为正值西班牙和古巴之间进行旨在加强和发展关系的谈判期间。

菲德尔留意地听着。

他说，“贵国政府不高兴是没有道理的。我接待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因为她是有名望的共产主义者，是西班牙共产党主

席，因为我也共产主义者。我是以古巴共产党的领导人身份接待她的。这在西班牙政府中不应该产生不愉快。如果有些在古巴不受欢迎的人在马德里受到接待，我也不会感到不快，因为贵国政府有权选择自己的朋友。我们古巴人也应该有这种权利。此外，我想向您声明的是邀请多洛雷斯不是象您的政府所想象的那样最近决定的，几个月以前我就邀请她了，您可以调查，因为这没有任何保密。消息早在古巴《格拉玛报》上发表了。”

西班牙外交官冷静了些。他无言可答。实际上，他所想的是如何平息他政府的不安。

“您刚才所讲的有道理，”他答道，“您给我打消了一个重大顾虑。现在我想起来了，对伊巴露丽夫人的邀请是几个月前发出的。我将把登载这一邀请消息的《格拉玛报》带到马德里去。您看，”他补充说，“您给了我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论据，去澄清情况。我非常感谢您。”

非常诚挚地告别了。赫雷斯补充说，西班牙代办没有说出他当时真正想的东西：一个好的外交官要当好西班牙在新古巴的代表，就应该增加自己的文化知识，掌握一些机械、家禽、畜牧和遗传学方面的知识，否则难以同菲德尔·卡斯特罗交谈，他可以冷不防地跟你谈起最料想不到的事情。

活在心中的巴勃罗·聂鲁达

从西班牙抵抗法西斯时期起，我们就认识了。我们是老朋友了。每逢他访问莫斯科，必到我家来作客。我们的家也就满

屋都回响着他那动人的智利口音，晃动着他那副给人印象深刻的、印第安人的、充满兄弟情谊的容貌。

我的外孙女洛利出生时，聂鲁达送给她一件礼物：一张俄国手工艺人用柳条编制的精致的小椅子，这还是他在苏联草原旅行时买的。他在献词中这样写道：“你好，新同志。”

我们常常谈到我们的情况，西班牙和智利的情况，我们的斗争和我们的希望。

后来，我们在巴黎见过面。他还请我们到他使馆里吃过饭。因为当时聂鲁达是阿连德的智利驻法国代表。在这之前他曾经是驻西班牙领事。

他向我说起他的困难，反动分子经常组织挑衅活动。他痛苦，因为他是诗人、革命家，热爱他的人民甚于一切事物……

令人震惊的消息来到了……巴勃罗·聂鲁达忍受不了他和他的人民的理想的破灭、阿连德的死亡、自由的灭亡，他活不下去了。

我当时这样写道：

致难忘的同志和朋友巴勃罗·聂鲁达

你离开了我们，我们再也见不到你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

你慷慨无私，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著作和榜样。你将与它们共存，并通过它们，继续歌唱，倾吐你对智利人民的热爱，对为正义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热爱。

巴勃罗·聂鲁达看到他的人民遭受披着羊皮的野兽的打击、践踏、残杀，这群野兽是帝国主义专门豢养出来摧残他的祖国智利的自由和主权，使他的智利、雷卡瓦伦的智

利，埃利亚斯·拉斐尔特的智利、阿连德的智利和科尔巴兰的智利成为没有自由的国家，尽管这些英雄们希望它是一个自主、独立和民主的国家。面对他的人民遭受这种极端痛苦，巴勃罗·聂鲁达受到了致命的创伤，他去世了。

聂鲁达，我们的同志和朋友，你将活在我们浸透泪水的回忆中。在我国人民英勇抵抗法西斯侵略而流血牺牲的年代里，你曾歌唱过我国人民，歌唱过不朽的西班牙。

你当时不可能想象到，历史会使你遇到与长期受苦受难的西班牙同样悲惨的命运，会使我们亲爱的巴勃罗·聂鲁达遇到与我们的马查多、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和加西亚·洛尔卡同样的结果；一些优秀的诗人，由于他们象你一样具有爱国主义思想，政治上真挚，对丑恶的、令人憎恨的东西采取不妥协的精神，遭受了和你今天一样的悲惨命运，我们的同志和朋友，西班牙和智利受尊敬的诗人，讲西班牙语的各国人民的诗人，所有为人的自由与尊严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诗人，我们伟大的阿尔维蒂和玛丽亚·特雷莎亲密无间的朋友。

有一天，你写了一首唯独你能写得出来的诗，
我出生在南方，
却从边疆继承了最后一个豪杰，
单枪匹马驰骋于世间。
但是党扶我下马，脚踩大地
我长大成人，
我踏遍沙滩和群山，
爱慕着、探索着。
我的人民，每逢春暖花开，

我的名字真的会在你耳旁回响？

你真的认出我

就象熟识你门前的江河？

是的，巴勃罗·聂鲁达。你的人民永远认识你，把你当作自己的亲人。我们这些认识你的人，在流血牺牲的日子里，看见你伴随着我们的人，也都是这样。你的名字将活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的记忆中和我们未来的胜利中并与我们的斗争、回忆和胜利同在。当我们说西班牙，我们就一定说智利！当我们说加西亚·洛尔卡，我们就一定说巴勃罗·聂鲁达！同志和朋友，你活着，你将永远活在我国人民的记忆中，将永远活在今天伤口还在流血，但是你的祖国的敌人卑鄙的代理人，皮诺切特们都无法使它屈服的你的智利的记忆中。

经过多少时间，我们还记得在遥远的过去，但对我们来说就在昨天，聂鲁达对共产党人雷卡瓦伦，一个由于是共产党人而受到仇恨与囚禁的人的神圣哲学。今天，智利人民一边埋葬自己的烈士，医治自己的创伤，满怀信心与希望凝视着未来，一边重温你的这一誓言：

我们发誓

医治祖国的创伤。

我们发誓

使自由之花在不光彩的沙场

高高举起。

我们发誓

继续走你的道路

直到人民取得胜利。

日内瓦集会

1974年春天人们感到了巨大变革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西班牙变革的时刻到来了。

我们党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大会。圣地亚哥·卡里略和我准备在会上发表演说。

伊格纳西奥·加列戈以由梅塞格尔和其他同志组成的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名义从瑞士打电话通知我：

西班牙人民热情高涨，将有数万名西班牙人参加这次大会。但是瑞士政府被佛朗哥的压力吓破了胆，对是否同意我们召开这次大会还在犹豫不决。

我们到底去不去瑞士呢？我们这次会议为什么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呢？

这确实有它的道理。

在葡萄牙刚刚爆发了石竹花革命，激起了巨大的热情。在希腊，军政府即将面临崩溃。在巴黎将很快公开出现西班牙民主管理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我国工人运动的代表，加泰罗尼亚和加利西亚等地区的民族运动的代表，人民社会党、卡洛斯党、民主右翼和共产党的代表，以及拥护君主政体者、共和主义者、新资产阶级阶层和独立人士的代表。

在西班牙将发生什么呢？所有的人都这样问……

最后，同志们向我建议：“到日内瓦来吧！在这里我们能排除困难。”

我们于是到瑞士去了，与我同行的有门德索纳、伊雷内、阿玛娅和我的外孙女洛莉塔。

在日内瓦，一下飞机瑞士同志和加列戈就告诉我们最新消息：这次大会能召开，但是按照瑞士政府的决定，这次会议几乎成了看马戏团演出了。人们执意要我和卡里略象哑巴一样在大会上一言不发。得了吧，这不成了蜡人博物馆了吗？要是这样，在会上讲话的就只有瑞士人了。

瑞士的同志们使我们放心了。他们保证，在滑冰场里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相信，不但能听到，而且将会非常响亮。

他们把我们带到一间录音室，录下了我们的演说，并安装了足够的扩音器，以便使会集在维尔纳体育场的三四万西班牙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说我们的会议引起国际上的关注，这并不是言过其实。我们身边围满了来自整个欧洲的上百名记者和摄影师。另外还有瑞士、意大利、荷兰的电视台和一家伪装成“哥伦比亚电视台”的西班牙电视台。

真正令人感动的是积极热情的西班牙青年、侨居不同国家的西班牙工人怀着伟大的牺牲精神花掉了自己多年的积蓄来参加我们这次大会。特别是从西班牙国内冒着旅途中的种种风险赶来开会的青年，他们大约有一千人。

会场上红旗如海，标语如林。“自由、自由”“要西班牙，不要法西斯”“多洛雷斯和圣地亚哥返回马德里去”的喊声响彻会场。

大会在瑞士劳动党主席范桑同志和书记马尼安同志主持下就要开始了。

有人通知说，两辆载有西班牙人的大客车已经越过边界线，正在向维尔纳体育场驶来，他请求我们等他们一会儿。

会场里一片寂静，当然，我们要等他们，怎么能不等呢。但是用什么方式来打发这段空闲的时间呢？

我站起来，向讲台走去，人们大为吃惊。要知道我们是被禁止讲话的！后来圣地亚哥对我说，他吓了一跳。多洛雷斯要讲什么呢？

多洛雷斯说了以下几句话：

同志们，他们禁止我们讲话，但是谁也不能禁止我们唱歌。我来给你们唱一首我青年时代的革命歌曲。我唱道：

青年工人们，新的无产者，站到我们这边来，无所畏惧地站过来！

我们有着神圣的理想，我们是更美好的世界的先驱，来壮大我们的队伍，来帮助我们，为了人类的事业，进行无情的斗争！

我们高举社会主义的红旗，它永远高高飘扬，它是我们的整个生命，在它指引下勇往直前，我们必胜！

那首意外的（会议议程之外的）歌曲激起了群众的热情，他们重新高呼起“自由”、“自由”的口号。

就在这时大家等待的客车也到了，会场上又荡漾起新的热情。

大会开始了。响起了事先录在磁带上的卡里略坚定的、强有力的声音。

他首先谈了这次大会在西班牙国内外引起的浓厚的政治兴趣，他指出，还没有在讲台上讲一句话，一个根本问题就已经明白了，那就是这个人数众多的会议，这个“强有力的呼声不是反对西班牙——象法西斯的发言人谴责我们的那样——而是为了西班牙，为了我们的祖国，为了我们伟大的人民，为了我们比谁

都更应获得自由和民主的伟大人民！”

卡里略描述了什么是“我们所要建设的西班牙”。我们把这个西班牙的主要特点概括如下：

一个民主的西班牙；一个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有发言权和参与权的西班牙。

一个没有报仇雪恨、没有酷刑、没有无责任感的警察、没有腐败政治家、没有死刑的西班牙。

一个人道的西班牙。

在我们要建设的这个西班牙，人们无需到海外去谋生。与此同时，我们要为被迫到国外工作的西班牙人争取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而斗争。

卡里略重申说，我们严格遵守民主法治，只有当有人用暴力反对民主政府时，我们才使用暴力，到那时，我们决不动摇，我们将进行战斗。我们决不会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人打。

他同样重申今天在西班牙提上日程的不是要实现社会主义，而是实现民主，确立自由权利。尽管我们从来就没有放弃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对于那些曾问到社会主义是否有自由的人，卡里略重新回答他们说，有。没有自由也就没有社会主义了，我们提倡在西班牙实现一个多党制的、实行一切人权的、反对派享有自由的社会主义。

扩音器里的声音最后说，法西斯独裁的丧钟敲响了，即将获得自由的西班牙正在这里诞生，在罢工和示威游行中，在抗议中，在民主对话中诞生。最后是三句口号：自由万岁！社会主义万岁！西班牙万岁！……

录音讲话结束后，在群情激昂的气氛下，卡里略从他的座位上跳起来走到麦克风前，呼喊道：

到现在为止你们听到的是我贮存在话匣子里的声音。现在……谁也不能扼制西班牙共产党的声音了！我们到马德里再见！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离独裁的灭亡只有一年了。但我们已经感到自由的空气很近了。

扩音器里传出了我的声音：

震动我们肺腑的声音使我们回忆起战斗的、不可征服的、不朽的西班牙。

使我们回忆起历史上的和传说中的西班牙，塞万提斯、戈雅、乌纳穆诺、加西亚·洛尔卡、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和毕加索的西班牙。使我们回忆起共和国和民主的西班牙，康潘尼斯主席、阿吉雷和内格林的西班牙。

这是我们的拉斐尔·阿尔维蒂用他美丽的诗句使之留芳百世的西班牙，阿尔维蒂的诗歌“在大炮轰鸣声中，飞遍人民抵抗的各条战线，后来又飞遍了全球”。这是诗坛上另一位巨人，智利的佛朗哥——卑鄙的皮诺切特将军迫害的牺牲者，我们难忘的巴勃罗·聂鲁达这样说的。

我们回忆起了格里莫和所有被佛朗哥分子杀害的人的西班牙。在自己家乡加泰罗尼亚被卑鄙绞死的普伊格·安蒂奇的西班牙。以捍卫劳动者权利的罪名被判处长期徒刑的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桑切斯·蒙特罗和卡马乔的西班牙。

我们回忆起我们的英雄和烈士，游击队员和无名的战士的西班牙；厄斯特拉马都拉、安达卢西亚和卡斯蒂利亚的农民们的，比戈、费罗尔、马德里、阿斯图里亚斯、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和纳瓦拉的劳动群众的西班牙。

尽管长期的流亡生活使我们非常痛苦，使我们象同我

们一样的一位葡萄牙流亡朋友那样不得不说：真想一死了事。但是我们对自已所走的道路并不后悔，我们为正义事业进行了斗争，为此理所当然地感到自豪，这是一种革命的自豪感，因为我们相信，民主未来的曙光今天已经开始照耀我们祖国的大地了。

这次西班牙人兄弟般的聚会是在国外，在兄弟的葡萄牙鼓舞人心的，使人激动的征兆下召开的。在葡萄牙几乎统治了近半个世纪的法西斯独裁政权在没有用任何暴力的情况下几个小时内就土崩瓦解了。由于人民的力量和武装部队运动的团结和斗争，由于勇敢的上尉们和高级指挥官们政治上的机智和爱国主义精神，葡萄牙一跃成了民主国家，成了沿着民主的道路前进的葡萄牙——不是没有困难的，因为分娩从来不是没有痛苦的，但是它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权利——象一座希望、正义和自由的灯塔，对我国人民和我们祖国来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亲切地屹立在我们祖国的西部边境。

当我满怀深情地向葡萄牙人民及其领导人表示敬意的时候，请你们允许我用发自肺腑的心声向他们说：葡萄牙的同志们、朋友们、兄弟们，让我们在所有的西班牙人都能在政治上和睦相处的、**自由和民主的西班牙再见！**我相信，这一定能表达你们的思想和你们的希望。

……我们共产党人不想把一个国家的革命经验机械地搬到另一个国家中去，因为每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条件永远不会完全相同。每一个国家走他们自己的民主与革命的道路。为了争取缔结一项自由公约，为了争取协调各种意见和主张，以保证从佛朗哥主义过渡到民主制度去，而

不导致流血冲突和更大的暴力行动，我们党进行了不倦的斗争，证明了它具有强大的政治、民主和国家观念……

我们的斗争是长期的、痛苦的，我们人民的抵抗是英勇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就象在大河的急流中，要想筑起一座土坝是不可能的。今天佛朗哥主义就象一个土堆，它虽然很硬，但极易粉碎，它吞噬了一百多万西班牙人的鲜血和生命，它受到人民抵抗的长期侵蚀，特别是新一代人的斗争和你们的侵蚀。同志们，朋友们，你们令人激动地表达了我们全体人民希望在一个自由的、民主的祖国生活的意志。

在这次新的、战斗的劳工运动中工人委员会发挥着杰出的作用，在这里，日内瓦，工人委员会和其他一些西班牙工会组织和民主组织一起得到国际工会运动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正式承认。

请你们允许我向他们公开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我们工人阶级的支持，并建议他们在只要做得到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强这一声援，因为这对西班牙劳动者来说是一种宝贵的支援。

起来反对过时法制的不仅仅是工人，还有农民。他们对政府灾难性政策的抗议表现在多种多样的活动中。多年来只是纯粹执行政府法令的农牧民兄弟会，今天也开始反对政府的法令，并要求农产品的补偿价格。

由于青年人的勇猛冲击和最有权威的老师们的支持，西班牙的大学起来反对突出教育的尖子主义和阶级性的选拔法草案。5月9日在巴塞罗那、马德里、加利西亚的圣地亚哥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高等和中等院校里举行的活动清楚地表明了学生运动的广度和生气。

西班牙知识分子通过他们最有声望的人物反对独裁，要求创作自由。

教会与政权的冲突是持久的，卡萨洛利主教阁下访问马德里，也没有减缓这种冲突。西班牙教会第二次教务会议后的革新倾向在主教大会上得到了确立。这就很难使罗马教皇与西班牙政府就宗教事务的条约达成协议，要是签订这种协议，就会成为教会对佛朗哥政权的支持。

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例如，潘普洛纳的大主教同省长发生了冲突，省长命令警察驱赶在大教堂开会的奥塞工厂的罢工者，这些事件表明这个政权和最基本的人权是水火不相容的。在我国正在产生一种新的情况，由于它与民主未来有重大关系，这里有必要加以强调。与1936年不同，今天教会已经过革新，它的领导阶层不是因循守旧的，而是进步的，数以千计的教士通过他们的行为使人民同教会和解。

由正义与和平组织发起的争取大赦的运动，已经征集了几十万人的签名，使全国和解有了真正的、具体的含意。

我们党早在1956年就举起了全国和解的旗帜，尽管人们对我们这样做不理解并采取宗派主义的态度。今天我们党欢迎这一倡议，它会熄灭内战留下的尚未熄灭的灰烬，实现民主共存。

近一个时期出现了一种朝气蓬勃的新现象，有力地影响着群众的意识，这就是报刊的态度，它们机智、有力地讽刺了不妥协的极端分子。这些新闻工作者支持对话的思想和自由的思想同“绝大多数”西班牙人的思想和感情产生共鸣。甚至在我们认为即使不是敌对的，至少也是对此漠不

关心的地区，这种倾向也产生了影响。

我们共产党人遭受了最残酷的血腥镇压，我们相信我们的航船已到达了民主的港口，今天的政治解决办法只能是恢复自由……

在西班牙的监狱里，还囚禁着数以百计因献身捍卫这些崇高思想而被判处长期徒刑的共产党人、民主人士、革命者和工人委员会领导人。在这次争取西班牙自由的盛大集会上，我们向他们表示我们最热烈的声援，并保证坚持斗争直至取得所有政治犯和政治流亡者的自由。

同志们，朋友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我向你们保证，为了结束我们国家目前的政治局面，西班牙共产党将竭尽全力以自己全部政治才能，不惜任何牺牲地进行斗争；但是我们这种斗争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一切有历史责任感的政治力量在一起争取使西班牙变成全体西班牙人的祖国。

同志们，朋友们，爱国的志士们，让我们不久在民主的西班牙再见吧！在西班牙你们还有一项任务要完成，那就是建设一个新的、自由的、民主的国家，全体西班牙人用他们的热情和爱建立的国家！

同卡里略一样，最后一段讲话是我自己对着麦克风说的，这样就打破了那道荒唐的禁令。谁能关起闸门堵住群众高涨的热情呢？

日内瓦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绩。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瑞士政府的指令(ukase)，瑞士政府通知我们“禁止我们入境”。

这是他们的权力。卡里略因有急事，当天晚上就走了。而相反，我却希望我的外孙女哪怕是只看一眼日内瓦湖也能多长点

见识。我们游玩了两三天，我们同侨居瑞士的西班牙朋友一起在露天用餐，他们曾为这次大会取得成绩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而且很有成效。

各国报刊以相当多的篇幅报道了我们的情况，有时表现出感情上的冲动和夸大其词。一位法国记者写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一位《世界报》的记者）热情之花一出现，滑冰场就变成了朝圣的庙宇，或类似的东西。

热情之花决定和家人以及朋友一起从苏黎世——德国的瑞士——出境。悄悄地离开殷勤好客的国家。

在通过海关检查站时，一位不太友好的女职员把我一个人带到她的检查室。打开我的小手提包，没有看到什么稀奇的东西，让我走了。在我之后轮到检查伊雷内，由于她喜好保存和管理文件，她带了一个大提包，里面装满了大会的宣传材料。女职员仔细地翻看直到找到了一张我的照片，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对伊雷内说：“喂，这位女士是在电视里唱歌的那位吗？”

“是，那当然。”

“真的吗？她唱得太好了，刚才我没认出她来。您能把这张照片给我留作纪念吗？”

“当然可以，非常高兴。”

女职员变得和蔼了，没有再找更多的麻烦就放伊雷内过去了。

我们都为那个女职员在这件事上表现出来的超现实主义的态度感到高兴，我们一致认为深深打动瑞士人的心的还是电视转播的我唱的歌。

印度朋友

在我们这次政治大会所收到的支持信中，我记得有一封是女战士、出色的国务活动家英迪拉·甘地从遥远的印度给我们的来电，表示了兄弟般的问候。

我没有忘记尼赫鲁和梅农 1938 年对西班牙的访问，这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他们访问了前线，同战士和政治家们谈了话，对我们的事业表示同情。

我当时很高兴地在巴塞罗那接待了尼赫鲁。那是一次非常诚挚的、令人愉快的会见。一位年青漂亮的印度姑娘陪伴着他。据说那是他的女儿英迪拉。那时候英迪拉正在英国读书。她非常支持为自由而斗争的西班牙人民，根据我得到的消息，她当时象很多青年一样报名要求和我们一起战斗。

英迪拉和她的父亲是在为争取他们祖国独立而进行的长期、艰苦斗争中的不倦的战士，他们理解和无保留地支持我们人民所捍卫的事业。

尼赫鲁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他是怎样在巴塞罗那和我相识的：

我在小办公室里呆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通过一个翻译的帮助互相了解。我钦佩她的活力；很快我就了解到同我交谈的这位妇女是我一生中所认识的最非凡的妇女中的一个。她那愉快的、开朗的面容使人以为她是一位幸福的爱笑的女人。但是在这种笑容的后面人们隐约看出她对自

己阶级和自己人民的命运感到的极大的痛苦。表面上看，她的表情坦然自若，但实际上却隐藏着深深的不安。她讲起话来，激动人心，满腔的热情溢于言表……

……连我这样一个难动感情的人，都如此深受感动，她在广大同胞中所产生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尼赫鲁这番亲切、热情的话语不是应景文章。在我们长期的斗争中我们一直感受到我们的印度朋友的友谊和支持。

愿大地不要把他压得太重

1975年11月20日人们告诉我一个消息：佛朗哥死了！愿大地不要把他压得太重了！这是我对围着我问个不停的无数的记者的回答。

我们并没有喝香槟酒。

通过比利牛斯广播站，我表示了我的激动心情和我的担心。

我们的人民知道佛朗哥死了，心情犹如一场恶梦方醒……

……佛朗哥死了，但永存的、民主自由的、唤醒了一个大陆的西班牙在自己能够创造一切人间奇迹的伟大人民中得到了永生；民主管理委员会和联合纲领使所有希望生活在一个和平与民主的祖国的基本政治力量在民主抉择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西班牙从而开始走上了新的道路，克服了不少困难，但对在我国重建西班牙人的和睦共处充满信心，这种共处在佛朗哥主义时期是不可能的。

黎明的曙光开始在西班牙的土地上出现了。今天的这一曙光冲破了过去时代的黑暗，出现在这样的西班牙土地上，在这里人民将起到主要作用，我们这个多民族、多地区的祖国，人和人民的权利将重新得到承认。

在这种令人激动的时刻，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的囚犯，所有的政治犯，他们应该立刻得到自由；他们的自由应该是所有希望在西班牙恢复民主制度并为之斗争的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

在罗马度过八十岁生日……

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最反对举行祝寿活动，这是出于我的性格（那些夸张的话使我感到胆怯）也是出于我的经验：我参加过不少首脑人物的祝寿活动，我听了很多赞美的祝词，后来这些祝词又变成了恶毒的攻击……

那么好吧，现在我也满八十岁了……整整一生，漫长的生涯……我的同志们，朋友们要我这样考虑问题：你的一生，你的战斗是属于党，属于人民，属于各国人民的，你自己也是这样希望的。因为你把六十多年的精力献给了人民，向热情之花表示祝贺，也就是向共产党人，向民主、自由表示祝贺……

此外，为了庆祝我的生日，罗马正准备召开一个声援我们党的重要大会。在莫斯科，苏联朋友和在那里居住的西班牙人也要求庆祝我的生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很长时间里我也是个莫斯科人。

怎么办呢？

我决定接受党和朋友们的决定。

决定很简单：举行两个活动，一个在罗马，另一个在莫斯科。

坦率地说，八十岁对我并没有太大的压力，我的年龄是八十岁整，但我没有感觉到自己老了，老了。我想起季米特洛夫说的话，他说，衰老并不取决于年龄，而是要看一个人有没有勇气，有没有战斗的精神和叛逆的心……

一天在讨论“年龄问题”时我们的阿尔维蒂说得极妙：

在光明的生活中，
人就象自由，
生命永不息。
只要光明之火在燃烧，
不管你年轻，还是白发苍苍，
青春之火长在。

就这样，我又重新到了罗马。但不是作为一个古董，而是作为一名战士去的。我的女儿、外孙女、伊雷内与我同行，在那里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

在罗马我是作为这个城市的客人——不只是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客人——受到接待的。

在福米奇诺机场，人们把我带到一间贵宾室。意大利共产党朋友对我说，西班牙大使就在旁边的房子里，谁知道在等待哪位要员。

罗马市长是一位基督教民主党人，他在罗马市政府接见了圣地亚哥·卡里略和我。在场的还有各个党的一些政治家。其中有彼得罗·南尼和萨拉盖特，罗马市长用很地道的西班牙语向我们问候，并送给我们罗马纪念章。

我向我们的东道主表示了感谢，感谢他这一真诚举动，以及

他对我们人民表示的团结友谊。

当我一走进罗马体育馆，两万名朋友同时向我问候，我激动的心情，我的惊讶是难以描述的。

他们用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以及不知多少种其他语言向我问候，他们挥动着红旗，高呼声援为自由而斗争的西班牙的口号……

顷刻之间，我感到我和群众融为一体，在他们之中，为他们所理解，我的胆怯没有了。在那里我是在我们自己人中间，在我的亲人中间……

那是1975年12月14日。佛朗哥已经死了。整个西班牙都动起来了；人们都在说着自由，感受到自由的到来，然而，仍然还有很多斗争要进行，要赢得胜利……

法国一家日报曾这样写道，西班牙一切都取决于谁先死：是佛朗哥，还是热情之花。看完这条消息后，我笑了。事情要复杂得多，不象记者想象的那么美好。

佛朗哥已经死了。而热情之花走过了漫长的、永无完结的、充满斗争与希望的道路。已八十高龄了，还在流亡之中，不能在她的祖国，和她的人民一起度过她的生日。

意大利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同我们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同志一起令人赞叹地组织了那次西意友好集会。在罗马的大街上，挂着一排排印有我的肖像的标语，向我们党表示祝贺。

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西柏林、保加利亚、智利、朝鲜、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日本、希腊（两个党）、英国、南斯拉夫、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圣马力诺、瑞典、瑞士、匈牙利、苏联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出席了那次有着深刻国际主义性质的令人难忘的会议。

这次大会还有一些社会党的代表，如智利社会党、意大利社会党（彼得罗·南尼和帕特利·莱佐）、葡萄牙社会党、法国社会党（给大会发来了贺电表示支持）。

民主管理委员会反法西斯的代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左翼政党领导人，还有政治、艺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带着深厚的友好情谊和我们一起出席了大会。

马德里、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加利西亚、阿拉贡、安达卢西亚、卡斯蒂利亚、纳瓦拉、巴伦西亚、巴利阿里群岛的西班牙共产党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大会。

从卡拉万切尔监狱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贺电说：“我们被囚禁的共产党人和工人运动的战士，以及同情者希望通过这几行电文同大家共同庆祝您的八十寿辰。”签名的有：胡安·穆尼斯·萨皮科、P·德拉莫塔、J·奥塔尼奥、巴萨乌斯特、马塞利诺·卡马乔、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拉斐尔·皮利亚多、卡洛斯·阿尔瓦雷斯、何塞·乌纳努埃、弗朗西斯科·罗梅罗·马林……

恩里科·贝林格致开幕词，他向我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卡里略和民主管理委员会表示问候，感谢西班牙共产党选择罗马做为举办这次庆祝活动的地点。“这对于所有那些对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和她的战友们，以及所有为西班牙人民的自由而战斗的爱国者们怀有崇敬心情和热烈感情的人们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荣誉。”

贝林格强调指出了西班牙反法西斯力量所取得的成绩对西欧民主和进步的重要意义。他强调指出：

在西班牙如果不承认共产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就不可能有民主……今天我们要比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向西班牙的同志们保证，我们要加强斗争，加强人民的、我们人民

的行动，以争取出现一个自由民主的西班牙，在欧洲能发挥一个生气勃勃、进步的国家所应起的作用的西班牙。

当贝林格向西班牙共产党人，西班牙国内和侨居国外的反法西斯战士表示热情问候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意大利人站起来为他们的西班牙同志和朋友热烈鼓掌。这是罗马的共产党人和左翼向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西班牙表示的战斗问候。

成千上万个声音不断高呼：“自由西班牙！”“多洛雷斯、圣地亚哥回到马德里去！”

作为战友，卡里略向我表示祝贺，并阐述了我们国家的形势和共产党的斗争。他说：

按道理这次庆祝活动本应该在马德里举行。我们之所以在罗马举行庆祝活动，那是因为，尽管佛朗哥已经死了，被埋葬了，但佛朗哥主义还没有死，还没有被埋葬。

他补充说：

只要佛朗哥主义还没有消失，多洛雷斯就不可能在马德里讲话。

如果说，三十六年来，我们党受尽了法西斯的迫害，一些人脱离了党，我们受到种种阴谋诡计和攻击，但是我们党还能始终保持团结的话，这主要应归功于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同志，归功于她的智慧和她思想上、政治上的胆略。

多洛雷斯，西班牙在期待着你。西班牙知道，只有当你、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和民族的政治力量能自由行动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民主。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聆听了意大利共产党主席路易吉·隆哥热情的讲话，他是同我一起经历过多次战斗的战友，是国际纵队的政委，他给我们带来了加里波第的士兵和那些在意大利参加

驱逐德国占领者的战士们的问候。

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源远流长。它产生于那些艰苦斗争的年月。我仅向热情之花致敬，“她就是牺牲精神的化身、谦虚的化身、革命力量的化身。她就是那场战斗的旗帜，代表最强大、最高尚的呼声。”

该我讲话了。我的情绪非常激动，对于人们的赞扬我一方面感到高兴，但又有些不知所措。

我讲了我自己的情况：我是矿工的孙女、矿工的女儿、矿工的姐妹、矿工的妻子。我讲述了我的家乡加利亚达，我的战友，还讲到了西班牙，我的西班牙，我们党为消灭佛朗哥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以及我们人民的英雄主义……

今天我们和你们意大利的同志们在这里、在罗马相聚，这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罗马，它与日月同辉，它好客、慷慨，这是它的市民投了共产党的票的现代的罗马。向参加这次集会的各个党的代表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主张民主，并为民主而斗争的男男女女在这里集会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我向代表各社会党，以兄弟般关切的心情前来参加这次大会的知名人士致敬。

我的真挚的、诚恳的问候表达了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对以葛兰西、陶里亚蒂、隆哥和贝林格为首的意大利共产党的感谢。

我们感谢兄弟的意大利共产党，在我们国内革命战争的不幸时刻，给我们派来了组织在加里波第纵队里的一批英雄豪杰，他们当中有加略（即隆哥）、卡洛斯少校、迪·维托里奥、彼得罗·南尼、朱理亚诺·巴叶塔、罗阿西奥、艾

托、德·拉罗萨，以及数不清的使人永远怀念的其他同志和朋友。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为了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自由在战斗中牺牲了，但是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永远对他们满怀感激的心情。

最后，我说：

同志们，朋友们：我不向你们说永别了，而是要说不久在马德里再见。

……在莫斯科

几天以后我们又在莫斯科集会，庆祝我的八十岁寿辰。这是一次非常友好的活动，大会在科学之家的大礼堂举行。参加这次集会的有和我一样在苏联居住的同胞，有几百名一贯支持我们的苏联朋友。伊格纳西奥·加列戈专程到莫斯科来陪我出席大会。老资格的苏联领导人佩尔谢同志参加了大会。鲍里斯·波诺马廖夫宣读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电，并授予我十月革命勋章：

亲爱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我们祝您健康长寿。祝您在争取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争取各国人民间的友谊与和平、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成绩。

西班牙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斗争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出现了消灭欧洲最后一个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可能性。

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苏联妇女代表、共青团的代

表、西班牙老战士的代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士的代表，以及我的鲁文生前的战友都向我致以亲切的祝贺。

我对他们在我生日之际表示的亲切祝贺和发表的热情洋溢的话语表示感谢：

今天我想回顾一下把我们两国人民和我们两党联系在一起源远流长的友谊。如果说西班牙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亲密友好的话，那么有一点已进入历史，我们的人民永远忘不了，这就是：在1936年到1939年抵抗国内外法西斯侵略的激动人心的、光荣的年代里，苏联政府和共产党给予西班牙共和国和西班牙人民的援助……

应该说，尽管地理上我们两国人民相隔千里，但很多共同的特点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都在劳动和困难中受过煎熬，在斗争中积极热情、英勇顽强，对背叛和懦弱毫不留情，而为了友谊慷慨大方。或许这是因为我们两国人民都遭受过很多苦难，不知是否如此，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我和所有象我一样在苏联生活过的西班牙人都感到在这里就象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一样。当快要与这块土地告别、与这里的亲密的人民离别的时候，我们感到我们在这里已经留下了什么，它吸引着我们，召唤着我们……

同志们，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经过近六十年的革命斗争，达到八十岁高龄，并不会感到衰老，也不会退出战斗。倒是意味着积累了对新的一代共产党人可能有益的丰富经验。而且当你在做一点有益的事时，你的心灵是不会衰老的，而且这是最主要的。

因为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为争取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

而积极斗争的人没有功夫去考虑自己是否衰老。特别是在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祖国即将得到自由的时刻更是如此。

新一代共产党人充满热情和斗志，满怀着必胜的信心冲上西班牙为争取民主、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的沙场。这告诉我们，我们的斗争不是徒劳的，我们不是在贫瘠的土地上耕耘……

在这亲如故土的莫斯科，你们今天给予了我亲切的、兄弟般的祝贺，苏联共产党领导授予我这枚崇高的勋章。我认为这枚勋章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而且也是授予我的英雄的人民的，授予我的家乡比斯开的矿工和冶金工人的，授予进行过多次伟大造反行动的阿斯图利亚斯的劳动者的，授予西班牙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授予马德里、巴塞罗那、塞维利亚、巴伦西亚、比戈，巴斯克和整个可爱的西班牙的妇女的。

我把它看作是献给我的党的领导机构和我的同志们的，他们在佛朗哥政权统治的艰苦条件下，为了根除罪恶的制度，发起和领导了伟大的人民和民族的战斗。

我把它视为是献给我们被囚禁的同志们和我国所有身陷囹圄的男男女女的。他们在佛朗哥的牢笼里和面对行刑队，以堪称楷模的尊严维护了，并正在维护着为西班牙的民主和自由而战斗的共产党和革命战士的本色。

苏联同志们，朋友们：我满怀信心地注视着我们祖国的今天和未来。佛朗哥的死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开辟了新的前景。

现在已经开始书写我国历史的新篇章。我们西班牙人，象《羊泉村》^①里的人一样，将团结成一个人，消灭佛朗哥血

腥制度的一切残余，建立起和睦相处和自由的生活。

公 开 露 面

那是 1976 年夏天。我们重新回到罗马，召开了流亡期间的最后一次中央扩大全会。但是这次不象我们在地下斗争时期那样，使用战时的名字，用假名。不，我们大家都是用自己的真正的姓名和公开的身份去参加这次全会。这次会议是完全公开的，西班牙和外国报界，以及很多朋友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是一次公开的会议。尽管现在还不让我们在祖国开会，但是流亡不会持续很久了……

我还记得当记者们和朋友们发现了一些显要的政治人物、工人运动的人物、知识分子、艺术界人士作为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出现在那里时，他们那种惊讶表情。

会上，任何人发言时，都不能用假名，如佩德罗、埃利亚斯、何塞、卡门等。一些知名人物，直到那时谁都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也要求发言。

这是一次勇敢的举动，在西班牙造成了很大的反响，毫无疑问，这促进了我们党的合法化的进程。

左翼各党的领导人和西班牙的进步人士应邀参加了这次值得纪念的会议，他们向我们党的会议表示了真挚的祝贺。

我忘不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执行委员会成员何塞·玛丽

① 洛佩·德维加的历史小说的书名。——译者

娅·贝内加斯(也许因为他是我的一位同乡)的话:

尽管西班牙共产党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有分歧,但是争取人民自由的斗争今天使我们团结在一起了,明天仍将使我们团结在一起。在争取社会主义、争取劳动阶级解放的斗争中我们必须紧密团结。

我们收到了意大利政治领导人兄弟般的祝贺,他们是: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政府首脑克拉克西、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意大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意大利共和党领导人、意大利民主社会党,以及彼得罗·南尼。

我们伟大的朋友恩里科·贝林格向我们转达了路易吉·隆哥和全体意大利共产党人的祝贺,“他们怀着自豪的心情,特别是深为激动的心情接受了把召开西班牙共产党第一次公开会议这样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安排在罗马这里的建议……”

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我们在座的全体同志心里又重新点燃起了巨大希望和快乐,个个眉飞色舞。

卡里略做了政治报告,其内容表明在我们当时所处的时期,即历史性的变革时期,党的组织、政策和行动都应与此时期相适应。

会上决定印制西班牙共产党党证,发给全体党员。

我在艺术剧院所致的开幕词里重申了“我们在自己的国家合法自由地行动是不可放弃的权力”。

“众所周知,在野的其他一些政党和组织都已经在西班牙国内召开过各自的代表大会,对此我们表示过祝贺,因为它表明有了某种进步;我们共产党人不放弃在我们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合法召开会议和进行活动的权利,因为我党是全国性的、民主的、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党,解决西班牙国家的重大政治问题与社会

问题都必须考虑到它。

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支持一切为争取自己的民族与社会自由而斗争的人民。但是我们是西班牙的政党，它不听从任何国际纪律，我们要坚持这一点，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人在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斗争中作出的牺牲，我们一贯对这一斗争所作的贡献，以及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它运用于我国的具体条件所作的努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提到我们所作出的牺牲，我想提醒大家，就在此时此刻，我们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西蒙·桑切斯·蒙特罗、弗朗西斯科·罗梅罗·马林和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还关在卡拉万切尔监狱里，无法出席我们这次全会。人民群众在全国各地举行游行、抗议活动，要求释放他们以及一切政治犯和社会犯。

在这一具有国际意义的讲台上，我们向我们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我们亲爱的路易斯·卢西奥·洛瓦托同志表示祝贺，他刚刚跳出牢笼，这是为了他的自由而发动的群众运动的结果。

西班牙在野的一些政党、团体和派别的代表出席我们的全会，为我们增添了光彩，对此，我以我们党的领导机构和在座的全体同志的名义，向他们致以真诚的敬意，祝愿这种举动成为一种惯例，因为它将有助于我们所有民主力量更好地相互了解，建立真诚的关系。

我们久经沙场的老战士，看到我们年轻一代，感到自豪，他们是我们的接班人，他们继续着我们的战斗。他们正是改变我们国家政治面貌，为民主打开闸门的力量之所在。佛朗哥主义以为这一闸门已经一劳永逸地关死了，然而今天在我们多民族、多地区的祖国，各民族、各地区蓬勃发展起来的斗争的冲击下，

这一闸门正从它的铁框中摆脱出来。

我们共产党人受到了独裁统治最野蛮、最残忍的、令人发指的迫害，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但是这种镇压并没能摧毁我们人民心中反对佛朗哥主义的斗争意志和对民主的未来保持坚定信念的决心。现在民主未来的曙光已经开始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冉冉升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信念的源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共产党。它坚持了四十年波澜壮阔的英勇抵抗，现在已作为这样一支力量显露出来，哪怕别人根本不同意我们的主张，也必须考虑到它；没有它，就不可能在西班牙建立民主制度。

我们共产党人意识到我们对西班牙、对历史肩负的责任，第一个向我们的人民提出了实行全国和解的必要性。它不是阶级之间的那种不可能实现的和解，而是通向现存的不同团体在全国共处的道路。

在西班牙正在创造共处的新气象，它将为各种力量的活动提供方便，共同努力使我们的国家，全体西班牙人的祖国向民主和社会进步敞开大门。

近几年来，在西班牙出现了一个意义非凡的现象。如果我们不善于研究它、了解它和吸收它，那我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指的是天主教运动的新潮流，它倾向于社会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而采取了纯粹的阶级立场。

在象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深厚的天主教传统的国度里，这一已经具有可观规模的潮流给我们党增添了新的天地，加强了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我们不以任何教条主义的眼光看待这一现实，相信——实践正证明着这点——在这一潮流中，我们可以吸收许许多多能

为实现我们党的纲领中所包含的理想和方案而奋斗的党员。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次将是我们在国外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目前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在西班牙这么多的城市里游行示威，要求大赦和自由，这说明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是西班牙实行民主的保证。合法地位是我们普通人民确立的。这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因为只要民主得到发展，人民群众参与解决涉及我们国家民主的今天和未来的一切问题就会有保证。”

1001 号案件

比利牛斯广播站再次使卡拉万切尔监狱里收听到了我对垂死的，但依然野蛮的佛朗哥主义的恐怖活动提出的抗议，对1001号案件中的工人委员会同志们表示的兄弟般的支持：

明天，12月20日，希特勒分子对保加利亚英雄的共产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进行的臭名昭著的审讯四十周年前夕，工人委员会一批领导人将以为争取工会自由、争取在我们国家重建民主与自由而斗争的罪名受到审判。

他们是十个人——这个词的最高含意中的人。他们表现了革命的尊严和坚定性，在佛朗哥主义血腥的独裁统治面前，代表了劳动的西班牙，文明的西班牙。

这真是历史的嘲弄，受审判的不是把西班牙共和国扼杀在血泊中的凶手，反而是一批因为捍卫劳动人民的权利，为反对掌权者的无法无天进行斗争而被认为有罪的人。

我们的人民把明天出庭受审判的人亲切地称为“卡拉

万切尔十人团”。他们为之而身陷囹圄的事业是正义的、高尚的。工人阶级以及我们国家一切民主的和进步的政治力量对他们的同情和声援都说明了这一点。

西班牙律师界最杰出的人士，其中包括信仰天主教的名流，将在法庭上为“十人团”辩护。

欧洲、美洲和全世界各国的各大工会、共产党、社会党、激进党、群众组织，都发出呼吁，要求释放西班牙工人领导人。

据宣布，在英国、意大利、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组成了观察员代表团或律师代表团，前往西班牙出席这次审判，表示他们对阶级兄弟的支持和声援。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这次人道主义的广泛运动的体现。

这一切尽管很多，但还不够。我们大家都应参加到这一场捍卫他们的运动中来。这是全体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一切希望生活在自由、民主和享有主权的祖国的人的一项神圣的义务。

我们国家进步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在各级政治和宗教领域里同政权的对抗已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同政权对抗的不仅有一贯为争取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权益而进行顽强斗争的工人阶级，还有大学生、中学生、教授、职业人员、妇女和我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

还有神甫和教会各圣级人员。有中间阶层，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象征。有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和加利西亚的民族力量。有纳瓦拉，拥有斗争传统的旧纳瓦拉，它今天同所有为自由与正义而斗争的力量共同前进。

有工人青年和学生青年，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但他们

反抗独裁统治，因为佛朗哥主义的一个个谎言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不攻自破了。

在佛朗哥政权与最广泛含义上的人民之间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这个关键时刻，在穷凶极恶的审判前夕，我抱着对在我们斗争中一直同我们在一起的国际声援的完全信任，呼吁帮助我们迫使他们释放——因为这是正义的——西班牙工人领导人卡马乔、加西亚·萨尔维、萨托里乌斯、索托、萨沃里多、马科斯、阿科斯塔、萨莫拉、桑蒂斯特万和费尔南德斯·科斯蒂利亚。

对西班牙劳动人民的国际声援万岁！

释放“卡拉万切尔十人团”！

“返回”战斗

对我来说，这是一条漫长的征途，尽管时间上是相对短暂的。在这一征途中，有激动、有困难和悲伤，有时这些困难似乎是无法克服的。此外，还要漫无边际地等待，这更是我难以忍受的。

对卡里略来说，这一漫长的征途无可比拟地更为激烈、危险，因而也是激动人心的，从而也显得更短些……

早在1976年2月，圣地亚哥就已经戴上假发和眼镜，在我们的朋友特奥杜尔福·拉古内洛的帮助下深入西班牙了。靠了聪明的同志们的英勇果断和卓有成效的合作，圣地亚哥能进出

西班牙，在那里参加重要的会见、政治会议，党的领导机构的全会……

圣地亚哥最终还是没能抑制住1944年幻想的从马拉加进入西班牙的念头——这是我的猜测——1976年9月，他终于实现了这一点。当然，这一次并没有带去他三十年前准备好的六十名游击队员，但是他这次确实经受了严重的风险，就靠他冷静的头脑和好朋友们的帮助，才得以绕过这些风险。

共产党领导人加速实现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的计划正在大胆而有步骤地进行着：同高级政界人士的多次会见、在马德里接受法国和瑞典电视台的采访，在马德里一间房间里，在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陪同下，卡里略同新闻界举行引人注目的记者招待会。可以想象，这一切都是在地下状态下进行的。

几天后，圣诞节前夜，卡里略和执行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开完会，刚走出会场时，被捕了，被投入卡拉万切尔监狱。

我立即给被捕的同志们打了一份充满深情和表示声援的电报。通过比利牛斯广播站，我又发表了如下声明：

西班牙人，全体西班牙民主人士希望和要求给予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西班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要求让我们党的总书记能在西班牙自由、正常地活动，然而就在这一时刻，苏亚雷斯政府竟然决定逮捕我们的同志卡里略和几位共产党领导人。

可以想见，在国际和国内立即发出了抗议声，抗议如此反民主的行动，在野的一切力量都声援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求释放他们，给他们以合法地位。

现在，正值大选阶段，竟然违背政府自己历次关于尊重西班牙人的政治抉择的声明，干出这种暴力与专横的行动，

阻碍所有西班牙人的和解和我们国家的民主正常化。

我们的党和其他政治力量一起，毫不含糊地主张进行立法性质的自由选举，把被篡夺了四十年的自主权还给西班牙人民。为此，一切政党毫无例外都应享有政治自由权利，必须立即释放圣地亚哥·卡里略和保证在西班牙能进行政治活动。

冻结了西班牙人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我们国家就无法治理。

不承认共产党这一支工人和人民的伟大民主力量，今天的西班牙就无法治理。

立即释放圣地亚哥·卡里略和全体被捕的同志们。

新年，我看自己还被迫流亡他乡，一种思乡之情压抑着我的思想，驱使我发表了如下几段话，就算是新年的贺词了。这一贺词通过比利牛斯广播站广播出去后，人们把它录了下来，后来又在卡拉万切尔住宅区庆祝新年的大厅里播放了，那里聚集着许多共产党人和朋友：

朋友们，同志们，

我们正在跨入新年。

1976年最后一个夜晚的鸡鸣声将宣告一个自由、正义的西班牙开始诞生，所有的人，不管是男还是女都将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必害怕遭到迫害和投入监狱。

我们要昂首挺胸阔步前进，既不要在苏亚雷斯政府的镇压面前卑躬屈节，也不要俯首帖耳于它的专制行动和武断、不公正的禁令。

我曾幻想能在我祖国的土地上，同我的人民、我党的同志们，我们的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一起，共度新年。我

想，经过四十年佛朗哥独裁统治、流亡生活和严峻的考验之后，这一愿望是合情合理的，是合乎人之常情的。

但是，令人失望的现实是卡里略和西班牙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七名成员在卡拉万切尔监牢过着铁窗生活。

而我却还在远离西班牙的千里之外，因为西班牙政府还是一味不肯发给我作为西班牙一位公民有权利得到的护照。

我希望，在国际声援下，我们党、我们人民和民主反对派的一切力量的声势浩大的运动能使全体被捕的同志得到自由，并能使我们的党和一切民主组织都取得合法地位。

任何镇压措施，任何专横武断的做法都不能阻止历史前进的步伐。

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反对和战斗动员必将在西班牙建立起民主制度。

一切使人民的行动瘫痪，使反对派分裂的阴谋活动必将失败。

我们跨入新年时，决心继续斗争，直到在西班牙建立起一个广泛民主的制度，使全体西班牙人能在这个多民族、多地区的国家里共存。

从千里迢迢的远方，我满怀激情，向身陷囹圄的我的全体同志们致敬。

我向共产党人，向我亲爱的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加利西亚以及西班牙全国的民主人士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同志们，朋友们，我衷心祝愿你们新年幸福，希望我们能很快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见面。

我的电报从卡拉万切尔监狱退回到了莫斯科：卡里略已经获得自由了。多高兴呀！我们党在向着合法化前进。总书记已经带着正式护照在马德里住下了。

但是，我回国的问题仍很困难，令人费解。

弗拉加·伊里瓦尔内几星期前就向法国一家报纸记者声明过：最好还是让热情之花留在西班牙国境之外，因为如果她到西班牙来，就不得不派专人长期保护她，而现在没有足够的警察来从事这一工作……

发表了一份六个人的名单，声明不能发给这些人护照，其中之一就是我。

弗拉加下台了，他的继任者们，对于我申请护照和回到我的祖国去的要求还是坚持那个荒唐、顽固的“不！”字。

甚至在我们党获得合法地位后——那是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神圣的星期六！——还是一味拒绝发给热情之花护照。

当然，如此毫无道理反对一位八十二岁高龄的西班牙妇女返回自己的故土，引起了我国国内和国际上的抗议。

人民在街头、在集会上高呼：“对，对，对，多洛雷斯应回马德里！”

朋友们，同志们的声援电从许多国家纷至沓来。

记者、电影工作者、作家专程到莫斯科来。又是拍电影，又是采访，又是拍照。一些即兴的采访很快就被写成关于我的生涯的书籍出版了。

那几天，我的家几乎成了通讯社。白天黑夜电话铃声不断，有从马德里、巴黎、苏黎世、波恩、伦敦……打来的，什么语言和口音都有。他们要了解热情之花什么时候动身返回祖国？热情之花想些什么？热情之花在西班牙要做些什么……我怎么知道！

我的外孙们索性不去接电话了。我的女儿尽一切可能对付他们。

在伊雷内的家里也是这样——我们的电话号码在国际上新闻机构一清二楚——，伊雷内在半夜里回答马德里的记者说：“还是请你们明天再谈吧！”“对不起，但是，因为有时差……”英国广播公司非要详细了解我的行程不可……

那几天，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当然，我们同我们在西班牙和法国的同志们是保持经常联系的。

电波突然给我们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使我们万分悲痛、伤心：我们五位同志，其中四位是律师，一位是管理人员被卑贱的极右分子谋害了。他们是：路易斯·哈维尔·贝纳维德·奥尔达斯、恩里克·巴尔迪维拉·伊瓦涅斯、弗朗西斯科·哈维尔·绍吉略·佩雷斯·德尔阿尔科、塞拉芬·奥尔加多和安东尼奥·安赫尔·罗德里格斯·莱亚尔。他们是在马德里阿托查街的劳工律师事务所工作时遇害的。

正当在西班牙升起自由曙光的时候，五位慷慨无私的青年被野蛮地杀害了。

阿托查街的罪行震撼了整个西班牙，使全世界民主舆论为之震惊。

在悲痛中，马德里人民团结一致，涌向街头，护送我们五位亲爱的同志到他们最后安息的地方。那是一次激动人心的送殡游行，它已载入我国人民和我们党为争取民主而斗争与牺牲的长久的历史。

终于回国

4月9日深夜，人们向我报告了一条重大消息：西班牙共产党获得了合法地位。这是西班牙民主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人民欢天喜地迎接了这一胜利。经过漫长的三十八年，我们就要获得完全的公民权利了。这三十八年，我们经历了地下生活、流亡生活，带着沉重的心情，漂泊于世界各地，但始终盼望见到我们祖国发出自由之光。

我的同志们从西班牙，从法国几次来电话向我报告了这一消息。

我们相信，我们很快就要生活在我们人民之中了。

但是，马德里仍顽固地拒绝。

他们为什么这样怕我呢？

几个月后，当我在阿斯图利亚斯地区当选为众议员时，议长埃尔南德斯·希尔先生极为亲切地对我说，我是西班牙历史的组成部分。我同意，因为在西班牙历史的一个阶段的进程中，我和我的人民及工人阶级一道参加了斗争。

但是，一个西班牙妇女由于参加了发展西班牙历史上的斗争，当局就这么惊惶失措，不让她进入国境？难道还可以给历史的发展关上大门吗？

最后，我党的领导机构同意了我的意见，决定结束如此荒唐的局面。

我将不带护照在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下飞机，谁还敢挡住

我的去路？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伊雷内和我的女儿阿玛娅将同我一起前往，她们也没有护照。卡门·梅嫩德斯从马德里赶到莫斯科陪同我们进行这次旅行。这是1977年5月初。

突然间，西班牙使馆通知我们：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和伊雷内·法尔孔的护照来了。

是不是苏亚雷斯的政府得知了我们“游击战”的打算？我不知道。不过，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5月12日，我们拿到了护照。

13日，我们坐上了莫斯科—马德里航线的一架飞机。

我想念西班牙

告别是不容易的。在舍列梅捷沃机场聚集着一大群朋友和同志。我的外孙们也在他们当中。要同他们告别了，要同所有与我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多年的人们告别了，我真是依依不舍。

苏联共产党领导机构的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同志来到机场，再次向我表示他们的情感并祝我取得成绩和幸福。我向他们、向苏联各族人民表示，我感谢他们的友谊，感谢他们对我国人民，对我们，流亡在他们国家的人所提供的帮助。

我登上了飞机，感到一阵心酸。我生涯中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令人钦佩的英雄的苏联人民中间度过的，在那遥远的、寒冷的，但对朋友又是热情、好客的土地上度过的。

还没有来得及感觉到时间的流逝，我们已着陆了，不过不

是在西班牙，而是在卢森堡。这是一般的停留。

但使我们惊讶的是几十名不同国家的记者一下子蜂拥而来，把飞机的舷梯围得严严实实。他们要求我举行记者招待会。

我决定留在座位上不动。伊雷内、阿玛娅和卡门尽力说服他们，请他们不要打搅我。他们恼火了。

“我们到这里来就为的这个？我们会说她病了！”

“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不过，多洛雷斯身体很好。”

我们又继续飞行。

在巴拉哈斯机场又将会怎样呢？

我事先就告诉同志们，我想象任何一个西班牙公民一样安安静静进入西班牙，不要群众迎接的场面。这是我由衷的希望。

我感觉到，我的这一愿望正符合西班牙当局的意愿。他们多么怕热情之花的到来呀……

终于到了西班牙的巴拉哈斯。到了我的西班牙！我激动的心情一时无法控制。终于！终于要踏上我祖国的土地，又要同我的人民，同我祖国的劳动人民融合在一起了！

在舷梯跟前，一些熟识的面孔在等待我们：伊格纳西奥·加列戈和胡安·安东尼奥·巴尔登。远处，在广场上，我们看到旗帜招展，听见人们欢迎的呼声，但是是有节制的。大家请我们上了伊比利亚航空公司的面包车，陪我们的有我们的同志们和警察——我又想起了弗拉加——我们不声不响地直往我们在皮拉尔区的新住宅。

他们向我保证说：“谁也不知道你的新住地。”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新闻界的职业特性。我们新的住宅——圣汉斯街第一幢楼——一下子就被摄影师、记者、电影摄影车围

得水泄不通。

费德里科·梅尔乔做了一件似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事：他说服了他新闻界的同事，让他们不要太劳累我。他们进了屋，给我照了相，向我表示了祝贺，接着是一连串问题：

“我能对你们说什么呢？我向你们大家问候。我重新回到我的国家，十分高兴。我是来过平静生活的，来为党工作的，正象人们在国家中正常工作一样，而不是来再次挑起历史纠葛的。我是来捍卫、宣传我们的思想的。对如何解决提出来的问题，有发言权的是人民……”

他们问我在我回到西班牙的时刻，想了些什么。

“激动、高兴……还有思乡之情。我很满意，但同时又伤心。因为我把我的外孙……我生命的一部分留在那里。这种心情是合乎人之常情的，不是吗？我们是共产党人，因为我们是有人性的。因为我们希望，人们生活幸福，没有忧伤。”

我的同志们也陆陆续续地来访了，有圣地亚哥，我下飞机时，他还在旅途中；有圣切斯·蒙特罗和卡门；有罗梅罗·马林和安东尼娅；还有许多人，青年人、老战友。我一一亲热地拥抱了他们。

我已经在西班牙了！

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到我的巴斯克去。然后到阿斯图利亚斯去，去参加竞选运动，因为阿斯图利亚斯的同志们希望我第二次当选为他们的代表。

那天晚上，我们游览了马德里。参观了一些给我们带来许多回忆的街道，如佛朗科斯·罗德里格斯街，在那里成立了第五团；加利略街，我在《工人世界报》编辑部工作时就住在那里；布拉斯科德加莱街，我的故土，我和我的孩子们曾在这条街区深处

的一所房子里居住过。然后，太阳门、西班牙广场、勒蒂洛公园……在马德里的街道上行走，生活在西班牙，多好呀！……

因为，我生命的四十年中，我想念西班牙！

“劈劈劈，啪啪啪， 欢迎多洛雷斯回老家”

我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我要在比尔巴鄂第一次参加群众集会。

此时此刻，描写不出那种壮观的场面，一名巴斯克女战士又同她亲爱的巴斯克相会了。我很难描写，是因为我当时是如此激动，在内心里积压了几十年的感情一下子全部爆发出来了。

在比尔巴鄂样品展览馆里成千上万名我的同乡——有人说是五万人——把我团团围住。他们的面孔我感到都是熟识的。红头巾、鲜花、写着 *Ongi etorri*（巴斯克语，意为“热烈欢迎”）；年青的长笛手演奏着 *Eusko Gudariak*（巴斯克语，意为“歌唱巴斯克战士”）。

我难以忘怀的朋友，才华非凡的诗人布拉斯·德奥特罗朗诵了以下几句诗句：

她出生于巴斯克
她象坎塔布连的海风
战斗，战斗；
她热爱矿工，热爱工农，
她象加利亚达的钢铁，

能经受种种锤炼。
她象我家乡奥罗斯科的栎树，
受人敬慕。

在我身边就座的有我的战友拉蒙·奥尔马萨瓦尔、托马斯·图埃罗斯、卡里略和其他同志，他们都在那次不可思议的群众大会上发了言。

四十多年前——由于激动，我断断续续地说——我离开了巴斯克，但是在我生命的任何时刻，不管是遇到痛苦还是欢乐，巴斯克的名字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它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中。在伟大的苏维埃国家，我们为了巴斯克而斗争，为了巴斯克献出了我们的儿女，他们在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英勇牺牲……

在阿斯图利亚斯

从我的家乡巴斯克，我们又飞速驱车前往阿斯图利亚斯，我们要在那里召集群众大会。一路上，座座村庄、绿色的平川、高山和丘陵，在我们眼前闪过，使我回想起我的孩提时代，我的青年时代，也使我回想起这个工业地区艰难、灰暗的身影。

1936年，阿斯图利亚斯的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曾选我作为他们的代表出席共和国议会。四十一年后，他们又提名我为他们在民主西班牙的众议员候选人。

他们的决定使我深为感动，同时也是大胆的。我已经是八十二岁的人了。

我在阿斯图利亚斯发表演说的时候，群众中有人高喊：

“伊巴露丽当众议员，大家不用讨论！”

我回答说：

“党可以推荐我，但是最后决定的是你们。”

在那一次难忘的，也是我最后一次竞选中，我参加了阿维莱斯、希洪、萨马德兰格雷奥、米耶雷斯……等地的竞选活动。

报刊上报道说，每次都有成千上万劳动者去听我们演说，听费尔南德斯·因关索演说。这个“乡下人”，不同凡响的共产党人陪同我出席了所有群众集会，1979年他接替了我在议会里的席位。我们党其他许许多多杰出的人物都在那些集会上讲过话。

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尽管我长期不在阿斯图利亚斯，这中间又发生过很多极其重大的事件，但是阿斯图利亚斯人并没有忘记我的名字。青年人从来没有见过我，但他们居然知道，我曾在1936年打开了奥维多的牢门，知道我曾下到卡达维奥矿井，支持那里的矿工罢工，知道我曾在1934年到阿斯图利亚斯救援被捕的同志们，并把几百名阿斯图利亚斯儿童，孤儿和被捕者的子女带出来，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方……

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呢？在劳动人民的家庭，革命传统是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传的。

加维特的一位同志给我寄来一首为阿斯图利亚斯名曲填的词：

阿斯图利亚斯，亲爱祖国，
阿斯图利亚斯，我炽热地爱着你，
四十年的风和雨，
多洛雷斯，今天我们又见到了你。

里亚尼奥党基层组织的一名阿斯图利亚斯姑娘对我说：

里亚尼奥的居民
也想告诉你
多洛雷斯，
我们投你的票，
支持你。

被人篡夺的席位
很快你将收回，

6月15日

你就将是众议员。

阿斯图利亚斯过去和现在都把我当作亲人一样接待。流逝的年月没能摧毁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这是割不断的纽带。我对阿斯图利亚斯人说，在我流亡的年代里，我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阿斯图利亚斯，因为想念阿斯图利亚斯，就是想念西班牙：

今天一见到你们，我就想，我们所作的一切牺牲都不足以同你们的英雄主义和你们的牺牲精神相比拟。你们可以相信，1977年的伊巴露丽，尽管今天有八十二岁的高龄，但还是和当初一样精力充沛。

这是我真心实意的愿望。我同许多老战友会了面，我们拥抱，我们哭泣。也高唱故乡旧民歌，喝几口苹果酒。我还穿起了他们送给我的木底鞋，还在一个粮仓前照了相。

和赫拉尔多·伊格莱西亚斯在一起

我同年轻的领导人热情拥抱，其中有赫拉尔多·伊格莱西亚斯，他曾当过矿工，当时是工人委员会的书记。他还把自己也叫鲁文的儿子带来给我看。

我称他们是年轻的领导人。但是我知道，赫拉尔多十五岁就参加了党，参加过斗争，并由于是共产党员而坐了一年监狱。

赫拉尔多·伊格莱西亚斯和我当时都没有想象到——也不可能对后来发生的事未卜先知——六年后他被选为我们党的总书记。

赫拉尔多的弟弟陪同我参加了整个竞选活动。

对那些向我热情鼓掌的群众，我回答说：“阿斯图利亚斯的劳动者们，我向你们学习到了怎么做个坚毅不拔的人，做一个革命者，做一名共产党人。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们的榜样。”

我被选为阿斯图利亚斯的众议员

1977年6月15日来到了。我怀着喜悦和感激的心情看了大选的结果。劳动者的阿斯图利亚斯在四十多年中第二次选我当众议员进入马德里的议会。

罗马法教授文塞斯劳·洛塞斯同志当选为代表阿斯图利亚

斯的参议员。他曾在共和国政府里担任过公共教育部副部长。他由于把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西班牙文而十分出名。

蒙特塞拉特修道院

我记得，在我第一次去巴塞罗那时，我曾要求谒见蒙特塞拉特修道院院长董·卡西亚·胡斯特。

当我千里迢迢流亡他乡时，就得到消息说那个修道院对受迫害的反佛朗哥主义者采取同情态度。

有一次我还通过洛佩斯·雷蒙多同志从莫斯科给修道院院长送去一个俄国的圣像，以表示我对他的钦佩和感激。我也高兴地收到了修道院送给我的一只和平鸽。这是蒙特塞拉特作坊制作的陶瓷品。

现在，我就是去向修道院院长表示敬意，表示我对他的尊敬。这是一次最为亲切的会见。与我同去的还有杰出作家、基督教徒和共产党人，我们难忘的阿丰索·卡洛斯·科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主席洛佩斯·雷蒙多和其他一些朋友。听完我表示感谢的话后，修道院院长只是简单地回答说，他做了他应做的事。我们还带着钦佩与感激的心情追忆了蒙特塞拉特修道院前院长奥雷利·埃斯卡雷。由于他采取了保护佛朗哥独裁专制的牺牲者的崇高态度，1965年被驱逐出西班牙，被迫回罗马，不久在罗马逝世。我们还追忆了争取民主与正义的战士，我们共同的朋友们。长期而痛苦的战斗并不是徒劳的。我拜访蒙特塞拉特修道院就证明了我们已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制度下了。

大家都知道，我重视基督教徒争取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它对象我们这样有天主教传统的国家有重大影响并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意义。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不少文章。

1968年我在莫斯科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作报告时，我就强调指出：

我想简单地谈一谈今天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一个很紧迫的问题。由于社会主义和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胜利，在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一些新现象。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对这些新现象中的一个问题不予以应有的重视，那我们就会犯错误，这会对我们不利。

这个新的现象就是天主教教会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请同志们原谅我在这里坚持提出这一个我在别的场合多次提到过的问题，因为我认为它对我们非常重要。天主教徒和部分教士开始转向主张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主，向社会主义靠拢。

甚至一些国家的某些高级圣职人员，1917年以来，特别是在苏联战胜希特勒后，他们懂得了历史不会倒退这一道理，因此对于世界上发生的变化不再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了。

对马克思主义者不再革除教籍了，也不谴责他们了。而且有时还同他们并肩斗争。

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能够，也应该帮助这一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争取民主与进步运动的发展。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我们就违背认为任何东西都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发展

的辩证唯物主义。我们也会同自己相抵触，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影响着整个当代生活的发展与变革，对天主教教会这个反动堡垒的政策也有影响，它过去一贯是，而今天却越来越不是反动堡垒了。

旧的反宗教的陈词滥调对我们来说没有用了。

今天，我们不能象过去那样认为群众性的天主教运动是纯粹反动的运动。

这些群众性运动确实成了力图通过改良的途径改革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督教运动。但是在这些运动中，有一些最彻底、最进步的团体公开表明它们对社会主义的好感，认为同资本主义相比较，它是在技术与经济上更有效，在社会方面更公正的制度。

而另一方面，在我国，我们每天都在证实这一点，不只是信仰天主教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甚至有些神甫都声明他们不希望宗教继续是毒害人民的鸦片，而且和人民一道参加抗议游行，象工人一样，遭受警察的毒打，并作为社会不安定分子被逮捕和审讯。

在巴塞罗那同塔拉德利亚在一起

加泰罗尼亚议会当时的议长，最受尊敬的何塞普·塔拉德利亚，由他夫人陪同，在圣海梅广场的宫殿里亲切地接见了我们。

与我一起去的还有众议员、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主席格雷戈里奥·洛佩斯·雷蒙多。

那是一次老朋友之间，经历过长期而痛苦的流亡生活的老战士之间的亲切的会见。

我们两人又重新生活在我们祖国了，两人都抱着乐观主义，尽管两人都意识到了刚刚诞生的民主所面临的危险。

塔拉德利亚头脑清醒、积极热情，准备继续争取在民主的新西班牙建立享有其一切民族权利的自治的加泰罗尼亚，许多年前就已开始了的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非常友好地告别了。我以对这位加泰罗尼亚的历史人物何塞普·塔拉德利亚一直怀有的尊敬心情同他握了手。

就在我从流亡回国后第一次访问巴塞罗那期间，我很高兴拜访和拥抱了我的同志和朋友拉斐尔·维迭利亚、何塞·博尼法西大夫和他的妻子埃尔维拉。

我们在不同国度，不同情况下，共同工作与生活过许多年。幸亏博尼法西这位医术高明的大夫，我才多次得以死里逃生并康复。

博尼法西和我是同时代人。尽管他在他美丽的家乡静静地过着有点隐居的生活，我们还是互相想念着，还保存着在困难时刻经受过考验的真正友谊的基础上培植起来的相互间的情感。

一位传教士给我写信

我在1960年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唯一的道路》，描写过在内战时期，当我得知，有几名女信徒躲藏在马德里贝拉斯克斯街一幢房子里，有被不法集团袭击的危险时，我忙去看她们，向她们

提供保护与帮助。

四十三年后，我在马德里收到如下的一封信：

我最尊敬的夫人：

愿上帝保佑您平安！

我是一个信徒，您不认识的信徒，而且当您看这封信时，我已离开马德里到外国履行职责去了。您收到这封信，定会感到惊讶。我为什么要给您写这封信呢？

因为我正在修道院里静修……在我住的这间房子里，有一幅很美的悲伤的圣母画像。在塞维利亚，我曾听一位修女讲到这幅画像的来历。那位修女就是1936年10月躲在贝拉斯格斯街的那群修女中的一位。她对我说到您对她们很好，说您在门上贴了一张标语，说明您在那里，就这样保护了她们，使她们摆脱了可怕的不速之客，说您还送给她们这幅悲伤的圣母的像，让她们看护着。

她们从来没有忘记过您对她们的益处，总是祈求圣母保佑您。

修女们在祈求时，还带着感激的心情想念您，而且她们的庇护神，悲伤的圣母的画像后面还写着它的来历，还有一张注明日期、印有您的半身像的名片也在我们圣母的保护下。我想，当您知道此事时，会是很高兴的。

愿圣母保护您，关心您，指示您的道路，愿您在悲伤和受难的时刻，得到安慰、希望和帮助。

顺致对我们的上帝和救世主耶稣基督虔诚之心。

签名

（因为我没有得到授权公开她的姓名，恕我删去她的署名。）